

贸易和发展报告 2012

实现包容性和
平衡增长的政策



联合国

201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日内瓦

贸易和发展报告 201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的报告



联合国
2013年，纽约和日内瓦

说明

-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
- 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
- 本出版物的材料可自由援引或翻印，但需说明出处及文件号码。应向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交一份载有文件引文或翻印部分的出版物。
-

UNCTAD/TDR/2012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C.12.II.D.6

ISSN 0251-8015

版权©联合国，2013年
版权所有

目录

页次

解释性说明	ix
缩略语	xi
概述	I

第一章

当前世界经济的趋势和挑战	I
--------------------	---

A. 世界经济近期趋势	1
1. 全球增长情况	1
2. 国际贸易	6
3. 商品市场	9
B. 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16
1. 通往强劲和平衡增长的道路艰难	16
2.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范围	21
3. 结构性改革不能代替扶持性宏观经济政策	23
注释	27
参考文献	28

第二章

收入不平等：主要问题	31
------------------	----

A. 收入不平等与市场机制	31
B. 不平等与经济理论	33
C. 一些关于不平等、就业和增长的经验证据	37
D. 向前看	40
注释	42
参考文献	42

第三章

收入不平等的演变： 不同的时间角度和方面	45
-------------------------------	----

A. 引言	45
B. 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的长期趋势	47
1. 功能收入分配	47
2. 最高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	49
3. 个人收入分配	51
C. 仔细审视1980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	52
1. 功能收入分配	52
2. 个人收入分配	55
3. 不平等和贫穷	60
D. 全球收入不平等	62
E. 不平等的其他方面	65
1. 财富分配	65
2. 性别不平等	68
3. 教育机会不平等	71
注释	74
参考文献	76

第四章

全球化与技术的变化 及其对国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	79
------------------------------------	----

A. 导言	79
B. 贸易、技术与生产结构转变	81
1. 1990年代初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	81
2. 关于“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新”辩论	83
C.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	98
D. 结论	103
注释	106
参考文献	110

第五章

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113
A. 导言	113
B. 财政政策和不平等	115
1. 财政与收入分配	115
2. 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	115
3.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共收入	119
4. 财政空间与公共支出	123
5. 通过公共支出影响收入分配	126
C. 政策建议	129
1. 经验教训	129
2. 课税、分配和增长	130
3. 发展国家的财政空间	131
4. 减少不平等的公共支出	133
注释	135
参考文献	137

第六章

重新思考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141
A. 导言	141
B. 失业与工资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	143
1. 传统方法：通过抑制工资增长创造就业	143
2. 其他方法：将工资增长作为决定需求增长的关键因素	146
C. 企业工资灵活性和市场经济活力	150
D. 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建设	155
1. 参与型社会与动态调整	155
2. 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	155
3. 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收入和就业政策	159
4. 法定最低工资	160
5. 国际框架	161
E. 结论	166
注释	167
参考文献	168

表目录

表		页次
1.1	2004-2012年世界产出增长率.....	2
1.2	2008-2011年部分区域和国家的商品进出口量.....	7
1.3	2006-2012年世界初级商品价格.....	11
3.1	1920-2010年部分国家的工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	48
3.2	1980-2010年按区域分列的不平等情况变化.....	57
3.3	1981-2008年部分国家组类别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61
3.4	1988-2008年世界收入不平等情况分解表.....	64
3.5	部分国家财富和收入集中情况.....	66
3.6	按区域分列的拥有企业、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和 全职就业的妇女百分比.....	69
3.7	2008年按性别和职业类别分类的就业分布情况.....	69
3.8	1971-201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	72
5.1	1981-2010年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指标.....	116
5.2	1991-2010年若干地区的财政收入指标.....	117
5.3	1991-2010年若干地区和国家组的财政支出.....	125

框目录

框		页次
1.1	贸易不平衡和欧元区危机.....	20
2.1	不平等、储蓄和投资.....	35
6.1	工资的确定与边际生产率.....	153
6.2	为应对进口价格冲击而进行的工资调整.....	158
6.3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德国的相对成功与欧元危机.....	162

图目录

图	页次
1.1	1970-2012年各区域对世界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贡献..... 4
1.2	2000年1月至2012年4月世界贸易量 7
1.3	2000-2011年净易货贸易条件..... 9
1.4	2002年1月至2012年5月按商品组分列的月度商品价格指数..... 10
1.5	2006-2012年部分国家类别的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及净出口和国内需求的贡献..... 18
1.6	2005-2012年部分国家和国家类别的经常账户平衡情况..... 19
1.7	1980-2011年公共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 23
3.1	1915-2010年部分国家收入最高的1%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 49
3.2	1890-2000年按区域分列的基尼系数..... 51
3.3	1980-2010年部分国家的功能收入分配情况..... 53
3.4	1980-2010年部分国家毛收入和净收入基尼系数..... 56
3.5	1963-2009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63
3.6	部分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基尼系数 66
3.7	1985-2010年男子和妇女之间的工资差距..... 70
4.1	1974-2008年美国处于各分配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比率..... 83
4.2	1993-2006年美国 and 欧盟若干国家按职业水平划分的就业份额变化..... 84
4.3	处于经济追赶期的若干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的制造业工资..... 85
4.4	1995-2010年若干国家和国家组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的商品，按产品类别划分..... 87
4.5	1995-2010年若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制造部门就业和收入不平等..... 89
4.6	美国各部门的就业增长、增加值和生产率..... 92
4.7	2000-2010年若干国家的贸易条件与收入不平等..... 97
4.8	1995-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实际私人资本流入净额与实际有效汇率..... 100
4.9	1980-2010年新兴经济体外部资产与负债的构成..... 101
4.10	1990-2010年若干新兴经济体有价证券权益负债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 102
5.1	1975-1979年与2004-2008年若干经合组织国家位居前列的边际所得税率 118
5.2	1975-1979年至2004-2008年，若干经合组织国家最高档边际所得税率变化、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最高1%所得份额..... 119
5.3	1982-2005年若干发达国家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率与固定资本形成毛额..... 131
6.1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雇员报酬与失业率..... 144
6.2	1981-2011年若干国家就业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147
6.3	1981-2011年若干国家的就业增长与固定资本形成毛额..... 148
6.4	单位劳动力成本与通胀的年增长率..... 157

国家或商品组分类

本报告中的国家分类只是为了便于统计或分析，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做出了任何判断。

本报告所用主要国家类别，照搬了联合国统计处的分类。具体类别如下：

- » 发达或工业(化)国家：系指经合组织成员国(墨西哥、大韩民国和土耳其除外)，欧盟新成员国及以色列。
- » 转型经济体系指东南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 » 发展中国家：系指上面未提及的所有国家、领土或地区。

“国家” / “经济体” 两个词在适当情况下也指领土或地区。

正文或表中提到“拉丁美洲”，除非另有说明，也包括加勒比国家。

正文或表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除非另有说明，也包括南非。

为了便于统计，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使用的商品组区域分组和分类，一般都是照搬贸发会议《2011年统计手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B.11.II.D.1)所用的分组和分类。有关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的数据。

其他说明

正文提到《贸发报告》系指(某一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例如，2011年《贸发报告》系指《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1.II.D.3)。

“吨”系指公吨。

年增长率和变动率系指复合率。

出口额按离岸价格、进口额按到岸价格估算，除非另有具体说明。

在指代年份的两个日期之间使用连字符(-)，例如，1988-1990年，系指所涉整个时期，包括开始的一年和最后的一年。

两个年份之间使用斜线(/)，例如2000/01年度，系指财政年度或作物年度。

圆点(.)表示该项目不适用。

两点(..)表示没有资料，或未单独报告。

短划(-)或零(0)表示数量为零或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四舍五入，各项小数和百分数加起来不一定等于总数。

英文简称	中文简称	中文全称
ADB	亚行	亚洲开发银行
BCBS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
CCT		有条件现金资助
CIS	独联体	独立国家联合体
EC-AMECO		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
ECLAC	拉加经委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B	欧洲央行	欧洲中央银行
EIU		《经济学家》资料处
EMU		欧洲联盟经济和货币同盟
EU	欧盟	欧洲联盟
FAO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SB		金融稳定委员会
GDP	国内总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
GFCF		固定资产形成总值
ICT	信通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
ILO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或劳工局)
IMF	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KILM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国际劳工局数据库)
LDC		最不发达国家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FA		多种纤维协议
NIE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ECD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PP		购买力平价
SME		中小型企业
SOE		国有企业
SWIID		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TDR	贸发报告	贸易和发展报告
TNC		跨国公司
UNCTAD	贸发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ESA	经社部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UNDP	开发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CA	非洲经委会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欧洲经委会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SCO	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ICEF	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DO	工发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SD	统计司	联合国统计司
VAT		增值税
WESP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WTO	世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概 述

世界经济继续受到始于2007年底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9月的金融崩溃的影响，尚未能恢复之前十年的增长条件。当时，这种增长条件特别有利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而随之产生的动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动力，在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得到控制之后，帮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然而，这些国家正在失去这一动力，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再度抬头。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无法回归正常的增长模式，但危机蔓延的问题也同样严重。发达国家的复苏是脆弱的，金融部门未经改革(且不知悔改)，宏观经济政策说得再好也只能说是缩手缩脚，说到最坏处是在起着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增长动力都难以为继，更不用说维持全球经济的增长了。

在美国，乏力的复苏依然容易受到在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的危害，因为双方的金融体系交织甚深。整个欧洲正处于严重衰退的边缘，一些成员历年来一直在倒退。美国和欧洲试图战胜本次危机的尝试都以财政紧缩为主，同时呼吁它们的劳动市场实行进一步的“灵活性”。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限制工资，在某些情况下还意味着大幅降薪。然而，这些政策更可能进一步削弱增长动力并增加失业，并不能刺激投资并创造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正如发展中世界过去30年来所采用的类似结构性改革政策所显示，这些政策还会加剧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这已成为金融驱动型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的破坏性特征。

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确定政策导向，并认识到健康的包容性增长需要在就业人口的收入预期良好，企业家有肯定的需求预期的基础上，稳定地拓展消费和产能投资。这需要重新思考设计国家经济政策和支持性国际体制安排时所立足的根本原则。

特别是，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及二者的相互作用既创造了赢家也创造了输家，但要了解二者在许多国家对总体收入分配状况造成的显而易见的不利影响，就必须考虑这些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政策已造成失业率上升且居高不下、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增长，且使租金收入流向了位于收入阶梯顶端1%的人囊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不一定需要对收入分配作重大转变，乃至青睐富人而使穷人和中产阶级无法改善生活标准。恰恰相反，如果国家和国际政策更加适当，并考虑进总需求对资本形成、结构变革和增长态势的至关重要性，创造就业的速度就可以加快，不平等就可以减少，必要程度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可以得到保障。

全球复苏：不均而脆弱

2009年年中开始的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复苏一直不均而脆弱。虽然增长在一些发展中区域已重获动力，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仍无法启动，整个私营部门都在去杠杆化，高失业率让千家万户心神不宁，政府则急于收紧预算。全球的决策者，包括20国集团一级的决策者，对如何穿透笼罩全球经济之上的不确定性的浓雾，并“将所有的船都推上”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增长道路，缺乏清晰的思路。

2011年年末，全球经济显著疲软，而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已于2012年上半年浮现。2011年全球GDP增速已有所下降，预计2012年将进一步放缓，降至2.5%左右。

尽管美国的GDP增幅微有上升，且日本增幅更加显著，但因为欧洲联盟(欧盟)当前深受衰退之苦，2012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增幅可能只略高于1%。衰退集中在欧元区，而欧元区当局至今尚未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以处理该地区的内部失衡及相关的过剩债务。当局选择的无条件紧缩政策正在扼杀向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回归。确实，不能排除欧洲经济状况出现进一步恶化。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 由内需和高商品价格推动

发达国家仍在努力重启复苏，但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GDP预期将保持相对高位，分别为5%和4%。确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设法夺回了危机造成的失地。这主要是源于采取了扩张式的需求方政策。例如，中国只付出整体增长预期小幅下降的代价，就能吸收经常账户顺差急剧下滑的冲击，还不用限制实际工资的增长。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尽管经常账户有巨额顺差，却无法避免经济停滞。

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表现上佳，私人消费和工资增长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GDP增速正在小幅放缓，但预计2012年仍能维持在3.5%左右。这种增长来自强大的内需，而维持这种内需的是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增长。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一些国家已经在采取反周期政策，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和在货币方面采取更通融的政策。这些国家一直受益于高公共收入和外国资本流量管理等积极的金融政策所创造的政策空间。结果是，投资率上升，失业率降至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经济扩张以及北非国家在2011年内部冲突结束后的经济复苏，非洲增长率有所上升。相对较高的初级商品价格有利于外部平衡和财政平衡，使许多国家得以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对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也支持了国内支出和增长。

亚洲依然是增长最快的区域，但也在经历经济放缓，预计2012年GDP增速将从2011年的6.8%降至略低于6%。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受到发达国家需求减弱的不良影响，

以及2011年为防止通货膨胀抬头和资产价格上涨而采取的银根紧缩政策的不利影响。由于来自国际经济的“逆风”，这些国家已在此后放松了货币政策，其中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反周期措施。区域增长是以家庭收入的持续扩张、从外需向内需的转变以及高投资水平为基础的。

2012年转型经济体的增速预期将保持在4%以上。这一增速完全归功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的活力。独联体增长的基础，是受到贸易条件收益和/或巨大的工人汇款刺激的强大内需；而在供给方面，农业部门的复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全球贸易扩张缓慢

国际贸易扩张继2010年强劲反弹之后，于2011年放缓至仅有5.5%，2012年可能进一步放缓。尽管2012年上半年日本和美国的贸易量确实有所增长，但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欧元区，贸易量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更有活力，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2011年的增长也大幅放缓，降至6-7%上下。一些商品出口国是例外，因为有从贸易条件的收益，它们的进口得以实现两位数增长。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这些国家因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从中受益，即使按历史标准，这种价格也依然是很高的。然而，这些价格持续呈现较强的波动性，且在2011年头几个月达到峰值之后一直呈下行趋势。

全球复苏有相当大的下行风险

全球复苏和良性重新平衡的主要障碍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中，美国继续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经常账户逆差，但因为进口明显收缩，2009年外部逆差已下降到了GDP的3%。此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保持稳定，而内需增长迟缓。此外，未来的巨大风险是，明年年初之前，不成熟和过度的财政紧缩将可能显著阻滞增长。全球复苏面临的更大问题是，欧洲对出口愈发依赖。德国今天的外部顺差只比危机前低一点点。迄今为止，德国很大一部分顺差都被主要由欧洲其他国家产生的逆差所抵消。然而，当前的危机正在降低收入和进口，而且随着大部分国家都在试图提高竞争力，欧盟的对外头寸可能会转为可观的顺差。整个区域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出口走出危机。这可能大大拖累全球的整体增长，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恶化。

欧洲的危机正被广泛地称为“主权债务危机”，因为公共财政状况自全球金融危机伊始已经显著恶化，且许多国家的利率急剧攀升。然而，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收益率也降至了历史低点，因此与这些国家相比，大多数欧元区国家的公共财政状况并不显得如此惊险。总体上，在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恶化主要是自动稳定机制的运作和2008年底震荡之后挽救金融机构所造成的，不过当时形势严峻，挽救金融机构完全是理所应当。然而2010年以来，推行“退出战略”、放弃财政刺激的呼吁以及进行快速财政整顿的呼吁已占据上风。结果是，财政紧缩已成为整个欧元区的“黄金法则”，南欧的成员国不得不承担特别严苛的财政紧缩。这一措施可能不仅会起反作用，甚至会对欧元造成致命损害，并严重危及世界其他地区。

欧洲财政赤字上升只是欧元区危机的表象，并非是其根本原因。经济与货币联盟内长期利率差距极大，其背后的原因，是巨大的工资和价格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成员之间愈演愈烈的区域

贸易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在开始形成的时候，最重要的应对工具(即汇率变化)却恰恰已不复存在了。许多关键国家的财政政策受意识形态所限，现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又明显力不从心，因此现在的政策工具必须另辟蹊径。

结构性改革不能替代增长战略

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财政政策的作用都需要从动态的宏观经济视角加以重新评估。财政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的变量，依赖于政策选择与体制能力的综合因素。特别是，稳定GDP的增长并保持低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助于保障财政空间，并实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无论在全球还是区域，财政空间都没有得到均衡配置，但放缓内需和GDP的增长从来就不是帮助整顿公共财政的可行选择。对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前景至关重要，系统重要性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要明智地利用其可用的财政空间以恢复增长，并为重新平衡经常账户提供支持。

进一步使全球复苏前景黯淡的是，发达国家的决策者，特别是欧洲的决策者，现在似乎再一次把希望寄托于“结构性改革”。然而，解开这些改革的语言密码，其实质就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包括削减工资，削弱集体谈判，并加大部门间和公司间的工资差距。这一结构性改革议程背后的推理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一推理完全是基于微观经济考虑，而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因素的宏观层面。紧抓着这种改革不放，在当下失业率上升、个人需求下降的形势下可能是危险的。此外，重新平衡措施不对称，完全让欧洲边缘地区那些受到危机冲击且经常账户有逆差的国家肩负调整的负担，注定会进一步危害区域增长。

需要重振全球治理改革

2008年为了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协调而建立的20国集团进程已经失去动力。尽管受货币投机驱动的汇率失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它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际金融改革是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危机促使各国考虑制定议程，为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更加安全的基础，但决策者对此的关注依然时断时续、犹豫不决。

现在看来，大好时机已经一去不返，绝不要“浪费严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这一建议无人理睬。金融危机和挽救措施已导致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而金融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其政治影响力。金融产业集体行为的指导原则依然是短期回报而非长期生产力，即便今天也是如此。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活动或许能再次成功规避监管，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近期的银行业丑闻就是鲜明的证据。

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去杠杆化即便确有必要，但也可能再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去杠杆化的过程未能有序渐进，而是因为出现新的震荡，银行资产负债表突然承压而强迫去杠杆化，那么，它也可能会影响国际银行借贷。在此方面，能否获得贸易融资的问题特别令人关注，可能需要新的全球举措，以确保发展中国家不会受到外部信贷紧缩的不利影响。

收入不平等加剧：过去三十年来的一大特征

财政紧缩，加上工资限制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弹性化，不仅导致经济收缩，还会在收入分配上产生更大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对社会凝聚力的威胁在一些国家已经明显可见。然而，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完全不是近期出现的现象；尽管新千年之初以来，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趋势已经停止。但这依然是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较为稳定的分配维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自1980年前后，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都下降了。在几个发达大国，1980年至1995年间就出现了大幅下降，当时上升的失业率开始对工人造成压力，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平均工资开始落后于整体生产率增长。这一趋势在一些国家持续了二十年。随着许多发达国家采取压缩工资的方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以及失业率创下新高，这一趋势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在若干发达国家，伴随这一趋势，收入最高的群体和收入阶梯底层群体之间出现了鸿沟。

在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初以来，工资所占的份额也有下降的趋势。然而必须记住，相比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职能收入分配数据不太能说明问题。这些国家的活跃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自谋职业者，从事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活动或零售商业活动，如果将他们的所有收入都视作资本收入，会导致错误结论。

1980年后所有区域的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

个人收入分配反映利润和工资之间分配情况、不同收入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家再分配情况；在战后，这种分配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日趋平等，直到1970年代。随后，收入差距拉大了。衡量各收入群体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证实了这一趋势：1980年至2000年间，22个发达国家中有15个出现了个人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不过在其中的8个国家，这一趋势在2000年之后有一定程度的扭转。

在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通常比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更加显著。和发达国家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三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拉丁美洲国家除外。但1980年至2000年间，所有发展中区域的不平等状况都普遍加剧。进入新千年以来，各发展中区域的收入分配趋势发生了差异。

1980年代到90年代，在18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有14个国家不平等状况加剧。到2000年，这一区域的整体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峰值，但在此之后，这18个国家中有15个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然而总的来说，不平等状况比1980年代之前严重。

1980年至1995年间，如同拉丁美洲一样，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不平等程度在已经较高的情况下继续上升，但这一上升比其他区域晚开始几年。在23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包括几个人口大国)，另有10个国家不平等状况有所减轻，而余下3个国家则保持不变。1995年后，25个国家中有15个收入差距缩小，主要是在南部非洲和西非，但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10个国家中，有6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在亚洲，虽然个人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低于其他发展中区域，但自1980年代初开始，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体现在两个方面：各收入群体的收入差异加大，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也上升了。不平等状况加剧在印度尤其显著，在东亚和东南亚也有所加剧，1980年至1995年间，在9个有相关数据可查的国家中，有7个出现了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东亚的不平等状况在2000年之后继续加剧，不过速度较慢。在许多亚洲经济体，金融活动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其他活动所获收入的增速。

1980年代以来，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不平等状况也显著加剧。2000年以后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尽管平均实际工资快速上升，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却有所下降，工资差异也在多个层面上加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差异加大、内陆和沿海区域差异加大、特定职业的技术工人与技能水平较低的移民工人差距加大。1985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也上升了，但相比国际水平依然较低。

直到1990年代初，中欧和东欧的收入分配在所有国家组别中是最平等的。而随着中欧和东欧国家转型为市场经济，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急剧下滑，这一区域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加剧幅度超过所有其他区域，不过仍然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所有区域，1980年代初以来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都与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中有关。拥有的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不仅是收入来源，也便于获得信贷以及参与政治决策的特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在此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在拉丁美洲尤其严重，那里收入不平等也最为显著，而在东亚和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所有权则相对不那么集中。

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过去三十年来收入分配的变化是与贸易和金融的加速流动，国际生产网络的扩散，技术的高速变革等同步发生的，其主要原因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设想，即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构变革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甚至是这一变革的前提。然而，上个世纪也一直在发生结构变革，其中有些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低。

确实，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生产链和制成品的国际贸易，都刺激了全球化。此外，相比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技术变革，近几十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方面的进步速度可能更快。但在此之前的几十年，生产力的增长很快，而因为同时创造了充足的新就业岗位，收入差异反而缩小了，这也是事实。

发达国家的结构变革和公司战略

1970年代至80年代，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去工业化”时期，它们近几十年的结构变革因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而成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加强而成型。在一些国家，伴随这种改变的，是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的调整——即，与

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需求相比，对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降低了。1990年代中叶以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量的增速加快，这主要是离岸生产造成的。

这种迁址生产的做法愈发频繁，个中原因不仅是贸易自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加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且也是发达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进行公司战略变革。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导致管理者只注重公司的短期盈利能力以及提高公司股票市场价值。这一方针已经改变了公司在高失业率情况下应对竞争压力的方式。公司不再着眼长远，不再通过投资和创新提高生产力，从而进一步升级其生产技术、改善产出产品构成，反而更加依赖于将生产活动搬迁至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低薪地区，并试图通过压缩工资降低国内单位劳动成本。工人持续面临失业的危险，讨价还价的地位被削弱，这种情况增强了赚取利润者对工薪阶层权势，从而更便于公司采取上述战略。与此趋势相关的是，掌握不同技能的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加剧，掌握相同技能但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也加剧了。

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状况的结构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

不同发展中区域和转型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加剧，但它们的发展路线却有很大的差异。在一些国家，比如有些亚洲经济体，不平等状况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加剧。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不平等加剧发生在经济停滞或萧条时期，例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1990年代的转型经济体。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还有一些转型经济体，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平等状况加剧是在“过早”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劳动力脱离了正规部门的制造活动，转而走上生产力低、薪酬也低的就业岗位，例如从事非正规的服务业和生产初级商品等工作。工业就业率下降，同时实际工资绝对值出现大幅下滑，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降幅达20-30%上下，导致收入差异增大，同时人均收入增长停滞或下滑。

一种解释是，许多自然资源丰富且工业部门刚刚起步的国家发现向国际竞争开放之后，难以维持动态的结构变革进程。这些国家不像发达国家，尚未获得技术创新的能力，无法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升级到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的活动。此外，这些国家又与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低收入国家不同，没有或者不再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发达国家公司的离岸劳动密集型活动中获利也不如低收入国家多。那些相对早些时候获得了一定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可能也受到了其他低薪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量增长的不利影响。

然而，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在1980年代初债务危机之后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这些国家获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实施了结构调整方案，在此背景下，与贸易自由化同步进行了金融自由化，同时实行国内高利率，以抑制高通货膨胀率或吸引外资。这往往导致货币估值过高、国内生产商竞争力受损以及工业产量和固定投资下滑，即便国内生产商试图通过压缩工资或裁员应对价格压力，也无济于事。

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制造业部门增速不够，无法创造充足的就业，且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被非正规和低薪的就业岗位吸收了，而农业上的价格自由化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在非洲尤甚。自由化就算有益，受惠的也主要是交易商，农民所获甚少。此外，虽然工业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情况，比如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许多国家就是如此，但从事生产并创造就业岗位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活动，这些活动未能启动并维持深化工业化的活跃进程。结果是，专门生产初级商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传统模式即便谈不上被强化，至少也是保留了下来。

1990年代末以来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些改善

过去十年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是在外部条件改善的背景下，特别是初级商品的国际价格提高，偿债负担减轻的背景下发生的。然而，由于内部结构和国内政策不同，外部条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并非一致。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通常高度集中，石油和矿物产品价格的上涨容易加剧收入不平等。尽管如此，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2002年以来已经成功地将贸易条件收益转换为整体经济中广泛的收入增长，从而成功缩小了收入差距。得以实现这一成果的方法是，增大财政收入并推行有针对性的财政和工业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在初级商品部门之外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支出，在公共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在与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行业和制造业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and 更加渐进的所得税也非常重要。此外，许多国家提高公共收入，以增加社会支出。若干国家还采取了有管理的汇率体系和资本控制的措施，目标是堵截投机性资金流入，并防止货币估值过高。

亚洲高速工业化，不平等状况加剧

在许多东亚经济体和东南亚经济体，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工业政策在全球化增强的背景下刺激了高速的工业化并支撑了经济增长。在这些次区域，高生产力活动，主要是制造业活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近几十年收入分配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劳动力得以脱离生产力低下、往往是农村的就业岗位，转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作。这些职业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工资，因为技能掌握较好的工人供不应求。此外，金融自由化造成金融活动收入比其他活动的收入增长更快。如果收入不平等达到了阻碍国内市场发展的程度，那么，采取步骤，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这将有利于国际和/或区域生产网络中的生产从工资低、技能低的专业生产中升级。

在中国，地区收入差异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增大，也是不平等加剧的表现形式。这似乎是由财政权力下放以及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导致的，这种政策有利于临近国际贸易路线的沿海地区，重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生产而轻小规模生产。与此同时，工薪阶层内部的差异也使整体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工资分配转而偏向高科技、金融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熟练工人，而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农民工的工资低，社会福利也差。

外国直接投资和生产迁移的作用

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投资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将各生产阶段外包给某个国家，再将这些生产阶段的产出浑然一体地融入不断发展的整体生产流程。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它们通常将其技术的一小部分转移给其境外子公司，使本国开发的先进技术与国外的廉价劳力相结合。过去二十年来，虽然存在失业率高的具体情况，也可能出现了与过去低失业率时期相反的具体情况，但对外直接投资不时地向制造业的工资和就业施加下行压力，这可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好有坏。然而，仅有外国直接投资永远不足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既不会倾向于劳动力的流出，也不会倾向于劳动力的流入。反常的是，母国和东道国在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工资设置方面对直接外资的增长采取了相似的反应：母国试图通过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并向工资施加压力，以遏制向国外迁移生产的趋势；而东道国也采取努力，创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吸引额外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地，政府常常采取降低赋税的方式，以增加跨国公司的净利润，并以财政手段限制它们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潜力，其目的是，创造区位优势，或者弥补所谓的区位优势。

转折点：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友好型”政策改革

要理解不平等状况加剧的原因，应该记住，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趋势是与1980年代以来经济政策的广泛重新定向同时发生的。在许多国家，伴随贸易自由化的是国内金融体系监管放松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导致国际资本流量高速扩张。国际金融有了自我生存之道，逐渐地不再为实体投资或国际商品流动提供资金，转而投身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交易。相比通过新投资创造财富，这种交易的获利往往多得多。

更广泛地说，过去更具干涉性的公共政策方针高度侧重于降低高失业率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而这种方针被放弃了。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过去的方针不能解决1970年代后五年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问题。因此，它被一个更加“市场友好型”方针取而代之。这种方针强调要消除被认为会扭曲市场的因素，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对市场超级静态效率的信念。这种全面的重新定向需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几乎完全是以打击通货膨胀优先，同时在工资形成以及在“聘用和解聘”条件中引入更大的灵活性，目的是降低失业率。这一方针背后的理念是(基于静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推理)灵活的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能推涨净利润和/或总储蓄，从而加强投资。

在金融活动扩张的背景下，不平等加剧往往导致更高的债务，因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无法在不借贷的情况下增加或维持其消费。这进而增加了金融资产拥有者的收入，往往会加速不平等。此外，当过高的债务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时，不平等程度就会屡屡上升，因为危机造成的损失通常会给最贫穷的人群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

虽然这一政策导向的转变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但这种新思维也开始在随后的几十年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过程。特别是，许多国家被迫遵守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的附加条件，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听从国际金融机构依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建议。

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和税制改革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这一新的政策导向意味着放松管制，实行更大的灵活性。工人不愿接受更低的工资，这被认为是造成失业惯性的主要原因。一些国家的工会在过去颇有影响力，但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下，其影响力遭到了削弱；另一些国家的工会本来就影响力很弱，而在这种环境下，其影响力则更是无从加强了。因此，在工资谈判中，力量的重心转向雇主；与总体生产率的增益相比，工人的工资增幅较低，导致在总收入中的利润占比普遍提高。

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再度攀升，但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激发大多数发达国家对上述方针的重新思考，反而促使它们重提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所谓优越性。只有少数国家的政府，尤其是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未迎合这一取向。这些国家着眼于采取各种政策，以改善穷人的经济境况，增加工人的谈判筹码，而同时又不影响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就财政政策而言，1980年代初以来，经济政策重新转向实现政府干预最小化和加强市场力量的原则，进而消除了由税收造成的“市场扭曲”。这一观点认为，税负和公共支出的分配主要应根据效益标准来决定，而不是从分配因素来考虑。降低公司的利润税，降低最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收入税税率，能加强积极性，增加公司用于投资的财务资源。另外一些支持对高收入群体和公司利润降低税负的人认为，此举可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从而增加社会总储蓄，因为这些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高于普通群体。据说，这进而也会引起投资的增加。

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这种自由主义的税制改革降低了税收与GDP之比，降低了边际税率，并强化了公共收入体系中对收入分配产生累退效应的因素(也就是税负不成比例地由较低收入群体承担)。在发达国家中，直接税收占GDP的比率大幅降低，也与这种改革有关。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缩小

发展中国家于1980年代开始财政改革，同时，贸易自由化造成关税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公共收入减少，或者说阻碍了公共收入的增长，使政府未能在促进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方面扩大范围。1980年代官方发展援助人均流量停滞，1990年代绝对值大幅减少，使这一问题更形恶化。结果是，许多国家减少了公共服务，或对公共服务征收使用费，这种情况常常会产生累退效应，或使得低收入群体无法享受此类服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尤为严重。

直到最近，官方发展援助付款才从1990年代中期的历史最低点回升。然而，这部分增长的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少数经历过数年冲突的国家，或是以债务减免的形式提供给债务拖欠额越来越多的国家，因此，这对多数受益国的经常预算所产生的影响很有限。官方发展援助中用于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支出的比率也在不断上升，这对受益国的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官方发

展援助在这些方面的比重增长，意味着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方面促进增长的投资比重相应减少，因此，它在结构改革和创造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方面的影响有限。

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改革失灵

多数国家不平等状况加剧的根本原因是，平均实际工资增幅不足，加上税制改革不适当，但是，这并没有产生所承诺的加速增长，降低失业率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任何政策方针，如不承认收入分配对需求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作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收入分配向高收入群体的转移带来更多的储蓄，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需求降低。当工资的增长跟不上生产率的增长，需求最终会与生产潜力脱节，因此生产能力利用和利润也会降低。通常，这反过来会造成投资的减少，而非增加。

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就业更加不稳定，这系统地扰乱了内需，不仅没有降低失业率，反而使之上升。这表明，仅仅依赖简单的市场机制，这不能防止劳动力市场出现不平衡。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激增之前，也就是从2007年低于6%的平均值增长到2011年的接近9%之前，工资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了二战后的最低水平。这种情况对消费需求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在部门或公司范围内，无论是降低平均工资，还是扩大工资差距，都不能指望以劳动换取资本，或降低整个经济的失业率。此外，通过扩大公司间的工资差异来克服发达国家当前的危机，这也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因为这会减少公司间的利润差距。然而，市场经济中驱动投资 and 创新的，正是这种利润差距。如果公司效益低下，又不能通过削减工资来抵消减少的利润，它们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创新来生存。

同样地，凭借生产率的增长而降低出口价格，这在初期可能会使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但这是不能长久的，因为这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当许多国家同时推行这一战略，而其国内的生产商又都参与国际竞争时，这往往会造成工人工资螺旋式下降。这种做法会使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分享不到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对于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企业税收方面的国际竞争，其道理相似。

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重新定位势在必行

首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改变收入分配方式，从而使整个社会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扶持就业、促进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外，合理的收入政策对于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上拉大收入不平等，同时增加创造就业的需求，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任何收入政策的核心特点都应是保证平均实际工资与平均生产率同步增长。名义工资的调整应考虑通货膨胀目标。因为原则上，只有当某个经济体中的工资增长与平均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并将通胀目标考虑进来，工资占GDP的比例才能稳定，经济才能整体上创造足够的需求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经济体才能避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避免不得已而一再推行“以邻为壑”的政策，以便为自己的过剩供给创造需求。

实施这一原则时，工资的调整应具有前瞻性。这意味着，工资的调整不仅要与生产率趋势相一致，还要与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下一阶段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而非依据上一阶段的生产率实际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也就是“后顾式”的)。后者只能保持通货膨胀不变，却不能保证实际工资达到预期水平。将工资与生产率的增长和中央银行官方通货膨胀目标挂钩，也可以帮助中央银行预防通货膨胀，并提供更大的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体协商机制有助于制定一个成功的收入政策。

工资增长与总体生产率增长和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其主要作用是，保持工资所占比例不下降，防止相同职业的工资差距扩大。同样，工资比例下降，个人收入不平等扩大，过去几十年多数国家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时，政府可尝试恢复工资比例，缩小收入不平等。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达成预设的社会共识，可通过雇主和工人协会间的集体协商，辅之以政府建议或工资调整的一般指导原则达成这种共识。

还有其他途径可用来修正市场的表现，使情况更有利于弱勢的谈判方。这些途径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设立最低法定工资，征收累进税，其收益可用于支付不断增长的社会转移支出。还可提高公共支出，用于改善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使更多人可以负担得起这些商品和服务。

发展中国家收入扶持措施

上一段末尾的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适用，因为普遍来说，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需要更大幅度地减少收入不平等。通过细化劳动分工和利用机会引进先进技术，这些国家在提高生产力发展方面有很大潜能。这意味着，在更平等地分配生产力增益，并促进需求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这些国家也有相当大的空间。

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初级商品的制造和出口，因此毫无疑问，增长和创造就业之间的关联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初级商品国际定价的波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业绩影响很大。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很大，小规模自谋职业的情况也很常见。在许多这类国家中，制造业部门的正规就业在全部付酬职业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且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工会和集体协商通常所发挥的作用也小得多。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者的收入及购买力，以此作为对正规部门收入政策的补充。

将农产品价格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相挂钩，这种机制能有助于逐渐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最低法定工资的实行，并根据经济体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和通货膨胀率目标予以定期调整工资，这些都对投资—生产率—增长的态势产生积极的影响。除了减轻最低收入者的贫穷以外，这一举措也能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这种需求的增长主要是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此外，最低法定工资水平及其最终的调整，可以为更大范围内工资标准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不可否认，在非正规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中很难实施最低法定工资标准。因此在此类经济体中，有必要增加公共就业，并实行增强小规模生产的战略，以对这种立法进行补充。

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除了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政策外，财政收入方面对收入和累积财富的征税，财政支出方面的社会转移及普遍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都在影响分配结果方面产生关键的作用。

累进制征税可以减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其减少甚于总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当新增税负分配的累进程度提高时，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加会产生更强的净需求效应，因为部分新增税收是高收入纳税人群体牺牲储蓄款上缴的，而相较低收入群体来说，这一群体更倾向于存款。

发达国家在战后头三十年，边际税率和企业税率较高，但投资也较高，其中的经验表明，决定企业家们是否愿意向新生产能力投资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某一时间内的净利润，而是对生产能力提高后新增产品和服务的未来需求预期。当公共支出增加，并通过其收入效应刺激个人需求时，这种预期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提高。

事实上，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减少收入不平等，其空间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尤其是对收入最高的群体征税，加大税率表的累进幅度，并不会抹杀高收入者的绝对优势，也不会打消其他人提高收入级别的积极性。提高对租金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的税收，降低对企业活动利润的税收，虽然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的做法正相反，但在非生产性金融活动过分扩张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正在日渐显现其正当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也有税收空间

通过累进税有效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经济体需要具备较高等度的正规就业和相当大的行政管理能力，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当前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然而，这些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一些潜在的收入来源，可有助改善平等状况并增加政府收入。

对财产和遗产征收更高的税率，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掘的一个潜在的财政收入来源，这能减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并扩大政府的财政空间。例如，相较于个人所得税，对房产，巨大的地产、耐用奢侈品和金融资产征税通常更容易些，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

对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采自然资源所得收入及由国际初级商品价格上升所得利润，是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正当地征收一部分初级商品租金，尤其是在石油和矿产部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保证全体人民都能从自然资源的财富中获益，而非仅仅几个国内外行为者。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初级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因此过去十年自然资源的收入潜力大幅提高。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定空间更改对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征税。发展中国家常常试图通过财政上的让步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然而，通过更低的税率与其他潜在的东道国竞争，会导致一些问题，因为这会引发税收螺旋式下降，缩减所有相关国家的财政空间，同时通过降低税收在最初建立起来的地方性优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通过公共支出减少收入不平等

目标明确的社会转移支出和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服务也能有助于减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例如，增加教育支出，尤其对较贫穷的国家来说，会有助于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但受教育者必须能获得工作机会。然而，创造就业依赖于整体经济增长动力，尤其是正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大。

公共就业计划，如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计划等，使失业有所减少，并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为当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了需求，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使是收入低、行政能力弱的国家也可实施上述计划，并可将其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相结合。筹划得好的话，这种计划也能有助于吸引工人进入正规部门。

通过提高税收所得的收益可用于以不同形式对城市工农业部门中的小生产者提供优惠贷款和技术支持。除了能促进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外，这类融资还可作为吸引小企业家们和工人进入正规部门的一条途径。

国际层面

在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越来越受到外部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政策的影响。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剧烈波动，汇率失衡，会导致不同国家生产者间的国际竞争产生扭曲。

货币市场上的这种不当定价引起了宏观经济震荡，影响到了整个经济，因此不能在企业层面上进行解决。应对这种震荡的恰当方式是使相关货币升值或贬值，而不是在那些生产商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中削减工资。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反映通货膨胀率差异的变化和单位劳动成本的上涨。此举也能够防止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以邻为壑”的行为。

国际框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各国处理固定资本转移的方式。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协调，以避免相互间的工资和税收竞争。这种协调的目的应该是，责成外国公司履行两项原则：全面接受国家税收计划；根据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通货膨胀目标调整实际工资。这两项原则会为国内的企业定下一条标准。外国投资者用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低工资相结合，会产生(常常是巨额的)额外利润，而国内企业并不会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部分利润，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是随整个东道经济体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的，而不是随他们自身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的。

以上考虑的所有问题，都是想表明：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市场过程取得有效成果，并不需要加大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也不需要进一步拉开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就业和再分配措施，实行扶持性的宏观经济、汇率和产业政策，以促进生产性投资并创造就业岗位。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总体需求、投资和增长，反过来也会加速创造就业，包括薪酬较高，社会福利较好的高生产率部门中的就业，从而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平等。



贸发会议秘书长
素帕猜·巴尼巴滴先生

当前世界经济的趋势和挑战

A. 世界经济近期趋势

1. 全球增长情况

2011年年底,全球经济明显走向疲软,2012年上半年又出现了进一步下滑的危险。全球产出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4.1%降至2011年的2.7%,2012年预计将进一步降至2.5%以下(表1.1)。尽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略有提高,日本的提高幅度更大,但发达经济体2012年的整体增长率可能仅略高于1%,这是由于目前欧洲联盟(欧盟)陷于无力摆脱的衰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表现要好得多,它们的国内总产值应当会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分别为5%上下和大约4%。

发达国家尚未从金融危机中复苏,¹ 金融危机过后,私人部门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弱不堪,坏账不断增加,银行间拆借的机会有限。随着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明显的去杠杆化之举开始启动,私人部门无法或者不愿取得新贷款,这强烈抑制了国内需求。事经验明,

扩张性货币政策,包括大量发行货币以及压低政策利率,不足以扭转这种形势。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停滞甚至下降,进一步妨碍了私人消费。除了已经疲弱的私人需求,一些发达国家还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目的是减少公共债务,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

在欧洲联盟,这些问题尤为严重,那里的经济活动在2012年开始收缩:净出口的增长额,仅部分地弥补了自2011年年中以来国内消费和投资的下降额。最近,有若干政策倡议付诸实施,以强化银行系统并消除金融投资者的疑虑。其中之一是采取一种新财政架构,它包括一项使国家预算实现平衡或者盈余的要求,² 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实施长期再融资操作,划减希腊的部分债务,增强欧洲稳定机制和实施银行资本重组新条例。然而,这些措施为金融市场和信心指标带来的改善是短暂的,原因是危机的深层原因仍然存在。

在欧盟内部,欧元区面临一些特殊难题:它缺少能够在需要时为政府和银行提供支持的

表 1.1

2004-2012年世界产出增长率 (年百分比变化)									
区域/国家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a
世界	4.1	3.5	4.1	4.0	1.5	-2.3	4.1	2.7	2.3
发达国家	3.0	2.4	2.8	2.6	0.0	-3.9	2.8	1.4	1.1
其中:									
日本	2.4	1.3	1.7	2.2	-1.0	-5.5	4.4	-0.7	2.2
美国	3.5	3.1	2.7	1.9	-0.4	-3.5	3.0	1.7	2.0
欧洲联盟(欧盟27国)	2.6	2.0	3.3	3.2	0.3	-4.4	2.1	1.5	-0.3
其中:									
欧元区	2.2	1.7	3.2	3.0	0.4	-4.4	2.0	1.5	-0.4
法国	2.5	1.8	2.5	2.3	-0.1	-3.1	1.7	1.7	0.3
德国	1.2	0.7	3.7	3.3	1.1	-5.1	3.7	3.0	0.9
意大利	1.7	0.9	2.2	1.7	-1.2	-5.5	1.8	0.4	-1.9
联合国	3.0	2.1	2.6	3.5	-1.1	-4.4	2.1	0.7	-0.6
欧洲联盟(欧盟12国) ^b	5.6	4.8	6.5	6.0	4.1	-3.7	2.3	3.1	1.2
东南欧和独联体	7.7	6.5	8.4	8.6	5.2	-6.5	4.2	4.5	4.3
东南欧 ^c	5.6	4.9	5.3	5.9	4.2	-3.7	0.7	1.1	0.2
独联体, 包括格鲁吉亚	7.9	6.7	8.7	8.9	5.3	-6.8	4.6	4.8	4.6
其中:									
俄罗斯联邦	7.2	6.4	8.2	8.5	5.2	-7.8	4.0	4.3	4.7
发展中国家	7.4	6.8	7.6	7.9	5.3	2.4	7.5	5.9	4.9
非洲	7.9	5.4	6.1	6.0	4.8	0.9	4.5	2.5	4.1
北非, 不包括苏丹	4.8	5.1	5.4	4.7	4.6	3.2	4.0	-1.1	3.9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不包括南非	12.8	5.8	6.9	7.2	5.6	0.6	5.8	4.8	4.9
南非	4.6	5.3	5.6	5.6	3.6	-1.7	2.8	3.1	2.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8	4.6	5.6	5.6	4.0	-2.0	6.0	4.3	3.4
加勒比	3.7	7.3	9.3	5.8	3.0	0.2	2.8	2.6	2.7
中美洲, 不包括墨西哥	4.2	4.8	6.4	7.0	4.1	-0.2	4.0	4.9	4.5
墨西哥	4.1	3.3	5.1	3.4	1.2	-6.3	5.8	3.9	4.0
南美洲	7.1	5.0	5.5	6.6	5.4	-0.2	6.5	4.5	3.1
其中:									
巴西	5.7	3.2	4.0	6.1	5.2	-0.3	7.5	2.7	2.0
亚洲	8.0	7.9	8.7	9.0	5.9	4.1	8.4	6.8	5.5
东亚	8.3	8.6	10.0	11.1	7.0	5.9	9.4	7.6	6.3
其中:									
中国	10.1	11.3	12.7	14.2	9.6	9.2	10.4	9.2	7.9
南亚	7.5	8.2	8.5	8.9	5.8	5.5	7.3	6.0	5.2
其中:									
印度	8.3	9.3	9.6	9.7	7.5	7.0	9.0	7.0	6.0
东南亚	6.5	5.8	6.2	7.0	4.0	1.3	8.0	4.5	4.9
西亚	8.8	6.9	6.7	4.5	3.8	-1.1	6.5	6.9	3.7
大洋洲	2.2	3.5	2.9	3.6	2.7	2.1	3.4	3.8	3.6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 依据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经社部), 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和《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年中更新》; 拉加经委会, 2012年; 经合组织, 2012年; 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2012年4月; 《经济学家》资料处, 《经济学家资料库国别数据》数据库; 摩根大通《全球数据观察》; 以及国家资料来源。

注: 国家合计数据的计算结果依据的是按2005年定值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

a 预测值。

b 2004年之后新增欧盟成员国。

c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最后贷款人，而且，它必须在单个国家无法诉诸名义贬值的时候，管理欧元区内的贸易不平衡和非对称竞争趋势。迄今各项对策的特点是财政紧缩，尤其是在对外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国家，其目的是消除金融投资者对其政府和银行系统破产的忧虑。这两者密切相关，因为公共债券占银行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此外，各国政府已经在寻求降低名义工资和其他成本，以便在货币联盟内实现真正的货币贬值(这一过程被称为“内部贬值”)。这些政策已经损害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因为它们已经使需求不足这一基本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由于增长举步维艰，财政收入低于预期，一些国家的银行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大。再者，由于若干伙伴同时实施了“内部贬值”，而且不是所有贸易伙伴的竞争力都能同时提高，因此它们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显著提高其竞争力。鉴于在恢复竞争力平衡和降低主权与银行风险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失望，新的倡议已获批准，或者正在讨论之中，其目标是为内需提供支持。有一项这样的倡议，是在6月28-29日召开的欧元区峰会上公布1,200亿欧元的“增长公约”。也有人建议加强银行系统的监管和资本重组机制。

由于这些新发展，2012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将经历增速放缓(例如法国、德国和瑞典)或者陷入衰退(例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与此同时，希腊和葡萄牙已经深受经济衰退之苦。仅冰岛和挪威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看来在加速。

联合王国2012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预计将接近2%，与2011年相比，仅略有提高。这种增长几乎完全是由国内需求推动的；因为出口和进口(量)的增长量相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实际上已被进口抵消。国内需求从2009年的衰退中复苏之后，在2010年年底失去了动力，这是因为家庭债台高筑，住房价格下降，实际

工资增长缓慢，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2011年最后一个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住房需求有了些许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储蓄率下降，银行信贷有了适度增长，但是这一趋势在第二个季度难以为继。迄今政府一直设法避免实行财政全面紧缩，但是公共支出的削减，已经对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总体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如果2013年的财政支出因为政治考虑而出现大幅削减即——所谓的“财政断崖”，这种形势将会急剧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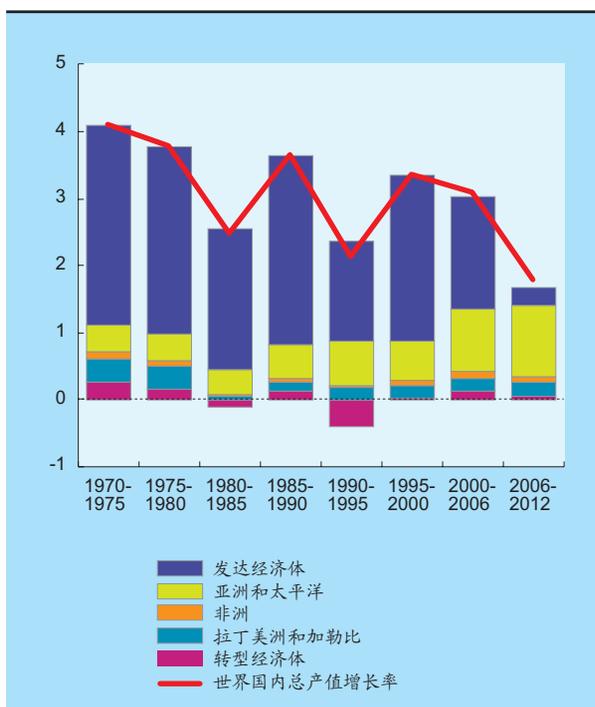
借助相对强劲的国内需求，2012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可能将超过2%。特别是政府在2011年3月的自然灾害和核事故之后用于重建的支出，将促进2012年国内总产值的增长。该国的货币政策仍然是扩张性的，政策利率接近零，并扩大了资产购置方案。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对抗通货紧缩的压力，其手段是将2012年的通货膨胀目标定在1%。该政策已经帮助压低了公共债务的利息支付额。然而，它尚未刺激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此种信贷依然处于低水平。

危机及其后果，加快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在2006年至2012年间，世界国内总产值增长量的74%，源于发展中国家，产生于发达国家的仅占22%。这与它们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各自为全球增长做出的贡献形成鲜明对比：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发达国家占全球增长的75%，但是在2000年至2006年间，这一数字降至略高于50%(图1.1)。

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适度放缓，降至3.5%上下(表1.1)。增长主要缘于恢复力很强的国内需求和其他积极因素，包括整个区域的经常账户赤字较小，2011年平均值约为国内总产值的1.4%，基本财政收支平衡，公共债务和外债不断下降(加勒比

图 1.1

1970-2012年各区域对世界国内
总产值增长率的贡献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表 1.1；贸发会议数据库；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总表数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及Maddison，2008年。

注：数据为各个时期平均值。

国家除外)，以及银行系统有偿付能力。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就业率，特别是正规职业就业率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均有增长，若干国家来自美国的汇款流入也已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私人消费的增长。2011年，区域固定投资总额达到国内总产值的23%，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了反周期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而不是减税。实际上，它们中间有些国家(包括巴西、哥斯达黎加、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拉圭和秘鲁)最近已经启动财政改革，旨在增加收入，以维持政府开支(拉加经

委会，2012年)。关于通货膨胀压力的忧虑曾在2011年引起利率上调，这种忧虑随后消退，导致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和巴拉圭。有些国家，例如阿根廷和巴西，实施了与这类政策互为补充的信贷计划，以促进为生产活动的融资。这些措施的目标是保障近年来通过提高公共收入和采取宏观审慎的金融政策(包括管理起伏不定的外部资本流入)创造的政策空间，并用它促进增长和就业。

非洲的增长率提高，是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的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一些北非国家部分复苏，这些国家的经济在2011年因内部冲突而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后一类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很难在2013年之前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这是由于它们的旅游收入复苏缓慢，失业率高，以及欧洲的衰退，欧洲是它们的重要市场。在南非，公共投资的强劲增长，在2012年年初继续为其经济活动提供支持。但是，私人投资，以及在较低程度上的家庭消费，自2012年年初开始，已经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总体上，疲弱的全球环境也给若干非洲经济体带来损害，尤其是那些更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经济体。此外，一些矿产出口国已经见证了来自某些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下降，尽管程度较轻。即使如此，很多经济体的对外收支和财政平衡继续因初级商品价格相对较高而得到支撑。此外，有少数非洲国家还受益于矿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与黯淡的外部条件相比，很多非洲经济体的国内经济活动仍然充满活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支出和服务部门，尤其是运输和电信，继续实现强劲增长。同样，对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也一直在为国内支出和增长提供支持。

虽然亚洲仍是增长最快的区域，但是它正在经历经济减速，2012年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从6.8%降至5.5%左右。有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因发达国家的需求走弱，以及它们为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飙升而在2011年实施了货币紧缩措施，已经受到不利影响。考虑到国际经济造成的困难，它们已经放松了货币条件，有若干国家还采取了反周期措施。区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投资率高和家庭收入及消费的持续增长，由此反映出增长的源泉正在从外部需求向国内需求转变，实现重新平衡。

在亚洲内部，东亚是增长最快的次区域，尽管其经济活动自2011年年中以来已经放缓。中国最近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放宽信贷，并稍微放宽了财政政策，两者结合，预计将使2012年的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实际工资的增长也为国内私人消费提供了支持。相形之下，中国台湾省的2012年度国内总产值增长预计将会下降，这是因为它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紧密，而且内部市场较小。在南亚，印度最近的减速也反映了国内私人需求因为严厉的货币紧缩措施而下降，尤其是投资。在东南亚，有些高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在2011年年底和2012年年初的一个季度，经历了国内总产值低增长。另一方面，这个次区域各个人口众多的经济体，国内需求依然强劲。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失业率在2012年年初进一步下降。泰国的财政支出有望大幅增加，将为该国的经济活动提供助力，因为政府对洪灾后的重建活动投入巨资。在西亚，有迹象显示2012年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国家的公共支出，与2011年特别高的公共支出水平相比，有所下降。而且，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内部冲突，对其经济产生了强烈影响，石油进口经济体的进口费用增加，也抑制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持续走高的油价，使石油出口国能够在必要时重新推行强有力的公共支出，并促进私人消费。

转型经济体的增长率保持在4%以上。鉴于东南欧国家继续受欧盟经济衰退之累，这种增长完全是由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国具有增长动力。独联体的增长是基于国内需求，来自贸易条件和/或工人汇款的收益，起了刺激作用。俄罗斯联邦的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为增长提供了助力，尽管2011年的资本流出额为接近最高纪录的840亿美元(俄罗斯银行数据库)。在供应方面，农业的复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独联体的各个中亚经济体，增长依然强劲，这是因为商品价格相对较高，而且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支出增加了。

总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通过鼓励国内需求，采取反周期政策，包括提供财政刺激和扩张性信贷，为其国内总产值增长提供了支持。它们还成功地预防了失业率的显著上升，它们的收入政策使实际工资得以持续增长，因此生产性投资得以增长，但是在有些国家，这尚不足以避免增长减速。

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无法避免发达国家经济困难带来的影响。2011年第二季度以来对那些市场的出口量徘徊不前和商品价格的下降趋势，已经反映出这一点。而且，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也影响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流入，加剧了商品价格固有的波动性。在若干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已经对它们的汇率和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促使它们采取措施，管理资本流动。最后，不能排除全球金融市场新的重大冲击的风险，及其对国际贸易量、资产和商品价格、风险蔓延、资本流动和汇率的相关影响，所有这些都影响发展和转型经济体(Akyüz, 2012年)。这些国家应当继续保留采取财政和金融措施的余地，包括增加公共收入；实施资本和汇率管理以避免币值高估和人为的信贷激增，保

持适当水平的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加强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

2. 国际贸易

国际商品贸易增速明显放缓，2011年为5.5%左右，此前曾于2010年大幅反弹，当时的贸易量增长了14%(表1.2)。此外，2012年头几个月的既有数据显示全年将进一步降至3.5%左右(图1.2)。这些增长率大大低于2003年至2007年平均8%的危机前贸易增长水平。

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发达经济体表现不佳，它们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尽管它们在全世界贸易中的总份额从1995年的69%下降到了2010年的55%(联合国经社部，2012年a)。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抑制了进口，2011年的增长率(按贸易量计算)仅为3.5%。实际上，贸易流通从2009年暴跌中的复苏，看来在2011年年中就终止了，进口量自此停滞不前。出口业绩稍好，2011年增长了5.1%，这是因为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需求在增长，尽管最近增速又有所下降。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出口增速仍然高于日本，后者由于2011年的自然灾害，无法正常供货，受到影响。欧盟的区域内贸易，占成员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该区域当前的经济衰退损害了区域内贸易。从更长时期来看，自2006年以来，该国家集团的贸易量几乎没有增长：2012年的头几个月同2006年相比，欧盟的出口仅增长了8%，进口增长也大体处于同样水平(图1.2)。

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疲弱和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状况，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2011年的出口增速也下降了，分别降至7%和6%。发达国家需求不振，主要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方，尽管南南贸易的增长抵消了此次增速放缓的部分影响(联合国经

社部，2012年a)。但是，增速放缓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存在，甚至会在2012年由于欧洲进口预期出现近乎零增长而加剧。欧洲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发达国家的需求不振，对某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影响最大，因为它们出口——主要是制成品出口——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南亚和西亚是个例外，实际上它们的出口在2011年加速了，但是这种状况多少有些迷惑性，因为这种增长始于2010年的低水平，当时这些区域的一些大国，例如印度和土耳其，未能反弹到2008年的水平之上。总的来说，2011年年底和2012年年初的月度数据显示出发展中的亚洲(包括南亚和西亚)的减速趋势：2012年4月，整个区域的出口水平仅比上年增长大约2%。

在其他发展中区域及转型经济体，2011年上半年的出口量增长也明显放缓，但2012年的前景似乎有所改善。2012年头几个月，非洲、拉丁美洲和转型经济体出口量的年度增长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似乎反映了初级商品需求的复苏力更强，尤其是能源和粮食需求，这是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持续增长，也是由于发达国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小。这些国家在2011年受益于贸易条件带来的巨大收益，因为其出口商品购买力的增幅，远非其出口量增长所能实现的。这种逆转发生在大多数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进口量增速低于出口量增速(表1.2)。

商业服务业的年增长(按时价计算)也显著放缓，2011年年底和2012年年初连续两个季度降至3%，而此前在2011年头三个季度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贸发会议/世贸组织，2012年)。旅游服务业约占服务贸易的四分之一的，其数量(按照到达的人数计量)增速为4.6%，比2010年的6.4%有所下降。与总体经济活动不同，南欧国际旅游的到达人数增长尤其强劲，其增

表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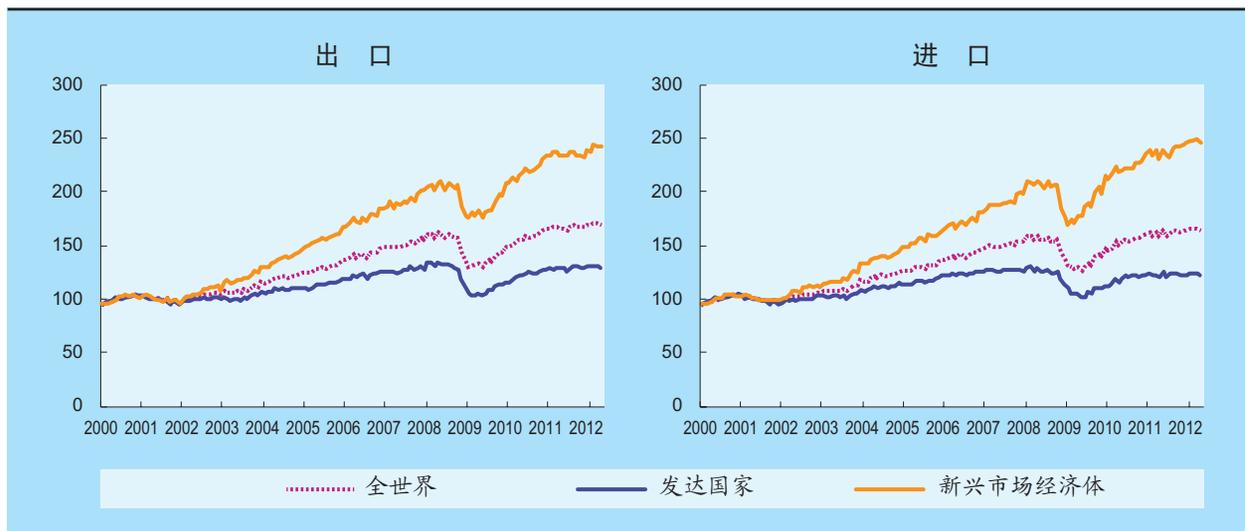
2008-2011年部分区域和国家的商品进出口量
(年度百分比变化)

区域/国家	出口量				进口量			
	2008	2009	2010	2011	2008	2009	2010	2011
全世界	2.4	-13.1	13.9	5.9	2.5	-13.4	14.1	5.0
发达国家	2.5	-15.2	13.2	5.1	-0.2	-14.5	11.0	3.5
其中:								
日本	2.3	-24.9	27.5	-0.4	-0.6	-12.4	10.1	1.9
美国	5.5	-14.9	15.3	7.2	-3.7	-16.4	14.8	3.8
欧洲联盟	2.4	-14.3	12.0	6.0	0.8	-14.2	10.0	3.2
转型经济体	-0.2	-14.4	11.5	6.0	15.5	-28.6	15.5	17.0
其中:								
独联体	-2.6	-11.4	13.3	2.3	22.0	-32.5	18.2	19.1
发展中国家	3.2	-9.7	15.4	7.0	6.6	-9.9	19.2	6.2
非洲	-3.1	-9.7	8.7	-5.1	10.6	-3.9	7.1	3.9
撒哈拉以南非洲	-4.1	-8.0	10.2	2.9	3.2	-4.4	8.8	7.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3	-11.0	10.3	3.4	8.5	-17.9	23.3	7.1
东亚	7.3	-10.6	23.8	9.9	0.4	-5.3	25.0	7.5
其中:								
中国	10.6	-13.9	29.0	12.8	2.3	-1.8	30.8	10.6
南亚	6.8	-6.0	6.0	9.1	20.9	-5.6	13.9	4.1
其中:								
印度	16.8	-6.6	5.9	13.7	29.7	-0.8	13.8	5.3
东南亚	1.6	-10.9	18.8	4.5	8.0	-16.3	21.9	6.1
西亚	4.4	-1.1	2.6	12.7	12.5	-11.5	5.4	3.8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 依据是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

图 1.2

2000年1月至2012年4月世界贸易量
(指数, 2000年=100)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 依据是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中央计划处, 世界贸易数据库。

注: 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包括中欧和东欧。

长率为7.7%。2012年的旅游业前景也与商品贸易的前景截然不同。实际上，在2012年头四个月，旅游业较上一年增长了5.4%，这主要是因为北美洲、东北亚和西欧的旅游活动增速提高(世界旅游组织，2012年)。因此，2012年国际旅游业的增速可能会保持稳定，或许还会略高于2011年。

运输服务是商业服务业中的第二大类，该行业在2011年也减速了。据初步估计，2011年世界海运贸易增长了大约4%，与之对比，2010年的增长率为7%。促成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集装箱和干散货贸易实现了强劲增长，这两种贸易的全世界载货总量达到87亿吨(贸发会议，2012年a)。相形之下，约占海运贸易三分之一的石油贸易，增长了不到1%。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海运贸易中所占份额也在增长，反映了它们对世界产品和商品贸易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联合国经社部，2012年a)。2011年，世界全部海运贸易(量)的57%，是在发展中国家交付的，而这种贸易的60%源自发展中国家。从地理上说，亚洲继续保持了它在海运贸易中的领先地位，卸载货物所占份额达到56%，装载货物所占份额达到39%。此外，2000年以来中国对进口工业商品的需求剧增，使之更有必要实现供应来源的多样化，包括来自巴西、南非和美国等遥远地方的供应。例如，据估计，在1998年至2011年，全球铁矿石贸易的平均距离增加了15%，并且有望随着北极和西非新矿藏的开采而进一步增加(贸发会议，2012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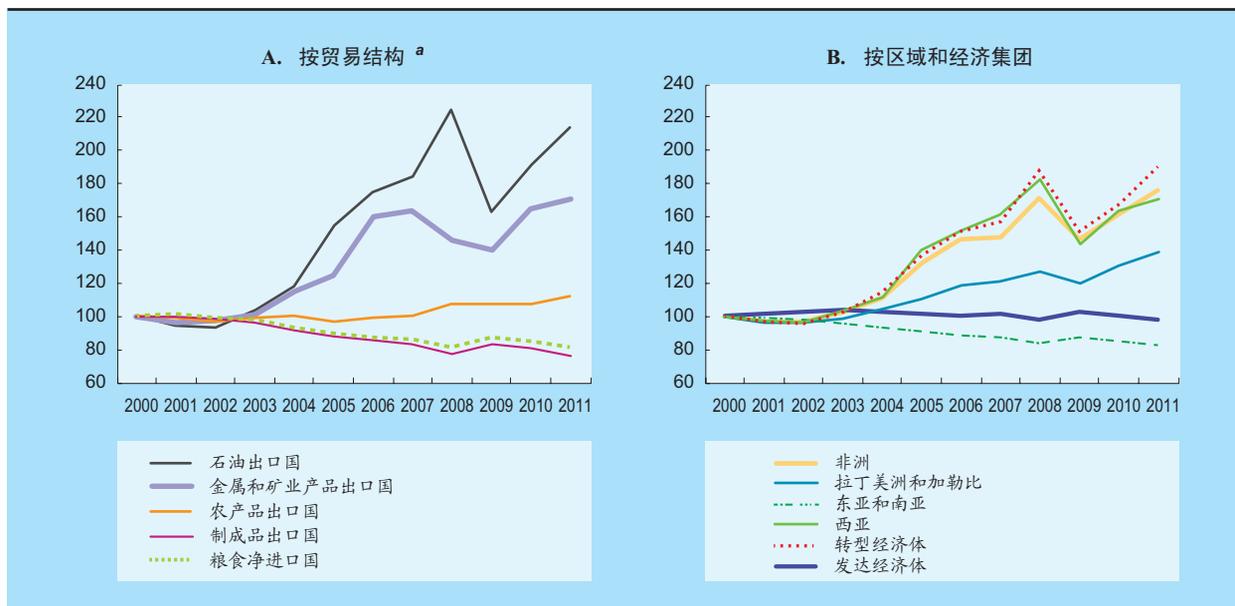
贸易条件的各种趋势显示，在过去几年里，不同类别发展中国家的分化现象日益明显。自2002年以来，石油和矿业产品在其全部出口商品中所占份额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与制成品所占份额很高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从较高的商品价格中获益最大(图1.3A)。鉴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转型经济体，或者位于非洲、拉

丁美洲或西亚，它们对这些贸易条件获得最大改善的区域做出了贡献(图1.3B)。在那些燃料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占最大份额的国家，自2002年至2011年，贸易条件改善了一倍多。相形之下，制成品在其出口总量中占很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位于东亚或东南亚，它们的贸易条件恶化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的进口商品价格走高，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出口制成品相对于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不断下降。这些不断分化的趋势持续到了2011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和矿产品出口价格达到了创纪录的高位，而制成品出口方和粮食净进口方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这些趋势显示，2012年出现了一种停顿或者适度逆转，因为很多商品价格自2011年以来已经回落，就平均值而言，有可能回落到稍低于2011年年中的水平，下一节将对此予以讨论。

至于具体国家的证据，在矿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当中，铜和/或金出口方(例如智利、秘鲁和南非)，其贸易条件自2004年以来已有大幅改善(2009年除外)。对这些国家来说，国际铜和金价格上扬带来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石油价格上涨和制成品价格下跌联合造成的消极影响。

在农产品在其全部出口商品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当中，贸易条件的变动迥然不同，这是由于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农产品的价格走势不同；各国初级商品在全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份额不同；石油在进口商品中所占的份额不同。在农产品出口国一类中有两个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见证了贸易条件的改善，它们受益于大豆、牛肉和某些谷物价格的上升。在阿根廷，这一趋势因石油(直至2010年)和矿产品出口而得到加强，虽然这些产品类目的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因进口制成品的价格提高而被削弱。

图 1.3

2000-2011年净易货贸易条件
(指数, 2000年 = 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

注：粮食净进口国是低收入缺粮国，不包括燃料、金属和矿业产品出口国。

a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

另一方面，制成品在其出口商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些发展中的燃料进口国，例如印度和大韩民国，贸易条件恶化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严重依赖燃料和矿产进口，并且它们的制成品出口价格有时出现相对下降。

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价格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两者的共同作用，在某些国家表现得较为不明显，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出口国，但对特定初级商品价格的波动仍然很敏感。特别是拉丁美洲(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和东南亚(例如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国家以及南非，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它们中间的很多国家中，不同类目产品的价格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互相抵消了。墨西哥、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的燃料在其全部商品出口中占相当大的份额，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成品出口价格下跌和/或粮食进口价格上涨对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

这些例证说明，近期国际价格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是多样的。全球需求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各国的影响，已经导致收入再分配，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再分配，也越来越成为不同类别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再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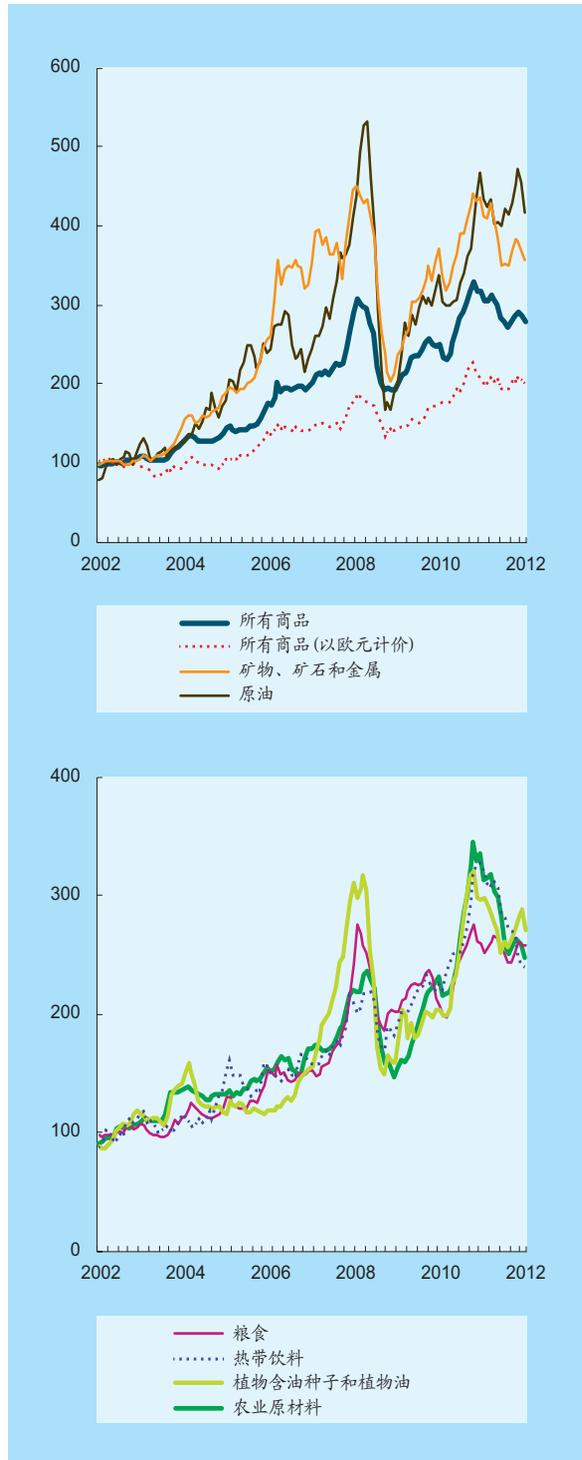
3. 商品市场

(a) 近期的商品价格趋势

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商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且变化多端(图1.4)。但是，它们在2011年头几个月达到高峰后，已经呈现出下降趋

图 1.4

2002年1月至2012年5月按商品组分列的
月度商品价格指数
(指数, 2002年=100)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 依据是贸发会议《商品价格统计在线》数据库。

注: 原油价格是迪拜/德克萨斯的同等加权平均价格。指数的是现值美元价格, 除非另有说明。

势, 石油是这一总体趋势的一个例外。商品价格在岁末年初曾出现短暂反弹, 但在2012年第二季度再度下跌。按照商品分列的2012年上半年价格相对于上次峰值的下降幅度, 如表1.3所示。³ 该表最后一栏还显示出2011-2012年的商品价格, 在总体上大大高于2003-2008年的商品价格高涨时的平均水平。最近的价格走势, 深受全球需求放缓的影响。而且, 关于全球经济演变的消息和欧元区的紧张状况, 也影响了金融投资者的活动, 这些投资者在商品衍生品市场上的持仓情况, 继续影响价格走势。⁴

商品价格的演变因商品类型和影响每一特定市场的不同因素而异。例如, 2012年早期油价上涨的部分原因是西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其后石油产量上升, 推动2012年第二季度油价下跌。就农产品而言, 天气条件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 大豆价格在2012年上半年走高, 是由于歉收, 这种歉收与南美洲和最近在美国出现的干旱天气有关。基于一个创纪录的种植季节而对谷物作物价格作出的乐观预期, 在2012年年中发生逆转, 原因是美国遭遇了一场严重干旱。结果, 谷物和大豆价格在2012年7月达到了创纪录的高位。同样, 小麦价格最近受到黑海地区恶劣天气的影响。粮食价格的飙升, 令人忧心忡忡, 唯恐重现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但是, 目前对粮食安全最为重要的商品, 即大米和小麦的库存, 不像那时那样少得令人触目惊心。

价格变动继续受到商品市场上大量金融投资者的强烈影响, 这一事实表现为商品资产管理规模在2001年至2011年间增长了近4倍。实际上, 与2011年和2012年的价格下跌相伴发生的, 是金融投资者的持仓量大幅减少。2011年是2002年以来商品投资流最弱的一年, 也是最不稳定的一年(Mohammadian-Molina, 2012年)。2012年年初出现过短暂反弹, 此后,

表 1.3

2006-2012年世界初级商品价格
(相对于上一年的百分比变化, 除非另有说明)

商品组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a	上一次峰值 以后的变化 ^b	2011-2012 与 2003-2008 对比 ^c
所有商品 ^d	30.2	13.0	24.0	-16.9	18.2	17.4	-6.5	-15.2	70.8
所有商品(以特别提款权计价) ^d	30.5	8.6	19.5	-14.5	19.5	13.5	-4.2	-13.5	64.1
所有食物	16.3	13.3	39.2	-8.5	7.4	17.8	-3.6	-9.5	77.9
食物和热带饮料	17.8	8.6	40.4	-5.4	5.6	16.5	-3.6	-8.6	77.7
热带饮料	6.7	10.4	20.2	1.9	17.5	26.8	-17.1	-26.9	97.5
咖啡	7.1	12.5	15.4	-6.9	27.3	42.9	-18.5	-31.8	124.7
可可	3.5	22.6	32.2	11.9	8.5	-4.9	-22.1	-33.4	52.4
茶	11.7	-12.3	27.2	16.5	-1.0	11.4	-1.7	-7.4	55.1
食物	19.0	8.5	42.5	-6.0	4.4	15.4	-2.1	-6.7	75.8
糖	49.4	-31.7	26.9	41.8	17.3	22.2	-11.3	-29.7	144.1
牛肉	-2.4	1.9	2.6	-1.2	27.5	20.0	4.7	-3.8	62.8
玉米	24.4	38.2	34.0	-24.4	13.2	50.1	-5.0	-13.8	106.3
小麦	26.6	34.3	27.5	-31.4	3.3	35.1	-12.1	-23.1	48.3
大米	5.5	9.5	110.7	-15.8	-11.5	5.9	3.7	-0.7	61.8
香蕉	18.5	-0.9	24.6	0.7	3.7	10.8	5.0	-17.0	61.5
植物含油种子和植物油	5.0	52.9	31.9	-28.4	22.7	27.2	-3.7	-15.4	78.9
大豆	-2.2	43.0	36.1	-16.6	3.1	20.2	-0.1	-0.3	60.5
农业原材料	13.3	12.0	20.5	-17.5	38.3	28.1	-15.9	-28.4	89.1
皮张	5.1	4.5	-11.3	-30.0	60.5	14.0	-2.5	-4.6	20.2
棉花	5.9	10.2	12.8	-12.2	65.3	47.5	-36.2	-61.5	120.9
烟草	6.4	11.6	8.3	18.0	1.8	3.8	-2.1	-5.3	47.9
橡胶	40.6	9.5	16.9	-27.0	90.3	32.0	-20.7	-37.2	154.0
热带原木	-4.7	19.5	39.3	-20.6	1.8	13.8	-4.2	-10.7	32.4
矿物、矿石和金属	60.3	12.8	6.2	-30.3	33.7	12.7	-7.7	-19.3	53.7
铝	35.4	2.7	-2.5	-35.3	30.5	10.4	-11.8	-24.9	8.3
磷酸盐	5.3	60.5	387.2	-64.8	1.1	50.3	2.8	-13.6	92.3
铁矿石	..	77.4	26.8	-48.7	82.4	15.0	-15.4	-27.0	37.9
锡	18.9	65.6	27.3	-26.7	50.4	28.0	-14.8	-37.3	139.4
铜	82.7	5.9	-2.3	-26.3	47.0	17.1	-6.8	-19.7	78.1
镍	64.5	53.5	-43.3	-30.6	48.9	5.0	-18.0	-39.8	7.7
铅	32.0	100.2	-19.0	-17.7	25.0	11.8	-13.9	-27.3	65.8
锌	137.0	-1.0	-42.2	-11.7	30.5	1.5	-8.8	-21.7	10.0
黄金	35.9	15.3	25.1	11.6	26.1	27.8	5.9	-10.5	182.5
原油 ^e	20.4	10.7	36.4	-36.3	28.0	31.4	6.9	-11.6	80.5
备注: 制成品 ^f	3.4	7.5	4.9	-5.6	1.9	8.4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 依据是贸发会议《商品价格统计在线》; 联合国统计司(统计司), 《统计月报》, 各期。

注: 以现值美元计, 除非另有说明。

a 2012年1月至5月的平均值与2011年平均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b 2012年5月上一次月度峰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c 2003-2008年平均值和2011-2012年平均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d 原油除外。

e 布伦特、迪拜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平等加权平均值。

f 发达国家制成品单位出口价值。

商品投资在第二季度转为负增长。根据巴克莱银行的说法(2012年a),投资者在2012年5月撤回了82亿美元的商品投资,当时的状况被描述为“类似于蜂拥出逃……让人不禁想起2008年”。⁵总体上,受管理的全部商品资产,与2011年4月达到的4,500亿美元的最高值相比,减少了280亿美元(巴克莱银行,2012年b)。金融投资者对商品市场的影响的新表现,是在欧元区于2012年6月达成银行资本重组协议之后,石油市场复苏,当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在一天之内上涨了7%,这一涨幅很难用基本供需变化来解释。谷物和大豆价格在2012年6月底的暴涨,看来也与金融投资者对影响收成的炎热天气做出的反应有某种关联。⁶

这些短期价格变动,再次激发了关于商品长期价格趋势的争论。始于21世纪的最初几年并至少持续到2011年(2008-2009年出现的与危机有关的中断除外)的价格上涨,被视为一个新的超级循环(即在至少一个重要经济体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下,多种商品的实际价格持续十年至二十年的上升趋势)。对金属的大量和日益密集的使用(即单位产出量的金属消耗量),常被视为商品超级循环的一个指标(《2005年贸发报告》:46-51)。⁷但是,最近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商品价格上升趋势出现逆转,这可能表明当前的商品超级循环行将结束。

一些对当前商品超级循环上升期有利的因素尚未消失,尤其是若干重要发展中国家快速而且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以及它们对基础设施和建设投资的持续需求。特别是中国对商品的强劲需求,一直是影响超级循环的一个有力因素。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它可能会日渐消退。关于中国能否保持较高的固定投资率,并保持单位产出增长对商品的需求增长强度不变,观点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和

房地产部门预期中的减速,有可能标志着商品超级周期的终结(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从更总体的方面,人们普遍预计,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长期欲振乏力,将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在危机后放缓,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抑制。中国对基础设施和商业不动产大举投资,其中有很多是由于政府实施了一揽子危机后的刺激计划(Cai、Wang和Zhang,2010年),它能否继续无限期地补偿与危机有关的总需求增长放缓,这一点并不确定。⁸强劲的国内私人 and 公共消费,可能会支撑高增长率,但是这种增长可能涉及某类商品投入的使用率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对全球非食品商品市场有利条件所做的贡献,尤其是对贱金属市场所做的贡献,可能会减少。此外,某些在价格上升年份启动的投资项目,现在可能开始造成商品供应增加,这将缓解商品价格压力。

因此,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支撑商品超级周期的供应增长所受的制约相结合,而供应增长对价格的影响,因商品市场上的金融投机者而被放大了,这种结合能否再延续较长时间,实属未定之数。就此而言,这将影响到特别是贱金属,或许还会影响到能源。虽然东亚和南亚及发展中世界其他区域的持续增长,有可能防止初级商品需求大幅下降,但未来的商品价格变化不大可能呈现出稳定向上的趋势。因此,商品生产国不应将视价格的不断上涨视为理所当然,并因为实施多样化和工业化政策而沾沾自喜。

(b) 商品价格变化对分配的影响

无论未来的商品价格发生何种变化,近年来居高不下且不断波动的价格,引起了一些与不平等和分配方面有关的问题。商品价格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在国家一级,21世纪头几年某些商品的

价格不断上涨，导致生产和出口这些商品的国家出口收入和增长率攀升。但是，它对那些出口国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并非一目了然：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上涨，扩大了它们的财政空间，使之能够实施再分配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很可能仅有少数自然资源私有者才是主要受益者。相比之下，发展中的商品进口国则承受日益增长的进口费之累，特别是粮食和燃料进口费。这将限制它们的资本商品和投入性物资进口能力，而这些商品和物资对它们的发展极其重要。⁹

另外，这给大多数家庭预算造成的负担，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比在发达国家沉重得多。在最穷国，食物有可能占家庭开支的80%之多。因此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导致最贫困家庭不仅减少营养摄入量，而且减少其他基本开支，例如医疗卫生和教育开支。他们还可能被迫出售某些能够借以增加他们的当前和将来收入的资产，从而将他们抛进贫困陷阱，加剧难以逆转的收入不平等。¹⁰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07-2008年的国际粮食价格高峰，使1.05亿人处于或者坠入贫困线以下，2010-2011年的价格高峰同样影响了4,860万人(世界银行，2012年)。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情形是非洲之角和西非萨赫勒区域的饥荒。虽然干旱是这些紧急事态的主要原因，但是触目惊心的饥饿问题却因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而变得复杂，并因冲突而恶化了。但是很多有关国家无法提供必要的额外社会支出，以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除非它们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包括亟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两难状况表明，需要有额外的外部援助，才能解决穷国的这一分配问题。

实际上，为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八国集团领导人于2009年在拉奎拉举行首脑会议，承诺增加对农业的援助并尊重各国自己的计划，将惠及小农的公共投资列为优先项。但是，承诺在三年内支付的220亿美元，在头两年仅实际支付了22%。农业援助的前景，以及总体上的发展援助的前景，在当前发达国家实施财政紧缩方案的背景下，显得很黯淡。此外，粮食安全和营养新联盟在2012年5月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作出了投资承诺，但承诺金额大幅减少，并且更强调私营农业综合企业的投资。公共和私人投资可能具有互补作用，但是农业综合企业的重点是获得利润，其目标未必与小农在增加收入和增进粮食安全方面的利益相符，也未必有助于减少贫穷(AfricaFocus, 2012年)。¹¹

商品价格变化对增长的影响，常常伴随着对分配的不利影响。即使在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国，虽然商品价格上涨促进了增长，但由此产生的收益并没有充分扩散，以便惠及全部人口。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平均分配程度通常低于其他资产。商品生产及其贸易的主导者是大型跨国公司和贸易公司。¹²在此背景下，从商品价格上涨中取得大部分收益的往往是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投资者。这一部门的商品生产者和工人，甚至生产国政府，所得甚少。¹³

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和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忧虑，在过去几年里，外国投资者纷纷到发展中国家开展大规模土地收购(或者租赁)，这对土地分配和粮食安全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不同的行为者，例如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和养恤金基金、粮食公司和大型农业生产者及土地所有者，对于收购和租赁土地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这种土地热潮的主要驱动因素，对粮食作物的巨大需求的普遍预期，抱有这种预期的

原因是人口增长、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以及对生物燃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另外的驱动因素是寻求更高的回报和实现投资多样化。有些粮食进口国政府也投资于国外土地，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它们本国的粮食安全。

对这些业务规模的全面评估，因很多交易相当不透明这一事实而复杂化了。尽管如此，既有的证据表明，尤其是自2007-2008年粮食危机以来，这些土地投资交易有大规模的快速增长，并且一定会持续增长。例如，根据乐施会(2011年)的说法，自200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有多达2.27亿公顷的土地已被出售或者出租。其他估计数较低，例如国际土地联盟的估计数，该联盟的估计数表明，自2000年以来，被租售的土地约为8,000万公顷(高级别专家小组，2011年)。¹⁴ 这些交易有很多发生在非洲，所支付的费用常常很低。

大规模收购土地——通常被称为“攫取土地”——的趋势，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但也构成重大挑战。一方面，在理论上，它们能推动对农业的投资，而在此前的数十年，农业未获得足够的投资。这有可能促进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改进，并有利于创造就业。另一方面，它们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令人忧虑，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和粮食安全而言。有迹象表明，这种土地投资创造的收益，大部分被投资者拿走了，并没有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人口中予以公平分配。很难看出所谓的收益，例如在创造就业和增进粮食安全方面的收益，将如何实现，因为种类投资大多涉及出口作物，而出口作物的耕作方式高度机械化。此外，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权不彰，贫穷小农很容易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和对土地的竞争中受到损害。特别是，他们面临失去土地而得不到适当补偿的风险。因此，这种投资一般会导致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¹⁵

已有一些倡议，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并保证土地投资能尊重地权，不损害小农生产或粮食安全，小农生产构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农业活动的很大一部分。2012年5月，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负责任治理土地、渔场及森林保有权的自愿准则》。此外，贸发会议与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银行一起，参与制订了“关于尊重权利、生计和资源的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¹⁶ 这些范例是正在采取的起始步骤，其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适当框架，以确保土地投资真正有利于包容性发展。

为了预防当前矿物和燃料商品价格高涨可能导致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还需要实施积极政策。实际上，在收入不平等、区域不平衡和世代间分配方面，存在若干种与采掘业有关的分配上的挑战。由于采掘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创造的直接就业相对较少。此外，矿产和燃料生产通常有地理上的集中性，为其产品出口所建设的基础设施，通常对其他经济活动或者对国家的实体整合没有多大作用。在缺少旨在发展上游和下游生产联系的有效政策的情况下，它往往仅为生产国创造少量直接就业和收入。而且，由于这些是不可再生资源，对它们的开采无益于未来的世代，除非将所创造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国内。

因此，要使基于资源的活动成为包容性增长的源泉，就要实施能够让所有各部分人口能够分享资源收入带来的好处的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解决采掘业收入在控制这一部门大部分出口活动的跨国公司和各生产国政府之间的分配问题。资源开采产生租费(即销售价值和资源开采成本之间的差额，包括利润)，如果有效加以利用，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结构性变革和增加固定资产形成值。这反过来将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在初级商品部门的收入来源可能是特许权使用费、税、合资企业，

或者对业务公司的完全公有制(也见本报告第五章)。在此背景下,无论短期价格如何变化,有一种根本需要,是在两个方面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是私人投资赢利,另一方面是政府获得很大一部分因采掘业价格上涨产生的租费。政府应当避免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参与财政规则和环境条例方面的“逆向竞争”。

有证据表明,各国和各部门之间的采掘业租费分配情况相差迥异,这反映了国有企业的角色和财政制度的差异。国有企业在采掘业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其政府获得的租费远高于这些公司已经私有化和财政处理方式相对宽松的国家(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保障国家和投资者(外国的或者本国的)公平地分享资源租费的最佳方式,可能是缔结具体国家的有偶尔重新谈判余地的协议。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可能含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的灵活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某些转型经济体,最近都已经修改了它们在租费分享方面的财政制度。目的是从不期而来的利润中获得更多收益。¹⁷ 这些政策对商品价格上涨或者处于历史高位的生产国来说,通常比较

容易实施。因为跨国公司不能将不期而来的收益归功于自己,也不存在任由它们占有这些收益的经济或者道德理由。正如联合王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说明政府单方面修改北海石油税制,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征收附加税的合理性时所指出的,“石油公司正在利用石油价格获取意想不到的利润,这些利润远高于它们据以作出投资决定的利润额”。¹⁸

通过修订财政制度来月报更公平地分享租费,政府可以利用有利的商品价格变化,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从长远来看,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实施促进经济多样化和促进工业化的政策。政府收入增加之后,可以通过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减少收入不平等并预防工业化进程逆转,转移支付应当面向那些没有从资源收入中直接受益的人群。政策目标应当是促进工业生产,其途径是鼓励出口公司在当地创造附加值,并建立国内供应商网络,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及实施刺激私人投资的货币政策。商品生产国还可以建立收入稳定基金,它不仅能够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世代间的平等,还能够将实际汇率上升幅度降至最低。

B. 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1. 通往强劲和平衡增长的道路艰难

截至2009年上半年，所有重要经济体的政府，都对经济危机作出了反应，实施了强有力的刺激计划。各国的混合政策工具各不相同。金融和货币方面的政策包括，紧急援助大型金融机构，将政策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提供大量流动性，以应对银行同业信贷的解冻。有些中央银行把它们的任务范围界定得很宽泛，为其政府或者为非金融私人行为者提供直接支持。很多国家还依靠“自动稳定器”增加公共支出并减税。因为所有这些政策是在不同国家同时实施的，所有国家都受益于彼此的刺激措施，国内总产值和国际贸易虽然暴跌，但是这种下跌相对短暂，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有力地证明了经济协同增效的强大作用，并为例如二十国集团(G-20)这样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2009年9月，各位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的匹斯堡首脑会议上达成正式协议，为确保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及加强国内与国际金融体系开展合作。但是，他们没有继续提供一般刺激措施以维护依然脆弱的全球复苏，而是一致认为，各国的战略应当有所不同：那些有对外逆差的国家，将支持私人储蓄并着手巩固财政，而顺差国将强化国内增长源泉。据

认为，这在原则上与恢复良性平衡并行不悖，顺差国的国内需求增强，将使逆差国能够增加出口。事实上，平衡仅恢复了一部分，且与全球增长走弱有关。主要原因是有逆差的发达国家，其政策在私人部门需求增长有机会复苏之前，就发生了向提高公众储蓄的转变。此外，有顺差的发达国家提供的刺激计划微不足道。2010年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多伦多首脑会议，鼓励有顺差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成员国，提供直接支持，以刺激其国内需求和进口，包括通过货币升值，而有顺差的发达国家成员国被认为应当通过集中精力，实施可以增加国内需求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该目标。如下文所讨论的，这样的改革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考虑到某些改革建议的性质，它们不大可能增进需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举措的不对称性，反映在德国和中国这两个重要的绝对顺差国为全球恢复平衡所做的不同贡献上。自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对外顺差按照时价和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从2007年占7.5%到2012年估计占5.5%)计算，仅略有缩减。另外，它的净出口为德国2010年和2011年的总体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私人消费仍然受到抑制。相形之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总产值10%的最高点，下降到2011年和2012年的3%以下，自2010年以来，其净出口为增长做出的

贡献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的经济正在从根本上实现重新平衡，越来越依赖国内需求来刺激增长(Lemoine 和 Ünal, 2012年)。不过，国内实现重新平衡的努力尚未结束，因为私人消费尚未发挥比投资更大的作用。工资的快速增长有助于实现这一国内目标，同时也在促进进一步恢复对外平衡。

在大多数发展和转型经济体，自危机爆发以来，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似乎大幅下降了。在发展中的亚洲和非洲，2010-2012年期间，这一贡献几乎为零，在拉丁美洲和转型经济体，这种贡献变成了负数。与此相反，它在欧盟则显著上升，欧盟的出口量增幅大大超过进口量增幅。然而，欧盟的进出口所做的贡献，仅弥补国内需求下降造成的一部分不利影响(图1.5)。

除了贸易量的变化，价格变化也对全球不平衡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不平衡在2009年减轻了，这与出口石油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顺差减少有很大关系，体现在美国和欧洲(德国除外)的逆差减少上。由于石油价格自2009年年中重新上涨，中国和日本的顺差持续减少，燃料出口国应当对2010年和2011年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衡，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图1.6)。在一定程度上，日益上涨的石油价格已经拖累了全球增长。这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燃料进口国的总支出，而燃料出口国总支出的增长，通常要经过很长的滞后期之后才会发生。对某些石油出口国而言，在经常账户上保持一定水平的顺差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的进口增长超过一定水平，就会造成过量开支，而这种开支由不可再生资源供资，会损害后代的利益。

对于全球不平衡的关切，在去年已经得到某些缓解，这是由于一些重要的顺差国(例如中国和日本)和最大的逆差国(美国)的顺差和逆差

出现大幅回落，但是相关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欧元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总体上相当平衡，但欧元区内难以消除的不平衡构成了很大风险(框1.1)。另外的风险来自与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有关的严重紧张状态。

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大逆转，在金融和经济危机酝酿期急剧增强，此后大幅减弱(尽管有某些例外)。向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的银行，其国际业务主要涉及发达国家，反映在它们的资产布局上：2012年第一季度，国际银行的债权，有73%是对发达经济体的借款者的债权，如果不计海外中心，这一数字将上升到80%。¹⁹然而，其他区域银行资产的变化，虽然在绝对意义上比较小，考虑到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外汇市场尚未成熟，有可能对它们的宏观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自2002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一季度，国际债券总额增长了226%，达到28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欧盟新成员国²⁰ (630%)和转型经济体(865%)的增速则高出很多；希腊、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增速也极高(接近400%)。自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一季度，全球国际债权额减少了16%，发达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减幅最大(分别为22%和18%)。在发达国家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希腊、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国际银行在这些国家的资产减少了一半。尽管汇率变化是此次缩减的一个原因，²¹ 但是大量信贷回流仍是加剧其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持续增加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资产价值持续增长，自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一季度，又增长了25%。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银行资产在整个区域平均增长了30%，在巴西增长了55%。在整个发展中的亚洲，银行资产平均增长了21%，在中国则增长了80%之多。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国家面临资本过度流入引发

图 1.5

2006-2012年部分国家类别的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及净出口和国内需求的贡献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表1.1；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总表数据库；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拉加经委会，CEPALSTAT；经济学家资料处；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以及国家资料来源。

注：2011年数据为初步估算数据，2012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的不同问题，资本过度流入往往对它们的货币形成升值压力。其中有一些国家(巴西最引人注目)声称，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对它们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这意味着一种“货币战争”，发达国家企图牺牲若干比较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恢复它们的某些竞争力。

2011年上半年，汇率问题造成的紧张关系，因为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而变得更加紧张。这些政策旨在抑制主要由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提高后的利率抑制了国内需求，它们吸纳短期资本，同时它们还往往造成货币升值压力。货币升值可能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对经济增长非常不利。随着国际范围内增速放缓和商品价格回落，政策目标再次转变，从稳定价格转向促进增长。为此目的，有几个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2011年和2012年降低政策利率，而墨西哥将其利率保持在4.5%的历史最低点。除了降低利率或者降低准备金，有些国家还采取了旨在更直接和有效地支持国内需求的信贷政策，尤其是支持投资的信贷政策。开发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利率降低，或许还由于金融投资者规避欧元区资金紧张带来的更大风险，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组合在2012年第一个月里有所减少。但是，大规模资金流在“骤然停顿”之后的反复流入给发展和转型经济体造成的不利影响显示，采取积极的资本管理政策并将其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国集团在2011年10月就资本流动达成的协议，明确承认有必要灵活使用资本账户管理措施，遏制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通常可能产生的风险。它认为，建立和巩固地方资本和债券市场，并采取适当监管和审慎做法，

图 1.6

2005-2012年部分国家和国家类别的经常账户平衡情况
(10亿现值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联合国经社部，2012年b；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库；以及经济学家资料处数据库。

注：2012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最终将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吸纳和处理反复无常的资本流动。但是正如日本和瑞士的例子显示，即使有着成熟金融体系的国家，也可能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以便预防短期资本流动引起的不利的汇率变化和严重的价格偏离。在此背景下，“建立由市场发挥更大决定作用的汇率制度，增进汇率灵活性，使之反映作为汇率基础的经济基本面”（二十国集团，2011年）的意图，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远大于贸易或者经常账户收支情况，没有理由相信它们将反映“经济基本面”。需要采取公共干预措施，管理这些资本流动，并引导实际汇率达到可持续的水平。例

框 1.1

贸易不平衡和欧元区危机

区域内在竞争力方面的严重分化，以及区域不平衡的相关积累，是欧元区危机的根本原因。货币联盟成员国承诺共同保持“低于但接近2%”的低通货膨胀率。成员国长期偏离它们对该共同通货膨胀率的共同承诺，就势必损害联盟。因为工资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因素，各国工资趋势，按照生产率增长情况(即单位劳动成本)予以修正之后，必须共同维护欧洲货币联盟的团结(Flassbeck, 2007年)。

结果，最大的成员国长期抑制工资增长，导致通货膨胀率出现差别，并产生了下述后果：它在德国导致消费长期停滞和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对整个联盟而言，由于低通胀国家相对于工资—物价增长率较高国家竞争力增强，贸易不平衡加剧。在一个财政联盟内，如果有顺差的成员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有逆差的成员国供资，这样的贸易不平衡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欧洲货币联盟，私人债务流动为日益加剧的贸易不平衡提供了金融对应物，因为顺差国的银行无法在本国市场拓展业务，就贷款给逆差国的借款者和用款者(Bibow, 2007年和2012年)。

全球危机仅仅起了触发作用，它使国内产生的房地产繁荣和泡沫在整个欧洲破裂。当贷款者对借款者的偿债能力产生疑虑时，赖以维持不平衡的欧洲增长的私人借款流戛然而止。私人债务好运的终结，导致一连串债务危机，因为最初悬在头顶的家庭债务转变成了银行危机，银行危机最终转变为主权债务危机。在开出过分紧缩政策的处方治疗主权债务危机的症状时，欧洲当局提高了赌注：随着严苛的紧缩措施使负债国陷于债务型通货紧缩，症状蔓延到了缺少坚实财政支撑点的紧密相连的整个区域经济，出现了阻碍区域增长的危险，债务可持续性对整个货币联盟构成了威胁。

货币联盟原有设计上的缺陷，也应承担一部分罪责：没有预先规划需求管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被嗤之以鼻。而且，没有进行适当的政策协调。通过限制财政转移支付，但又没有预防导致此种转移支付不可或缺的区域不平衡，货币联盟才让自己陷于当前的尴尬境地。目前，通过让逆差国过多地肩负重新实现平衡的重担，欧洲当局增加了重新实现平衡的成本(De Grauwe, 2012年)。如果区域内的顺差国同意上调它们的工资和物价，恢复平衡的目标就能更有效、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迄今商定的制度措施仍不充分，因为它们没有将恢复增长列为主要目标。宣布一项1,200亿欧元的计划，用于各种投资项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是这似乎还不够。各项措施包括建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将其作为主要的危机管理工具(“防火墙”)，并实施各种举措以改善欧洲的经济治理方式，从而预防将来的危机(欧洲央行, 2012年)。实质上，所有新举措都遵循旧蓝图，各项措施的重点主要是加强所谓的稳定和增长公约，并调整政策，使之与最新的欧盟长期结构改革议程——2020年欧洲战略——保持一致。欧洲继续忽视国内需求管理和为实现内部平衡实施适当政策协调等重要问题。

如，经中国人民银行允许的人民币实际价值的逐渐升值，²² 似乎比开放资本账户和实行浮动汇率的组合措施更为可取。后者可能会制造金融不稳定和货币骤然升值，从而不仅对中国的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2.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范围

关于各种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当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存在争议，这是由于人们对在给定时间点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可否使用政策工具(例如是否存在“财政空间”或者“货币空间”)，以及使用这些工具时可预期的结果，各持己见。

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全球危机的根源及为了战胜危机而需要克服的主要经济问题的判断。有一种判断以财政问题为焦点——赤字和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过高，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基于此，有人提出以“财政整顿”为救治之方。根据这种观点，实行财政紧缩将使金融投资者重拾对主权债务人偿债能力的信心，借此抑制利率并恢复信贷供应，此举将反过来促进经济复苏。围绕这一主要立场也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观点。最乐观的观察家以2010年的“新绿芽”为证，认为全球经济很强大，取消公共刺激措施也不会带来不利后果，因为私人部门已经恢复了可持续的支出(基金组织，2011年)。最悲观的人声称，财政紧缩不会重启增长，但它将为实施摆脱当前危机所需的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例如预防出现金融恐慌)。有人采取折中立场，它们相信财政紧缩的力度，必须足以保障财政的可持续性，但又要足够宽松，能够将它对增长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基金组织，2012年a)。

另一种关于全球危机根源的判断，指向私人过度举债，而不是指向财政过度支出，尽管财政过度支出的一个后果是恶化了发达经济体

的财政状况。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由于银行和债务人努力调整其资产负债表，一个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接踵而至(Koo, 2011年)。在当前情况下，由于高失业率、工资停滞或者下降以及负财富效应进一步抑制了私人需求，认为私人部门已经“接过接力棒”而且私人支出将支持复苏，这种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因此，财政紧缩被认为具有反效果。通过进一步抑制增长并减少财政收入，它或许连“财政整顿”都无法实现，也无法重振金融市场的信心。²³ 信心，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信心，通常只有在经济复苏之后才能恢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货币政策无法重启增长。问题不是流动性不足在制约信贷供给：中央银行已经向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在2008年9月以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为银行系统注入2万亿美元，是其总资产的三倍，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在欧洲的资产增加了一倍，约达3万亿欧元。即便如此，自2008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年底，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在欧洲处于停滞状况，在美国则减少了4%。银行不增加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并不是因为缺少资金，而是因为它们不愿意发放贷款(即：更愿意整顿其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因为私人部门无意增加消费或者投资，因而不要求获得净贷款(即：到期债务展期之外的贷款)。信贷市场再次显示出顺周期性的倾向。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全无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将使当前形势恶化。另一方面，各货币当局如果少关注全球已发行的货币量，而多关注谁应当获得资金及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它们的措施会更有效。尽管如此，货币政策已经显示了其局限性，正因如此，财政政策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这种政策争议之下是深层次的观念问题。正统财政观念的根本错误，是视一国公共财政的功能，与单个家庭的私人财政别无二致。因为没有哪个家庭能够长久支出多于收入，维持

超越自身条件的生活，所以认定，这同一条原则也必定适用于一切负责任的政府。用这种类比指导合理决策，会造成严重误导。如果家庭收入不受它自己的紧缩措施影响，一个孤立的家庭有可能通过减少支出成功地削减债务。然而，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个家庭的支出即是另一个家庭的收入。因此，如果一个大的行为者或者很多家庭一起为削减债务而同时减少支出，其结果将是总体收入减少，包括它们自己的收入。

正是全世界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同时减少支出，导致了全球收入和增速下降。除非单个行为者紧缩开支的做法得到扭转，否则全世界不可能从本次衰退中复苏。如果减少开支的浪潮得不到遏制，最终结果将是收入和支出的螺旋式下行。但是，单个私人行为者无望通过反周期行为改变事态；只有政府才能抵消私人减少支出对收入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就提出了财政空间问题。2011年《贸发报告》主张应当从宏观经济和动态角度评估财政政策的作用。它认为，有必要考虑到财政政策对总体收入和国内总产值增长情况的影响，以及最终对预算实况本身的影响。财政空间和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公共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和当前预算赤字的大小，还必须考虑到增长情况和利率。这样，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影响国内总产值和利率，成为一个经济体内财政空间的重要决定因素。

今天，有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面临主权债务利率上涨的情况，因为金融市场认为它们的借款具有高风险。这已经被当做推行更严厉的财政紧缩的理由。例如，欧盟领导人已经签署了“金科玉律”，要求立法(甚至更改宪法)禁止结构性财政赤字超过国内总产值的0.5%。美国国内也存在强大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就财

政整顿问题达成政治协议，有可能从2013年初开始大幅、“自动”削减政府开支。

然而，制造欧元区国家偿债能力风险的，并不是它们的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高，而是因为它们缺少对货币政策的主权控制。有若干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和联合王国。不同之处在于，后几个国家不仅拥有对其货币政策的主权控制，而且它们的中央银行能充当其银行和政府的最后贷方。在欧元区，解决方案将不会是更严格的财政紧缩和取消福利国家，而是深化财政和金融一体化，并以合作方式实现经济再平衡(Aglietta, 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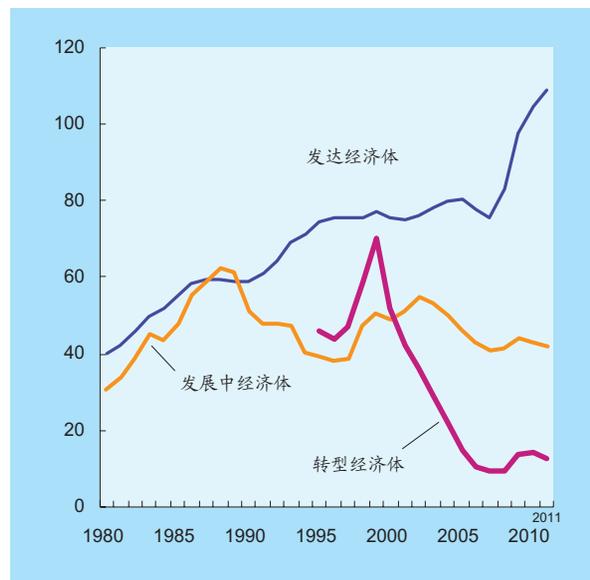
一些对财政空间有决定作用的因素(特别是不同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可以说明发达、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何以呈现分化趋势(图1.7)。在1995年至2007年间，发达经济体的这些比率保持了稳定，发展中国家自2002年以来，转型经济体自1999年以来，均呈现下降趋势。危机大幅提高了发达国家的该种比率，但没有逆转在其他国家类别的下降趋势，尽管它们中间有很多实施了一揽子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为实施金融紧急救助付出了成本。而另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总体上更快地恢复了国内总产值的强劲增长，这也增加了它们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很好地利用了它们的财政空间，其中有些国家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有若干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以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全球危机，它们的境况相当好(Takats, 2012年)。它们的刺激方案更多地以增加公共支出而不是以减税为重点，实施证明对于快速回复增长成效显著。因此，它们的公共财政总体上仍然健康，它们的财政空间也已经恢复。²⁴

能够提供所需经济刺激的，不仅仅是公共支出和税收数额的变化，还有其构成的变化。目标是增进一种给定支出水平的乘数效应，或者降低税收或者私人支出的紧缩效果。正如在2011年《贸发报告》中所讨论的，对于刺激经济之举来说，重要的不是财政盈余或者赤字本身的大小，而是特定公共收入和支出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有必要考虑财政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创造新的总需求，不仅是直接创造的总需求，还有通过新需求的乘数效应间接创造的需求。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衰退期间，当“传统挤出论的适用性降低时”，财政乘数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基金组织，2012年b: 34)。它还发现，增加支出比减税提供的刺激更大，从而放弃了它以前的某些看法(基金组织，2010年)。但是，基金组织没有建议利用这些很高的财政乘数效应来扭转衰退压力，而是建议采取渐进的财政紧缩方法。尽管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顺周期政策产生的危害目前已经得到广泛承认，通过反周期财政政策改善经济表现的可能性也得到广泛认可。

因此，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分配效应，因为它们能够增进具有强烈消费和/或投资偏好的行为者的购买力。当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需求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实施旨在增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在初次收入分配中所获份额的收入和就业政策，也有可能取得同样效果。可以产生工人收入渐进增长预期的收入政策，使实际工资(就以工资维生的人而言)与生产力同步增长，对于重启消费增长可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总之，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去杠杆化正在进行中和实际工资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使受危机打击的国家走出衰退。公共政策应当以重振需求为目标，而不是用财政紧缩进一步抑制需求。为了重振总

图 1.7

1980-2011年公共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基金组织，《历史公共债务数据库》，《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4月，及《为就第四条进行协商而提交的2012年国别报告》。

需求、增长和就业，政府需要合并使用数种工具，这些工具可能比通常所认为的更易于利用。正如以前的《贸发报告》所认为的，也是本报告第六章予以进一步探讨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可以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合并使用的合理工具，可用于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增长。

3. 结构性改革不能代替扶持性宏观经济政策

泛泛地说，实施结构性政策的目的是建立或者重建制度结构和市场功能。其措施可能涉及政府(尤其是)对于市场的职能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相应转变，要求采取适当结构性措施，对经济在效率、稳定性和增长方面的表现给予最有力的

支持和促进。因此，对结构性政策的范围和形式的再评估，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面临的持久挑战。

就此而言，结构性政策可能涵盖多种领域，包括(撤销)市场监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税收和福利制度、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本身。例如，自2008-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金融改革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结构性政策的一个共同优先项，目的是恢复稳定和重新界定它们各自金融部门的经济角色以及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举措。

已经有了一些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国家和全球举措。但是，重新制订的监管措施仍然各自为政，在未来很多年里不大可能得到全面实施。在全球一级，《巴塞尔协定三》(由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制订，获得二十国集团2010年11月首尔首脑会议支持)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其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的建立，就属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在全球金融监管和监督领域采取的主要举措。前者提供了对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管标准(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2010年a和b)，而后者是国家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设定机构的一个信息渠道和协调平台，国际标准设定机构的任务是评估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确定并监督需要为处理这些薄弱环节而采取的行动。

《巴塞尔协定三》的要求将分期逐步实施，直到2019年1月才有望得到全面实施(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2012年)。与基金组织(扩大了)金融监督职能互为补充，金融稳定委员会是通过宏观审慎监管遏制系统风险这一危机后新重点的一部分。但是，宏观审慎原则因有利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压力而受到削弱，尽管实施证明这些自由流动是很多发展和转型经济体金融不稳定状况的罪魁祸首。

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与金融机构及活动再次成功地逃避监管的危险有关，特别是通过

影子银行业务和海外中心。再者，对“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的处理，可能需要各国财政当局携手合作并共享金融资源。但是，事经验明这个问题特别具有挑战性，即使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尽管它有着深度区域一体化的悠久历史。²⁵

为了重组国家和全球金融体系，以降低与对它们的不充分监管和错误的激励制度有关的系统风险，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同样重要的是，需要调整它们的活动方向，使之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为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和增长筹资(2011年《贸发报告》，第四章)。但是，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内，结构改革的重心一直变化，改革计划的方向令人想起为应对1980年代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一场更早的金融危机而实施的那些计划。

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以及国际金融机构认为，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腾挪空间不大。有一种观点是，采取扶持性政策的更大空间，可能会因利率已经很低而受到限制。在财政方面，政府唯恐新刺激措施可能会释放出背离财政整顿目标的信号。因此重点越来越落在以提高竞争力和恢复增长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上。

因此，有几个发达国家已经启动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例如减少对劳工的保护，将工资谈判转移到公司一级，实施私有化计划，放宽对能源和零售业部门的限制，并减少公共部门的就业和社会支出。中欧和东欧经济体以及葡萄牙、冰岛和希腊已经宣布的私有化项目尤为广泛。其他发达经济体也计划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某些税收和福利改革，有可能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加剧不平等。例如，希腊、冰岛、葡萄牙和西班牙从获得机会和数量方面对失业救济予以限制。另外，有几个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启动养老金改革，提高退休年龄和/或者降低养老金水平，并启动税

收改革，扩大税基并增加间接税收，但对个人或者企业的直接税收(经合组织，2012年b)。另一方面，有些措施看来旨在缓解社会危机的影响，例如向工人培训工作提供更多资源，以及扩大失业救济范围。

一个特殊重点似乎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放松对有些人认为过分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是基于这样的普遍信念：市场越灵活就越高效。谋求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更方便地辞退工人的改革，被认为将为聘用工人和增强总体竞争力提供更好的激励，这反过来将促进增长并增加就业机会。本报告第六章探讨了劳工制度和法规的基本原理，并揭示出存在所谓的“僵化”是合理的，并不妨碍增长。而且，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经济推理，忽视了该市场和工资的决定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劳动收入是总需求的一个有力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大范围削减劳动报酬会抑制经济活动，并因此抑制劳动力需求。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不同，降低劳动力价格也会降低对它的需求。

对于通过扩大进出口谋求摆脱危机之道的政策，可以提出理由，说明其合理性。工资的下降，创造出降低价格的空间，由此提高价格竞争力，前提是汇率变化不会抵消通货膨胀差额。这似乎是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推崇的政策。²⁶但是，如果国内和区域需求在数量上大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欧洲很多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同一区域内的若干国家同时降低工资，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除了关于结构改革的长期效应的争议，它们能否及时解决并且适用于解决当前问题，也受到关切。因为当前危机中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克鲁格曼，2012年)，旨在改善经济中的供应方的改革，并非最适当的，如果它们进

一步削弱总需求，则尤为不适当。例如，在劳动力需求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参与率(若干政府的特定目标)，只会加剧失业状况，并进一步压制工资和国内需求，与所需的效果恰恰相反。甚至力推此类结构改革方案的机构都警告说，它们可能“在不恰当的时机是有害的”(经合组织，2012年 b: 20)，在当前私人部门需求走低、失业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紧缩效果有可能太严重(基金组织，2012年d)。另外，在压力之下和经济衰退期间实施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有可能导致政府收入远低于当初的预期。

到目前为止，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改革，尚未与恢复经济增长挂钩。实际上，实施这类政策最卖力的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内总产值增长、创造就业和财政整顿的预期目标(经合组织，2012年)。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本身是导致当前衰退的主要原因；更可能的情况是，经济和金融危机被认为证明了实施结构改革的合理性，谋求这些改革原本是由于危机背景之外的其他原因。²⁷

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结构改革，往往是创建或者巩固社会安全网，并扩大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福利改革的方向与发达国家不同，有时是一种相对于以前的市场取向原则的“反向改革”。在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彻底修订其养恤金计划，扭转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私人部门为取向的改革，重新实行国家参与。例如，智利扩大了政府付费的非缴费型福利的普及范围；阿根廷恢复了费用发生拨款制公共养恤金制度；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实施了相关改革(Arza, 2012年；Kritzer, 2008年；Rofman、Fajnzylber和Herrera, 2010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0年)。这些结构性“反向改革”的目标是纠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私

人养恤基金革命已被察觉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包括覆盖率大幅缩小、性别不平等、管理和营销费用高昂，以及对受益人的支付额少。在某些国家，它们还使政府能够将养恤金收入和累计基金用于公共投资。

2012年，印度政府通过了一项50亿美元的计划，为占人口50%的最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²⁸ 一个与此配套的决定是，只能使用通用名药品(而不是原研药品)，这不仅将增进享受医疗的机会，还将促进国内制药业发展。在南非，正在开展的医疗改革，谋求建立某种形式的国民保险，并提高该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扩大覆盖范围。

在二十国集团2012年6月召开的洛斯卡沃斯首脑会议上，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承诺，加强或者扩大社会安全网及减贫方案。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行动的重点是对家庭的社会援助、增加社区权能、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机会以及以可承受的价格向低收入人口提供基本必需品。阿根廷的主要收入转移方案“普及儿童津贴”，面向18岁以下弱势儿童，该方案的覆盖率已经达到85%，并在2011年将孕妇纳入覆盖范围。巴西启动或加强了若干计划，其目标是消除极端贫穷和为弱势人口提供更多机会。这些计划包括“巴西消除极端贫穷”倡议，该倡议有三个主要支柱：(1) 增加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2) 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供应面；(3) 扩大就业和赚取工资的机会。墨西哥采取了一些措施，旨在提高正规就业对工人的吸引力。

在若干发展中国家，结构改革包括增强公共政策对支持投资和结构转变的作用。这样的措施常常与既面向供应方也面向需求方的刺激目标协调一致。例如，巴西最近降低了对银行向汽车工业贷款的准备金要求，降低了消费贷款利率，目的是支助汽车制造商和汽车购买者。与这一有针对性的措施并行的，是在基础

设施方面实施基础更广泛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包括运输和能源项目，这些项目能够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同时提高长期生产能力。其他几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也扩大了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参与程度，以支持国内经济活动并促进创造就业。例如印度尼西亚有很大一部分公共投资，定向投入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部门，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公共投资更多地以能源部门为重点。南非的公共部门投资，主要用于发展运输、电力和水务基础设施，2011年占国内总产值的7.1%，在此后至少三年里有望保持在国内总产值的7%以上。与此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其公共工作方案，保证弱势和处境不利群体拥有工作机会。而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提供的便利，有望刺激创造就业(二十国集团，2012年)。

这些措施大多具有反周期目的，因为它们的目标是在危机时期保障就业并支持经济活动。然而，它们之中有些并不是当国际环境变得较为有利时就会逆转的临时措施。一项重要的结构改革是，改革国家本身(建构或者重新成为“发展型国家”)，这也是落实产业政策和实施其他结构改革的工具。扩大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和养恤金覆盖范围，也通过它对需求的即时影响，具有了反周期成分，但是没有理由在恢复增长之后撤销这些社会进步，虽然某些相关的转移支付通常会随着经济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而减少。

总之，结构改革不可能成为借以走出经济衰退的主要工具；这项任务应当主要由扶持性宏观经济政策完成。应当根据一国的长期社会目标和发展战略，认真裁量这些改革。它们的一个特定目标，应当是矫正导致全球危机的主要功能失调领域，这些领域中有很多与全球和国内金融体系有关。另一些导致危机的因素，是收入不平等及其决定因素，本报告对此有一些较为详细的探讨。结构改革应当以减少不平等为目标，而不是像在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放大这种不平等。 ■

注 释

- 1 截至2011年年底，在35个发达国家中，仅有15个发达国家的国内总产值超过了它们各自在2007年和2008年之间达到的危机前的最高水平。
- 2 2012年3月2日，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该条约包括一项财政协定，规定将结构性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总产值的0.5%纳入国家立法。
- 3 这些商品价格的最高点，通常出现在2011年1月至4月，大米、烟草、热带原木和黄金除外，它们价格在2011年8-9月达到最高点。磷酸盐最后一次价格高峰出现在2012年1月，而石油、香蕉和牛肉的价格在2012年3月达到最高点。
- 4 关于信息的作用和商品投资者对价格的影响的详细讨论，见2011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 5 据路透社援引巴克莱银行2012年6月25日的说法，5月份有82亿美元商品投资撤离。
- 6 见，例如Kemp(2012年)；Danske Research (2012年)；路透社，Oil posts fourth biggest daily gain on record, 2012年7月29日；及路透社，Corn eases after rally, soy turns up ahead of USDA report, 2012年7月10日。
- 7 回顾1865-2010年这一时期，Erten和Ocampo(2012年)发现了四个超级周期。他们还表明所有非石油商品类目的平均价格，从一个周期到下一个周期，均有大幅下降。
- 8 保持危机后的投资力度，将招致产能过剩和出现坏账的风险。正如Akyüz (2012年)所指出的，中国的商业房地产部门面临崩溃的危险，地方政府似乎面临难以偿债的问题。
- 9 例如，低收入粮食短缺国家的谷物净进口费用，预计将在2011/2012年达到创纪录的高额，甚至高于2008年粮食危机时期(粮农组织，2012年)。
- 1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11年)提出了详细分析，分析了粮食价格波动如何使小农和贫穷消费者越来越容易陷于贫困。国际劳工局(劳工局，2011年)研究了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对发展中国家就业和分配的影响，断定有重要证据表明，粮价上涨具有不利的致贫效应。
- 11 对拉奎拉首脑会议以来农业援助进程的详细评估，见Action Aid, 2012年，以及《卫报》，Rich nations risk breaking their pledges on farming aid, says anti-poverty group, 2011年7月10日。粮农组织还着重指出了萨赫勒和非洲之角应急计划的资金缺口。关于总的发展援助，经合组织(2012年a)报告说，2011年，主要捐助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减少了近3%，此前的一个长期趋势是逐年增长。
- 12 关于跨国公司在农业和采掘业中的作用的详细讨论，分别见贸发会议，2009年和2007年。
- 13 根据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2012年)的说法，2011年，全世界40个最大的矿业公司因商品价格上涨而获得创纪录的高额利润。
- 14 全球土地热潮的佐证，也见国际环境和发展学会(环发学会)，2012年。
- 15 关于土地交易如何未能使穷人受益的讨论，见乐施会，2011年。
- 16 该指导方针包括下述方面，例如增进妇女在取得土地方面的平等权利，建立农村穷人可资利用的透明的簿记制度，促进对非正式和传统地权承认和保护(Graziano da Silva, 2012年)。查阅该指导方针可登录：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112/VG/VG_Final_EN_May_2012.pdf。负责任的铜业投资原则系指尊重土地和资源权利，确保粮食安全，透明度、良好治理和适当的扶持性环境，协商和参与、负责任的农业企业投资、以及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贸发会议，2010年)。

- 17 最近重新审查它们的采矿业制度的国家例证，见 Leon, 2012年; Ernst 和Young, 2012年; 经济学家, 2012年a; 及Australian Mining, 2012年。
- 18 见2011年财政大臣预算报告: http://www.hm-treasury.gov.uk/2011budget_speech.htm。
- 19 见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 <http://www.bis.org/statistics/index.htm>。
- 20 这些是2004年之后加入欧盟的12个国家。
- 21 国际清算银行关于国际债权的统计, 以美元表示, 但有些债权也可能以其他货币表示(例如欧元, 特别是在欧洲)。因此, 美元在危机发生后对欧元升值, 往往会凸显出以美元计量的银行债权减少。
- 22 自2005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20%, 按照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约30%。
- 23 事实证明, 迎合市场是一项艰难任务, 因为“市场似乎患有某种分裂症, 它们要求整顿财政, 但是当整顿导致增长率下降时, 它们的反应很糟糕”(基金组织, 2012年a: xiv)。
- 24 总体上,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趋势不太乐观(基金组织, 2012年b; 贸发会议, 2012年b)。总体图景掩盖了这一事实: 有20个国家已经债台高筑, 或者仍然处于这样的高风险中(基金组织, 2012年c)。
- 25 金融稳定委员会就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督和监管提出了建议(金融稳定委员会, 2011年a), 也制订了一个框架, 用于解决与被断定“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有关的系统和道德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 2011年b; 也见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 2011年)。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已经确定了第一组29个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最终将要求它们具备额外损失吸纳能力。
- 26 据欧洲央行总裁马里奥·德拉吉说, “这些领域的改革, 对于在成本竞争力方面遭受重大损失并需要刺激生产力和改善贸易表现的国家, 尤为重要”(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介绍性发言, 巴塞罗那, 2012年5月3日; 也见巴罗索, 2012年)。
- 27 正如《经济学家》(2012年b)所指出的, “将经济上的失败归咎于肆意挥霍或者没有充分坚持一套公认的经济原则, 是一种很诱人的做法。有些领导人似乎急于对危机做出有意无意的错误判断, 为的是抓住机会, 将他们喜欢的政策偷偷强加给弱势经济体。”经合组织(2012年b: 25)也声称, “总体上, 危机似乎对结构改革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与危机前的时期相比, 对《努力实现增长》的建议的平均回应率有所增加, 建议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利用率。就后者而言, 这部分地反映了最近在欧元区债务危机背景下实施的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 28 见《金融时报》, “印度向数百万人提供免费药品”, 2012年7月6日。

参考文献

- Action Aid (2012). Pledges, principles and progress: Aid to Agriculture since L'Aquila. Available at: <http://www.actionaid.org/usa/publications/pledges-principles-and-progress-aid-agriculture-laquila>.
- AfricaFocus (2012). Africa: detour on food security. *AfricaFocus Bulletin*, 24 May.
- Aglietta M (2012). *Zone Euro, Eclatement ou Fédération*. Michalon Editions, Paris.
- Akyüz Y (2012). The staggering rise of the South? Research Paper 44, South Centre, Geneva.
- Arza C (2012). The politics of counter-reform in the Argentine pension system: Actors,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cy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Available a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8-2397.2012.00872.x/abstract>.
- Australian Mining (2012). Taxing times: A look at global mining tax regimes. 5 March. Available at: <http://www.miningaustralia.com.au/slider/taxing-times--a-look-at-global-mining-tax-regimes>.
- Barclays Capital (2012a). *Commodities Weekly*, 29 June.

- Barclays Capital (2012b). *Commodities Weekly*, 1 June.
- Barroso JMD (2012). St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finance, and its impact on development in 2012. Speech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7 May.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SPEECH/12/365>.
- BCBS (2010a). Basel III: A globa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ore resilient banks and banking systems. Basel,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bis.org/publ/bcbs189.pdf.
- BCBS (2010b). Basel III: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 Basel,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bis.org/publ/bcbs188.htm.
- BCBS (2011). Globally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the additional loss absorbency requirement. Final document, November. Available at: <http://www.bis.org/publ/bcbs207.htm>.
- BCBS (2012). Report to G20 on Basel III implementation, June. Available at: <http://www.bis.org/publ/bcbs220.pdf>.
- Bibow J (2007). How the Maastricht regime fosters divergence as well as instability. In: Arestis P, Hein E and Le Heron E, eds. *Monetary Policies - Modern Approach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7–222.
- Bibow J (2012). The euro debt crisis and Germany's euro trilemma. Working Paper no. 721,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Annandale-on-Hudson, NY. Available at: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s/wp_721.pdf.
- Cai F, Wang D and Zhang H (2010). Employment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China & World Economy*, 18(1): 33–46.
- Credit Suisse (2012). China: Is the commodity super-cycle over? *Securities Research & Analytics*, 19 March.
- Danske Research (2012). Commodities update: Weather premium in grains to stay elevated, 16 July.
- De Grauwe P (2012). In search of symmetry in the eurozone. CEPS Policy Brief No. 268,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Brussels.
- ECB (2012).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Annual Report*. Frankfurt.
- ECLAC (2012). Macroeconomic Report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de Chile, June.
- Ernst & Young (2012). Business risks facing mining and metals, 2011–2012.
- Erten B and Ocampo JA (2012). Super-cycles of commodity price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Working Paper No. 110,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ESA), New York, February.
- FAO (2011).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How does International Price Volatility Affect Domestic Economies and Food Security? Rome, March.
- FAO (2012). 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 Rome, March.
- Flassbeck H (2007). Wage divergences in Euroland: Explosive in the making. In: Bibow J and Terzi A, eds. *Euroland and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Player or Global Drag?*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43–52.
- FSB (2011a). Shadow banking: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11027a.pdf.
- FSB (2011b). Policy measures to address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sel.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11104bb.pdf.
- G-20 (2011). Coherent conclus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apital flows drawing on country experiences, as endorsed by G20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3–4 November. Available at: http://www.g20-g8.com/g8-g20/root/bank_objects/0000005999-Coherent_Conclusions_on_CFM_postCannes.pdf.
- G-20 (2012). Policy commitments by G20 Members, Los Cabos Summit, 18–19 June. Available at: http://www.g20.org/images/stories/docs/g20/conclu/Policy_Commitments_By_G20_Members.pdf.
- Graziano da Silva J (2012). Global land deal guidelines could pave the way to world without hunger. *The Guardian*, 11 May.
- HLPE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2011). Land tenur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in agriculture. Rome.
- IFS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2012). Public spending on education in the UK to fall at fastest rate since at least 1950s.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www.ifs.org.uk/pr/bn121_pr.pdf.
- II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12). The global land rush: What the evidence reveals about scale and geography. London, April.
- ILO (2011). World of Work Report 2011: Making Markets Work for Job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MF (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October.
- IMF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 IMF (2012a).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 IMF (2012b). *Fiscal Monitor*. Washington, DC, April.
- IMF (2012c). List of LIC DSAs for PRGT-eligible countries, 3 May.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dsa/dsalist.pdf>.
- IMF (2012d). Concluding Statement of the 2012 Article IV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3 July.
- ISS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2010). Pension reform in Chile. A case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Geneva.
- Kemp J (2012). Price jump does not mark shift in oil fundamentals. *Reuters, Inside Oil*, 4 July.
- Koo R (2011). The world in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Causes, cure and politics, *Real-World Economic Review*, 58(58): 19–37.

- Kritzer B (2008). Chile's next generation pension reform.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68(2): 69–84.
- Krugman P (2012).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 Lemoine F and Ünal D (2012). China's strong domestic demand has reduced its trade surplus. VoxEU, 19 July. Available at: www.voxeu.org/article/china-strong-domestic-demand-has-reduced-its-trade-surplus.
- Leon P (2012). Resource nationalism by taxation: A look at key African countries. Presentation at Annual Mining Seminar on Minerals Tax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Centre for Energy, Petroleum and Mineral Law Policy, 26–28 June.
- Maddison A (2008).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GDP per capita, 1-2008 AD. Available at: <http://www.ggd.net/MADDISON/oriindex.htm>
- Maddison A (2008).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GDP per capita, 1-2008 AD. Available at: <http://www.ggd.net/MADDISON/oriindex.htm>.
- Mohammadian-Molina R (2012). Investment flows in commodities market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prices. Barclays Capital, London.
- OECD (2012a). Development: 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falls because of global recession. Paris, April.
- OECD (2012b). *Economic Policy Reforms 2012: Going for Growth*. Paris, OECD Publishing.
- Oxfam (2011). Land and power: The growing scandal surrounding the new wave of investments in land. Oxford.
- PWC (2012). *Mine 2012: The Growing Disconnect*. Available at: <http://www.pwc.com/gx/en/mining/publications/mining/mine-the-growing-disconnect.jhtml>.
- Rofman R, Fajnzylber E and Herrera G (2010). Reforming the pension reforms: Argentina and Chile. *CEPAL Review*, No 101, August: 83–106.
- Takats E (2012). Countercyclical policies in emerging markets. *BIS Quarterly Review*, June: 25–31.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The Economist* (2012a).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Africa: Wish you were mine. 11 February.
- The Economist* (2012b). Growth: In praise of structural reform. 27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2/02/growth>.
- UN/DESA (2012a).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DESA (2012b).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Update as of mid-201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CTAD (TDR 2005).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Features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5.II.D.1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mployment,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1).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Post-crisis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1.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07).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7.II.D.9,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0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D.15,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10).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that Respects Rights, Livelihoods and Resources: A discussion note prepared by FAO, IFAD, the UNCTAD Secretariat and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contribute to an ongoing global dialogue. TD/B/C.II/CRP.3. Geneva, United Nations.
- UNCTAD (2012a).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2*. Geneva (forthcoming).
- UNCTAD (2012b). Sovereign debt crisis: From relief to resolution. Policy Brief no. 3, April. Available at: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uxiiipb2012d3_en.pdf.
- UNCTAD/WTO (2012). Short-term services trade statistics, 13 July. Available at: http://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183&Sitemap_x0020_Taxonomy=Statistics;#20;#UNCTAD%20Home.
- World Bank (2012).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2: Food Prices, Nutrition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ashington, DC.
-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12). *UNWTO World Tourism Barometer*, 10. Madrid, July.

收入不平等：主要问题

A. 收入不平等与市场机制

全球危机发生之后，经济不平等再次成为一项政策关切，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全球不平等日益严重，在增长期和衰退期都是如此。在此背景下，本报告探讨一个老问题：日益加剧的(或者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否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或者一项必要因素；或者，降低收入不平等是否可能甚至值得向往，以便实现包容性增长以及克服当前的经济挑战，并为长期更可持续和更快速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平等和公平问题，从古代就让思想家、政治家和各种宗教颇费脑筋。在当代的论争中，人们常常将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形式平等)与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区分开来。后一种形式的平等，受所有权结构及市场过程、社会分层情况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可能使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无法获得真正的机会平等。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对于可以容忍

多少“实际上的不平等”，而不会严重损害社会凝聚力和信任以及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运行，尚存在争议。此处的平等主要是指收入分配上的相对平等，而不是公民权利上的绝对平等。

其中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的差距似乎特别巨大的一个领域，是市场操作。一方面，不同市场上的买方和买方形式上是平等的：它们在给定价格上自由地接受或者拒绝某项交易。其结果是，在理论上，只有使双方

都受益时，市场交易才会发生。另外，市场制度通过等价交换，确保公平(哈贝马斯，1973年)。另一方面，资源的不平等在市场交易中的表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明显，这是由于不同参与者在购买力上的非对称性。从形式上看，市场是一个人员

和法律上的平等空间，所有参与者在此平等地自由买卖，使双方都受益。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财富和收入差别，市场操作反映出在起始点就缺乏实质(或者有效的)平等。

对于可以容忍多少“实际上的不平等”而不会严重损害社会凝聚力和信任以及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运行，尚存在争议。

在纯市场机制中，没有什么因素倾向于矫正资产和资源在起始点的不平等。拥有更多资源或者更容易获得贷款(两者通常互相关联)的行为者，能够以比其他人更大的规模投资、创新和扩大生产。因此经济发展过程通常是不平衡的，有些企业和部门占有其他企业和部门的市场份额，新产品和生产流程在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取代旧的(熊彼得，1942/2003年)。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和知识(包括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获得的知识)的积累，往往使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

虽然形式平等的原则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和经济交易的基础，但是，市场结果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社会共识，在不同的社会里迥然不同。无论国家间在实际不平等的程度问题上存在什么差异，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已经引起对于其社会和经济后果日益严重的关切。

在过去30年里，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这常常被视为一项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导致以工资维生的人和以资本收入维生的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导致这些总类中不同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重要的是记住，贸易、金融和技术因素，总是在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法规及政策框架内运作。在本《贸易和发展报告》(贸发报告)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开始加速而且变得日益“以金融为先导”，大多数区域的不平等加剧，但是这种发展趋势，并不是社会必须容许或者接受的“自然的”东西，不平等的加剧也不会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上提高市场结果的效率。甚至更为糟糕的是，不平等的显著加剧，可能会制造经济冲突，而经济冲突导致社会紧张，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政治暴力，尤其是当收入在总体上增长放缓或者停止增长时。正因如此，例如

廷伯根(1956/1964年)等经济学家，将国家和社会集团之间以更好的方式分配实际收入和支出的必要性，列入经济政策目标。

利用某些工具，降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未必会损害投资和增长。相反，适当的宏观经济、税收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以既有利于促进总体收入增长，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预防不平等加剧，或者减少不平等。

例如，通过征收收入累进税或者对积累的财富征税，政府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而不削弱经济行为者创立和实施新想法和新项目的动因。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税，不会消除较富裕人员的绝对优势，也不会消除其他人尝试新想法和向上攀

不平等的加剧并不是社会必须容许或者接受的“自然的”东西，也不会提高市场结果的效率。

登收入阶梯的动机。据Diamond和Saez(2011年)估计，美国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可能高达50-70%，而不会对激励作用造成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将征收财富和遗产税视为一种手段，借此激励下一代也以下述方式参与经济活动：为社会整体创造最大的成果，而不是依靠继承遗产。在资源富饶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旨在获得一大部分自然资源租费的政府政策至关重要，它利用这种商品红运，增加国内收入和需求，并创造有更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容许少数国内外行为者，主要集中在狭小的地理区域，拿走大部分意外收益。收入政策、用于对付失业和其他艰难境况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提供基本服务，例如全民良好教育，是能够同时强化增长并减少不平等的工具。

这些可供选择的观点，通过挑战那种认为不平等的加剧是市场经济体内发展的正常结果的传统智慧，有可能催生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新见解，并有可能导致一种范式转变，转向一种更平等且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

B. 不平等与经济理论

关于不平等问题，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贯有分歧。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不是个问题，他们辩称，在没有对社会流动性的阻碍的情况下，不平等状态基本反映了才智和选择上的不同。他们相信，最有才智、最节俭和最勤奋的人会取得成功，即使他们最初因社会条件不利而身处窘境。在市场参与者获得的补偿与他们的社会贡献(他们的边际生产力)相符的世界上，“适者”的成功不能被视为不公平，也不应成为一项政策关切。根据这种观点，为减少不平等而制订的战略，将损害市场机制产生最有效成果的能力，因为它们削弱参与经济过程的动机。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妨碍“通过使各方共同获利”减少绝对贫困的机会(Friedman和Friedman, 1980年)。

根据哈耶克(1960年和1978年)的观点，市场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是一个无人管理和引导的非人格化过程产生的结果，因为公正心是一种人类特质，非人格化的市场无所谓公正或者不公正。吊诡的是，政府为确保更平等或者更具社会公正性而实施的干预，会将报酬分配与个人为创造全球收入所做的贡献割裂开来，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公共当局应当提供“机会平等”，尤其是在这种意义上：规则应当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人为地制造或者设置障碍或者有利条

件。机会平等也要求普遍接受政府提供的初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应当由私人创办，为了平等，公共管理机构无权决定谁可以获得高等教育(哈耶克, 1960年: 384-385)。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努力制造“结果平等”的政府，将打击能力较强的人，而鼓励能力较弱的人。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从经济学观点看，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一种关于经济发展方式长期结构的观点，导致对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库兹涅茨影响深远的贡献，揭示了收入不平等和基于经济结构部门变化的发展进程之间的

长期关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由于生产力和收入增长集中在城市，不平等加剧，工人从农村地区(其特点是相对一致的低生产率活动和低收入)迁徙到城市地区寻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在后期，不平等状况减弱，因为

农业机械化和农业部门从业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往往会消除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因为城市工人最终拥有了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库兹涅茨, 1955年; 加尔布雷思, 2012年)。按照这样的分析，“必须将收入不平等状况的长期变化，视为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并且与其他要素的相似变动互相关联”(库兹涅茨, 1955年: 20)，它们

有些经济学家相信，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和增长。

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收入水平和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与经济发展过程内生的结构性变化相呼应。因此，至少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不平等看起来既不是发展的推动力，也不是绊脚石。

后来，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研究了收入分配能够如何影响投资和增长之后，对这一观点作了修正。卡尔多(1957年)提出了一个经济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国内总产值的增长，受可用资源限制，而不是受有效需求限制：资本积累、创新流动和人口增长决定着经济扩张情况。在模型中，社会储蓄倾向决定着资本积累速度，但是它们还与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有关联，因为以利润维生的人，其储蓄在收入中所占份额往往高于以工资维生的人。因此，较高的(功能)收入不平等，与较高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关。卡尔多没有暗示这应当成为任何政策建议的依据，因为在他的模型中，收入分配是内生的；但是多年来，对其模型的一个流传很广的解释是，通过增加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有可能促进增长(框2.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在1960年代所做的研究，遵循了不同的方法，因为他们认定拉丁美洲社会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是发展的主要障碍。他们相信，它妨碍了社会流动，原因在于它阻碍了最有活力的个人在社会中崛起，弱化了高效利用劳动力、土地和机械的经济动因。¹他们还认为它造成上层阶级的过度消费，这与普罗大众的朝不保夕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在他们看来，收入不平等不会转化为更强的资本积累，因为富人穷奢极欲的消费导致储蓄减少。而且，因为此种消费包含很大一部分进口商品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的商品，它对国内增长和就业影响甚微，

不会为可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的基础。因此，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政策，必须设法减少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便增加储蓄并引导它们变成资本积累(普雷维什，1963年；Pinto，1970年)。

1970年代中期，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工作，已经不再是主流，其中一个原因是具有代表性的行为者模型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²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的金融动荡和债务危机，使人们集中关注短期经济管理，而发展关切退居幕后。然而，自1990年代初，人们重新对不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和拉丁美洲在发展方面“失去的十年”之间的反差，向人们提出了关于它们的不同发展路径问题。东亚相对低度的不平等与拉丁美洲一贯的高度不平等形成鲜明对比，而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又因债务危机以及所采取的对策而进一步加剧。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用于解释这些区域截然不同的发展经验的重要因素(例如，Fajnzylber，1989年；拉加经委会，1990年)。

增长和分配之间的联系在1990年代初重新激发出的兴趣，体现在多项理论工作中，这些工作确认了四个可能的渠道，收入不平等有可能经由这些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渠道是不平等状态对总需求量及其构成的影响。第二个是不平等状态与社会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关注高度不平等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含义。最后，第四个渠道与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及教育投资有关联，经由这一渠道，不平等状态对产出增长速度有影响。

关于第一个渠道，有一种观点是，因为企业家根据他们对其产品未来需求的预期作出投资和雇佣决定，提高工资(和降低不平等)可以通过增加预期需求刺激投资、就业和经济

发展经济学家重点研究 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总 需求、投资和增长。

不平等、储蓄和投资

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常常被视为一种提高投资率的手段，因为富人的较高收入或者以利润维生者获得的更多收入，往往在任何给定收入水平上增加总储蓄量。据认为，他们的储蓄率提高，近乎自动地导致增加投资。正如以前的《贸发报告》(见，特别是2006年《贸发报告》，第一章附件2，和2008年《贸发报告》第三章)所讨论的，支撑这一观点(以及旨在重启增长和创造就业的相关政策)的储蓄和投资理论极为可疑。它甚至有严重缺陷，因为其核心是一种简单的事后追溯出的一致性。

一个经济体所创造的国民产值(加上净资本流动)，可以立即使用(用于生产期间的消费)，也可以随后使用。如果随后使用，它被算作该经济体的储蓄或者投资。因此，仅从定义看，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储蓄(国内的和外国的)总是等于它的投资。

但是，这种特性并不涉及因果关系。因此，只要确定两个术语中任意一术语的因素没有被考虑到，就很难将其归咎为任何术语在宏观经济过程中发挥的某些特殊或甚至是领导作用。一种理论，只有将一组行为者的计划与其他行为者的计划对照分析时，才能成立。具体地说，必须找出决定一个经济体内不同行为者所做的消费和投资决定的功能关系。这样做的时候，不能将所有行为者的实际收入，都当做外部因素，而应当作为其本身受到经济行为者影响的一个变量，即关于消费和投资计划的决定影响，也受到政策决定和外部冲击的影响。

因为一个经济体内经济行为者的行为变化，受到客观不确定性的影响，作出消费和投资的决定是一个复杂过程，其结果远不如仅仅从事后追溯出来的一致性来看可能显示出的那样一目了然。如果不平等加剧，所有家庭计划中的储蓄加在一起，实际上将会增加，因为富人的储蓄率高于穷人的储蓄率。但是，假若如此，生产者将立即面临对其产品的需求减少和利润下降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典型应对方式是，减少对新生产能力的投资。另一方面，如果储蓄计划是基于依赖投资增长的收入预期，而实际上投资率下降了，这时总收入将低于家庭当初在制订储蓄计划时的预期收入。因此家庭收入总体增长计划将可能无法实现，因为总收入低于制订储蓄计划时的预期收入。而且，企业的储蓄(即保留的利润)可能会减少。事后追溯出来的储蓄和投资的一致性没有改变，但是触发均衡化的机制是实际收入的意外下降，这种意外下降抵消了计划中的储蓄增长。

传统储蓄和投资理论忽视了这后一种机制和储蓄是内生变量这一事实。它假定家庭储蓄率提高之后，尽管消费减少，公司的投资将比以前增加，而消费减少是储蓄增加的必然对等物。在正统模型中，经济的唯一驱动力是由消费者的自主决定。它假定企业家完全是被动反应型的，他们在制订投资计划时，从不考虑实际商业条件恶化和利润下降的情形。

当给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平等时，总消费量和私营企业进行固定投资的动因更大，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高于高收入群体。这一点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或者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尤为重要。正如凯恩斯(1936/1973年: 372-373)所说的：“……在达到充分就业这点以前，资本之生长并不系乎消费倾向之低，反之，反因其低而遭遏制……”因为“……提高消费倾向，则总体上有助于增强投资之动因……”

增长。墨菲、Shleifer和Vishny(1989年a和b)正式论述了罗森斯坦·罗丹(1943年)的直觉：同时创建多种行业，即使在每个行业中单独来看不盈利的情况下，也有利可图。他们表明这样的“大推动”要求新行业支付的工资高于传统部门的工资。如果工资较低，同时实施的产业化不会赢利，因为缺少总需求。在他们的模型中，富人需求高质量商品，生产高质量商品几乎不能提供提高生产力的空间；相形之下，中产阶级需求大批量生产出的标准化商品，生产力的提高大多发生在这里。因此，减少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因为它增加了对具有促进增长的特性的产品的需求。

另一套观点(上文所述第二个渠道)强调，即使收入高度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不利影响，它也有间接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例如，高度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并使犯罪率上升，这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损害财产权，提高交易和安全成本，并降低增长率(Venieris和Gupta, 1986年；Benhabib和Rustichini, 1996年；Grossman和Kim, 1996年；Bourguignon, 1998年)。

第三个渠道得到了不同模型的检验，这些模型在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建立了一种政治经济学联系。Alesina和Rodrik(1994年)及Persson和Tabellini(1994年)的模型表明，初次收入分配(即对完全产生于市场结果的收入的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碍增长。他们辩称，在平等度较低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口谋求更多的再分配，再分配政策由于扭曲经济而降低增长率。特别是，资产税导致私人投资和增长率下降。另一组模型(Bénabou, 2000

年、2002年；Saint-Paul和Verdier, 1996年；Perotti, 1996年；Bartels, 2008年)得出了高度不平等导致低增长的同样结果，但使用了截然相反的机制。他们假定再分配和增长之间正相关。根据他们的观点，关键投票人(即在连续选举中能够改变选择，在一个群体中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投票人)常常比中等投票人更富有，因此不会因再分配政策受益。因此，在平等度较低的社会里，穷人对选举的参与率很低，而且/或者富人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太大，促进增长的再分配政策力度不够。

第四种渠道主要研究收入不平等、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强调收入不平等、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投资决定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对风险的规避和道德风险，是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根源。他们发现，不平等现象降低增长率，是因为它阻止了一些行为体为实物和/或人力资本投资(Banerjee和Newman, 1991年)。Galor和Zeira(1993年)假定，为接受教育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即使穷人也需为此付出一笔最低额的固定成本(可能是他们的孩子不去工作而产生的机会成本)。他们显示，为教育支付的固定成本，由于贫穷家庭落入贫困陷阱而导致不平等状态难以消除。³ Galor和Moav(2004年)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

当实物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时，如果这种积累取决于储蓄，而高收入个人对储蓄有较高的边际倾向，不平等状态可能有利于增长。然而，当人力资本是此种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时，不平等状态可能对增长有不利影响，因为信贷约束可能会限制总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一理论断定，强调不平等状态对增

最近的理论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

高度不平等可能会抑制总需求，剥夺很多人获得教育和信贷的机会，制造社会动荡，损害生产性投资和增长。

长的积极影响的模型，正确反映了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现实，但是对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已经不再有意义。最后，在Aghion、Caroli和García-Peñalosa(1999年)的“资本市场不完善”模型中，高度不平等也对增长有直接的不利影响。他们辩称，它减缓了人力资本形成，因为富人的投资往往限于回报率低的活动，而穷人，即使他们有回报率很高的项目，其投资额也无法超出他们有限的财力，这是因为资本市场不完善致使他们没有机会获得贷款。

这种理论研究并不总能引起决策者注意，尤其是在1990年代(直到1997年)，除非洲和转型经济体之外的多个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上升趋势的时候。在若干国家，增长似乎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相互兼容，所采取对策的导向，常常是为那些在获得增长收益方面被边缘化的人建立安全网。然而，一些具有更宏阔的历史眼光的国际组织，并不这样乐观。贸发会议(1997年《贸发报告》)评论说，自从1980年代初期，

不平等日益加剧，增长缓慢，这正在变成全球经济的永久特征。它还警告说，这将导致政治上的激烈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会损害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多种好处。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和社会规划研究所(拉加经社规划所，1998年)突出强调了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缺点和脆弱性，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社会影响有限，没有能力减少收入不平等。它还评论说，补偿性社会政策没有能够遏制日益扩大的社会和经济差距，需要重新调整经济政策的方向。

世界银行(2006年)也分析了高度不平等带来的负面社会经济后果。它指出，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常常以社会不乐见的方式，影响到投资机会的分配，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高度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系统性地有利于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的利益。这种不公正的制度可能产生经济上的代价……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有害无益而且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世界银行，2006年：2-3)。

C. 一些关于不平等、就业和增长的经验证据

B节回顾的大部分最近的文献，都提出对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这种关系，正如在这一节中解释的那样，通常显示两者之间的一种负相关。这与本报告后面几章中讨论的一些基本的典型化事实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曾有过强劲的全球增长，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很低或者日渐降低，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收入不平等明显加剧，特别是在发

达国家，达到了192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程度(第三章讨论这一问题)。它与全球增长放缓和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同时发生，最终导致2008年底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最近关于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第二类利用纵向截面数据(仍然在跨国一级)，研究两者之

间中期关系，第三类以美国的横断面和纵向国家级数据为重点，研究这一关系。

在第一类研究中，Persson和Tabellini(1994年)及Alesina和Rodrik(1994年)检验了他们的模式的简化方程式，显示出收入分配和增长之间在经验角度呈负相关。Easterly(2007年)利用辅助变量方法，显示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因果关系。Perotti(1996年)试图对上文讨论的各种不同理论方法加以区分。他的主要成果可以概况如下：(一) 收入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二) 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国家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联度更高；(三) 结构性估计支持这样的假设：不平等导致社会政治动荡并影响教育和与生育有关的决定，从而妨碍增长；⁴及(四) 没有证据支持下述政治经济观点：

不平等导致力度更大的再分配，这反过来导致增长率降低。实际上，Perotti发现再分配和增长之间呈正相关。

第二类研究包括Li和Zou(1998年)和Forbes(2000年)的研究，他们利用5年长期，对国别因素进行受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正相关。这些结果似乎与上文讨论的理论模型得出的结果截然相反。但是，他们的经验方法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与下述事实有关：大多数模型强调不平等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研究分析的是不平等和中期或者短期增长的关系。第二个问题(也影响上文讨论的跨国回归分析)与这一事实有关：强加在标准的回归分析中的线性结构，可能导致片面的结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Banerjee和Duflo(2003年)发现，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在任一方向上)与增长呈负相关，不平等状态迁延不决，也与增长呈负相关。

收入过度集中是导致全球危机的一个因素，因为它与对最高收入者有悖常理的激励有关，也与其他收入群体负债过多有关。

第三类研究表明，美国各州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晰。例如，Partridge(1997年)发现，如果用收入分配五分位中第三位的收入所占份额来衡量不平等程度，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如果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则呈正相关。而Panizza(2002年)的研究显示，美国州一级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不是很明显。

此处回顾的最近的经验和分析工作，虽然并不都是结论性的，而且有时基于相反的假设，但是大多显示出与上文已经提及的典型事实一致，这一事实是：很多国家在战后几十年里，当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或者日益降低时，其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自1980年代以来，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减弱。就发达国家一类而言，员工薪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以要素成本计算)已经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显性失业达到了同期最高记录。

正如本报告后面几章所示，过去三十年里，宏观经济政策和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新范式之后出现的制度安排变化，对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趋势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对全球危机的酝酿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劳动力市场和税收政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因为它们将根据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作出调整的重负，压在以工资收入维生的人和低收入群体身上。例如在美国，减税有利于富人，他们的某些税率达到了该国历史最低值。有证据表明，21世纪头十年降低累进税，并没有导致增长率和就业

率较之前的十年更高，尽管针对最高收入的税率在1990年代初期提高了(克鲁格，2012年)。

另外，有一些最近的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某些主要原因，包括私人负债过多和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配地位，都与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有联系。⁵ 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私人债务收入比日益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实际工资停止增长，降低了家庭购买力。由于工资没有增长，家庭只有通过举债，才能增加支出，或者保持原来的支出额。这种债务增加，反过来促进了金融部门的活动并增加了它们的利润，导致财富和收入进一步集中。信贷泡沫由此产生并最终破裂，造成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反映在付给公司主管、经理人和金融代理人的薪酬上。这一部门的薪水极高，是最高收入者和其他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薪酬组合常常包括股份或者优先认股权，这造成有悖常理的激励，并导致过度冒险。在此背景下，与以金融为先导的全球化相伴发生的公司行为变化，大力强调短期收益和股东红利，而以工资收入为生的人承担了为适应经济冲击所作调整的最大重负。

如果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随后发生的全球衰退和为应对衰退而制订的政策，也对收入不平等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贸发会议，2012年)。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社会后果是，很多国家的失业率达到创纪录之高，还有贫困现象增加和不平等状况加剧。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很多旨在克服当前危机

的建议，例如降低工资和减少社会公益服务，往往加剧不平等。削减公共支出的重点主要是削减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和社会公益服务支出和减少转移支付，以及削减公共部门的薪水和就业。它们还包括减少公共投资，这将对就业和私人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财政紧缩采取提高税率的形式，这通常涉及增加递减的间接税，而不是对财富和高收入群体征收的累进税。因此，财政紧缩通常具有负面的分配效应，因为它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由于这些群体有较强消费倾向，这进一步对总需求产生下行压力。

危机使社会在就业方面蒙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为了恢复危机前的就业并吸纳新劳动力，需要消除2011年估计为4,800万个工作岗位的缺口(联合国经社部，2012年)。⁶ 除了工资收入的直接损失，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往往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对工资和劳动条件产生严重影响。它还导致失去资格和降低就业能力。此外，最穷和中等收入人口最容易在资产方面蒙受严重损失，例如在住房和储蓄方面，同时，他们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进一步受损。关于危机如何加剧欧洲的不平等，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b)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情况相反，在过去十年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善是实施再分配型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将工资增长与生产力增长挂钩。21世纪头十年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状况日益缓解，证明了这些政策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有效性。但

发展中国家必须越来越
依靠国内市场和南南
贸易……

……但是国内和区域市
场的规模和构成，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
分配。

是，在绝对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往往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限制性政策和更加严重的不平等，不仅损害国内经济活动，也制造出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在当前发达国家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依靠出口

取得过去那样的增长，必须越来越依赖国内市场和南南贸易(2010年《贸发报告》)。但是，此类市场的规模和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情况。因此，这些国家需要进一步降低收入不平等，并在外需和内需之间找到恰当平衡。

D. 向前看

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际机会平等之间的差异，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影响深远的经济后果。从摇篮时期就开始面临的不平等，不容易通过社会流动予以纠正。它往往从一代人延续到下一代，而且通常是复合型的，特别是由于接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不平等，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现有权力结构的惯性。实际上的机会平等，不仅要求消除从法律上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例如存在于封建时代的那些制度。它还要求为所有社会群体提供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和适足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否则，形式平等不过是一个空壳。用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话说(1894/2007: 75)，“冠冕堂皇的法律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禁止他们睡在桥下，禁止他们上街行乞，还禁止他们偷面包”。没有实际上的机会平等，就会浪费大量的发展潜力，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不能参与现代生产活动和消费，这将对创造附加值和培育强大的国内市场的可

能，产生不利影响。

平等度越高，结果和机会南辕北辙的可能性越低。结果经由获得医疗卫生、教育和影响力的情况，对机会具有决定作用。这不仅与低收入群体的机会有关，而且涉及收益分配(例如租费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分配，以及创新性部门和企业与衰退型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收益分配)。利润在何种程度上反哺投资，以及经济的整体活力，影响着创造就业的情况。

正如后面的章节所讨论的，不平等、增长和结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降低不平等和增强包容性，能否以及如何导致一个强劲和持续增长的过程。鉴于全球危机对很多发达国家的持续影响及财政和工资对策所产生的负面分配效应，修正关于不平等的政策办法，更成为当务之急。在发展中国家，增进工人在总体生产力增长中对所有职业的参与，并为穷人提供更多保护，这对减贫和增强国内市场活力都极为重要。

对不平等与增长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不平等涉及方方面面。

衡量不平等问题的难度及数据可用性问题，使这项工作变得更为复杂。本报告主要考察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仍然是一项重大关切，因为全球不平等是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的结果。

事实上，国家间的收入差

别，才是全球收入不平等

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一国内部

采用可靠的收入分配方式，

减少国家间的人均国内总产

值差距，将降低全球收入不

平等，反之亦然。因此，在

国家和国际一级付出持久努

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国内总产值并帮助它们追赶发达国家，仍然至关重要。

本《贸易和发展报告》第三章给出了一些关于不平等状况严重性及其演变的经验证据。

它以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为重点，但也考察

不平等在全球一级的演变方式。它提出，决策

者需要针对其国内的不平等，采取旨在缩小收

入差距的政策，这反过来将影响总体经济和社会

成果。本章还简要考察了不平等问题的其他

一些方面，例如性别、教育机会和财富分配。

所有这些都与收入分配相关，要求采取具体的

政策行动。

第四章探讨了公认的引起最近收入分配

方式变化的主要结构性原因，包括贸易、技术

变革和以金融为先导的全球化。它认为，全球

化和技术变革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未必都

一样。相反，它们取决于初始条件以及宏观

经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全球化的力量和技术发展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采取适当的就业、工资和收入分配政策，结构性变化不一定导致不平等加重。本报告第五章和第六章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详细探讨。

第五章探讨积极的公共

政策已经和可能对收入分配

作出怎样的修正，包括利

用以再分配为目标的财政

工具。它认为，利用这些工

具，不一定会减少对固定资

本、创新和获得技能进行投

资的激励。与此相反，利用

这些工具减少不平等，比过去的降低累进税和

减少社会转移支付的一般做法，更能够促进增

长和创造就业，降低累进税和减少社会转移支

付的目的是消除对市场结果的扭曲。

最后，第六章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和

政策，能够怎样与适当的宏观经济框架一起，

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导致持续增长和更具包容

性的发展。这一章的开头提出，增速缓慢对不

平等有强烈影响，这是由于失业率上升并且居

高不下。后者加剧不平等，一是因为失业造成

收入损失，更根本的原因是，削弱了劳动者的

议价能力。文章认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范

式，不但没有减少失业，而且往往加剧失业状

况，因为失业者容易接受低工资。它断言，支

撑这一范式的经济模型，有着根本性的缺陷，

并提出了一个基于下述认识的替代办法：工资

和生产力保持同步增长，会防止不平等状况加

剧，并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内的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提供支持。 ■

鉴于全球危机的持续影响及其对策所产生的负面分配效应，修正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政策办法，更成为当务之急。

注 释

- 1 例如，普雷维什(1963年)相信，农业土地所有权的极端不平等妨碍了现代集约型生产技术的发展，因为大农场不必诉诸这样的生产就能获得巨额地租，而很小的生产单位，由于极端贫穷，用不起现代技术。
- 2 这些模型依据这样的假设：经济作为一个体，其行为如同单个经济单位——“有代表性的行为者”。由于它们的建构方式，它们不会考虑多个行为者或者行为者群组之间的分配问题。
- 3 但是，这一模型并不总是得出不平等状态不利于增长的结论。有一套参数和初始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不平等状态使有些行为者能够投资于教
- 育，而在完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低于教育固定成本，没有人投资于教育。
- 4 Alesina和Perotti(1996年)还发现，有证据表明，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负相关，这是由于高度不平等引发社会政治动荡。
- 5 例如见：Attali，2009年；2010年《贸发报告》，第二章；Kumhof和Ranci re，2010年；及Galbraith，2012年。
- 6 国际劳工局也估计危机造成5,000万个岗位的缺口(国际劳工局，2012年a)。

参考文献

- Aghion P, Caroli E and Garc a-Pe alosa C (1999).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4): 1615–1660.
- Alesina A and Perotti R (1996).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6): 1203–1228.
- Alesina A and Rodrik D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2): 465–490.
- Attali J (2009). *La Crise, et Apr s?* Paris, Fayard.
- Banerjee AV and Duflo E (2003). Inequality and growth: What can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3): 267–299.
- Banerjee AV and Newman AF (1991). Risk-bearing and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2): 211–235.
- Bartels L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nabou R (2000). Unequal societie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1): 96–129.
- B nabou R (2002). Tax and education policy in a heterogeneous-agent economy: What levels of redistribution maximize growth and efficiency? *Econometrica*, 70(2): 481–517.

- Benhabib J and Rustichini A (1996).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 125–142.
- Bourguignon F (1998). Équité et croissance économique: une nouvelle analyse? *Revue Française d'Économie*, XIII(3): 25–84.
- Diamond P and Saez E (2011). The Case for a Progressive Tax: From Basic Research to Policy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4): 165–190.
- Easterly W (2007). Inequality does cause underdevelopment: Insights from a new instru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2): 755–776.
- ECLAC (1990). Transformación productiva con equidad. (LC/G.1601-P). Santiago, Chile, March.
- Fajnzylber F (1989). Industrial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de la ‘caja negra’ al ‘casillero vacío’: comparación de patrones contemporáneos de industrialización. *Cuadernos de la CEPAL*, No. 60 (LC/G.1534/Rev.1-P), Santiago, Chile, ECLAC.
- Forbes JK (20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869–887.
- France A (1894, reprinted in 2007). *The Red Lily*, Wildside Press LLC.
- Friedman M and Friedman R (1980). *Free to Choose*. London, Secker & Warbur.
- Galbraith J (2012).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or O and Moav O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4): 1001–1026.
- Galor O and Zeira J (1993).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1): 35–52.
- Grossman HI and Kim M (1996). Predation and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3): 333–350.
- Habermas J (1973). *La technique et la science comme idéologie*. Paris, Gallimard.
- Hayek F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 Hayek F (1978). *Temas de la Hora Actual*. Buenos Aires, Ediciones de la Bolsa de Comercio de Buenos Aires.
- ILO (2012a). *World of Work Report 2012: Better Jobs for a Better Economy*. Geneva.
- ILO (2012b). *Work Inequalities in the Crisis: Evidence from Europe*. Geneva.
- ILPES (1998). Reflexiones sobre el desarrollo y la responsabilidad del Estado. 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y del Caribe de Planificación Económica y Social (ILPES), United Nations, Santiago de Chile.
- Kaldor N (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67(268): 591–624.
- Keynes JM (1936/1973).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VII. London, Macmillan and 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 Krueger AB (2012). 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in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12 Jan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2/01/12/chairman-alan-krueger-discusses-rise-and-consequences-inequality-center-american-pro>.
- Kumhof M and Rancière R (2010). Inequality, leverage and crises. IMF Working Paper, WP/10/268, Washington, DC.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1–28.
- Li H and Zou HF (1998).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 318–334.
- Murphy KM, Shleifer A and Vishny RW (1989a).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5): 1003–1026.
- Murphy KM, Shleifer A and Vishny RW (1989b). Income distribu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3): 537–564.
- Panizza U (2002).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merican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7(1): 25–41.
- Partridge M (1997).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5): 1019–1032.
- Perotti R (1996). Democrac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What the data say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 149–187.
- Persson T and Tabellini G (1994).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3): 600–621.
- Pinto A (1970). Naturaleza e implicaciones de la ‘heterogeneidad estructural’ de la América Latina. *El Trimestre Económico*, 37(1), No. 145, January–March, Mexico City.
- Prebisch R (1963). *Hacia una Dinám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Mé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Rosenstein-Rodan PN (1943).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210/211): 202–211.
- Saint-Paul G and Verdier T (1996). Inequality, redistribution and growth: A challenge to the conven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3–5): 719–728.
- Schumpeter JA (1942/2003).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First published in 1942.
- Tinbergen J (1956, reprinted in 1964).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and Design*. North Holland.
- UNCTAD (TDR 1997).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Globaliza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7.II.D.8,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Global Partnership and Nat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6.II.D.6,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Commodity Prices, Capital Flows and the Financing of Invest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D.21,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mployment,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12). Breaking the cycle of exclusion and crisis. UNCTAD Policy Brief No. 5, June, Geneva.
- UN/DESA (2012).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2. Update as of mid-2012*. New York, NY, United Nations.
- Venieris Y and Gupta D (1986).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as determinants of savings: A cross-sectional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 873–883.
-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Equ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收入不平等的演变： 不同的时间角度和方面

A. 引言

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沧桑巨变。很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甚至改变了经济制度。与此同时，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程度加深，技术进步和部门转变，正在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连续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不利影响。一些大型发展中国家国内总产值快速增长，正在改变不同区域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权重。这些发展势必对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衡量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衡量方式是功能收入分配，考察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它以工资为一方，利润、利息和租费为一方，显示双方各自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它遵循政治经济学传统，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嵌入生产体系(工人和资本及土地拥有者)之中，观察其决定因素和演变方式。这一衡量方式强调参加经济活动获得的初次收入来源。

第二种衡量方式是衡量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系指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无论

收入来源是什么。给定家庭或者个人的收入，可能既有劳动收入，也有资本收入，还有养恤金和来自公共部门的其他转移支付。最全面的数据通常是通过家庭调查获得的。得出他们不同类型收入的总数之后，按照人均收入将这些家庭分类，从较穷的到较富的，并通过不同分量间的比例，或者通过衡量集中程度的综合统计指标，评估不平等程度。这方面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¹

初次收入分配中不同程度的不平等，部分地决定了家庭收入不平等。因为资本通常集中在相对少数人手里，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上升，往往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反之亦然。然而，功能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明了，原因不一而足。首先，不是所有资本收入都在家庭之间分配：有些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在企业里。其次，家庭收入可能有不同来源：资本收入、工资收入和混合收入(就自营工人来说)。第三，家庭为初次收入纳税，其中有的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包括

养恤金、家庭补贴和失业救济。因此，经过公共部门的再分配之后，总收入分配情况可能与净可支配收入分配情况有很大差别。

关于收入分配的统计学证据非常不完整而且成分多样。它们还因方法不能一以贯之而受损，使之难以呈现一幅全面图景，展示以各种不同方式定义的不平等状况的演变方式，尤其是长期演变。另外，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使用的定义和方法常常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在对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进行比较时，采取极其审慎的态度。²例如，在非洲、西亚和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统计数据列出的是家庭支出分配而不是收入分配。虽然两个变量相互关联，但收入的集中程度大大高于支出的集中程度，因为储蓄在收入中所占份额，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且，功能收入分配还取决于社会结构。在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以工资维生的人占活跃人口的80%以上，这就很容易确定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一部分活跃人口并不是以工资维生的人，而是低生产率活动(农业和零售业)中的自营业者。因此将他们的全部收入视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是一种误导。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收入被单列为“混合收入”，但是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它被列入资本收入。相形之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统计中，自营收入被分成工资(适用该群体工作所得的有代表性的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最后，在收入等级表的最高端，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之间的分配情况，也会变得模糊，因为那些处于工资等级结构最高点的人，其薪酬常常更紧密地遵循资本收入的逻辑(例如红利或者优先认股权)。

铭记这些提示，仍然有可能从可用数据中提取一些典型事实。其中一项是，由于重大危机或者发展战略和国际经济框架的变化，所有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随时间发生了很大

变化。1980年代(或者在某些国家是1970年代或1990年代初)，似乎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几乎所有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大大增加。但是，很难对此进行归纳：此次不平等同时加剧，发生在迥然不同的情境中，是不同机制产生的结果。在某些国家，它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如在某些亚洲国家；而在另一些国家，它发生在经济停滞或者衰退的背景下，例如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以及在1990年代的非洲和转型经济体。最近，由于拉丁美洲正在恢复活力，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工业化国家也可以看到快速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下降之间的正相关。所有这些都表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可以通过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加以改变。

另一项典型事实是，在1929年和2008年的两次重大金融危机酝酿期，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加剧，富豪占总收入的份额在不断提高。这种不平等很可能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与对最高收入者的有悖常理的激励有关，并导致其他收入群体债台高筑。面对仍未解决的全球金融危机，解决收入不平等和过度负债的方式特别重要。过去，很多工业化国家能够创造持久和包容性的增长，收入分配更为平等，这是由于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发生在资本和债务遭到大范围损毁之后，特别是通过恶性通货膨胀、大规模破产和战争。在当前形势下，“摆脱债务”战略(2011年《贸发报告》：82-83)需要累进式收入再分配和债务重组，以重振内需和增长。但是，看起来很多受危机打击的国家，特别是欧洲联盟，其对策最有可能导致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关于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建议是，大力依靠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和对工资的限制，以及财政紧缩，紧缩的重点是削减开支，尤其是削减社会支出、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就业。这种调整具有递减的分配效

应，有可能妨碍短期和中期经济增长，并给下一代制造一个包容性较低的社会。

本章阐述不同区域的收入分配随时间推移发生的重要变化。B节追溯了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演变，由此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据以分析最近的变化，尤其是198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那些变化，C节将对此予以分析。D节

阐述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和世界范围内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演变方式，并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作出估计。最后，E节探讨了不平等问题的某些方面——财富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些虽然与收入不平等有明显不同，但也与之密切相关，并且往往强化收入不平等。

B. 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的长期趋势

1. 功能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经常为这样的主张声辩：从经验角度看，功能收入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但是，他们对稳定性的原因却有迥然不同的解释(Krämer, 2010年)。这种长期稳定是卡尔多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典型事实”之一，是合理的“建构理论模型的出发点”(卡尔多, 1961年: 178)。不过，现代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³提出这样的假设：功能收入分配严重取决于政治因素，根据这些理论，应当将稳定期的出现，归因于“阶级冲突”暂时平息或者达到平衡，这是在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战后北方的社会共识中，工人的薪酬应当大体跟上生产力的增长，这种共识导致资本和工资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将功能收入的稳定性，既视为经验事实，也作为在利用可替代的生产要素进行严格的技术——经济解释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预言：可用技术的性质(例如Cobb-Douglas的总量生产函数所阐述的)是

这样的：如果工资增长，资本将取代劳动力，以此保持其相对份额的稳定性(Piketty, 2008年: 45)。⁴

只有几个发达国家拥有关于功能分配的没有重大方法断裂的长期统计数据。Piketty(2008年)观察到，自1920年至1995年，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收入分配相当稳定：这三个国家的功能收入分配大致是工资的三分之二和利润的三分之一，从长期来看，看不到改变这种分配的系统趋势(虽然，如下文所述，自1980年以来似乎有所改变；见表3.1)。这种稳定性可能看起来与二十世纪发生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不合拍，这些重大变革包括自营业者(例如农民和小店主)数量减少，劳动力中以工资维生的人比例随之上升。这没有完全表现为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所占份额上升，正如经合组织所报告的那样，经合组织的统计习惯是，将一部分自营收入归入工资，其余部分归入资本收入(如上文所述)。

表 3.1

1920-2010年部分国家的工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
(百分比)

	1920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法国	66.3	65.1	67.5	69.5	68.7	..	62.2	65.9	65.6	67.6	66.4	70.3	71.7	68.0	62.4	60.3	60.5	61.0	61.4	
联合王国	61.9	61.9	61.9	64.2	63.7	..	66.8	67.5	68.8	67.5	67.6	70.6	67.1	61.9	62.9	60.3	62.8	61.4	62.6	
美国	55.4	56.7	57.2	60.1	57.5	59.3	61.3	60.5	65.3	63.7	64.6	62.0	62.6	61.4	61.5	59.7	59.0	
日本	40.9	39.4	43.7	43.0	55.0	54.6	55.0	54.1	57.3	57.0	54.8	55.0	
大韩民国	37.1	35.3	44.3	45.2	50.5	52.7	48.6	51.6	50.6
阿根廷	47.5	46.2	36.4	38.1	44.1	47.6	40.5	39.5	38.6	41.9	39.4	31.6	41.5	
智利	44.6	43.0	47.8	45.3	43.3	42.4	38.7	40.9	46.5	42.5	44.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OCED、StatExtracts数据库；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库；联合王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Lindenboim、Kennedy和Graña，2011年；及Piketty，2008年。

注：数据系指以要素成本计算雇员总薪酬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工资和资本各自所占份额的相对稳定性，没有在其他国家出现，1980年以后，即使在这三个国家，它也有消失的趋势。实际上，1980年以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所占份额明显下降(C节有详细讨论)。经合组织其他国家的数据，并没有证明下述：假设从长远看来，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具有稳定性。在日本，伴随1960年至1975年间国内总产值的高速增长，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大幅上升(从39%上升到55%)，此后一直相当稳定。大韩民国的工资所占份额自197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这是由于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大幅上涨，同时发生了产业升级，这可能与劳动力市场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都有关系。

拉丁美洲国家拥有相对长期的系列统计，那里的功能收入分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很不稳定，这是由于实际工资和就业状况变化很快，反过来又反映了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实际工资以及工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在进步政府统治下和/或者经济增长期通常会上升，在经济危机期间或者军人政变(例如1955年和1976年在阿根廷，

1973年在智利)之后暴跌。例如，在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加剧期间的阿根廷(1975-1976年，1981-1982年，1989年和2002年)、巴西(1981-1983年和1992年)、智利(1973-1975年和1982-1983年)和墨西哥(1982-1987年和1994-1995年)，工资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下降10至20个百分点。因此，在这些国家，劳动力吸纳了过去几十年里的大部分经济冲击，工资所占份额在经济上升期至少有部分回升。这种形态与发达经济体常见的状况截然不同，发达经济体的利润能更快地按照短期增速变化作出调整，因此，利润所占份额在上升期随之提高，在衰退期随之下降。在拉丁美洲，赚取利润的人更容易将大部分衰退造成的成本转嫁给以工资维生的人。结果，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与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这样，由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增速低而且不稳定，以工资维生的人出现长期恶化，导致非正式就业和自营职业的发生率上升。这就使他们更难以恢复以前的收入分配份额；即使最终发生了，也是不仅仅是由于经济增长，还由于为支撑就业和实际工资而采取的积极的公共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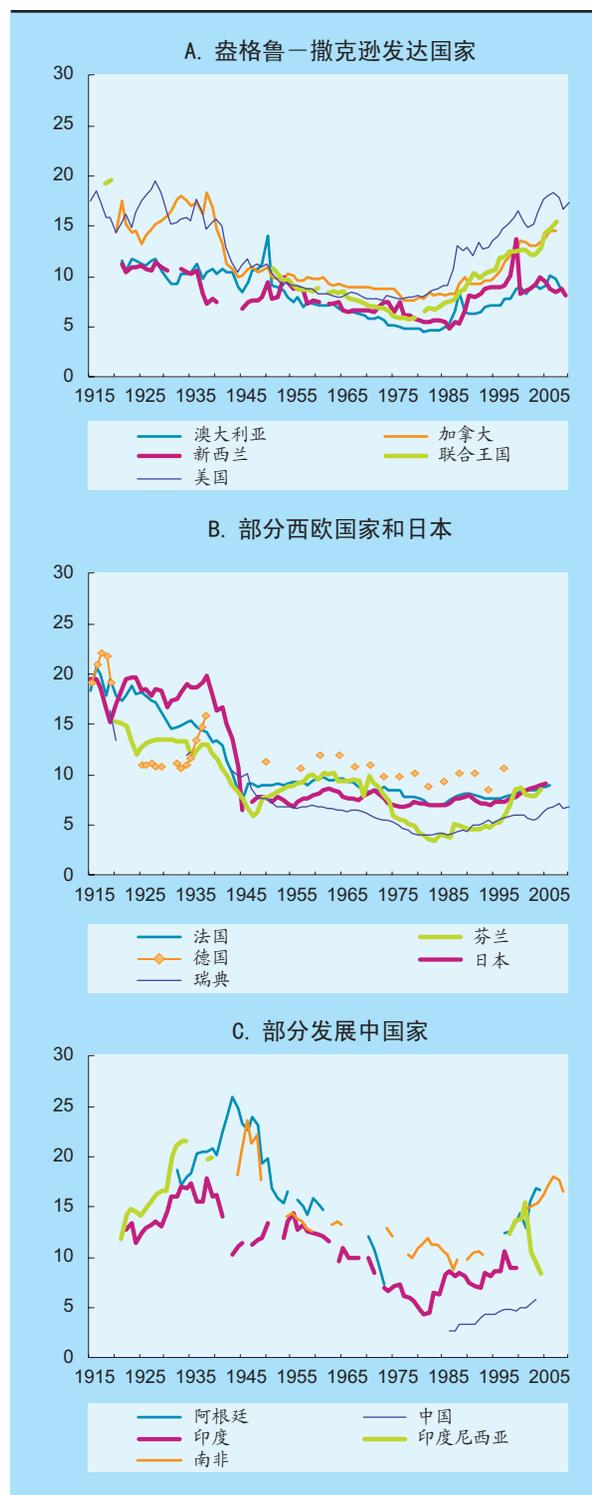
2. 最高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

历史税收统计数据也可以指示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演变情况。根据最富有的纳税人申报的收入和对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已对20多个国家的“最高收入”（例如收入最高的1%或者5%在收入分配中的所得）占总收入的份额进行了估算，对其中很多国家的估算是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Atkinson和Piketty，2007年和2010年）。⁵ 但是，应当审慎地处理这些统计数据，因为它们可能是低于实际数值的估计数，因为应课税的收入常常被少报，特别是富人，他们有这样做的强烈动因、更多机会和更好的技巧。由于税收制度的变化，也可能出现时间上的断裂，特别是在资本收入税方面。实际上，在一些国家，可申报收入税的（并且随后被录入税收统计数据的）资本收入所占份额，已经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因此这类被排除在外的资本收入，大多与最高收入群体有关，这可能导致他们的收入份额被低估。另外，对长期国民总收入作出估计，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Atkinson、Piketty和Saez，2011年）。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对最高收入所占份额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演变进行分析，仍然可以为解释个人收入集中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关于收入最高的1%的收入份额演变情况，一个总体特征是，1920-1930年前后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收入集中程度相对较高（图3.1）。当时，“收入最高的1%”的收入占一些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5%到20%，例如在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日本、荷兰、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而在阿根廷、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随后，他们的份额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大幅下降。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及法国和美国的1929年危机，使集中在高收入阶层的地租收入减少。最高收入者所占份额受到第二次世界

图 3.1

1915-2010年部分国家收入最高的1%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巴黎经济学院经济新思维研究所，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

大战的更大影响，这是由于实物资本遭到破坏、通货膨胀和战时条例或没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丧失了来自殖民地的收入。在有可用数据的14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收入最高者所占份额大幅减少。唯一的例外是没有参战的国家，阿根廷，该国的收入最高者所占份额得益于高物价和对交战国日益增加的粮食出口(Atkinson、Piketty和Saez, 2011年: 62)。

在随后数十年里，大多数国家的收入集中程度进一步降低或者保持在历史低位，因为经济导向和社会政策的转变防止了它回到战前的水平。在很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常常涉及收入政策、金融监管、经济关键部门的大公司国有化以及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相形之下，在一些国家，最富有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代开始重新上升。与这一现象同时发生的是，在发达国家，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开始，新自由主义政策取代战后社会共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是由认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取代战后社会共识。

最高收入群体的份额在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呈现出明显的U型曲线，占1%的最高收入群体的份额，在联合王国从1979年的6%上升到2007年的16%，同期在美国则从8%上升到18%，从而重新回到战前的水平(图3.1)。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统计数据并不包含资本收入，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国家才有资本收入的数据。在美国，如果计入资本收益，2007年最富的1%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23.5%，而在1978年则是8.5%。因此，自1976年至2007年，占1%的最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4%，而其余99%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Atkinson、Piketty和Saez, 2011年: 9)。

在图3.1的样本所涵盖的发展中国家，最高收入群体所占份额的演变也呈现为U型曲线，

但是阿根廷和南非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所有这些国家，上升趋势始于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中期。中国(时间序列短得多)自1980年代中期也显示出收入集中度提高，但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占1%的最高收入者的财富集中度(约占总收入的6%)仍然较低。相形之下，自1950年前后以来，欧洲大陆和日本占1%的最高收入者所占份额相当稳定，低于10%。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最有可能与相对较高的累进税有关。尽管如此，即使在那些国家，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最高的1%所占的份额仍然有所增加(丹麦、荷兰和瑞士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芬兰、爱尔兰、意大利、挪威和葡萄牙。

最高收入的构成，自上个世纪上半叶以来，已经发生改变，特别是在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早先，富豪的收入主要是资本收入，而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工资收入。新的“工作致富者”和食利者可能都受益于放松金融监管，后者通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高利率及不断上升的资产价格的资本收益，前者通过在金融繁荣期获得的红利和其他报酬，这些在出现金融损失时都没有被归还。Bakija、Cole和Heim(2012年)发现，近年来，美国的身居高管和高层经理职位的雇员，加上金融专业人员，在占0.1%的最高收入者中，约占60%。

公司高管、经理人和金融交易商的极高收入，指示新的公司治理形式(在第四章予以详细讨论)。因为他们的一部分薪酬采取了股份和优先认股权的形式，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区别变得很模糊。除了道德上的考虑，给予高级经理人员的畸高薪酬，还引发了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质疑。很难用技能高度集中的说法来解释这一点，因为这收入最高的0.1%或者1%，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与收入最高的10%并无不同，后者的收入则低得多。有意思的是，

克鲁格曼(2012年)指出,在这个小群体中,真正的企业家很少:他们大多数是并非由他们创建的公司的高管,但是他们获得股份和优先认股权,这是他们薪资的一部分,是由薪酬委员会以共谋方式决定的。至于金融行业的最高收入者,他们的收入之高,往往与他们的业绩不成比例,这是由于他们极易招致风险的“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薪酬结构,这种结构与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关;相反,这样的结构已经导致过度冒险,而过度冒险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

3. 个人收入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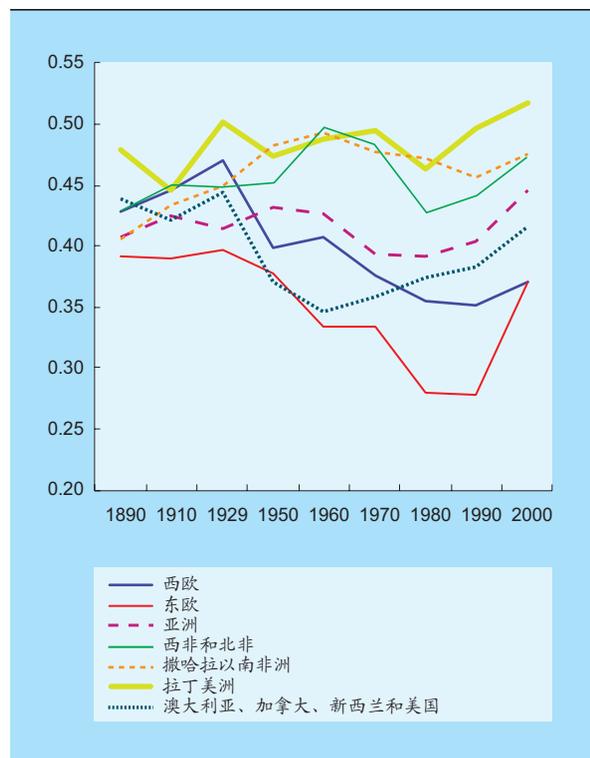
在一些国家,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所占份额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足以显著影响总体上的个人收入不平等。例如在美国,自1970年代下半期至2007年,收入日益向收入最高的1%手里集中,这即使不是同期基尼系数上升的全部原因,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⁶

最高收入者收入的畸形增长,仅是整体图景的一部分。但是,要对所有社会阶层之间的长期收入分配作出更全面的评估,更为困难。对1820年至2000年很多国家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作出的新估计(图3.2;另见van Zanden等人,2011年),证实了最高收入者收入所占份额早已揭示的证据。⁷这些估计的主要结果,通常与已经提供的证据一致。1929年至1950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下降,在某些国家,这种下降一直持续到1980年前后。自1980年代至2000年,这类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提高,有时是大幅提高。1929年以后东欧的不平等程度也降低了,在1980-1990年间特别低,此后在1990年代急剧升高。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大多数拥有成熟的工业部门的国家,其经验似乎证明了库兹涅茨的假设:在第一个十年里,不平等程度日益上升,此后显著下降,那时收入在很长

图 3.2

1890-2000年按区域分列的基尼系数
(未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 van Zanden等, 2011年。

注: 区域构成按照资料来源。

一个时期里的进一步增长与不平等程度下降有关。这也符合库兹涅茨的下述观点:穷国往往比富国更不平等。的确,最近很多发达和转型经济体的进一步增长与不平等程度上升有关。但是必须予以强调的是,不平等程度提高主要是由于资本-劳动力收入分配发生了变化。正如加尔布雷斯(2012年)指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薪酬不平等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向下倾斜。这一规则最近的例外,出现在人均收入等级表的顶部,而不是底部。

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演变形态不太明显。1950年之前,非洲的不平等程度趋向于升高,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在相当高的程度。实际上,它和拉丁美洲一起,

一直是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区域。拉丁美洲未加权的基尼系数相当稳定，但是该区域个别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因素，不平等状况经历了明显(却是暂时的)变化；例如，在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1950年前后)、巴西(1950年)、智利(1970年)和秘鲁(1985年)的不平等程度明显下降。

东亚和东南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低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尽管这些次区域的不同经济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一方面，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政府在战后初期没收并重新分配了土地和其他资产，征收很高的财产税并确保提供广泛而稳定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在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基尼系数往往较高(Cornia、Addison和

Kiiski, 2003年)。中国的情况很独特，它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上半叶大幅上升，在1950年达到最高点，在随后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陡然下降(即表明不平等程度下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重新抬头，下一章将对此予以讨论。在南亚的印度(1970年代不平等程度降低，扭转了此前几十年里的上升趋势)和巴基斯坦，自1950年至1980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总之，自1980年(某些区域自1990年)至2000年(van Zandenn的长期数据库有可用数据的最近一年)，全世界所有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似乎总体都加剧了。但是，在21世纪头十年，不同区域不平等状况的演变情况各不相同，在下一节予以讨论。

C. 仔细审视1980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

自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所有重要经济体和区域的经济范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降低，其他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则相当稳定，这时，这些经济体向着以金融为先导的全球化迈出了决定性步伐。此外，很多国家选择国家政府在经济中发挥较小作用(联合国贸发组织，2011年；另见《报告》第五和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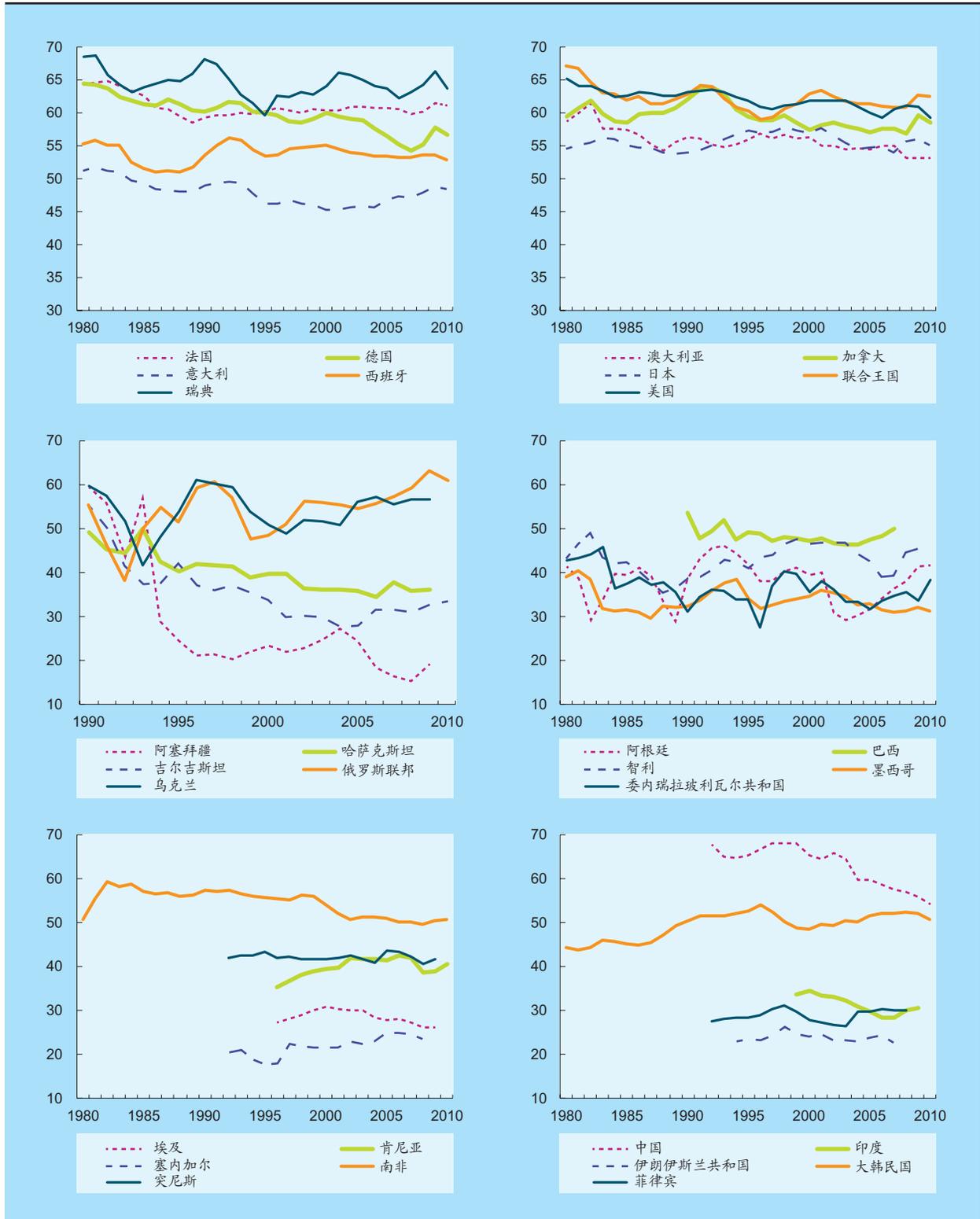
1. 功能收入分配

自1980年以来，很多国家的工资所占份额在功能分配中明显下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图3.3)。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

所占份额下降，从1980年至2006-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在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法国、荷兰、挪威、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下降了5个百分点，在奥地利、德国、爱尔兰、新西兰和葡萄牙，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在若干重要经济体(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工资所占份额在1980年至1995年之间就已经下降了一大部分。这似乎与偏离战后社会共识有关联，此前的工资增长紧紧追随生产力增长。在某些国家，最明显的是德国，由于为提高竞争力而故意采取了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和努力，这一趋势持续到21世纪头十年。它对国内需求和欧元区内不平衡状况的影响，将在第六章予以讨论。资本所占份额上升的其他主

图 3.3

1980-2010年部分国家的功能收入分配情况
(按照要素成本计算的工资占国内总产值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OECD。StatExtracts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司，主要总量和明细表数据库；拉加经委会，CEPALSTAT数据库；及联合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要原因，是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日益增强的支配地位，和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实施的公司治理方式的改变(也见第四章)。

在一些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网比较先进的国家，2008-2009年金融危机实际上导致工资所占份额上升，因为利润降幅大于工资降幅。例如，在欧洲联盟(欧盟)，营业盈余(以当前价格计算)在2007年至2009年间下降了8.5%，与之相比，雇员薪酬仅下降了1.2%。美国同期的营业盈余和雇员薪酬下降了2.4%和0.6%，日本下降了11.4%和4.5%(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数据库)。这是一个预示工资份额长期恢复的转折点，还是仅是其下降趋势的暂时中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克服危机采取的政策。如果对策中包含支持消费和投资的财政和工资政策，不平等程度的减轻可能会更持久。但是，到目前为止，危机对策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延长不稳定的就业合同以及财政紧缩的实施时间。因此扭转以前的趋势的可能性很小，特别是因为事经验明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进程很缓慢。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所占份额在2010年和2011年都下降了，特别是在失业率很高的国家，例如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和西班牙。⁸

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功能收入分配情况也有明显改变。转型经济体在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崩溃之后，其工资所占份额大幅下降：1990年代初，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这一份额陡然下降了15到23个百分点。此后，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工资所占份额起起落落，遵循了顺周期形态，到2010年，它已经恢复到接近1990年的水平。相形之下，在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工资所占份额甚至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从采掘业获得的

收入，提高了资本所占的份额(或者“营业盈余”)。19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东南欧国家(例如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工资所占份额也有明显下降，与爱沙尼亚、波兰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下降情况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没有发生此种恶化。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功能收入分配状况很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就业情况和实际工资变化很快，上文已有提及。其原因是周期性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冲击和/或政治变化，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就业、劳动条件和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自1980年代初以来，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是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工资所占份额下降，因为债务危机、布雷顿森林金融制度促动的结构改革，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独裁政权，削弱了正式就业、劳动保护和工会。某些国家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头十年：在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劳动力所占份额大体保持在国内总产值的25%到35%之间(以要素成本计算)，但是应当指出，在这些国家，“混合收入”相对较高(占总收入的20%左右)。另一方面，在智利(1990年代)、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997年以来)和阿根廷(2003年以来)，工资所占份额有明显增长，尽管没有回到以前的最高点(图3.3)。

在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自营职业仍然是劳动力中重要的(有时是最大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功能收入分配变化，是有时对立的的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移徙，能够增加以工资维生者在总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尽管某些移徙者只是从低生产率农业中的自营职业，转变为低生产率城市服务业中的自营职业。另一方面，劳动力供应过剩，往往压低实际工资。在印度，自营职业者约占劳动力的一半，有证据表明，自

1990年代以来，正规部门的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与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同时下降。实际上，要素收入的变化，揭示了不平等程度加重的趋势：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90年代初的40%，降至2009-2010年的区区34%，而正规部门的该份额，同期从69%降至51%。与此同时，尽管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者在该国仍然占压倒性多数，包括自营职业者，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从64%下降到57%(Ghosh, 2012年)。

2. 个人收入分配

功能收入分配的这些趋势，如何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采取的再分配措施，发达国家的这些措施一向力度很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的毛收入和净收入不平等指数差别很大(图3.4)。21世纪头十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差额是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转型经济体是4个点，发展中国家约为2个点。图凸显了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在影响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的参与，才使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毛输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为0.45(平均值)，与转型和发展中经济体差别不大。但是，净收入不平等程度则明显较低。

在过去三十年里，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明显加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收入不平等，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原本已经很严重的程度上又有加重，但在2000年代有不小的下降，基尼系数下降了4到5个点。转型经济体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大幅上升了20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也明显加剧，主要是在1981年至2000年之间。而毛收入不平等的增幅(接近8个点)，远高于净收入不平等

的增幅(为前者的一半)，这显示了公共政策部分的补偿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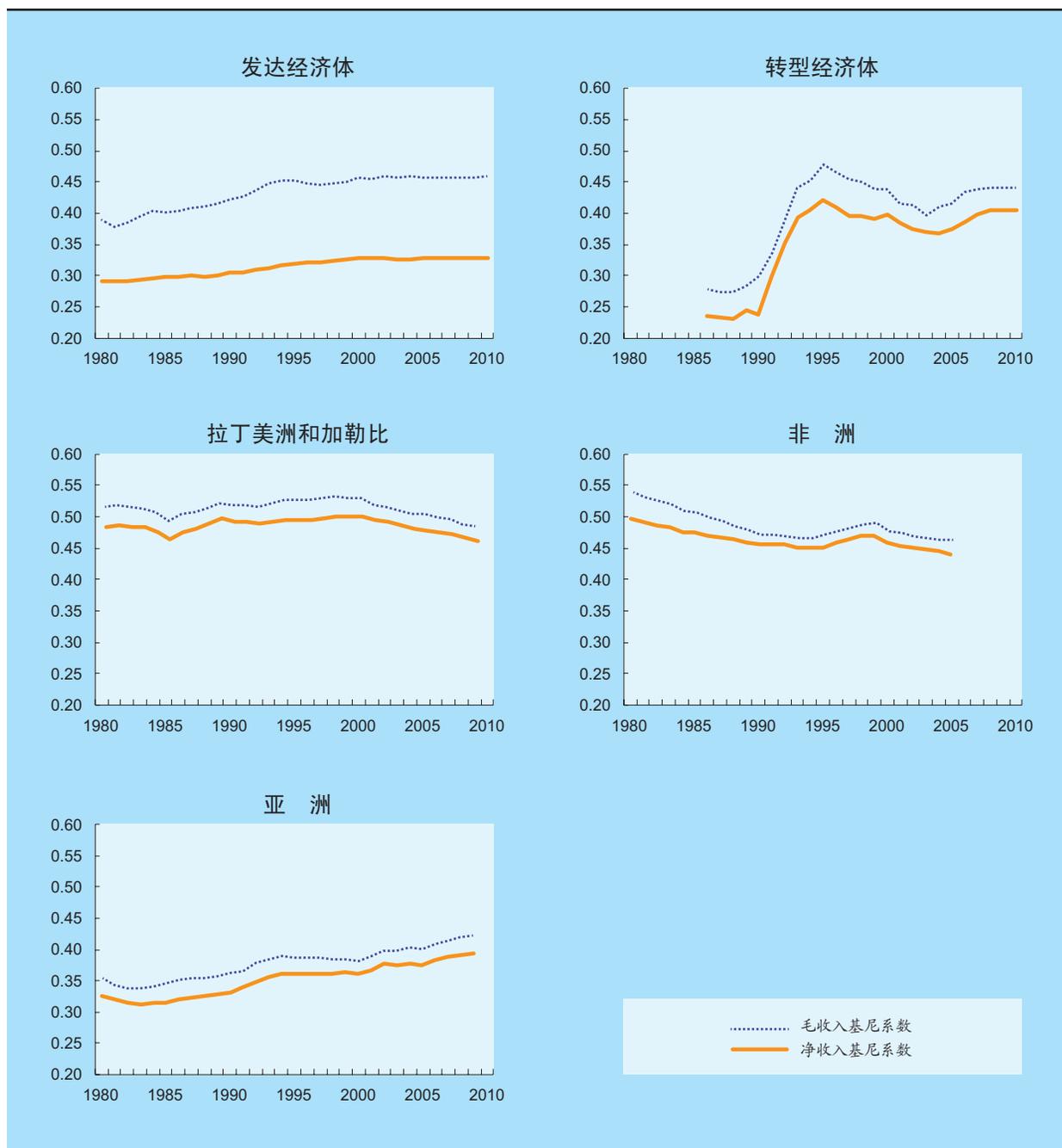
这些合计数字提供了对近期趋势的总览，但是由于它们基于加权平均值，所以主要是由人口大国的变化决定的。需要借助对单个国家经验的研究，对其加以补充。表3.2概要反映了部分国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及整个21世纪头十年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变化。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采用以及所发生的一系列金融、银行和货币危机。在104个取样国家中，有73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加重，仅有24个国家减轻了。在该时期，几乎所有区域的不平等程度都加重了，只有非洲、西亚和南亚例外，那里不平等度加重的国家数，被不平等度减轻的国家数抵消了。

1980年至2000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加剧了。如上文所述，资本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增加了，这得益于资本所有者数量少。另外，工资分配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因为收入最高的工人，工资涨幅超过工资最低的工人，少有例外。最后，收入和转移支付对于降低毛收入不平等(或市场不平等)的有效性减小(经合组织，2011年a：23、37)。在转型经济体，199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对以工资维生的人影响特别大，政府财政危机导致社会转移支付减少。此外，匆忙实施的私有化，导致若干国家内的财富集中，结果不平等程度攀上新高并长期持续。最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状况在这一时期也加剧了，主要与经济改革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

相形之下，在21世纪头十年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经济环境有所改善(至少2008年之前是这样)，有几个发展中区域采取了务实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过去十年里，几乎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都经历了国内总产值快速增

图 3.4

1980-2010年部分国家毛收入和净收入基尼系数
(人口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拉加经委会，社会全景数据库；及国家资料来源。

注：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转型经济体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乌克兰。非洲国家包括：科特迪瓦、埃及、肯尼亚、马拉维、毛里求斯、摩洛哥、塞拉利昂、南非、突尼斯和赞比亚。亚洲国家包括：孟加拉国、中国、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省、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大韩民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土耳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包括：阿根廷、巴哈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拿马、秘鲁、波多黎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乌拉圭。

表 3.2

1980-2010年按区域分列的不平等情况变化 (国家数)						
	发达国家 1980-2000	东欧和 独联体 1990-1998	非洲 1980-1995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1980-2002	南亚和西亚 1980-2000	东南亚和 东亚 1980-1995
不平等加剧	15	24	10	14	3	7
不变	1	0	3	1	2	0
不平等减轻	6	0	10	3	3	2
合计	22	24	23	18	8	9
	发达国家 2000-2010	东欧和 独联体 1998-2010	非洲 1995-2007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 2002-2010	南亚和西亚 2000-2010	东南亚和 东亚 1995-2010
不平等加剧	9	13	9	2	3	5
不变	5	5	1	1	2	1
不平等减轻	8	6	15	15	3	4
合计	22	24	25	18	8	10

资料来源：Cornia和Martorano，2012年：及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注：变化情况依据基尼系数变化。

长，并受益于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张，更易于利用的全球金融，以及日益增长的移徙者汇款。但是，只有几个国家的收入差别缩小。在这一时期，不平等趋势出现分化：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和非洲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明显的出乎意料的下降，而大多数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和东亚国家的不平等状况继续加剧，只是速度较慢。这些对比鲜明的经验，可能有助于找出不平等程度在某些区域减轻而在其他区域加剧的原因。

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说明最近经济状况的改善，会直接减少收入不平等。在贸易条件方面有收益的国家，不断上升的商品价格，可能仅使少数人受益，因为它们发生在土地和矿产资源所有权高度集中的总体背景下。同样，工人汇款的增长，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谁受益最多，是中产阶级还是非熟练工人阶级家庭。⁹ 利率不断下降的外

国资本大量流入，主要使大公司和银行受益，但是并没有缓解劳动力密集型、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它还推高了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汇率，这可能导致竞争力和就业率恶化，并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在某些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汇款及资本流入额增加，有助于减轻收支平衡对增长的制约，并增加就业和公共收入(Thirlwall, 2011年)。这些条件，通过增加就业对收入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它们对公共转移支付的间接影响，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情况。这表明，有几个因素能够影响(有时是矛盾的)不平等状况的演变，而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

在拉丁美洲，不平等现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加剧，并不像库兹涅茨型发展进程所预期的那样，是在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由劳动力从农村地区低生产率活动向城市地区的

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移徙促成的。恰恰相反，在城市占大部分并且已经完成了很高程度的工业化的国家，它是工业和公共部门的正规和高薪就业岗位减少的结果。而且，它发生在低增长和投资率不断下降的二十多年里。1990年至1999年，有三分之二的就业岗位是非正规部门创造的，包括微型企业、家政佣工和非技术熟练的自营职业者(拉加经委会，2004年)。在此背景下，不平等状况加剧，并非该区域不得不为加速发展付出的代价；相反，它与经济停滞密切相关。

相形之下，自21世纪最初几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同时经济出现明显复苏。2002年至2010年，该区域基尼系数平均值下降了4个百分点，南美洲几个国家(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和秘鲁)的降幅甚至更大。总体政策方向的调整与外部条件的明显改善，共同为实现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宏观经济层面，很多获得成功的国家实施了反周期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收入(包括商品租费)，而不是通过削减开支，实现财政平衡。另外，税收制度的累进性也有提高(Cornia、Gomez Sabaini和Martorano，2011年)。这些国家也采取了管理汇率制，以防止币值被高估。而且，它们还将经济活动转向制造业和农业中的劳动力密集型、贸易导向型生产，这对收入分配、出口和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它们设法减少外债并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这不仅减少了它们为财政和外贸收支差额支付的利息，还大大增加了决策方面的回旋余地。

新政策模式还为劳工和社会政策带来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劳工政策明确谋求解决之前二十年遗留的问题，例如失业、就业非正规化、最低工资下降、社会保障范围缩小和工资谈判制度弱化。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实施了

包括公共工作在内的收入政策，扩大正规就业范围，它们还重新实施工资的三方商谈制，并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此举产生了增进平等的作用。此种政策还几乎普遍包括，使用于社会保障和教育的公共支出的增长趋势加速，此举有可能提高税收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另外，很多国家实施了社会援助计划，例如有条件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看来此举明显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Cornia，2012年)。

结果，2003年至2010年间，拉丁美洲不平等程度的降幅，几乎完全抵消了1980年至2002年间的增幅。因此，21世纪头十年取得的改善，很多都是由于扭转了华盛顿共识型政策的不平等效应以及它们对工业化和正式就业的不利影响。

非洲和拉丁美洲一样，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区域(图3.4)。¹⁰ 2010年，全世界10个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中，有6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非洲开发银行，2012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几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当地精英与国际资本一起，获取了自然资源的大部分租费。各国的收入分散程度不一。例如，在10个收入等级中，最高一级与最低一级的收入比，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10.5倍，到南非的44.2倍，各不相同(非洲进步小组，2012年：23)。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通常是在非农职业，其中教育是工资等级的一项决定因素。在非洲，虽然收入因教育而获益颇丰，但其教育不平等程度也是全世界所有区域中最高的(Cogneau等人，2006年)。

非洲各次区域的不平等状况变化方式不同。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除北非以外，所有次区域的不平等程度都加剧了，尤其是在中非、东非和西非。在2000年代，南部非洲的不平等程度减轻，其次是西非，其他次区域变化

甚微(甚至有所加剧),那里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剧了不平等(非洲开发银行,2012年)。尽管非洲的情况特殊,但其宏观经济机制与世界其他地方下述机制很相似:它们明显导致工资收入和小自营职业工人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下降,所创造的生产性就业机会不足。

南非的例子特别有趣,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和收入增长,似乎都没有导致南非处于历史高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收入不平等状况很严重,而且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毛收入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63上升到2005年的0.70。虽然基于种族的不平等仍占主导地位,但是种族/族群内部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实际上,到2008年,非洲裔(占人口的80%)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是所有种族中最高的。这越来越体现在空间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从最近的增长过程中获益太多(Finn、Leibbrandt和Wegner,2011年)。

亚洲不平等问题的变化趋势不明晰,有些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有的减轻。但是,考虑到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该区域的不平等程度总体上显著加重了。在南亚区域,全球化进程与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加剧相关。这一点在印度表现得特别明显,印度的全国消费基尼系数,从1993/94年的0.31,上升到2009/10年的0.36,而城乡之间的消费比率从1.62上升到1.96。据Vanneman和Dubey(2010年)估计,2005年的支出基尼系数为0.35,而收入基尼系数则高得多,为0.48。¹¹因此,印度的增长带来的收益,集中在少数盈余获得者手里(包括利润、租费和金融收入)。此中主要原因是,现代部门(例如制造业和生产率很高的服务业,例如软件行业)的增长,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因此,有大约一半劳动力继续留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

(尽管这个部门占该国国内总产值不到15%)和低薪酬的服务业混日子。

在孟加拉国,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非农活动的工资差额(相对低技能的领薪工作者和相对高技能的领薪工作者之间)越来越大,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结果,收入基尼系数1991/92年相对较低的0.28,提高到2005年的0.40(Khan,2005年)。斯里兰卡的不平等状况也加剧了,该国通过1978年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改革,成为南亚第一个有条不紊地参与更大的全球一体化的国家。起初在198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是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超过了邻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50(Vidanapathirana,2007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受资产所有权集中和技能水平差异的驱动,在快速增长的现代工业部门,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第二,在快速增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即区域,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及区域之间,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Gunawardena,2008年)。相形之下,在巴基斯坦,不平等状况相对稳定。消费者调查显示,在1990年代上半期,消费不平等程度减轻,随后在下一个十年里又加剧了(Asad和Ahmad,2011年;Shahbaz和Islam,2011年)。

在东亚和东南亚,有几个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经历了机构转型,加剧了不平等,因为技术变革的加速,为高收入群体中技能较高的工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这些职位的工资比平均工资增长得更快,因为公共教育支出不足,导致技能较高的工人供不应求。另外,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缩小了再分配政策的实施范围,促进了金融活动收入的增长。1997-1998年危机之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大韩民国的基尼系数下降,而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的基尼系数继续上升。有些与政策有关的共同因

素，有助于解释第一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在分配方面取得的改善。这些因素包括确保稳定和促进增长的务实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在马来西亚¹²和泰国)。还有，对教育进行大量投资，从而增加了学校教育年数，随着新技术进步，劳动力技能升级，改善了人力资本的布局，同时避免工资中技能奖金的进一步提高。再分配政策得到加强，其重点是社会保护(大韩民国)、缩小城乡差距(泰国)，及缩小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马来西亚)(也见第五章)。

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对不平等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1978-1984年的第一次改革浪潮，以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农村公社被平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场所取代，向农民支付的粮食收购价提高。农业和总体增长因此加速，导致农村收入迅速提高，这有助于减轻总体不平等。与此相反，在1985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期间，收入集中的现象迅速加剧，这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推动因素是城市活动的更快扩张、农产品价格下降30%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征收的农业税增加了两倍(Ping, 1997年)。与此同时，公司利润的增长和技能奖金迅速提高造成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加剧(Luo和Zhu, 2008年)。此外，由于1978年的财政放权，到1996年，全国税收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降至10.2%，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以向贫穷省份转移支付的方式控制区域不平等的能力。在21世纪头十年的第三阶段改革期间，基尼系数继续上升，2009年估计已经接近0.47(与之相比，1984年为0.27；见Chen等, 2010年)。虽然西部和中部的基础设施有了改善，贸易和产业政策继续推动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出口导向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部门，而不是小规模部门。尽管平均实际工资迅速增长，但是劳动力占总收入的份额下降了，因为私人、企业和公共储蓄增长了，与资本的

快速积累齐头并进。工资赚取者之间的差距，增进了总体不平等，工资分配发生了有利于高技术、金融和服务部门的有技能工作者的转变，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低于有正式城市户口的工人(Luo和Zhu, 2008年)。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构建和谐社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端。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改善了工人的条件，本报告第四章将进一步予以探讨；税收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从1996年的10.2%，提高到2010年的18.4%，为增加对医疗卫生、教育、养老金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公共支出提供了资源。

3. 不平等和贫穷

人的不平等和贫穷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取决于家庭收入。贫穷的定义是缺少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足够收入。它的衡量方式是估算出一个“贫困线”，即满足基本需求花费的人均成本，并用它和家庭实际人均收入相比较。经常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被视为贫穷家庭。贫穷现象的规模取决于满足基本需求花费的成本(特别是粮食价格)、一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和该种收入的分配方式。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方式，有可能减少或者增加贫穷。显然，增加实际人均收入并实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让低收入比平均收入提高得更快，是减少贫穷的最有利条件。其他的组合方式，效果没有这么明显：人均国内总产值和不平等可能同时上升(或者下降)，粮食价格下降可能使城市家庭摆脱贫穷，却降低了低收入农民的收入。

关于如何减贫的问题，分析工作和政策辩论已有很多。这些分析和辩论的重点，主要在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穷之间的联系。有一种风行多年的有影响的观点是，增长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重要的减贫因素。根据这种观点，

表 3.3

1981-2008年部分国家组类别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百分比)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非洲	43.5	46.1	45.4	46.8	49.3	48.3	48.5	46.7	43.9	40.0
其中:										
北非	18.2	17.3	16.0	14.8	13.6	12.6	12.0	9.5	8.2	5.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1.9	13.6	12.0	12.2	11.4	11.1	11.9	11.9	8.7	6.5
亚洲	41.2	39.7	37.8	37.5	34.4	31.5	26.9	25.7	20.2	17.1
其中:										
中国	84.0	69.4	54.0	60.2	53.7	36.4	35.6	28.4	16.3	..
南亚	57.5	53.9	52.0	50.6	48.6	46.0	42.7	41.8	37.1	33.8
东南亚	45.2	43.5	42.6	37.7	32.7	27.4	25.4	22.2	16.9	12.9
西亚	6.6	6.4	4.2	4.7	4.9	6.0	5.8	5.4	4.6	3.2
转型经济体	2.4	2.0	2.1	2.5	3.0	5.1	4.9	2.6	1.3	0.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世界银行在线衡量贫困工具，PovcalNet。

结构性改革，包括扩大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度，降低政府消费并发展金融，将有利于增长，因而也将“对穷人有好处”。据认为，收入分配中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往往与一国的平均收入增速是相近，并将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现同样幅度的改善，而不需要实施再分配政策。此外，有人辩称，“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支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穷人的收入，收效甚微(Dollar和Kraay, 2000年)。

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建议，都受到了质疑。实际上，事实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低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份额往往会下降，在经济好转时期不会快速恢复(La Fuente和Sainz, 2001年)。而且，有确凿证据表明，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对于最贫穷者的收入有积极影响，最终对减贫具有积极影响(见第五章)。最后，再分配政策往往促进增长，尤其是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过去三十年里，对付贫穷的工作已经取得重大进步。但是各国和各区域减少极端贫穷的进程，却各不相同(表3.3)。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极端贫穷是指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一天收入低于1.25美元，这一数字与15个最穷国的人均消费中数相符。一方面，在亚洲增长最快的国家，一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所占比例，最初很高，现在已经大幅下降。例如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84%下降到2005年的16.3%。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有6亿多人在这一时期摆脱了极端贫穷，尽管它的人口增长了3亿多。

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非洲、拉丁美洲和西亚的减贫工作进展缓慢。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人口最多的国家，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的人所占的比例，在这二十年里甚至有所上升。例如在尼日利亚，该比例从1985年的53.9%上升到了1996年的68.5%，21世纪头十年的平均数为65.5%。从绝对意义上

来说，从1985年到2009年，另有5,900万人口陷入绝对贫困。相当于尼日利亚同期新增人口的86%。巴西的状况最初与此相似，只是程度较轻，但随后状况改观。极端贫困率从1981年的13.6%上升到1992年17.9%的高峰，并在1990年代后半期稳定在11.6%。21世纪头十年早期开始下降，2009年降至6.1%，这是因为巴西实施了以更包容性的增长为目标的政策。从绝对意义来看，这意味着从1981年到2009年，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尽管人口增长了大约7,000万。在转型经济体，极端贫困率的变化曲线呈倒U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垮台之后，大多数此类经济体的极端贫困率上升，自21世纪头十年初以来，由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复苏，这一比例迅速下降。

减贫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不同经济体自1980年代初以来的增长速度。但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经济政策也很重要。有些国家在对付贫困方面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其途径是借助更高的增长率，增加公共支出，包括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创造就业方案(第五章将予以详细探讨)。这部分地解释了各国的贫困率增长弹性何以不同。弹性不同的另一个原因与初始条件有关。人均收入大大高于贫困线的国家，弹性相对低，因为它需要更高的增长，才能减少与平均收入接近(或者低于)贫困线的国家相同比例的贫困人口。这说明了对迥然不同的国家使用同样的绝对贫困线的局限性：如果贫困线与人均(或者中等)收入相差很远，后者的变化即使很大，所反映出的贫困率的变化也只有很小。

D. 全球收入不平等

本报告主要阐述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大多数影响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已在各国内部付诸实施，反过来，它们国内不平等状况的演变，也对它们的经济表现和政策辩论有直接影响。但是，全球一级的不平等，无论是国家之间的还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也是一个受到严重关切的问题。实际上，有若干多边和区域机构，已经受命减少国家和区域间的不平等。¹³ 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已经牢固确立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减少这两类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两类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往往会出现差异。不能将该目标与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脱钩。

换言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仅仅是少数社会精英收入增长的结果，就不会在完成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因此，全球不平等起源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所以，旨在改善全球收入分配的政策，必须照顾到这两个方面。

关于全球不平等，存在不同的定义。¹⁴ 其中之一大体相当于“国际”不平等，或者平均收入不同的国家间的不平等。它利用每个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人均总产值以同一种货币衡量，在此使用美元购买力平价，将世界上所有国家从最穷到最富排序，以便计算出一个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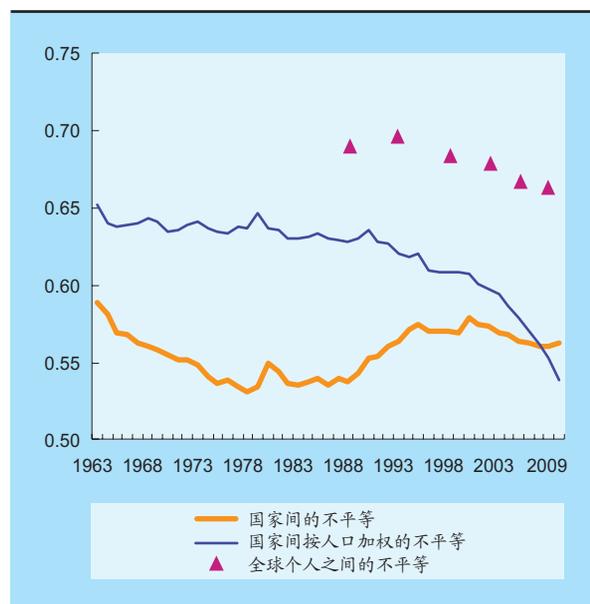
量不平等的量度标准，例如基尼系数。按照这一定义，全球不平等先是在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下降了，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速高于发达国家(图3.5)；后来从1980年到2000年，不平等程度加剧，因为很多拉丁美洲、非洲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率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有所下降，而发达国家持续增长，尽管曾都低于战后的几十年。¹⁵ 最后，在21世纪头十年，全球不平等再次缩小，原因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内总产值增长明显复苏，而发达国家增速放缓。

用这种方法衡量全球不平等，有一个重大缺点，它不考虑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口数：一个很小的国家可能和人口众多的国家拥有同等“权重”。因此，对不平等状况的估量，可能不反映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如果根据人口为不同国家分配不同的权重，这一图景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这表明，首先，按人口加权后衡量出的1990年代初之前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按照上一个定义得出的结果，用基尼系数表示，前者约为0.65，而后者为0.55(图3.5)。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述事实：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低收入国家。其次，按人口加权后衡量出的收入不平等，其变化更准确地反映了这些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1980年代早期以来，全球不平等状况几乎没有变化，当时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率与全球增长率相同，此后随着中国和印度开始以大大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速度增长，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21世纪头十年，不平等程度下降的速度甚至更快，因为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开启或者重启追赶进程。

尽管用第二种方法分析全球不平等状况更为准确，但它仍是以国家间的不平等为依据，并暗含这样的假设：每个国家内的所有个人都取得同等收入。它相对易于计算，因为它仅仅依据人均国内总产值，这可用从国民账户和人

图 3.5

1963-2009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
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Milanovic, 2005年；欧洲统计局；世界银行在线贫困衡量工具，PovcalNet，及统计司数据库。

注：国家间的不平等，依据人均国内总产值。

口资料来源找到，唯一的复杂之处，是需要估算购买力平价。¹⁶ 但是，要评估全世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还需要获得大量国家的国内收入分配数据。直到21世纪头十年初期，研究者才能够利用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众多国别家庭调查，提出关于全世界整体的新的经验证据，忽视国界，研究全世界的收入分配情况(见，特别是Milanovic, 2005年；2006年)。

利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全球不平等程度，显然高于用其他方法衡量出的结果，因为它不仅反映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也反映它们内部的不平等。它还高于数据库内列出的任何单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这说明确了对收入不平等的衡量结果，有可能随着地理范围的变化发生怎样的改变。例如，在给定国家内，有些农村地

表 3.4

1988-2008年世界收入不平等情况分解表
(百分比)

	1988	1993	1998	2002	2005	2008
基尼系数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1.1 (1.5)	1.1 (1.5)	1.1 (1.6)	1.2 (1.7)	1.3 (1.9)	1.3 (2.0)
国家间的不平等	62.7 (90.7)	62.5 (89.8)	61.0 (89.3)	60.8 (89.5)	59.0 (88.4)	58.4 (88.1)
重叠	5.4 (7.8)	6.0 (8.6)	6.2 (9.1)	6.0 (8.8)	6.5 (9.7)	6.5 (9.9)
世界总体不平等	69.2	69.6	68.4	67.9	66.7	66.3
泰尔系数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19.6 (21.7)	22.9 (24.5)	23.0 (25.4)	22.7 (25.4)	23.1 (27.1)	23.0 (27.4)
国家间的不平等	70.7 (78.3)	70.4 (75.5)	67.7 (74.6)	66.9 (74.6)	62.0 (72.9)	61.0 (72.6)
世界总体不平等	90.2	93.3	90.7	89.6	85.1	84.0
国家数目	93	116	121	121	120	11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Milanovic, 2005年；欧洲统计局；世界银行在线贫困衡量工具，PovcalNet；及联合国统计司(统计司)数据库。

注：括号内的数字代表总体中每个部分的份额百分比。

区或者城市贫民窟可能一律贫穷，而相邻地区可能一律富裕；单独衡量其中每一个区域的不平等程度，所显示的基尼系数会非常低，即使国家一级的基尼系数很高。同样，根据国家基尼系数平均值，欧盟看起来是一个比用区域整体基尼系数所显示的更为平等的区域。¹⁷

根据定义，全球不平等是由国家间和各国内部(按照人口加权的)收入差别决定的。每个因素(即：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收入差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不平等？对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进行分解，¹⁸可以看出，2008年，总体不平等的73%和88%(分别按照泰尔系数和基尼系数)是由于国家间的差异，其余是由于国家内部的差异(表3.4)。如果从历史视角看，国家间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的影响增强，似乎是一个相对近期的发展。根据对各国

国内总产值的长期研究得出的估算结果是，19世纪中期，最富国(荷兰和联合王国)与最穷国(斯里兰卡(原名锡兰)和中国)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比率大约是4比1。2007年这个比率上升到100比1以上(Maddison, 2004年；Milanovic, 2011年a)。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初，对于全球不平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至少是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同等重要的原因(Bourguignon和Morrison, 2002年)。目前，发达国家10%，甚至5%的最低收入人口，其平均收入高于低收入国家10%或者5%的最富者的平均实际收入。对比最富的15个国家和最穷的15个国家过去几十年里的人均收入，可以证实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1980年代，最富国的收入是最穷国收入的44倍，1990年代是52倍，21世纪头十年是60倍。但是，在上一个十年里，趋势发生了变化，比率从2000年的62.3降至2009年的55.8。

因此可以预期，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将立即转化为全世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这实际上似乎正在发生，只是明显滞后了。从1988年至2002年，衡量个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68到0.70之间，而国家间按人口加权的的不平等程度已经下降，这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两国人口总共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看来在那个时期的

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间不平等程度减轻的部分(Milanovic, 2011年b)。只是自21世纪头十年以来，所有关于全球不平等的衡量结果，都显示明显的同时减轻。值得强调的是，似乎从1990年代开始发生的全球不平等(个人之间)程度降低，是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不平等程度的首次降低。

E. 不平等的其他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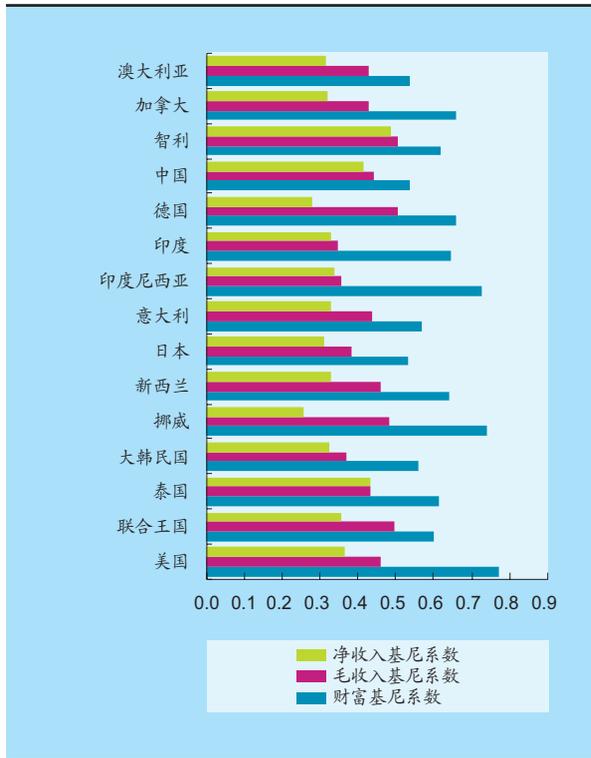
不平等有若干相关的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收入不平等，因为它直接决定着获得用于消费或者投资的商品和服务的情况。收入差别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它们也是由财富分配不均衡和获得教育及服务的机会不同造成的，而这些又常常是由社会、种族和性别因素决定的。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这些因素可能严重损害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而且，收入的高度不平等，往往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扩大，其途径是增加财富集中度，而财富的集中会制造出一个双重社会：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高质量的私立教育、医疗卫生和基本服务，而其他人只能接受低质量的服务，因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本节简要阐述不平等问题的某些方面，以说明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需要超越仅仅改变初次收入(例如工资政策)或者二次收入(例如税收和社会转移支付)的措施；这类政策也需要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基本社会决定因素。

1. 财富分配

收入和财富分配密切相关。某些初次收入，可以以利息、分红和其他资本收入的形式，从资产所有权获得。实际上，财产收入可能占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的一大部分。¹⁹ 那些收入有的被储蓄起来或者用于资本积累，以创造更多财富。总体上，这种相互关系适用于高收入群体，他们能够储蓄一大部分财富，因此大多数财富集中在这些群体手里。其实，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也是收入高度集中的，反之亦然。另外财富集中度往往高于收入集中度(图3.6)。这种更高的集中度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财富是多年积累的金融和不动产总量，并能够在不同世代之间传承。财富的集中度也反映出下述事实：高收入群体的储蓄积累比低收入群体快；前者能够定期储蓄比后者更大、绝对数额更多的一部分收入。事实上，在某些国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仅能满足其基本需求。

图 3.6

部分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瑞士信贷银行全球财富数据手册，2011年；及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注：各国财富数据的最近年份不同：澳大利亚(2006年)，加拿大(2005年)，智利(2007年)，中国(2002年)，德国(2003年)，印度(2002-2003年)，印度尼西亚(1997年)，意大利(2008年)，日本(1999年)，新西兰(2001年)，挪威(2004年)，大韩民国(1988年)，泰国(2006年)，联合王国(2008年)及美国(2007年)。

全部家庭财富的一大部分，其数额远多于收入，通常集中在人口中最富的1%手里。在拥有合理的可比数据的大多数国家，收入最高的1%，在经济体财富总量中所占份额，远高于人口中收入最低的50%(例如，在美国分别是33.8%和2.5%，在印度尼西亚分别是28.7%和5.1%，在法国分别是24%和4%)，他们的财富所占份额，远高于他们的收入所占份额(表3.5)。

财富集中度提高，意味着年收入中新创造的财富，被集中在早已富裕的家庭。这种现象可能明显有利于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例如，较为富裕的父母能够为他们的后代

提供更好的教育，这反过来增加他们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而且，富人的后代常常受益于所继承的大笔财富，这样就促进了下一代的财富集中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这体现为财阀政权，在此种政权下，富人对政府的影响力太大，因此政府的行动有利于富人，使之能够继续聚敛财富。

但是，财富集中度并非一直在提高。与20世纪某些发达国家中最富有阶层的财富份额有关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收入和财富集中度都曾一度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资本收入下降，这主要发生在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随后，收入累进税和不动产税的实施，使最富有的资本持有者难以完全恢复战前的集中程度(Piketty, 2003年)。在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有长期系列数据可用的国家)，家庭财富的降

表 3.5

部分国家财富和收入集中情况

(百分比)

年份	财富所占份额		收入所占份额	
	最低的50%	最高的1%	最高的1%	
加拿大	2005	5.4	15.5	13.1
法国	2010	4.0	24.0	9.0
印度	2002-03	8.1	15.7	9.0
印度尼西亚	1997	5.1	28.7	11.0
爱尔兰	2001	5.0	23.0	9.7
意大利	2008	11.5	12.2	10.0
大韩民国	1988	12.3	14.0	..
瑞典	2007	..	29.0	6.9
瑞士	1997	..	34.8	8.0
联合王国	2005	9.2	12.5	14.3
美国	2007	2.5	33.8	13.8

资料来源：瑞士信贷银行全球财富数据手册，2011年，表1-4；及巴黎经济学院经济新思维研究所，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

幅明显大于可支配收入的降幅，将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从6-7(在1900年到1940年间的不同时期)压低到1970年代的接近4。只是在1980年前后，在七国集团所有国家，财富再次开始迅速增长，将财富和收入的比率从1980年的4.6(平均值)提高到2007年的7.4。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财富遭受损失，但是这一比率只是稍有下降，2008-2009年大约是7(瑞士信贷银行，2011年)。这种长期增长，反映了资产价格的强劲上涨，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而在当前危急中若干发达国家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仅仅部分地扭转了这种上涨趋势。

在取样的发展中和新兴国家中，净财富与收入的比率平均数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大约是一半)。中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它的这一比率接近7，与法国、日本和瑞典相差无几，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储蓄率高，在过去二十年里，储蓄率超过国内总产值的20%。²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产构成也不相同，在发展中国家，非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土地和住房更为重要，金融市场欠发达。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各自作为总财产的一部分，通常具有同等重要性。在加拿大、荷兰、瑞士和美国，金融资产所占份额，实际上超过了不动产，而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澳大利亚这个拥有大量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国家，情况刚好相反。

在发达国家，财富资产的增速超过了可支配收入，它们的强劲增长以及在高收入群体中的显著集中，加剧了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根据Galbraith(2008年：99)的观点，某些发达经济体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似乎是“一个金融市场的现象，财富分配现象，资本资产估价现象，和根本上的权力分配现象”。发达国家中财富的日益集中与金融和

房地产市场有莫大关系，而在一些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这一现象可部分地归因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正如Stiglitz(2012年：42)所指出的，“以低价攫取国有资产，很容易致富”。一旦取得了支配地位，就可以获得垄断租费，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特别重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对100多个国家的经营性土地所有权分配情况所作的全面估计显示，土地集中度最高的是拉丁美洲，其中位基尼系数是0.81，其次是西亚和北非(0.66)、东欧(0.62)和南亚(0.59)。经合组织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为0.56，最低的是东亚(0.51)和撒哈拉以南非洲(0.49)，这两个区域的农业人口比例仍然很高(Vollrath, 2007年)。但是，这些关于土地持有权的统计数字，不能确切地反映土地所有权分配情况，因为同一主体可能拥有若干地块，在其中一些地块上工作的却是无地农民。因此，上述数值可能低估了实际所有权的集中度。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土地集中度高于收入集中度。

土地的高度集中，具有重大社会和经济影响。土地所有权不仅提供一种生计，而且有利于获得信贷，它关系到提高社会和政治参与(世界银行，2006年)。土地的高度集中已被确认为经济效率不足的主要根源，因为小佃户往往缺少资源和获得信贷的机会，无法投资和提高生产率，而大土地所有者可能缺少这样做的动因(Vollrath, 2007年；Prebisch, 1963年)。从历史视角看，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土地贵族，也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不像工业所有人那样，希望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据认为，这有可能是对普及教育和改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不够重视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反过来影响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速

度和本质特征(Galor、Moav和Vollrath, 2009年)。所以,对实现更平等的土地分配的土地改革的可能收益加以研究,是很重要的。例如,东亚土地改革的经验表明,它们的确能够提高社会凝聚力和经济效率。但是,需要在更广泛的农村发展战略内,为它们提供配套的技术辅助措施和获得投入及培训的机会(世界银行,2006年)。

2. 性别不平等

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性别有关。与性别有关的收入和机会差异(家庭内外),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因素,例如就业和工资条件,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差别,以及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就业方面,不平等不仅指有酬工作,因为在大多数社会里,家庭内无薪酬的工作大部分往往由女性家庭成员承担。

鉴于大多数妇女承担了大量无薪酬的工作,关于她们参与有薪酬或者获得承认的工作的证据,可能具有迷惑性。但是,人们已经发现,妇女在有薪酬和获得承认的工作中的参与度提高,与性别不平等的日益减轻有关。这是因为,它导致妇女的经济角色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并导致工作妇女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不过,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妇女对工作的参与率大不相同。在过去二十年里,她们在成人劳动力中的参与率有所提高,从1991年的52.8%提高到2010年的54.3%。在同一时期,妇女劳动力的增速高于男子(分别为50.4%和43.2%)。在发达和转型经济体,2010年的妇女参与率接近55%。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最高的是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约为70%),其次是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约为60%)。相形之下,西亚、北非和南亚最低(在20%到35%之间),那里的妇

女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一系列教育、社会和文化障碍(国际劳工局,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虽然参加有薪酬的工作对妇女很重要,但是她们的工作条件和薪酬水平也很重要。而且,如果社会不为也参加有薪酬工作的妇女承担的无薪酬工作预先作出安排,她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有薪酬工作,可能会成为她们的双重负担。另外,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有可能通过减少或者增加她们的无薪酬工作,对她们产生特殊影响。

拥有企业、担任高层管理职位或者参加全职就业的妇女比例相对较低,也表明大多数工作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表3.6)。

跻身高层(议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妇女往往比较少。相形之下,她们处在底层(初级职业,包括家政保洁工、工人和街头小贩)的太多(表3.7)。在发达和转型经济体,有一大部分妇女是作为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就业。拉丁美洲也是这种情况,只是程度差一点,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受教育的机会好于过去。但是,这些是成分相当混杂的群体,包括医生和医疗秘书、大学教师和小学教师。对资历要求较低的工作,例如职员、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是典型的“妇女的”工作,因为在发达国家它们为妇女提供了46%的有薪酬就业岗位,在拉丁美洲、亚洲(不包括中国)和转型经济体,它们为妇女提供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有薪酬就业岗位(这一比例是所有这些区域男性的两倍多)。相反,从事大多数技艺和制造业工作的,通常是男子。在非洲和亚洲,工作妇女大多从事农业,包括温饱型农业中的家庭内无薪酬工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女工集中从事某种类型的非传统农产品生产(例如切花和蔬菜),在若干亚洲国家是低级制造业工作,例

表 3.6

按区域分列的拥有企业、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和全职就业的妇女百分比

	拥有企业	高层管理职位	全职就业
东欧和中亚	36.7	19.0	38.4
东亚和太平洋	54.3	27.1	39.1
南亚	17.1	6.0	12.5
中东和北非	17.2	13.6	14.5
撒哈拉以南非洲	33.0	15.2	24.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0.4	20.8	37.9
高收入的经合组织	31.9	17.3	34.6
全世界	35.3	18.4	30.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可登录：<http://www.enterprisesurveys.org/CustomQuery#Economies> 查阅。

注：调查数据系2002年至2011年间的的历史数据，各国数据年份不一致。国家分类如资料来源所列。

表 3.7

2008年按性别和职业类别分类的就业分布情况
(份额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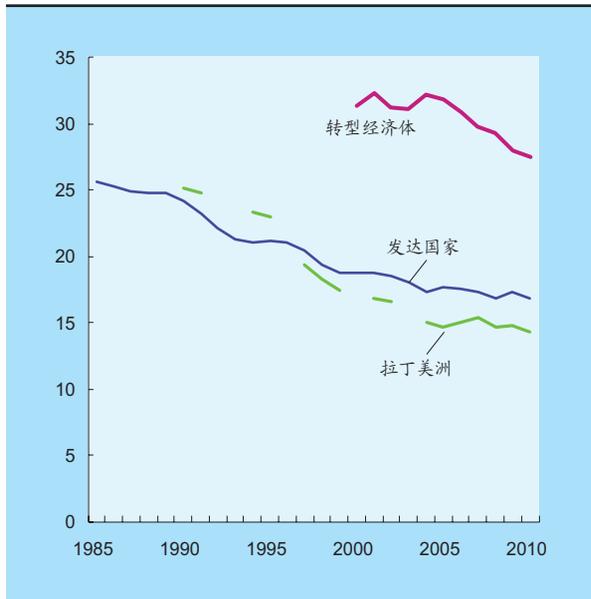
	发达国家		转型经济体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议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	11.2	8.0	8.2	6.0	4.8	1.7	4.0	1.4	3.8	2.9
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22.1	29.8	19.9	37.6	10.3	10.4	6.3	7.8	13.2	18.0
职员	7.1	20.0	1.9	6.5	3.5	5.0	4.0	3.3	5.4	11.2
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	15.2	25.7	9.4	19.6	10.2	9.7	9.8	12.6	12.2	23.1
农业和渔业公众中	3.5	2.4	7.7	5.8	39.4	53.6	48.1	58.9	17.7	9.7
工艺工人、工厂和机器操作人员及装配工	35.4	7.9	39.2	9.3	21.6	6.2	21.1	11.5	30.4	10.4
初级工	4.8	5.8	12.9	14.8	9.9	13.3	6.4	4.4	15.9	24.2
武装力量及未分类的	0.8	0.3	0.8	0.6	0.3	0.2	0.2	0.0	1.4	0.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国际劳工局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和劳工统计数据库；联合国欧洲经委会，性别统计数据。

注：工艺工人、工厂和机器操作人员及装配工在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区域合计数(亚洲和发达国家)中包含“初级工”。数据系2008年或最近可用年份的数据。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转型经济体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和乌克兰。非洲包括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埃及、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摩洛哥、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亚洲包括：不丹、柬埔寨、中国、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特区、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马尔代夫、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菲律宾、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包括：阿根廷、阿鲁巴岛、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开曼群岛、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牙买加、墨西哥、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

图 3.7

1985-2010年男子和妇女之间的
工资差距
(占男性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欧洲经委会，统计数据库；拉加经委会，CEPALSTAT数据库；及经合组织，就业数据库。

注：发达国家的数据系指下述国家全职雇员中位收入的性别工资差距简单平均数：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转型经济体的数据系指下述国家月收入性别差距的简单平均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拉丁美洲的数据系指下述国家城市工资性别差距的简单平均数：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和乌拉圭。

如制造成衣和皮革制品以及某些电子产品，还有“传统上属于女性的”服务行业的工作，例如旅游、数据录入和电话中心(Dejardin, 2009年；Seguino和Grown, 2006年)。

关于妇女就业的质量，这取决于它们的工作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是全职还是非全职。定性研究显示，妇女更有可能从事不稳定、低薪酬或者无薪酬工作(劳工局，2012

年)，以及与男子相比，在更小的农场生产，生产利润更低的作物(世界银行，2012年)。此外，她们的收入往往低于男子(世界银行，2012年：xxi)。即使在年轻女工对出口导向型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区域，她们也是集中在薪酬相对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

正规就业和无论是挣工资还是自营职业的非正规就业，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当今总体就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在发展中国家，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收入不平等，最近在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这种根本性的分野，往往因基于性别原因的收入差距而变本加厉，基于性别原因的收入差距在各行各业都很明显，即便教育水平相近。在亚洲，工资上的性别差距极为悬殊；从事贸易导向型业务的雇主，更喜欢雇佣女工，不仅是因为她们从事给定工作时，通常接受比男子更低的薪酬，而且是因为可以用结婚或者生育为借口，从极易使工人疲劳的生产线上把她们替换掉(Seguino, 2000年)。随着性别差距缩小，雇主开始发现，此类工作者的吸引力下降。实际上，妇女参与出口导向型活动的快速增长期似乎已成过往，因为最近的趋势显示，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妇女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均有下降，即使在最受出口驱动的经济体也是如此(Ghosh, 2009年)。相反，此类工作现在更多地集中在薪酬甚至更低的地方，例如在家里从事的工作和大生产链上的小家庭工业。

发达国家有减少基于性别原因的薪酬差距的长期趋势(图3.7)。然而，在上一个十年里，这种缩减不如以前明显，在某些国家还出现了逆转。在转型经济体，男子和妇女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为28%，而发达国家为17%，但在转型经济体也表现出缩小的趋势。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政策对减小基于性别原因的工资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阿根廷、巴

西、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法定最低工资和对家庭佣工的保护，有助于减小工资差距和改善女工的工作条件。在整个区域，男子和妇女获得的城市工资的差距，已经从1990年的25%下降到2010年的15%。但是，对比同等教育程度的男子和妇女的收入，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差距：1990年为38%，而2005年为30%(拉加经委会，CEPALSTAT)。这表明不仅从事相似工作获得的薪酬比男子少，而且她们凭借可比的资格只能获得薪酬较低的工作。

就业方面基于性别原因的不平等，反映在其他各种与性别有关的重要不平等上，并且与之相关。妇女参与有薪酬劳动力，有助于减贫，因为它增加家庭收入，但是这不同于家庭内部的公平，或者男子和妇女之间的公平。妇女更有可能比男子更贫穷，这种趋势从一代人延续到下一代人。以妇女为首的家庭，收入低于以男子为首的家庭。妇女不大可能像男子那样，拥有或者继承可创造收入的资产，例如土地，资本和产权，或者拥有住房(Agarwal, 1994年；世界银行，2006年，2012年)。妇女也不大可能拥有缓冲收入变化的储备，例如储蓄或者其他转移支付。而且，她们年老时更有可能在财务方面朝不保夕，因为她们参加公立和私立养恤金计划的比较少。所有这些都使性别不平等社会中的家庭为妇女和女童投资的可能性减小。

总之，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尽管快慢不一，这个变化是，妇女的参与率在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妇女获得的职位，在正规性、决策地位和工作时间长(即全职或者非全职)方面，质量常常低于男子的职位。另外，妇女的薪酬一贯低于同样工作、同样技能或者学历的男性。可以设想，一个薪酬低于平均收入的群体的参与率提高，将加剧总体收入不平等。但是，这

没有表现在收入分配统计中，统计依据的是家庭调查，它们掩盖了性别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那些调查得出的数据，甚至可能显示出不平等程度减轻了，因为附加的收入来源，实际上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而这些家庭的就业密度往往较小。结果，尽管与性别有关的收入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最普遍的形式，但它也是在总量统计数据中最不易看到的。和对待其他不平等一样，人们强烈主张减少不同层面上的性别不平等。改善妇女的就业条件，将增强工人总体上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有助于纠正很多国家正在发生的工资份额下降趋势。

3. 教育机会不平等

接受教育是创造机会平等的关键因素。普及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而使教育机会仅限于精英或者高收入群体，将使现有社会层级结构和收入不平等永久存在。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相互关联：良好教育导致薪酬更高的工作，而在很多国家，较高收入能够买到更好的教育。而且，教育还影响着其他重要形式的不平等，包括儿童死亡率和寿命，医疗卫生和营养、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性别平等和社会参与、公民和政治生活(Sen, 1980年)。

今天，能够接受教育，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过去增多了。这个进程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可以从不断提高的识字水平上看出来，读写能力是平等获取知识的最低门槛。在有数据可用的104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的青少年识字率超过95%，有35个发展中国家为99%(开发署，2010年)。目前的文盲通常是老人，这反映了过去教育水平的高度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15-24岁的人仅有7%从来没有上学，而在65岁以上的人中间，从未上学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表 3.8

1971-201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 (人口加权平均值, 百分比)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0
发达国家	78.6	83.5	87.2	92.0	94.5	101.7	101.7	101.9	102.6
转型经济体	97.7	99.4	94.7	89.9	91.4	88.2	91.8
非洲	14.6	18.3	24.2	29.5	31.7	32.9	37.2	43.1	48.8
亚洲	29.7	41.6	35.9	36.3	41.4	51.3	55.5	63.5	70.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0.2	41.5	50.6	58.4	59.3	64.0	74.2	81.5	86.2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 依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注: 由于学生留级, 入学率有可能超过100%。区域合计数是按人口加权的平均值。发达国家不包括澳大利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瑞士1971-1986年的数据。转型经济体不包括亚美尼亚、克罗地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1981-1986年的数据及塞尔维亚1981-1996年的数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不包括巴西的数据。

小学入学率在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几乎都已经普及, 但是某些个别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差距。²¹ 不仅上学的儿童增多了, 完成学校教育的也增多了: 2010年, 小学毕业率达到95%, 预期就学年数, 从1980年的9年, 提高到2010年的11年。即使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名最低的国家, 预期就学年数也从5年提高到8年。1970年以来, 中学入学率也有明显增长(表3.8); 截至2010年, 它涵盖了这个年龄群体的80%以上, 不仅在发达经济体是这样, 在欧洲和中亚转型经济体, 以及拉丁美洲和东亚也是如此。这一覆盖率在南亚(大约为60%)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接近40%)相对较低, 但是有一些例外。²² 高等教育发生了相似的演变, 入学率在21世纪头十年有显著增长, 尤其是在欧洲(西欧和东欧都是如此)、拉丁美洲和东亚。

开发署以平均就学年数衡量教育不平等, 它发现, 自1970年以来, 中欧和东欧以及中亚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 其次亚洲和太平洋, 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发署, 2011年), 但是, 这种衡量方式并没有考虑到教育质量差异, 这方面还存在重大差距。除了普及

学校教育, 重要的是通过增加支出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确保教育机会更加平等, 从而改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

例如, 进入学前班对于减少学识不平等尤为重要, 这种不平等反映家庭背景和收入, 而不是儿童自身的能力。但是这方面的机会仍然高度不平等: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仅有17.5%的符合条件的儿童进入学前班, 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是85%(教科文组织, 2012年)。²³ 而且, 通过扩大学前班的覆盖率和增加在校天数来减少教育不平等, 将减少成年人, 尤其是妇女, 用来照顾儿童的时间。这也将有利于妇女获得有薪酬的就业, 对收入和性别平等都有积极影响。

收入低仍然是各级教育的主要障碍, 尽管在很多国家, 教育政策直接为占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教育支助(Cornia和Martorano, 2012年)。例如, 在拉丁美洲, 占五分之一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仅有五分之一能完成中学教育, 占五分之一的最高收入家庭的儿童, 则有五分之四。据拉加经委会(2010年: 209)称, “这些对比显示, 当前的教育形式, 强化而不是扭转了不平等的代际传承”。

机会不平等，尤其是与低收入有关的障碍，也是发达国家的一项关切。社会经济状况是很多经合组织国家教育成功状况的有力预测因素(经合组织，2011年b)。例如在美国，出身贫困家庭(最底层的四分之一)的年轻人，仅有8%在24岁之前去的大学学位，而出身最顶层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则为82%(教育信托基金，2011年)。而且，在八年级标准化数学考试中成绩最好但却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完成大学教育的可能性，低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能力最低的学生(Roy，2005年)。居高不下而且日益上涨的大学学费，是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方面赤裸裸的不平等的一个原因：在美国，顶尖大学中只有9%的学生，来自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74%来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Stiglitz，2012年：19)。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学费也相当高，例如澳大利亚、智利、日本、新西兰、波兰和大韩民国(Oliveira Martins等人，2009年)。总体上，上大学的直接费用越高，就越有可能阻止较穷的家庭，或者使其背上沉重负担。²⁴ 发展中世界高等教育的日益私立化，也引起关切，因为它对于较低收入群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会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公共教育支出是改善机会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工具。它尤其有利于最贫困家庭，否则这些家庭可能无力承担教育费用。提高全部人口的技能，而不是片面提高富人的技能，除了创造更广泛的社会平等效益，还能大大增进技能和赚取收入机会的扩散。劳工局(2008年：132)指出，1990年代初在教育上支出较多的国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往往较轻。

教育不平等与谁支付教育费的问题息息相关。近年来全球学校教育覆盖范围明显扩大，

这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公共资金增加有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2009年的公共教育支出平均约为国内总产值的5%，高于1970年代的大约4%和一个世纪以前的区区1%左右(在那个时代，只有富裕的，而且只有男孩接受教育)。今天，即使最不发达国家也在教育上支出了国内总产值的4%左右，此举有助于提高贫困家庭儿童的就学率，尤其是女童。但是，各区域和国家之间的支出仍有诸多差异。

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变化最大。这是由于受到若干拉丁美洲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危机导致某些国家的就学率下降，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但是，21世纪头十年，这些国家的就学率大多迅速恢复，并且达到新高，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古巴、墨西哥、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案例研究显示，拉丁美洲和亚洲很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大韩民国，其公共教育支出的强劲增长，使人力资本和工资的分配更加平等(Cornia，2012年；Ragayah，2011年；di Gropello和Sakellariou，2010年；Kwack，2010年)。看起来，劳动力教育程度提高，强烈影响了工资分配，因为它增加了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供应(“数量效应”)。对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要求提高中学教育的入学率和毕业率，增加有助学金的高等教育机会。其结果对平等问题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滞后5-10年，但是往往卓有成效。增加教育支出，可能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尤其是在最穷国。但是这要求为那些已经接受此种教育的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这取决于总体增长动力，尤其是正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动力。 ■

注 释

- 1 基尼指数或者系数是最常用的收入分配衡量方式。它是洛伦茨曲线的一种概况统计：洛伦茨曲线画出了在全体人口的总收入中，各不同部分人口的累加收入所占的比例，基尼系数表示洛伦茨曲线和代表完全平等的45°线之间的集中区。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完全平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完全不平等，即：其中1人获得了全部收入，而其他人都没有收入。因此，系数越接近1，收入分配就越不平等。泰尔系数也提供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内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资料。它的值在0(完全平等)和个人或国家数的对数(完全不平等)之间。这一指数的优势是，它能够将不平等分解为国家间的和各国内部的而没有任何交叉。
- 2 关于衡量和比较各国不平等情况时的数据问题的讨论，见Galbraith, 2012年，第二章。
- 3 概览见Blecker, 2002年。
- 4 正如Gollin所说的(2002年: 458)，“很多被广泛使用的经济模型，都暗示地做出这样的假设：收入份额在不同的时空应当完全相同”。
- 5 见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 6 Atkinson、Piketty和Saez(2011年: 10)计算出，基尼系数总共上升的大约8个点，可以用占1%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所占份额提高来解释。根据其他估计，该时期基尼系数上升值的一半，可以归因于占1%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提高(克鲁格曼, 2012年: 77)。
- 7 这些估计数涵盖19世纪的41到71个国家，20世纪的85到108个国家。从1985年起，所使用的家庭总收入基尼系数，来自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此前的年份(特别是1945年之前)，由于没有此类系数可用(或者仅有少数国家有这些系数)，其系数是利用与收入不平等有关的不同统计数据得出的估计数。如果知道某些部分的收入分布(通常是最高收入)，就通过设定一种全体人口的统计分布，据此推导出基尼系数。估算基尼系数时使用的另一个替代物，是家庭平均收入与非熟练工人年薪之间的比率。最后，广泛使用人口中的身高分布，替代说明收入不平等状况。因为人生最初几年里的营养状况、医疗卫生和居住状况，是决定个人身高的重要因素，它们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由此发现身高变化与收入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van Zanden等人, 2011年: 5-13)。另一些对长期收入的估计，见Bourguignon和Morrison, 2002年。
- 8 从中期观点看，不平等程度加重似乎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障碍而不是优势。Galbraith(2012年)运用工资不平等数据揭示，较为平均的社会失业率较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的速度较快。
- 9 例如，有证据表明，在萨尔瓦多和墨西哥，汇款趋向均衡(Acevedo和Cabrera, 2012年)，但是来自印度(那里的熟练劳动力出口最近才变得重要)的证据就较为混乱。
- 10 整个区域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基尼系数平均估计数为0.46(Cogneau等人, 2006年)，与拉丁美洲2010年的系数相近。但是，应当指出，拉丁美洲衡量不平等的尺度通常系指收入分配，而在非洲，大多数可用的调查都与支出有关，显示出的不平等程度往往低于实际程度。
- 11 其他作者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超过以前基于支出不平等状况的估计。利用关于印度的第一批详细的收入分配情况估计数，Desai等人(2010年)计算出0.54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巴西在21世纪头十年末期的基尼系数。依据农村调查做出的估

- 计，显示了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即使在各个村庄之内，家庭之间平均为0.64，个人之间平均为0.59(Swaminathan和Rawal，2011年)。
- 12 正如Wee和Jomo(2006年：194)指出的，“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政策，概括言之，是优化增长方式，使之服从价格和收支平衡。”政府增加了公共投资，并使之与市场力量互补。
- 13 例如，欧洲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已经建立了在它们各自区域实现发展水平再平衡的金融机制。
- 14 关于另一种全球不平等概念的讨论，见Milanovic，2005年。
- 15 对各国人均国内总产值的比较，偶尔会因为国家数目增多而改变，特别是在发生非殖民化进程的1960年代，后来是在1990年代，前联邦制国家解体，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体。
- 16 利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可能有问题，因为它们依据的是对各国一揽子固定商品的过时的而且常常是可质疑的价格调查。在进行国家间的收入对比时，这些缺点并不总是被适当纳入考虑。
- 17 依据这另一种计算方式，Galbraith(2008年)对欧洲比美国更平等的普遍看法提出了质疑。
- 18 关于该项分解的方法论详情，见Pyatt(1976年)。必须指出的是，与泰尔系数不同，基尼系数并非完全可分解，因此，这一运用中的计算的是“重叠”部分，即指较富裕国家中某个人的收入水平可能会低于较贫穷国家的某个人这一事实。Milanovic(2005年)声称，将基尼系数中的整个“重叠”项归因于国家内部分是可接受的。
- 19 在发达国家，财产收入往往占最高收入群体(即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总收入的20%(日本)到50%以上(法国)。
- 20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印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和乌克兰净财富与收入比率的简单平均数，估计为3.25，与之相比，16个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为6.35(瑞士信贷银行，2011年)。
- 21 根据教科文组织(2012年)的资料，2010年前后，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尼日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索马里的小学入学率低于70%。
- 22 例如，佛得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毛里求斯、塞舌尔、南非和斯里兰卡的中学入学率超过85%。
- 23 在拉丁美洲，学前班的就学率大幅上升，从1970年的9%上升到2008年的71%。但是，该区域各国之间仍有巨大差异，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的就学率相对较高，而几个中美洲国家的就学率相对较低。此外，“3至5岁儿童的学前教育，阶层分化很严重，就学机会与家庭收入相对应：贫困家庭和容易致贫家庭的儿童就学率最低”(拉加经委会，2010年：207-208)，而这些社会群体正是最需要此种服务的，在很多国家，这种服务并不是免费的。在中亚、南亚和西亚以及非洲，学前班就学率仍然比较低，这些区域的妇女对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也往往很低。
- 24 教育信贷产生的债务积累，无论从家庭预算，还是从宏观经济视角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美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指出，学生贷款产生的未偿债务，上升到了1万亿美元(Chopra，2012年)，这一数额超过了汽车债务或者信用卡债务，仅次于抵押债务(Evans，2012年)。

参考文献

- Acevedo C and Cabrera M (2012). Social Policies or Private Solidarity? The Equalizing Role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El Salvador. UNU-WIDER Working Paper 2012/13,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 Africa Progress Panel (2012). Africa Progress Report 2012, Jobs, Justice and Equity: Seizing opportunities in times of global change. May.
-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Inequality in Africa. Briefing Note No. 5, Abidjan, March.
- Agarwal B (1994). *A Field of One's Own: 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ad MA and Ahmad M (2011). Growth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Pakistan. *Pakistan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49(1): 69–89.
- Atkinson AB and Piketty T (eds.) (2007). *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 Contrast between Continental European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AB and Piketty T (eds.) (2010). *Top Incomes: A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AB, Piketty T and Saez E (2011).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1): 3–71.
- Bakija J, Cole A and Heim BT (2012). 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 tax return data. Williams College Working Paper, Williamstown, MA. Available at: <http://web.williams.edu/Economics/wp/BakijaColeHeimJobsIncomeGrowth-TopEarners.pdf>.
- Blecker R (2002). Distribution, demand and growth in neo-Kaleckian models. In: Setterfield M, ed. *The Economics of Demand-led Growth*. Cheltenham, Elgar.
- Bourguignon F and Morrison C (2002).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7–744.
- Chen J, Dai D, Pu M, Hou W and Feng Q (2010). The trend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hina. Working Paper 109, Brooks World Povert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 Chopra R (2012). Too big to fail: student debt hits a trillion. Washington, DC,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Available at: <http://www.consumerfinance.gov/blog/too-big-to-fail-student-debt-hits-a-trillion/>.
- Cogneau D, Bossuoy T, De Vreyer P, Guenard C, Hiller V, Leite P, Mesple-Soms S, Pasquier-Doumier L and Torelli C (2006). *Inequalities and Equity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Institut pour la Recherche de Développement, INSEE, DIAL, Paris.
- Cornia GA (2012). Inequality trend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Latin America over 1990–2010. UNU-WIDER Working Paper 2012/09, Helsinki.
- Cornia GA, Addison T and Kiiski S (2003). Income distribution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3/28, UNU-WIDER, Helsinki.
- Cornia GA and Martorano B (2012).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selected developing regions, 1980–2010. Background paper for *TDR 2012*. Geneva, UNCTAD.
- Cornia GA, Gomez Sabaini JC and Martorano B (2011). A new fiscal pact, tax policy chan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last decade. UNU-WIDER Working Paper 2011/70, Helsinki.
- Credit Suisse (2011).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1*, October.
- Dejardin A (2009). Gender (in) 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 92, Policy, Integration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Geneva.
- Desai SB, Dubey A, Joshi BL, Sen M, Shariff A and Vanneman R (2010). *Human Development in India: Challenges for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 Gropello E and Sakellariou C (2010). Industry and skill wage premiums in East Asia.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379.
- Dollar D and Kraay A (2000).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8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ECLAC (2004). *A Decad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Chile.

- ECLAC (2010). *Time for equality, closing gaps, opening trail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Chile, May.
- ECLAC (2012).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11*.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Chile, March.
- Education Trust (2011).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11*. The Education Trust, Washington, DC.
- Elson D (1993). Gender-aware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5: 237–247.
- Evans K (2012). Student loans: the next bailout? CNBC, 25 April. Available at: http://www.cnbc.com/id/47171658/Student_Loans_The_Next_Bailout.
- Finn A, Leibbrandt M and Wegner E (2011). Policies for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Transformation Audit: From Inequality to Inclusive Growth*.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Cape Town.
- Galbraith J (2008). *The Predator State*. Free Press, New York.
- Galbraith J (2012).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or O, Moav O and Vollrath D (2009). Inequality in Landownership, the Emergence of Human-Capital Promo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Wiley Blackwell, 76(1): 143–179.
- Ghosh J (2009). *Never Done and Poorly Paid: Women's Work in Globalizing India*. New Delhi, Women Unlimited Press.
- Ghosh J (2012). Trends in inequality in South A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DR 2012*. Geneva, UNCTAD.
- Goldsmith RW (1986). *Comparative National Balance Sheets, A Study of Twenty Countries, 1688-19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lin D (2002).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2): 458–474.
- Gunawardena D (2008). Inequality in Sri Lanka: Key trend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Inequality in Social Justice in South Asia*. UNDP and Macmillan India: Delhi: 241–286. Available at: http://hdru.aprc.undp.org/areas_of_work/pdf/Sri_Lanka.pdf.
- ILO (2008). *World of Work Report 2008: Income Inequalities in the Age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LO (2012).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2: Preventing a deeper jobs crisi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Geneva.
- Kaldor N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utz FA and Hague DC,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London, Macmillan.
- Khan AR (2005). Measur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Bangladesh: An assessment of the survey data. *Bangladesh Development Studies*. Dhaka,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ume XXXI (3-4): 1–34.
- Krämer H (2010). The alleged stability of the labour share of income in macroeconomic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acro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IMK), Working Paper 11/2010, August.
- Krugman P (2012).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Kwack SY (2010).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Workers in Korea, 1965–2007. The Bank of Korea, 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37.
- Kwon H (2005).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 477–497.
- Kwon H, Dong G and Moon H (2010).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Kore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Policy in Times of Change of the Social Policy Association at University of Lincoln, 5–7 July.
- La Fuente M and Sainz P (2001). Participation by the poor in the fruits of growth. *CEPAL Review*, No. 75, December: 153–162.
- Lindenboim J, Kennedy D and Graña J (2011). Distribución funcional y demanda agregada en Argentina: Sesenta años en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 Working paper no. 16,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Población Empleo y Desarrollo (CEPED), Buenos Aires, August.
- Luo Z and Zhu N (2008).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700, World Bank, East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 Maddison A (2004).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GDP per capita, 1-2000 AD. Available at: <http://www.eco.rug.nl/~Maddison/>.
- Milanovic B (2005). *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lanovic B (2006).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Working Paper No. 2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 Milanovic B (2011a). Global inequality: From class to location, from proletarians to migran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5820,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 Milanovic B (2011b). More of les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 Ocampo JA (2009). Latin America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3(4): 703–724.
- OECD (2011a).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Paris, December.

- OECD (2011b). *Equity and quality in education: Supporting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schools*. OECD: Paris.
- Oliveira Martins J, Boarini R, Strauss H and de la Maisonnette C (2009). The policy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in tertiary education. *OECD Journal: Economic Studies*. OECD: Paris.
- Piketty T (2003). Income Inequality in France, 1901–199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5): 1004–1042.
- Piketty T (2008). *L'Economie des Inégalités*. Paris, La Découverte.
- Ping Z (1997). Income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 China. UNU/WIDER Working Paper 138, Helsinki.
- Prebisch R (1963). *Hacia una Dinám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Mé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Pyatt G (1976).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isaggregation of Gini coefficients. *Economics Journal*, 86: 243–255.
- Ragayah HMZ (2011). Malaysia's new economic model: An assessment of its strategies for inclusive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regional workshop on Social Inclusiveness in Asia's Emerging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13 September 2011, Jakarta, Indonesia, Organized by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 Razavi S (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 an opportunity both welcome and missed*. UNRISD, United Nations, Geneva.
- Roy J (2005). Low income hinders college attendance for even the highest achieving student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conomic snapshot/Jobs Wages and Living Standards, Washington, DC.
- Seguino S (2000).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 country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28(7): 1211–1230.
- Seguino S and Grown C (2006). Gender equity and globalis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MPRA paper 6540.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 Sen A (1980). Equality of what. Tanner Lectures in Sen A (1982).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Blackwell, Oxford. Reprin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7.
- Sen A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Shahbaz M and Islam F (2011).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Pakistan.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6(1): 35–58.
- Solt F (2009). Standardizing the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0(2): 231–242.
- Stiglitz J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W. W. Norton and Company Ltd., New York.
- Swaminathan M and Rawal V (2011). Is India really a country of low income-inequality? Observations from eight villages. *Review of Agrarian Studies*, 1(2): July–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www.ras.org.in/index.php?Abstract=income_inequality_and_caste_in_village_india.
- Thirlwall P (2011).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ed growth models: History and overview. Studies in Economics no. 1111. Kent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Kent, Canterbury, May.
- UNCTAD (TDR 201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mployment,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1).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Post-crisis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1.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11).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UNCTAD to UNCTAD XIII. Development-led globaliz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paths. New York and Geneva.
- UNDP (201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New York and Geneva.
- UNDP (201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Sustainability and equity: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New York and Geneva.
- UNESCO (2012).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online database. Available at: www.uis.unesco.org.
- Vanneman R and Dubey A (2010).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equalities in Ind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equality and the Status of the Middle Class: Lessons from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uxembourg, 28–30 June.
- van Zanden JL, Baten J, Földvari P and van Leeuwen B (2011). The changing shape of global inequality 1820–2000: Exploring a new dataset. CGEH Working Paper Series, Centre for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Utrecht University.
- Venieris Y and Gupta D (1986).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as determinants of savings: A cross-sectional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 873–883.
- Vidanapathirana U (2007). Emerg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widening economic divide: The case of Sri Lanka. Paper presented at IDEAs Conference on Policy Perspectives on Growth,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Poverty Reduc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7–9 June.
- Vollrath D (2007). Land distribution and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89(1): 202–216.
- Wee CH and Jomo KS (2006). Macroeconomic policy, growth, re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case of Malaysia. In: Cornia GA, ed. *Pro Poor Macroeconomics: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London, Palgrave.
-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Equ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201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全球化与技术的变化及其对国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

A. 导 言

前章所述证据表明，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会在不同时点和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各类收入产生影响。本章旨在考察过去两个年代中，技术进步以及贸易与金融全球化对国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演变所施加的压力。

赞成传统理论取向的很多观察员都坚信，全球化与技术的变化必然会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就他们而言，主要问题是，这两种势力中，哪一种势力会更强大。但本《贸发报告》对这一立场提出了质疑：第四章和第五章旨在阐明，如果采取了原本会对一国贸易与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更适当宏观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政策，那么就算不能预防，也原本可以缓解很多国家中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问题。

技术变革以及贸易与金融全球化的演进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

无法事先明确这种影响的走向。不同渠道所释放的力量很可能会改变原有走向，而这些力量又很可能要取决于国别因素和各种具有时效性的因素。在国别因素中，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尤其是汇率管理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组织将起着决定性作用。

另一国别因素是第三章所概述的工业与技术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一国的经济与工业发展水平以及这种水平与全球技术前沿水平之间的接近程度将决定该国的一体化是否能够促进其工业化进程，或者，该国更多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是否会限制其工业化进程。因此，通常认为，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一体化会对一国经济活动的结构性因素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本章将探讨全球化与技术发展态势对一国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一) 确定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态势

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渠道；(二) 考察这类渠道对各国产生影响的差异；(三) 重点阐述那些会使这类国别差异相互依存的经济势力。

随后各章将讨论旨在确保某种能为社会所接受且有利于可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收入平等水平。

由于很多国别因素都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所以本章无法对所有国家进行同样程度的阐述。相反，将通过特定国家和国家组的证据来说明技术与全球化对分配的影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所列渠道对其具有重要意义。

本章认为，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各种方式之间密切相关，在过去两个年代中，这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已明显增加。但至于这些综合影响究竟是会减少还是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将取决于一国的初始条件和工业发展水平，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汇率管理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标准有关的各项安排与制度以及那些会对经济一体化性质和速度产生影响的政策。

本章所述证据显示，自21世纪头十年初期以来，各种全球化势力对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司部门旨在应对更激烈国际竞争的行为变化有关。各公司已不太注重通过从长计议的促生产投资，来实现生产技术与产出品构成的更新；相反，他们已越来越多地将生产活动外包给海外低工资地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压缩工资来降低国内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这种趋

势一直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化问题相关。就美国而言，证据显示，旨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新型公司治理模式正促使各公司通过压缩工资和离岸外包方式，来保持其对外竞争力，并通过金融投资(通常为投机性投资)而非提高产能的方式来提高其利润。

最后，本章表明，在某些迅速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全球贸易的扩张以及发达国家因此而从发展中国家所增加的制成品进口一直伴随着收

入不平等水平的增长。正如Kuznets(1955年)为早期工业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预测的那样，这些国家的分配变化很可能反映了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以及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增长率的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转型期经济体)和某些发展中经济体的证据显示，金融迅速一体化带来了经济的不稳定，这对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在过去一个年代中，一些具有丰富资源禀赋的国家，包括更先进和欠发达国家，在贸易方面得到了改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改善催生了各种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政策。

下节将重温相关文献，这类文献重点论述了贸易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影响收入分配的渠道。首先，该节将简单介绍1990年代初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争论，这种争论强调了发达国家中有

技能劳工和无技能劳工之间工资不平等水平的上升问题。其次，该节将重点阐述有关贸易不平等问题的最新争论，这些争论揭示了技术和贸易全球化对分配产生影响的几个新层面。另外，还：(一)将考察令人担忧的就业问题；(二)除了

全球化与技术变化对分配产生的各影响之间密切相关……

……在过去两个年代中，其综合影响已显著增加。

传统二分法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外，还将考虑中等技能工人工资两级分化的问题；(三)除了发达国家外，还将考虑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在内的更广泛国家；(四)除了制造业

内部的就业转移外，还将考虑制造业向初级和服务部门的就业转移。除了技术和贸易全球化外，C节还将讨论金融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渠道。D节为结论。

B. 贸易、技术与生产结构转变

1990年代初，曾对贸易、技术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激烈辩论(另见1997年《贸发报告》有关该辩论的文稿)。大约在一个年代之后，又再次展开了这种辩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近期有了上升，第二，理论有了进步(例如，Harrison、McLaren和McMillan的讨论，2011年)，同时有了更全面的数据，因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收入分配变化与技术发展/一国贸易一体化扩大之间的关系。理论进步有助于拓宽分析，评估贸易、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收入分配的综合影响。

在很多国家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加速都伴随着不平等水平的上升，为全面了解这一问题，还论述了那些致使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和劳工在工资谈判过程中不断弱化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本《报告》第六章将分析这些政策。本部分将重点论述在特定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下，贸易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对收入分配施加压力的特定渠道。首先，将简单回顾1990年代初有关“贸易与不平等”关系的辩论，其次，将重点阐述不平等问题和全球

贸易对一国影响的主要性质变化——这引发了近期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

1. 1990年代初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

传统赫克歇尔与俄林理论中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的差异驱动了贸易。该理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预测，当一国从事国家贸易时，该国所富有要素的实际收入会增加。更准确地说，假设更先进国家具有大量有技能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具有大量无技能的劳动力，那么当更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无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货物的价格会下降。在更先进的国家中，无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货物价格的这种下降会使生产转向更高技能劳动力密集的货物，并使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实际工资下降——无论是从绝对值来说，还是相对于技能更高的工人来说，都是如此。后一效应通常被描述为所谓的“技能溢价”增加，这代表了有技能工人和无技能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拉大，以及工资失衡问题的恶化。根据预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相反：价格变动使生产转向无技能劳动力密集的

部门，这带动了市场对无技能工人的需求，并进而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无论是从绝对值来说，还是相对于有技能的工人来说，都是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无技能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技能劳动力的占比，所以这些国家工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预计会下降。

至于这种与贸易有关的效应是否可以解释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很多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问题，1990年代曾对该问题有过激烈辩论(另见1997年《贸发报告》)。¹最后，一种广泛共识是，在这些国家中，贸易对欠技能工人相对工资的打压作用比较温和，因此，不是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主导因素甚至主要因素。相反，不平等的这种上升主要归因于偏向技能的技术进步(回顾见Anderson, 2005年; Goldberg与Pavcnik, 2007年; 以及Harrison、McLaren与McMillan, 2011年)。

该辩论弱化了国际贸易的解释性作用²，其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如，Lawrence和Slaughter, 1993年; Berman、Bound和Griliches, 1994年)发现，大部分货价变化和技能溢价的增加都源于工业部门内部的转移，而不是各部门之间的转移，这与标准贸易理论所预测的情况相反。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如，Berman、Bound和Machin, 1998年; Desjonqueres、Machin和van Reenen, 1999年)指出，发展中国家也发生了曾在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技能工人工资上涨现象；然而，根据标准的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工资走向原本与发达国家的工资走向相反。³

后一发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贸易理论假设货物是自由移动的，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

代，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面临着很大的准入壁垒(1997年《贸发报告》第二部分)。主要壁垒包括：关税高峰——这通常会影劳动力密集型货物；多种纤维协定(MFA)，该协定包括一套复杂的量化限制性措施，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不会使进口国(即：发达国家)付出相当大的短期和中期调整代价时，尤其是失业代价时，才允许扩大出口。

如将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期间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上升只归因于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则会受到质疑，其理由是，这种技能偏向不是该期间的新现象(Card与DiNardo, 2002年)。在传统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该问题可通过考察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的长期趋势和技能工人供应的发展态势加以解决。至于技能溢价的演变，技术进步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很可能会有角逐，前者往往会增加市场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后者则会增加技能劳动力的供应(Tinbergen, 1975年; Goldin和Katz, 2008年)。很多观察员认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较稳定技术进步之后，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计算机在工作场所中的普遍使用加速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术变革。他们表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步伐都超过了教育进步的步伐，这使工资不平等水平上升⁴。

单凭基于简单Stolper-Samuelson关系式的传统贸易理论或者技术进步都无法全面解释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各国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问题。对美国的经验分析发现，离岸外包和技术变革是另一个重要的解释性因素

1990年代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认为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主要与偏向技能的技术进步有关。

(Feenstra和Hanson, 1999年)。⁵ 一般认为, 该期间上升的总失业率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总技能群组失业率的上升会打压总工资而不是工资比。但在总失业率持续很高的时期, 雇主甚至有可能选用良好素质的人员从事技能水平很低的工作。这往往会延长失业以及低技能工人工资所受的压力。此外, 在持续存在失业问题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政府会迫使工人, 尤其是低技能工作接受那些甚至不能让他们过上体面生活的工作。

2. 关于“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新”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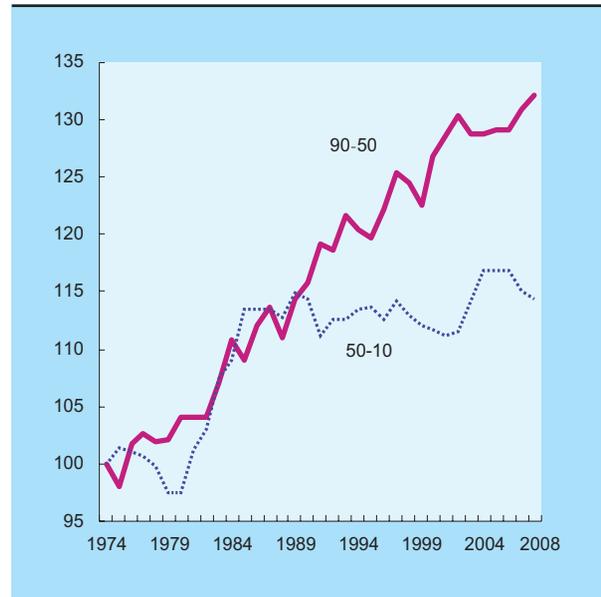
在过去几年中, 与贸易有关的分配效应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节将对这一新辩论进行阐述。首先, 将考察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对这一新辩论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不平等明显恶化, 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 收入不平等和国家贸易风险敞口的性质发生变化。其次, 将介绍其他很多国家, 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国家以及若干转型经济体, 在这些国家中, 人们意识到, 各种全球化势力可能正在导致去工业化问题以及就业和工资收入机会的相应恶化。本节还将讨论某些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担心的分配问题, 这种担心的原因是, 人们观察到, 全球化可能已经推动了迅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但同时也使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

(a) 发达国家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新特征

除了工资外, 发达国家新的收入不平等——也称“两级分化”(Autor、Katz和Kearney, 2006年)还事关就业问题。1990年代初与贸易—不平等关系有关的辩论侧重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在工资方面的分化问题。但近期则表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格局, 技能最高和最低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

图 4.1

1974-2008年美国处于各分配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比率
(指数, 1974年 = 100)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数据, 采用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数据库“人口现状调查: 轮换出组的合并”。

注: “50-10比”指处于分配第50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与处于第10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之比, “90-50比”指处于分配第90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与处于第50百分位的平均小时工资之比。

但中等技能从业者(即: 那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员)却不能。相对于其他工人而言, 中等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一直在下降。

为考察工作的两级分化问题, 最好撇开顶层收入者(见第三章的讨论)和底层收入者的工资。对第90百分位(顶层)和第10百分位(底层)之间收入者的工资走势进行分解有助于比较第90百分位和第50百分位的工资比率(以下简称“90-50比”), 以及第50百分位和第10百分位的工资比率(以下简称“50-10比”)。有关美国的证据显示, 这些比率(90-50比与50-10比)在1970年代相当稳定, 在80年代迅速增长,

图 4.2

1993-2006年美国 and 欧盟若干国家按
职业水平划分的就业份额变化
(百分比)



资料来源：Goos、Manning和Salomons，2011年；以及Acemoglu和Autor，2012年。

注：职业按工资百分点分组。欧盟成员的各项数据点按照最高薪酬职业所占份额的变化排序。

但在80年代后则急剧分化(图4.1)。⁶ 90-50比一直稳步增长，如今比1973年约高出35%。相反，50-10比则一直相当稳定，约比1970年代初的水平高15%。更详细的证据显示，在过去几年中，第10百分位数和中位数之差一直在大幅缩小(Acemoglu和Autor，2012年：第13页)。包含了性别因素的更多证据显示，女性的50-10比停止增长，而男性的这一比率实际上已在下降(Lemieux，2007年；Acemoglu和Autor，2012年)。总之，该证据显示，收入增长一直集中在

梯阵的高层和底层，而收入分配的中间阶层则成了牺牲品。

实际上每个发达国家也发生了就业的两级分化(图4.2)。⁷ 在图4.2所列的绝大多数国家中，最高薪酬职业(如，律师、银行家、管理顾问、教授和医生)的就业份额已显著上升，而在大多数国家中，最低薪酬职业(如，理发师、清洁工、司机、餐厅服务员和超市工作人员)的就业份额也上升了。相反，在国有国家中，中等薪酬职业(如，办公室文员、手工艺和相关行业的工人、车间和机器操作人员 and 装配工)的就业份额则下降了。中等收入职业的这种空心化可能与自动化有关(即：与技术进步有关)。计算机在工作场所的使用增多可能减少了中等技能工人的职位，从而将他们推向了那些无法通过计算机执行的较低薪酬服务业(Autor和Dorn，2012年)。但，也可能与制造活动和服务的离岸化有关。

的确，贸易对国家的影响有了两个新特征。首先，200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越过了30%，而在2010年则达到了40%，与1970年代和1980年代25%的平均水平相比，有了显著增长，而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较早辩论则以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为重点。⁸ 其次，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增长一直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尤其是中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工资大大低于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中占了很大比重的经济体，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大大低于那些在战后有过迅速追赶经济经历的其他国家，如，日本和德国。尽管可用于准确跨国比较的数据只限于1975年以后，但是，在就制造业工资水平，将那些有过迅速追赶经济经历的国家与美国相比后，可大体发现，出口制成品的某些大型发展中国家与作为其贸易伙伴的发达国家之间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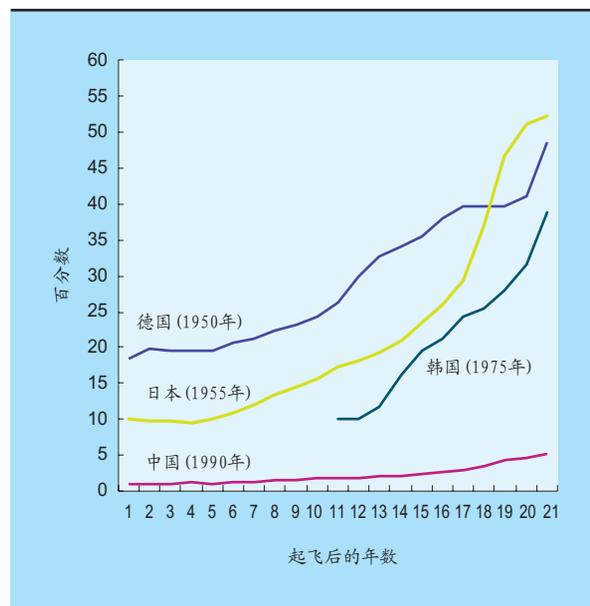
巨大的工资差距(图4.3)。的确,随着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开放,这种差异很可能会拉大,甚至在对美国工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行调整后,也是如此(Ceglowski和Golub, 2011年)。这与1990年代初的辩论相反,该期间,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相对于美国而言的平均工资上升,在人们担心贸易会引起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情况下,这种上升曾起过减轻担忧的作用。

按照亚洲和德国迅速追赶经济的早期经验,中国目前可能已到达追赶阶段,该阶段的制造业工资正开始大幅上升(图4.3)。劳动力供应的增速下降以及区域性劳动力流动受限可能是其部分原因(2010年《贸发报告》,第二章C节)。此外,2008年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加强雇员的谈判权。⁹最后,劳动报酬也增加了,因为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根据Banister和Cook(2011年)的资料,1991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包括制造业以及建筑、矿业和公用事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0%。生产率增长迅速的原因有:资本投资相当大而且在不断增长;中国工人的文化和技能水平提高;参与国际生产的跨国公司(TNC)采用了先进技术(见下文讨论)。就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报酬而言,其按美元计算的增速要高于按人民币计算的增速,因为2005年至2012年期间,人民币大约升值了25%。¹⁰

为说明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增加情况,最好以一组“低工资经济体”为重点。根据Bernard、Jensen和Schott(2006年)的定义,该组指2007年前(即:当前经济危机爆发前)人均收入不足美国人均收入5%的国家。由此得出的82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全部名单见本章注释末的正文内容)包括很多小型经济体,但也包括亚洲的一些大型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以及诸如印度、印尼和菲律宾之类的国家。

图 4.3

处于经济追赶期的若干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的制造业工资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库。

注:括号内的年份表示经济起飞的起始时间。用以确定经济起飞的起始日期是对生产率增长数列进行断点分析的结果,而生产率增长则用每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进行测算。

的确,至于全球贸易对各国影响的新格局,很多与此有关的讨论都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迅速扩张有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货物和电子器件出口),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这是中国正式进入全球经济舞台的标志,尤其是,该事件使中国与其唯一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之间有了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这种正常化消除了这两大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并对中国境内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外国直接投资又加速了整个东亚的生产分工。¹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还意味着需要在商定的时限内最终消除那些与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的歧视性反出口措施。例如,中国将因逐步淘汰《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而得到保护,该协定代表了配

额条例的终结，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该条例一直支配着国际服装贸易。

经验证据显示，各国之间在以下方面有着显著差异：低薪酬经济体在其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他们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的增加情况，以及源自中国的进口在源自低薪酬经济体的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图4.4)。低薪酬经济体在日本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30%，紧接其后的是他们各自在美国和亚洲一组相对先进发展中国家的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在美国、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和拉美地区，中国在所增加的进口中占了大部分，而低薪酬经济体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则更加均匀地分布于中国和其他低薪酬经济体中。此外，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在所有国家中都占了很大的份额。¹²

总之，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加了，这些货物的主要进口方和主要出口方之间拉大了薪酬差异，这些证据说明，如今，贸易全球化对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压力要比20年前大，在发达国家中，尤其如此。但与贸易有关的这些影响很可能由更深层的非贸易因素引起，如：国际工资角逐(见第六章)和公司行为变化(见下节的讨论)。

(b) 发达国家中贸易对分配的影响渠道

如前节所述，国民收入不平等和全球贸易对一国影响的性质变化引起了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新辩论。与以往讨论类似，近期辩论涉及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和国际贸易对分配的影响。有人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一直是使不同类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发生变化的原

因，因为“信息技术为那些具有很高文化水平因而从事抽象工作的工人提供了辅助，取代了那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因而从事日常工作的工人，但对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技能工作的

影响却较少”(Autor、Katz和Kearney，2008年：第301页)。原因是：计算机可以取代日常工作，如：组装线工作或文书工作；非日常工作则难以数字化；计算机方便了大规模的数据分析，这为技能工人的工作提供了辅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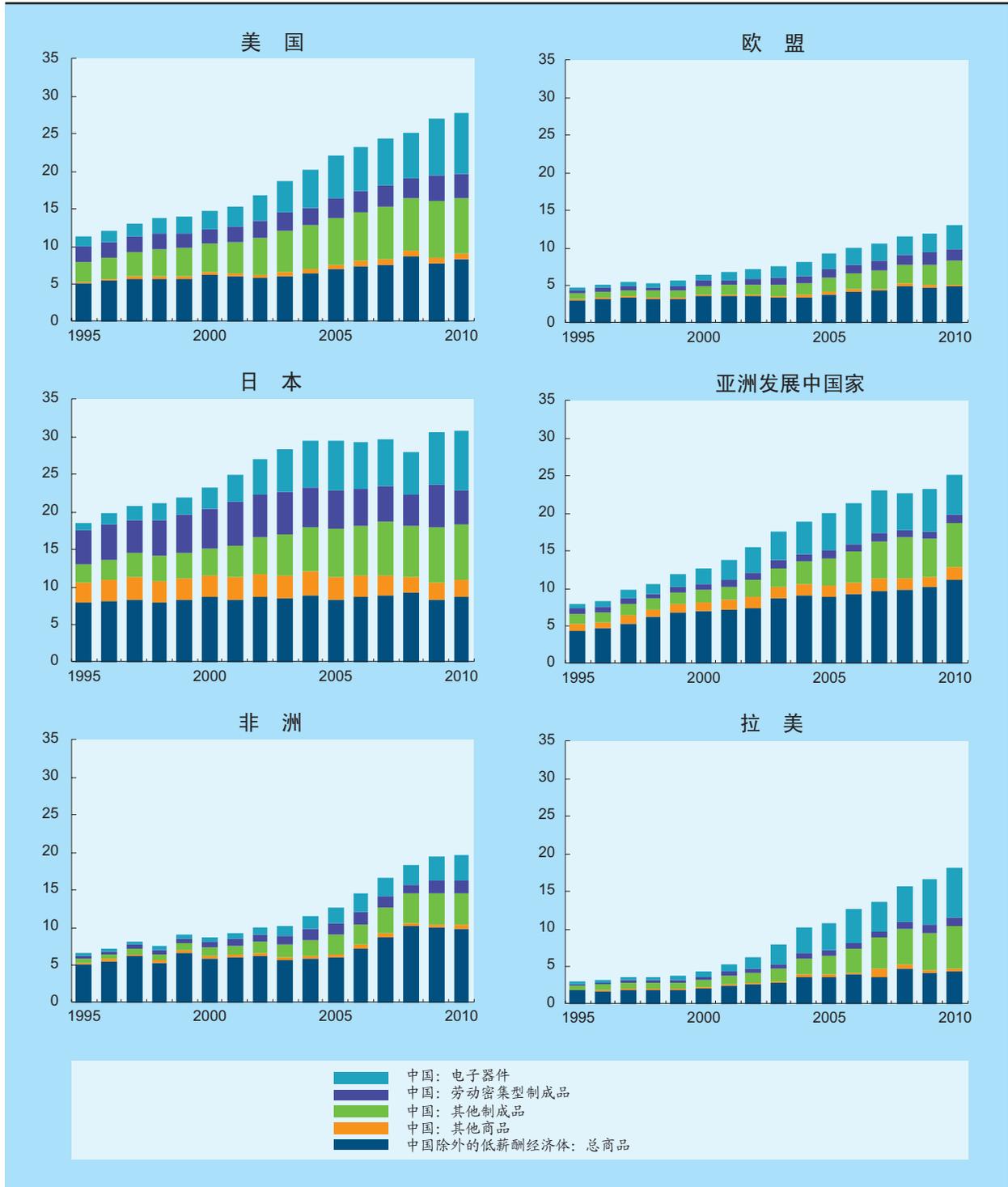
贸易对分配影响的增加可能由更深层的非贸易因素引起，如：国际工资角逐和公司行为变化——在发达国家中，尤其如此。

如前所述(以及图4.1和4.2所示)，在过去两个年代中，与技术有关的这些变化是不同类工人相对工资和就业状况发生演变的根源。但这些发展情况也可采用与贸易有关的论点加以解释，这些论点强调了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增加(如，作为电子行业关键特征的部件和组件贸易增加)和服务活动的离岸外包。在发达国家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中，中间产品贸易和离岸外包通常占有突出地位。

除减少了与政策有关的贸易壁垒外，运输费用，尤其是与信息通讯技术(ICT)有关的通讯费用一直在下降。成本更低和更尖端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使企业能够在盈利的情况下，管理多方面的程序和在不同地区从事不同阶段的生产。结果，有些中间产品的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从而刺激了这些货物的国际贸易。这类贸易不仅对有技能和无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影响了那些从事离岸外包活动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部件和组件贸易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可能会大大超过最终产品贸易所产生的这种影响。此外，在发达国家，中间产品对劳动力需求和技能溢价的影响与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大致相同：两者都减少了低技能活

图 4.4

1995-2010年若干国家和国家组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的商品，
按产品类别划分
(在总商品进口中所占的百分数)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联合国贸发会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的数据。

注: 低薪酬国家指, 2007年前(即: 当前经济危机发生前)其人均收入不足美国人均收入5%的国家。国家组的构成见本章注释末的正文。“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包括: 皮革、纺织品、服装和鞋类。

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较高技能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和工资。

这解释了中间产品分散化生产和贸易为什么能刺激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因此，类似于最终产品生产中的技术进步。但两大生产率增长源是由差异很大的公司行为引起的：一方面，技术进步依赖于创新投资以及企业长期增长战略中与此有关的动态增益，另一方面，用较低成本的进口中间产品取代较高成本较高的国内投入可通过全球化生产所减少的成本，实现生产率增长。不同公司战略影响收入分配变化的方式将在下文进行详细讨论。

在各地区分散进行不同阶段的中间产品生产和相关贸易要涉及很高的费用。在不同国家生产部件和最终产品不仅需要支付运输费和关税，而且需要进行协调。因此，对于其企业参与了国际生产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适当技能的劳动力、良好的贸易基础设施和靠近发达国家将具有优势，这一点已被证实。这种参与采取了企业间协议、网络和各种联盟的形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招引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因为在同一企业内部管理生产链的情况下，很可能将协调费用降到最低。若不考虑用以管理生产网络的特定形式，那么生产的国际化将会直接影响最高层梯队的收入分配，因为这种国际化使世界各地可通过很高的报酬利用特定人才(Gordon和Dew-Becker, 2007年)。

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是，可以将其外包给特定国家的各生产阶段的产出天衣无缝地纳入持续演变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为实现这一目的，跨国公司通常对其划分给外国子公司的各部分技术进行配置，并将其本国开发的先进技术与海外的较便宜劳动力相结合。这种安排意味着，“跨国”是

将一小部分技术“借给”发展中国家所在地的生产者，以使海外部分能够按照尽可能低的成本和必要的质量水平进行生产(Baldwin, 2011年:第21页)。这种“借技术”战略意味着，跨国公司的目的是将其转让给东道国的技术和诀窍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截然不同于一种通常会对各项政策起支配作用的范式，即：尽可能多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范式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捆绑在一起的一组资产，包括(而且最重要的是)获取先进技术和技巧，这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跃入更尖端的生产领域。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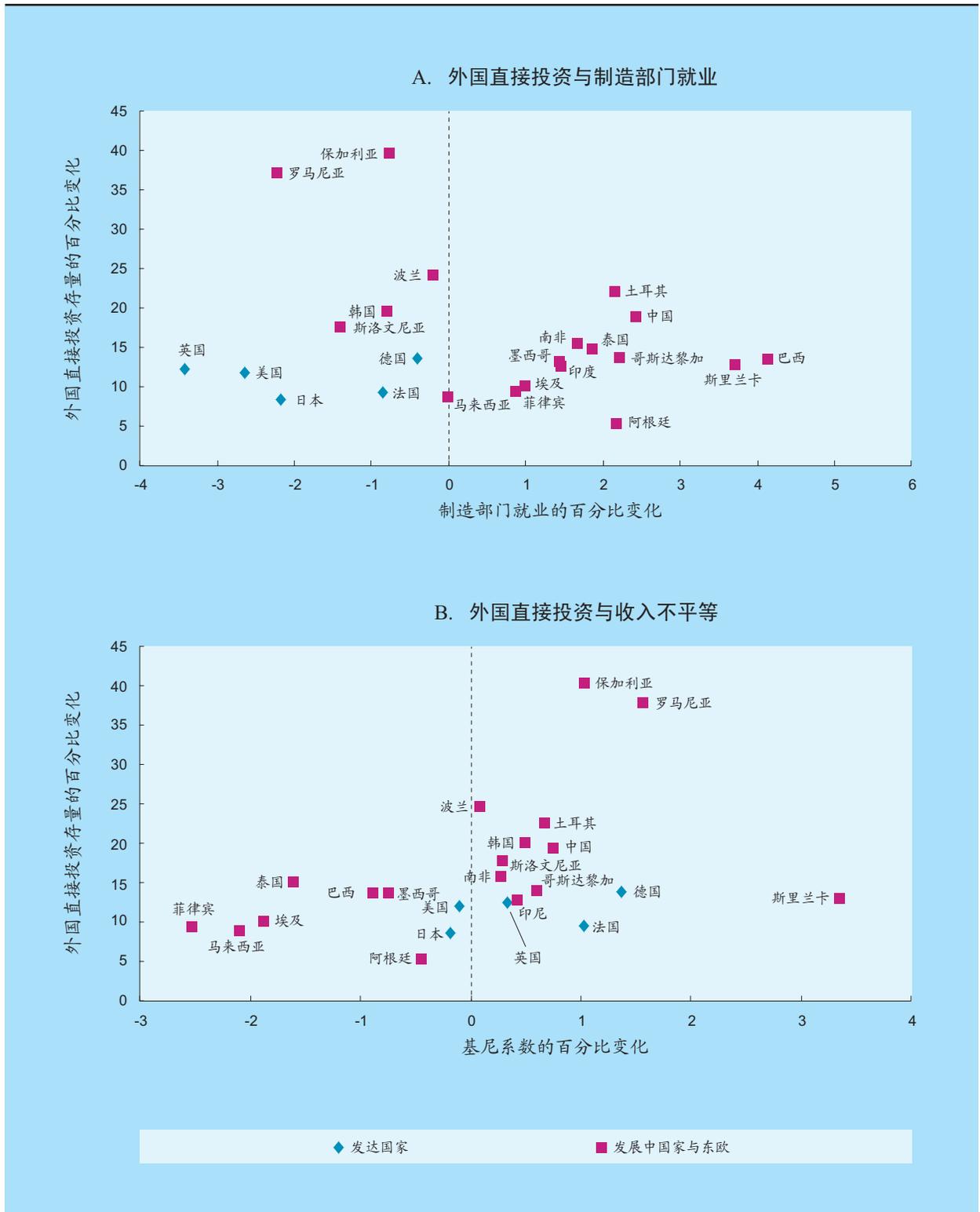
外国直接投资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动机和战略，而且取决于东道国的初始条件和政策。在最近几年中，增长最迅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成功地将发展举措与这些国际生产网络连接。例如，1990年代初，中国开始在区域网络的背景下，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外国企业是该国旨在加速工业化、创造就业和支持技术升级的政策内容之一。一个特别的监管体系和各种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已成功地将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到制造部门，这补充了现有产能，提高了生产率并支持了地方产能的升级，不过，该国的出口一直具有较高的进口含量，技术密集型部件和组件的进口含量尤其如此(2006年《贸发报告》：第186-189页)。

其他很多国家则不具备足够的国内条件，尤其是良好的贸易基础设施、技能较高的大量劳动力和适当的行政管理能力，来发挥跨国公司杠杆作用，并以此获取技术转让和允许工薪阶层参与生产率的增长。参与这些网络所带来的制成品出口增长之所以一直没有与之匹配的增加值和就业增长，其原因正在于此。

有关1995-2010年期间的现有证据显示，在最大的发达国家中，流出外国直接投资一般会使制造部门的就业下降(图4.5一)¹⁴。而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则一直

图 4.5

1995-2010年若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制造部门就业和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Lane和Milesi-Ferretti的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劳工组织，Laborsta与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数据库；经合组织、欧统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及拉美经委会数据库。

注：外国直接投资指：发达国家的流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流入。中国数据指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

伴随着制造部门的就业下降，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显示，这种流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随着制造部门的就业扩大。¹⁵ 但该证据也显示，

同样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可能会对制造部门的就业变化程度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种多样性有几个原因。首先，并不是所有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都用于能够扩大产能和就业的固定资本形成，而且并不会全部流向制造部门。第二，东道国制造部门相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现

有存量而言的规模具有一定的作用：如果该存量小而工业部门大，那么即使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很高，其对就业的影响也可能很小。最后，制造部门的就业机会还可能与那些与外国直接投资无关的诸多因素有关。

除了制造部门外，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收入分配之相关性的证据为混合证据(图4.5二)。就1995-2010年期间而言，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一般与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上升一致。但很多东道国，尤其是具有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也有过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经历。¹⁶ 至于为什么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和流入会对收入产生同样方向的影响，还难以理解。原因之一可能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被引向资本密集型活动(如：开采业)，所创造的就业很少。此外，当外国直接投资需要购置那些已经存在但可能会最终缩减其规模或关闭的现有生产场所时，就业效应甚至可能为负。另一重要原因可能是有关劳动力市场管制和工资制订的政策反应可能类似：本国可能会努力通过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来放慢海外生产的迁

址趋势，而东道国可能会认为，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发达国家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都与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

……两组国家很可能都与生产分工、相关劳动力市场解除管制和工资限制有关。

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只是经济政策的内容之一，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可能与其他伴随因素有关。例如(见第三章讨论)，在转型经济体中，全面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包括解除劳动力市场监管驱动了不平等水平的上升。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很小的与贸易有关的方面。但如上简述，有关贸易流量变化的证据也许说明，发达国家企业为应对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潜在竞争威胁而采取的战略发生了变化。这些企业为适应这种竞争而采取的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增加厂房和设备支出，以实现产出组合和生产技术的升级。二是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第一种机制需要依赖旨在提供生产率的创新投资，第二种机制除了外包外，还需要通过不对称的谈判权来限制工资、减少工资或将工资增长水平保持在生产率增长水平以下。有时，除了这些以外，还要努力通过金融投资来提高利润。¹⁷

1990年代初，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辩论通常会忽略这两种机制中的第一种。该机制涉及贸易所引起的技术进步，即：Wood(1994年)所认为的贸易与技术效应不能轻易分开。¹⁸ Thoenig和Verdier(2003年)正式确立了这一论点，他们预言，在更加自由化的行业，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应更加明显——有关这方面的证据源自那些侧重于欧洲、日本和美国汽车和服装行业的案例研究。¹⁹

但这些经验性结论可能对所研究的具体时期具有敏感性。有关美国的证据显示，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该国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发生了变化。1990年代，产出扩张是通过创新实现的，这种创新主要与微电子革命有关，它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升级。21世纪头十年，焦点转为减少给定产出水平的投入成本，以提高效率。

与1990-2000年期间美国特定部门有关的证据显示，生产率增长水平最高的四个部门(计算机与电子产品、批发贸易、零售贸易和不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制造业)全都经历过正的平均就业增长，共增加了近200万个新岗位(图4.6A)。相反，21世纪头十年，生产率增长水平最高的部门则经历了就业的大幅下降(图4.6B)。计算机与电子产品、信息和(不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制造业在总生产率增长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就业却下降了，流失了660万多个岗位，其中约有60%是在2008年大萧条开始前流失的²⁰。此外，在具有最高就业增长水平的部门中，大部分都是那些具有最低生产率增长水平的部门，主要是服务部门(图4.6B)。

生产率和就业的这些发展很可能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支配性公司治理方式有关。²¹这一概念意味着，评价公司业绩的依据是每股的资金价值，而不是其生产的货物和服务、聘用的人数或表现为公司创新投资的长期收入潜力。这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通常采取认股权，如果公司股票价值上涨，认股权的市场价格就会上涨。更重要的是，努力寻求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短期增长不利于创新投资，因为创新活动通常具有

不确定性，短期内会涉及沉没成本，其长期回报要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公司管理人员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相反，公司回购股票和提高股息会对股东价值产生直接影响。这意味着，有较大部分原本可以再次投资于创新的公司利润往往会通过股息形式或者注入股票市场回购股份的形式进行分配。这会耗减劳动力需求，更宽泛地说，各公司很可能会将生产转向海外，这种威胁会削弱工会和工人的谈判权。²²

经验证据显示，1997-2003年期间，由标准普尔公司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419家公司对

19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来源发生了变化，从创新投资转向降低投入成本，包括通过离岸外包降低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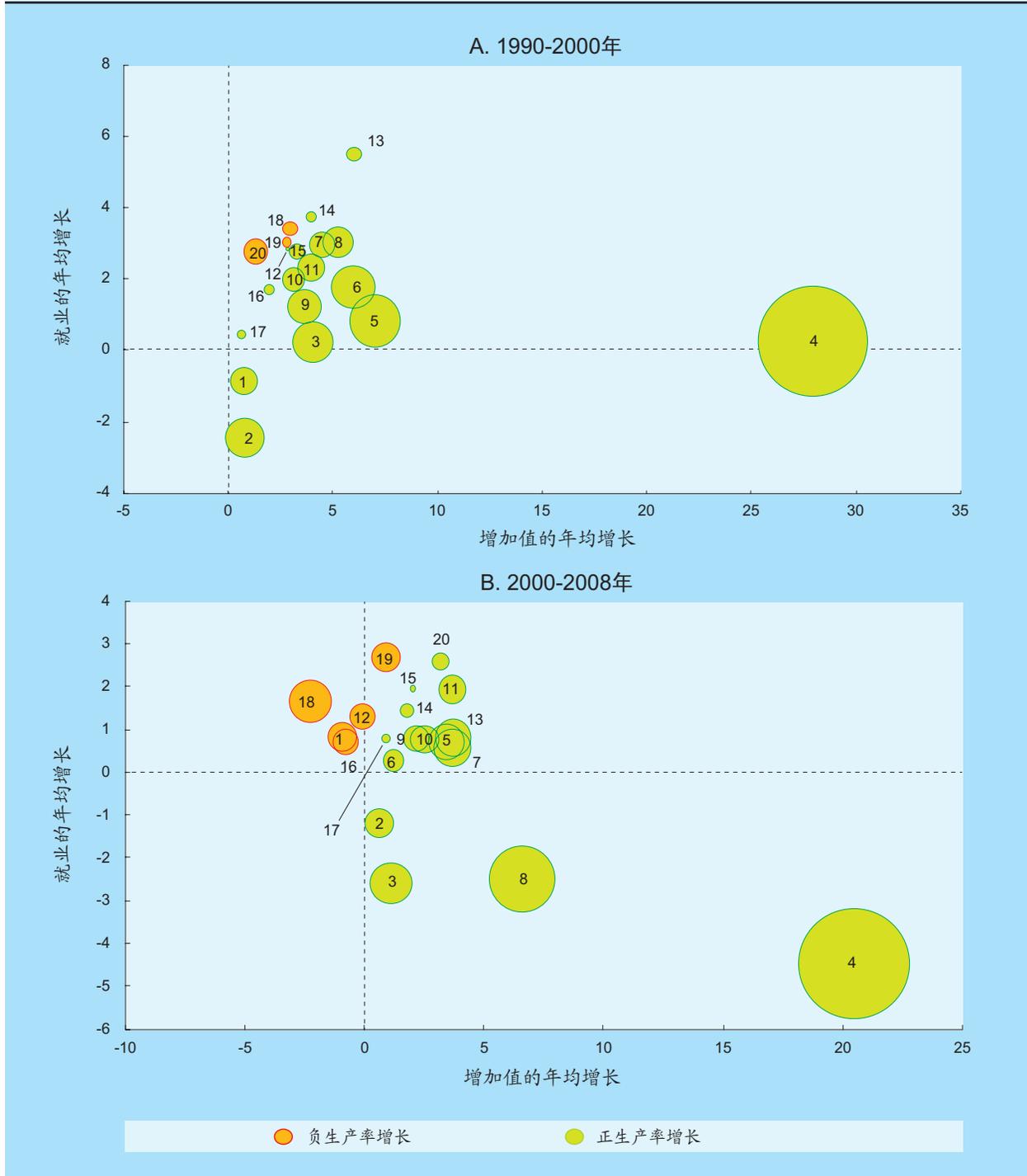
1997年至2010年上市的股票所进行的回购一直很稳定地在3亿-3.5亿美元之间震荡。在随后的四年中，这种回购值几乎是原来的四倍。其中一些增长与标的股票价值的增长有关。但标准普尔500指数本身在这四年期间大约只上升了80%，因此，在股票回购的四倍增长中，大部分

都反映了这种回购的实际增长。也许最重要的是，1997-2000年期间，这些公司的股票回购值与其净收入之比相当稳定保持在0.45左右的水平，之后才在2001年的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后急剧上升到0.6。在2003-2008年期间，该比率一直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0.8左右，并在2008年急升到1.0以上，之后于2009-2010年期间下降到0.35左右。所支付的股息也有类似演变：股息几乎翻了一番——从2003年的约3.2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近6亿美元，然后才在2009-2010年期间略有回落(Lazonick, 2012年)。²³

在过去两个年代中，制造活动的离岸外包一直是全球经济关系的一大发展。但趋势似乎在转变，至少美国是如此。随着迅速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内需不断增长，这些国家(包括跨

图 4.6

美国各部门的就业增长、增加值和生产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注：每个泡的大小反映了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情况。1：农业与采矿业；2：公用事业；3：制造业（不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4：计算机与电子产品；5：批发贸易；6：零售贸易；7：运输与仓储业；8：信息；9：金融与保险；10：房地产，以及租用与租赁；11：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12：公司与企业管理；13：行政与废物管理服务；14：艺术、娱乐与休息；15：膳宿服务；16：其他服务，政府除外；17：政府；18：建筑；19：教育服务；20：健康保健与社会援助。

国公司子公司)用于出口的产能将会减少。此外,中国近期工资的迅速增长(见上文讨论)和大幅货币升值已大大减少了其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外包给中国的活动不太可能被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生产那些用以在中国进行最终加工和销售的中间产品,他们可能会发现,相对于通过重组其生产流程来生产那些出口到美国的制成品而言,维持原有做法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最后,石油价格的强劲上涨大幅推高了物流和运输费用,而对供应链风险和管理成本的重新评估可能会使各公司重新考虑其在美国的产品制造。另一方面,因为这一原因而将生产返回(“回岸”)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可能会很难,因为本地供应商已不存在,而本地劳动力可能不再拥有必要的技能。

不过,在发达国家中,任何“回岸”生产做法都定然会给就业带来正面影响。²⁴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朗。根据媒体报告,所“回岸”的生产似乎主要位于工会化程度较低的辖区,在这些地区,可以很容易地对工作小时进行迅速调整,然后转向两级工资制,相对于那些已在“回岸”开始前就业的工人而言,新雇员薪酬仅为他们工资的一半。²⁵

(c) 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的分配性影响

全球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加大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性质。首先,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较早具备某种工业产能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受到了制成品进口的负面影响,包括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见图4.4)。第二,那些在更近一些时候迅速

开始工业化并已成为南南制成品贸易主要来源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也经历过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问题。“贸易—不平等”关系在性质上的其他变化则与金融一体化作为贸易补充的更大倾向性有关。金融一体化可能会对汇率产生很大影响,而这反过来又会对一国的贸易表现产生影响。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新旧辩论都忽略了这一点(另见C节)。

关于发展和转型经济体贸易类不平等问题的担心通常集中在源于生产结构转变的分配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这类影响很可能要大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以及同一部门内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方差距往往要大很多。

发达国家生产率和就业的近期演变可能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支配性公司治理模式有关。

除了贸易对就业岗位总数的影响外,贸易对不平等水平的影响还取决于劳动力是转向生产率更高的活动还是生产率更低的活动,或者是否从正规就

业转向了非正规就业或失业。对贸易自由化结果的评估显示,在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劳动已从生产率低下的岗位(通常为农村岗位)转向了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岗位,而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则相反(即:从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岗位转向了生产率较低的岗位),如,非正规服务和初级商品的生产(Sainz和Calcagno, 1992年; McMillan和Rodrik, 2011年)。与那些有关“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较早辩论不同,这些考虑通常指整个经济体,而不仅指制造部门。采取这种更宽泛的视角有助于把握那些会引起部门间要素移动和特定部门生产率转变的结构性变革。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有:外部冲击、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

在从更宽泛的这一视角对“贸易—不平等”关系进行考察后发现，贸易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压力在各国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具体取决于宏观经济冲击以及贸易一体化对结构转变进程的不同影响。贸易全球化对分配产生不同影响的一种解释是，在开始受到全球化势力的影响时，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禀赋，而且具有不同的工业化程度。根据这一推理，在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国家(其中很多都在南亚和东亚)，融入全球经济体最初会提高不平等水平，因为这往往会提高人们扩大生产和其他现代部门活动的动机。在这些经济体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时，如两个年代以前的中国，其收入的不平等往往会扩大。另一方面，当这些经济体已经有了技能良好的劳动力并且步入较先进的工业化阶段时，如1990年代的韩国，其收入分配差距往往会缩小，因为贸易全球化的激励作用，再加上通常情况下的扶持性政策，有助于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活动。

强调结构因素的另一推理认为，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禀赋且具有某种起始工业化程度的国家将很难在其放开全球竞争后保持一个有活力构变革进程。理由是，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他们还没有获得技术创新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有助于他们通过全球化的激励作用迈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活动。此外，与那些处于初始工业化阶段的低收入国家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或者不再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因而无法从发达国家企业外包给海外的劳动力密集型活动中受益。更有甚者，他们对全球贸易的开放往往会使其制造部门的就业和产出下降(即：去工业化进程)。的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中亚和西亚的很多国家，以及东南亚的

一些国家，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贸易很可能减少了人们扩大制造活动的积极性，并强化了初级商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制成品方面的传统专业化格局。

但，如果不考虑要素和技术禀赋以及现有的工业化水平，那么源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冲击，尤其是源自货币升值的冲击可能会严重拖累甚至中断一国融入全球经济所带来的结构转变进程。一国为融入全球经济而采取的管理方式将最终决定全球化的相关影响，这种管理方式不仅包括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而且还包括金融和汇率政策。²⁶ 一些国家不能保持有活力的结构转变进程，这种情况有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时，某些国家将难以提高其国内增加值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难以让劳动力持续转向生产率更高和更需要技术的制造活动(联合国贸发会，2011年：第40页)。扭转结构转变进程很可能对分配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制造部门下岗的劳动力往往会转向生产率低下的活动，而且通常会转向非正规服务或走向失业。

关于发展和转型经济体贸易类不平等问题的担心通常集中在源于生产结构转变的分配性影响。

如首先考察那些在工业化初级阶段遭遇贸易全球化势力的国家，则显然可以看出中国的结构转变是如何影响其国内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在过去两个年代中，中国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上升一直以区域性不平等水平的强劲上升为其特征(高收入集中在某些地区，而低收入则集中在其他地区)。收入增长迅速的一直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该国奉行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深度贸易一体化，这方面的好处包括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通往国际市场的快速物流。但也使相对于内陆

一些国家不能保持有活力的结构转变进程，这种情况有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时，某些国家将难以提高其国内增加值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难以让劳动力持续转向生产率更高和更需要技术的制造活动(联合国贸发会，2011年：第40页)。扭转结构转变进程很可能对分配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制造部门下岗的劳动力往往会转向生产率低下的活动，而且通常会转向非正规服务或走向失业。

省份而言的不平等水平上升，当然，与以前水平相比，内陆省份的收入也有了快速增长。²⁷ 此外，在那些集中了行政、金融和出口导向型制造活动的最大城市持续进行投资也助推了城乡不平等水平的上升(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Galbraith, 2012年)。²⁸ 根据一项估计数据，城乡差距以及各城市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占了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的三分之二以上(Zhu和Wan, 2012年：第98页)。²⁹

部门就业转移与行业间工资差异是结构转变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如果结构转变发生在那些经历了重大所有权变革(如：土地所有权改革以及国有企业(SOE)解散)的经济体，则会放大这些影响。例如，199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了土地所有权与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后，大多数省份的制造业都出现了就业下降情况。但这种下降却被过度抵消了：在那些率先参与了全球贸易并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沿海省份，制造业的就业急剧上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有利的汇率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些沿海省份，劳动密集型活动所支付的薪酬占了制造业活动的大部分，而且出于需要，这些薪酬都高于内陆省份，以吸引移徙工人，尤其是具有更好技能的工人。至于为什么这些出口导向型部门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其原因很可能是其中大多数活动都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进行，这些子公司结合采用了先进技术和很低的绝对工资，因而实现了更高的利润。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分配的这些具体影响也可用来

一国为融入全球经济而采取的管理方式将最终决定全球化的相关影响，这种管理方式不仅包括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而且还包括金融和汇率政策。

中国崛起对其余发展中世界的经济进步和公平构成了威胁，这一共同观点似乎有些夸大其词。

解释中国部门间工资格局越来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现象(Kwon、Chang和Fleisher, 2011年)。³⁰

除了国有企业重要性的下降外，私人部门内工资差距的拉大很可能是引起中国总体工资不平等水平上升的一大因素。但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地理位置很集中，而且该部门的薪酬也很高，这也是促使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Chen、Lu和Wan, 2010年；Galbraith, 2012年)。³¹

中国对全球贸易开放以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固定汇率制度作为其支撑。这有助于推进一个有活力的结构转变进程，同时扩大高生产率活动领域的就业。但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贸易自由化似乎已使劳动力转向了生产率较低的活动，包括转向非正规活动和陷入失业(McMillan和Rodrik, 2011年)。这样，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工业化水平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很多的拉美。从低薪酬经济体进口制成品所带来的竞争是否是造成这种格局的根源？

最近一项研究探讨了中国向全球贸易开放是如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和出口构成产生影响的，该研究得出了三大结论(Wood和Mayer, 2011年)。中国对那些开放了贸易而且其产品与中国产品类似的其他东亚经济体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第二，“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取决于因地区而异的其他因素。例如，1980年代拉美进口制成

品的上升与该地区本身的贸易自由化有关，当时中国向该地区的出口非常少。之后，中国出口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已有一部分被区域一体化计划和旨在改善拉美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产业政策所抵消。第三，总的来说，“中国崛起对其余发展中世界的经济进步和公平构成了威胁，这一共同观点似乎有些夸大其词” (Wood 和 Mayer, 2011年：第346页)。³²

还应强调的是，拉美贸易自由化对结构转变的多数影响都是因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时间太早或者管理不当。在很多情况下，这与货币升值有关，而货币升值则是因为激增的资本流入没有转化为较高水平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扶持性产业政策的削弱或逐渐退出以及国家从经济领域的全面撤退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贸发报告》，第二部分，第六章)。中国有利的货币制度和拉美频繁高估的货币已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出构成和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结构转变所引起的另一问题与贸易条件发展对分配的影响有关。这很可能取决于因国家和时间而异的情况。一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即：其出口相对于进口而言的价格)是一个关键的国别因素，会使贸易全球化对分配的影响发生变化。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既要考察低薪酬经济体制成品出口的迅速扩张情况，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络的扩张情况，又要考察后者对初级商品需求的强劲增长情况。理由是，自21世纪头十年以

来商品价格回升的规模、广度和持续时间都很可观，这提高了出口收入，改善了资源富裕国家的贸易条件，而其中很多国家都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贸易条件改善以及促使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初级活动的相关动机不一定有损收入分配……

有理由认为，有利于资源丰富部门的贸易条件效应会带来负面的分配结果。一个原因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分配通常不如其他资产那么均衡。另一原因是，与制造行业和服务不同，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活动不会产生很多就业(2010年《贸发报告》，第四章)。当贸易条件效应降低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时，这可能会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从而有可能将制造业的工人推向较低薪酬的工作，甚至推向非正规领域或陷入失业。如果在经济体内的其他领域创造了优质岗位，则可避免不平等水平上升问题。这取决于初级部门中出口导向型活动与现代(公共和私人)服务/制造业之间所能确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只源于市场势力的情况很少，通常需要有支持性的宏观经济和工资政策，以及有针对性的财政和产业政策，以确保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活动所产生的大多数收入都在国内使用。尤其是，如果贸易条件的改善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则可增加公共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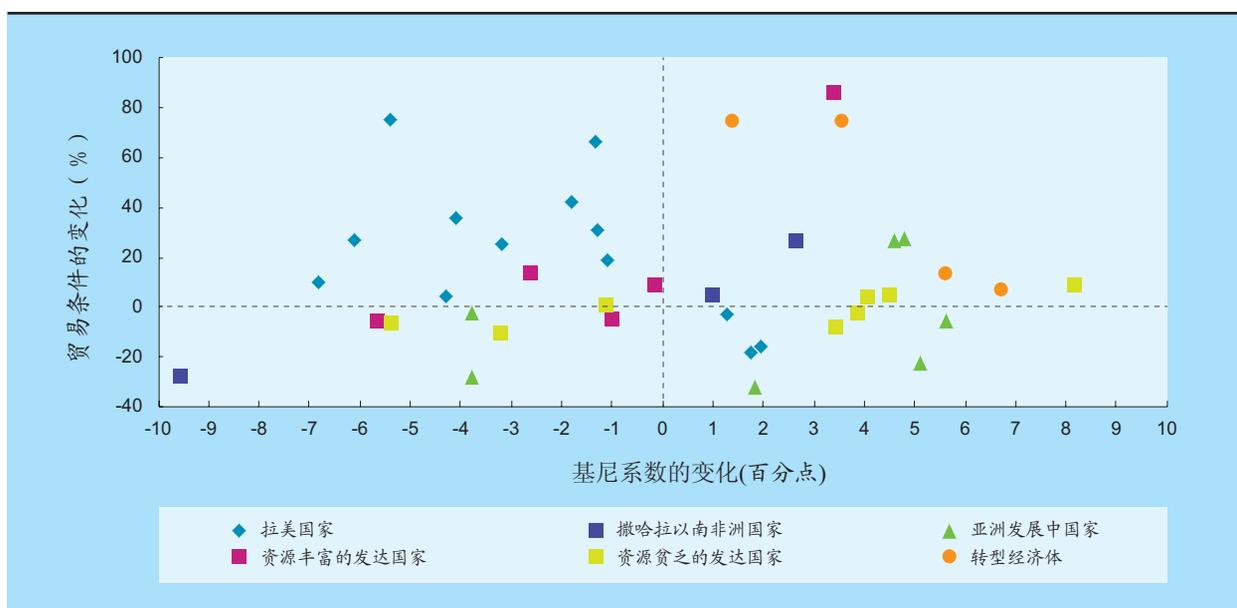
出，以便在公共和服务部门直接创造就业，在与基础设施开发有关的领域间接创造就业，并在宏观经济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在制造领域创造就业。³³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积累和国内产能建设的步伐，还需要有扶持性的政府政策，包括防止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冲击。

自2000年以来，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成功地在改善其贸易条件的同时，改善了其收入分配。但在资源丰富的其他大多经济体中，情况一般都不是这样(图4.7)。难以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结论，因为数据

图 4.7

2000-2010年若干国家的贸易条件与收入不平等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就有些国家而言，时间段截至有数据可用的年份。阿塞拜疆的期间从2001年开始。拉美：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纳、毛里求斯、南非。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土耳其。资源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挪威、美国。资源贫乏的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转型经济体：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

覆盖面不全，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来说，尤其如此。不过，现有证据显示，图中那些有过贸易条件改善经历的所有拉美国家也经历过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下降，而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乌干达)，收入不平等水平则上升了。相反，尽管在贸易条件略有恶化的毛里求斯，收入差距缩小了，但图中只有两个改善了其贸易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加纳和南非)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图中所有转型经济体尽管有了贸易条件的改善，但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却上升了，而有关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则为混合证据。

出口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通常会带来积极的财政效应，因为来自商品

出口收入的直接和间接税收通常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过去一个年代中，从贸易条件改善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组(非洲、拉美、西亚和转型经济体)也是那些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面临低增长和低投资率问题的国家。商品价格的上升使这些国家大大提高了其财政收入(见第五章C节)，并使他们能够增加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公共支出，甚至可以同时减少其财政赤字；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财政甚至有了盈余。

增加公共投资通常是让私人投资效仿或者平行增加其投资所必要的，这种增加使拉美在2003年至2011年的总固定投资率平均上升了，上升幅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个百分点(即：从国内生产总值的16.8%上升到22.9%)(拉加经委

会，2011年)。1999-2000年度至2009-2010年度期间，非洲、西亚(不包括土耳其)和转型经济体的固定资本形成毛额(GFCF)业增加了，增加幅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6%。2010年，尽管这些投资率远远低于东亚(国内生产总值的42%)、南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8%)和东南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7%)，但却是1980年代初或中期以来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此外，这些上升的投资率还以那些改善了就业前景的宏观经济、贸易和产业政策作为其补充，这些政策包括鼓励那些往往占有较高制成品份额的区域贸易，以及采用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新立法(见第六章的讨论)。³⁴

改善的财政收入还有助于更好地供应公共品，扩大公共再分配政策的范围，包括推出现

金转移方案，在有些国家(如，巴西)中，这类方案覆盖了数百万个住户，第五章对此进行了更详尽讨论。

总之，拉美的最新经验显示，贸易条件改善以及促使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初级活动的相关动机不一定有损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积累和国内产能建设的步伐。通过建立出口导向型初级部门与其余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公共支出和一般政府政策能为创造就业和工资机会提供支持。但除非可以防止外部冲击，如过去一个年代中，巴西货币雷亚尔的实际升值，否则，将无法落实合理的再分配政策以及旨在促进经济体(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潜力的政策。

C.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

前节认为，Kuznets的基本观点很可能依然有效，这个观点就是经济结构的构成是有损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自1980年以来，全球化进程已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经济体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使我们难以在有关各国不平等水平的数据中发现“倒U”曲线。这种困难可能部分源于方法问题，³⁵当然还源于非劳动力收入(Kuznets仅提到薪酬的不平等)和后工业经济部门(如，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重要程度的提高。这是因为，相对于较缓慢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言(即：Kuznets所强调的各部门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相对份额变化)，资产价格

以及与此有关的巨大资本损益有时可能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更大影响。

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和转型经济体更大程度的金融一体化很可能对那些铸就了结构转变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甚至更大的影响，并对分配产生了附带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本节将简单介绍这些经济体通过金融一体化所获得的好处，然后，将集中介绍不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给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并根据高生产率活动，尤其是商品部门所创造的就业和工资机会简单介绍分配所受到的附带性负面影响。

最近几年，国际金融一体化一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金融一体化³⁶可带来收入和分配方面的重要好处，如，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可创造就业和工资机会，并帮助扩大技术转让(见前节讨论)。在为资本货物进口提供融资，以创造新产能时，金融一体化还可带来其他好处。从理论上讲，如果通过提供外部融资通道，提升一国奉行逆周期政策的能力，并由此消除或避免衰退和岗位流失问题，那么还可在面临暂时冲击的情况下，减少宏观经济的调整压力，当冲击源于国内，而一国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很小时，会有这种情况。

但，通常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宏观经济和分配效应往往会超过这些潜在好处，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尤其如此。国际金融一体化所引起的跨境私人资本流动增加会带来四大负面效应：(一) 因其波动性和顺周期性，这类流动会引起或夸大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二) 它们对宏观经济基本面变化所做出的反应通常反复无常；(三) 它们往往会扰乱国内金融体系；(四) 它们往往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³⁷ 这些效应使这种跨境资本流动的利得基本上(如不是全部的话)都被金融资产的业主所挪用了，而损失则主要由实体经济部门中那些从生产性活动中赚取工资或利润的一方所承担。

至于这些渠道中的第一个，显然，进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资金流一般呈波浪形(即：同时经过这些国家)，而且以主要发达国家中宏观经济条件所产生的推动因素作为其驱动力。这些推动因素包括转型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不断加大的利率差，以及更大的全

球“风险偏好”(Ghosh等人，2012年)。³⁸ 经验证据显示，转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私人资本流动明显要比那些转向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动更具波动性(Broner和Rigobon，2006年)，而且资本流入的激增是预测其突然终止和逆转的良好指标(Agosin和Huaita，2012年)。此外，由于资本流动的行为往往是顺周期的，因此，不会消除外部冲击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相反，它们往往加剧这些冲击，乃至本身成为一种外部冲击。因此，金融一体化往往以资金流的繁荣—萧条周期为特点。繁荣时期的收益

大多是有限的，因为资本流量的猛增一般并不带来更多的固定投资，或更多的资本货物进口及技术转让，而有了这些才有助于加强增长、结构改革和创造就业的持续进程。相反它们会给汇率施加上行压力，这会降低国内生产者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在萧条时期，资本的迅速退出会引起金融动荡和经济紧缩问题，并对就业产生附带性的负面影响。这样，金融一体化对分配的净影响很可能为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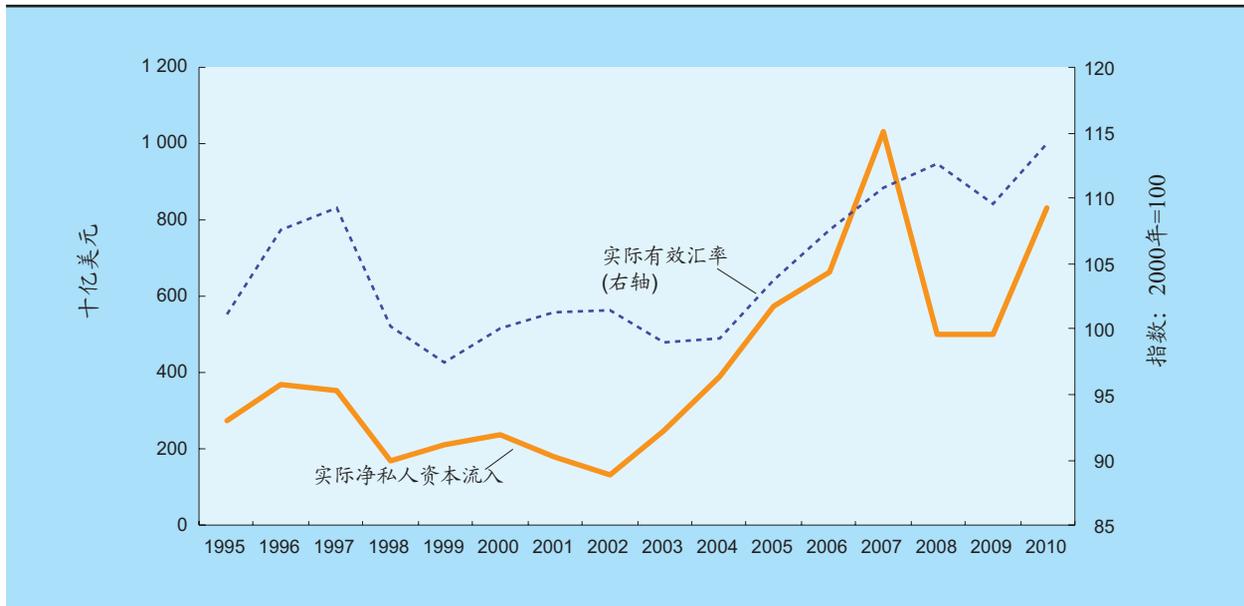
第二，资本流入通常来势凶猛，这说明它们往往会受从众行为的影响。这会使它们超出甚至违背那些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项目，如：经常账户差额或通胀差异。³⁹ 这意味着，资本流入可能会击跨这些国家的监管和政策框架，如：审慎的监管或外汇市场干预措施。因此，资金流入会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实际汇率的急剧上升。结果，私人部门将不太愿意投资，而可贸易品部门的投资则减少了利润。同样，这将不利于创造就业和工资机会。

私人资本流入的演变与接收国的实际汇率变动密切相关(图4.8)。但这种关联度在各国之间有差异，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更细分证据揭

金融一体化对那些铸就了结构转变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影响，并对分配产生了附带影响。

图 4.8

1995-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实际私人资本流入净额与实际有效汇率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资料——“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量”, 2011年9月。

注: 名义净私人资本流量按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2008年=100)进行缩减。国际金融研究所将以下国家定义为“新兴经济体”: 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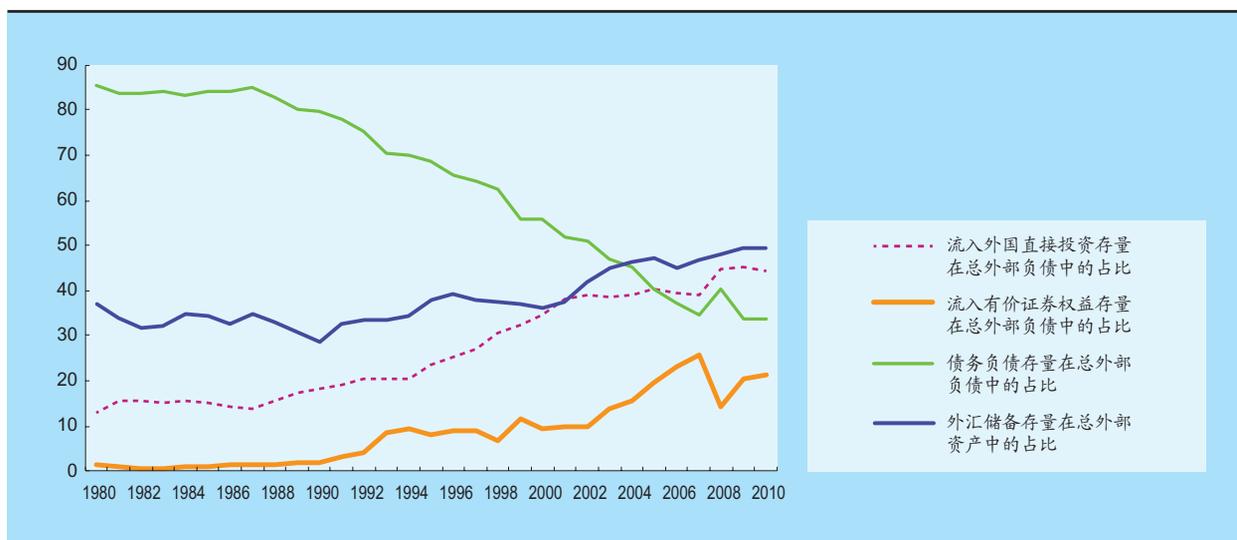
示了这一点。证据还显示, 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 尤其是拉美和东欧经济体有了相当可观的资本流入, 但私人投资却没有怎么增长。甚至在那些有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中(如, 巴西、印度、南非和土耳其), 也一直是这种情况, 为了抵消较高的通胀和转向均衡的经常账户, 这些国家的货币原本会贬值的(2008年和2011年《贸发报告》)。相反, 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智利成功地在一段持续的期间内, 采用了旨在防止实际汇率上升的系统化干预措施和资本控制措施, 因此, 私人投资得到迅速增长, 制造部门的就业和工资机会也迅速增加(2003年《贸发报告》; 另见Akyüz, 2011年)。如前节所述, 这说明, 与金融一体化及其管理有关的政府政策差异可部分解释高生产率部门与低生产率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差异。

第三, 金融一体化通常会使得银行提供给私人非银行部门的信贷过快上涨, 对于那些按照低于国内信贷的利率借入外币的企业、住户和银行来说, 其资产负债表还会逐渐出现货币和期限错配问题。一旦资金流入干枯或逆转, 东道国的货币就会急剧贬值, 而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错配问题往往会加大偿债难度和增加违约情况(2008年《贸发报告》第六章)。

但在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后, 新兴经济体开始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 以此作为防止资本流入突然终止和逆转的一种自我保险形式。外汇储备在总外国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从2000年的36%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近50%(图4.9)。此外,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部负债不再以外币计值的债务为主导, 因为已转向了外国直接投资

图 4.9

1980-2010年新兴经济体外部资产与负债的构成
(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Lan和Milesi-Ferretti的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

注：所列数据是经过加权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数。图中涵盖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韩国、俄罗斯联邦、中国台湾省、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 有价证券权益。的确，在总外部负债中，外币计值的债务从1980年的近90%下降到2010年略高于30%的水平。这是由经济危机发生前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所促成的——有利的环境有助于这些经济体更普遍地改善其债务状况，因此，更加有能力发行以本币计值的债务。一位观察员指出，发行本币债务的这种转变“是因为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多地需要具有较高收益的本币资产” (Leijonhufvud, 2007年: 18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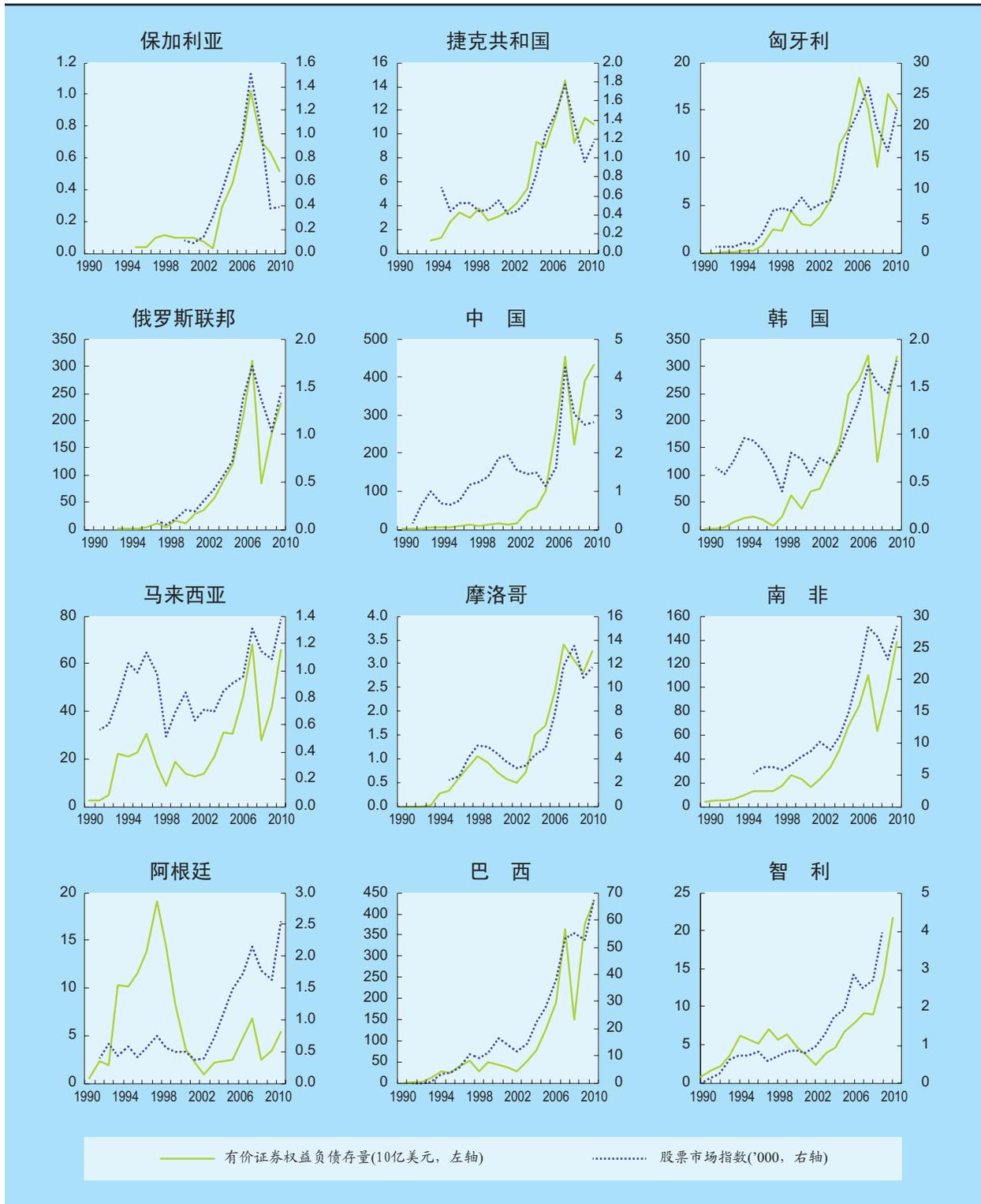
外国金融投资者对本币资产的这种日益青睐表现为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价证券权益增加了：2000年至2007年期间，有价证券权益持有额在总外国负债中的占比几乎是原来的三倍，达到了26%左右——不过随着当前危机的开始，该占比急剧下降了。这种增加还很可能

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来加强其证券市场的举措有关。

有价证券权益流入的相对重要性增加可表明金融活动相对于实体经济活动(即投资与消费)而言的重要性增加。的确，可能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的第四个负面宏观经济与分配效应是，资本激增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或房地产泡沫。经验证据显示，在新兴市场(尤其是东欧新兴市场)以及部分非洲、亚洲和拉美，证券市场指数变动如今已与有价证券流入密切相关(图4.10)。这种密切相关性表明了资本流向逆转的潜在风险，这种逆转很容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甚至信贷紧缩，并带来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和附带的负面分配效应。

图 4.10

1990-2010年若干新兴经济体有价证券权益负债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Lane与Milesi-Ferretti的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彭博(Bloomberg)数据库。

注：采用了以下股票市场指数：保加利亚：SOFIX；捷克共和国：PX；匈牙利：BUX；俄罗斯联邦：INDEXCF；中国：上证指数(SHCOMP)；韩国：KOSPI；马来西亚：FBMKLCI；摩洛哥：MOSENEW；南非：JALSH；阿根廷：MERVAL；巴西：IBOV；智利：IPSA。

2008年，继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后，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出现逆转，这给他们的货币带来了下行压力，股票市场也一落千丈(图4.8-4.10)。大多数国家都能消除与此有关的大多数负面宏观经济和分配效应，这是因为昔日繁荣年份大大改善的财政状况和所实现的价格稳定使他们能够采取逆周期政策。但自2009年以来，资本流入已有了引人注目的快速恢复。

在国际金融机构各建议的鼓励下，很多希望促进其发展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为迅速融入国家金融体系做出了努力，其中一些国家行动得有些过早。与过去三十年中各《贸发报告》所分析的较早阶段一样。⁴⁰ (尤其见1998年《贸发报告》第三章；1999年《贸发报告》第三章和2003年《贸发报告》第二章)，过去五年中的繁荣—萧条周期显示，已

进行深度金融一体化的国家极易受到潜在全球经济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如，欧元区危机的恶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尤其易受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具有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下降)，因而通过资本流入为其赤字提供资金，但这种资本流入不是转化为新产能而是用以刺激现有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需求的国家。⁴¹ 这意味着，经常账户赤字的对应方是流动的有价证券流量或者进入房地产的一次性外国投资流量，两者都受到那些对风险失去偏好的投资者的影响，两者都不会对生产部门的抵御能力有好处。这种资金流入的枯竭会破坏增长和收入分配，而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此种破坏可能要比2008年更严重。正如第一章所述，这是因为流入资本的逆转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而在规避重新抬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和衰退问题方面，可采用的逆周期财政措施余地也小得多。

D. 结 论

本章分析显示，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影响收入分配的程度取决于贸易与金融一体化是如何管理的。影响经济一体化性质和速度的政策会影响结构转变进程以及高生产率活动中与此有关的就业和工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可将经济体分为五大类(见下文)。

- 第一组由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组成，这些国家经历过就业和工资结构的两极化问

题，这种两极化使中等技能工人相对于最高技能工人和最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下降了。这些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经济体进口的制成品有了大幅上升。在当时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的这种迅速增加很可能与离岸外包有关，这种活动与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分工密切相关。但贸易—不平等关系的这些新特征似乎也与

发达国家企业为了适应日益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而做出改变的战略密切相关。1990年代期间，这些企业通过创新投资实现了生产率增长和产出扩大。相反，在21世纪00年代，他们则更多地通过限制工资和减少就业岗位的措施，以及旨在通过金融投资提高其利润的措施，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后一战略的实施得益于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和劳动力市场的更大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加强了营利者相对于工薪阶层而言的权力。

- 第二组由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组成，包括亚洲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该组的决定性特征是在高生产率活动尤其是制造业创造了很多就业和工资机会。这些与旨在支持生产性投资和汇率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其中的汇率管理政策保持了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推进使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有了迅速增长。但其经济从低生产率活动向高生产率活动的结构转变也加大了收入差距和区域性不平等问题。如果更全面地将那些目前就业于劣势领域和活动的工人吸引到高生产率活动中，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或许能够在逐渐缩小其收入差距的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平均收入。如果从强调制造的出口导向型生产转向更注重国内市场的生产可增加服务活动领域的就业和工资机会，则很可能导致稍微逊色一些的良好分配成果。这种成果可能会放慢过去几年中所观察到的工资增长速度，并使平等水平上升，不过平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是正如本报告第六章所述，如果收入政策能将所有经济部门的工

资调整与平均生产率增长挂钩，则可避免这一问题。

- 第三组由那些已达到某种工业化水平但却不能保持工业深化动力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一直伴随着去工业化进程。其中包括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部分亚洲的资源丰富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期间，尤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贸易和汇率政策无疑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人均收入平均水平的普遍下降。但商品价格的大幅上升以及这些国家由此大幅改善的贸易为他们旨在改善宏观经济政策姿态和财政帐目的努力提供了便利。其中一些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已通过其他经济领域创造的优质岗位，成功地规避了去工业化对分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情况下，扶持性宏观经济和工资政策，以及旨在确保商品部门大多数收入都用于国内的有针对性财政和工业政策，将尤其重要。

但，其中一些国家在持续转向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时，可能会面临着巨大挑战。原因是，良性分配成果至少有一部分是靠商品价格飙升所带来的较高财政收入取得的。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设想这种有利的出口收入态势会持续更长时间。尽管净粮食出口国有可能继续从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获益，但全球经济的长期放慢可能会减少能源商品和贱金属出口商的良好成果，其中很多出口商都在非洲、中亚和西亚，这些地区的近期分配变化已经不如很多拉美国家那么有利。

- 第四组由东南亚和部分非洲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通过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工业化。但其大多数活动都集中在简单劳动密集的活动，而且一直不能激发或保持工业深化动力。在过去两个年代中，这些国家的增长迅速，而分配成果却很少变化(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或者已恶化(印尼)，其原因类似于上述第二组国家。在今后几年，这些国家的就业和工资机会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因为全球总需求很可能会持续下降，从制造部门下岗的工人将会转向低生产率活动领域，甚至转向非正规服务或陷入失业。如果制造业出口收入的下降使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恶化，而由此产生的赤字要通过增加国际有价证券流入获得资金，那么这种分配效应可能会因为金融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恶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过各项旨在促进国内大众收入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内需—增长—就业动力。可通过周密设计的收入政策实现这一

目的，并通过旨在改善国内融资条件的措施鼓励人们增加固定投资。

- 最后一组国家主要在中欧、东欧和中亚，这些国家完全信奉自由主义政策议程，其结构转变进程和相关分配效应受到了金融一体化以及企业所有权结构变革的强烈影响。分配成果在这些国家的进一步演变将取决于他们如何管理金融一体化，以及他们再次确定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取向是否会扭转不平等水平上升的趋势。

至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对分配的影响，本章将重点考察结构转变进程以及就业和工资机会的相关转变。但强调结构性因素并不意味着该因素对收入分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各项政策是决定分配成果的关键因素。不过，为设计出能够尽可能实现理想分配成果的各项政策，重要的是要理解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势力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以及何种政策可以使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对分配的影响最大化。



注 释

- 1 Aghion、Caroli和Garcia-Penalosa(1999年)指出,英国和美国的工资不平等水平急剧上升,但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瑞典等国家中只有小幅上升,而芬兰和法国保持了稳定,德国和意大利有了下降。
- 2 另一理由是,一些经济学家(如, Krugman, 1995年)认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制成品的增加量不足以导致质的差别。但,正如Feenstra与Hanson所建议的那样(2003年),鉴于20世纪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变,正确的比较指标不是制成品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而是附加值在制造业中的占比。按照这一尺度,1913年与1990年之间,“很多先进国家相对于商品生产而言的商品贸易的确大幅增长了”(Feenstra与Hanson, 2003年:第149页)。
- 3 这种预测以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法则”为基础,该法则是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其最简单的形式假设没有摩擦的自由贸易将使不同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同,前提是,具有相同的线性齐次技术,而且其要素禀赋的类似程度足以处在同一多维锥体中。
- 4 例如,见Berman、Bound和Griliches, 1994年; Berman、Bound和Machin, 1998年; 以及Aghion、Caroli和Garcia-Penalosa, 1999年。其他观察员则侧重于美国,他们认为,工资溢价的上升与1970年代后技能劳动力供应增长率的下降有关(Card和Lemieux, 2001年; Goldin和Katz, 2008年; Rajan, 2010年)。仍有其他人认为,1960年代末婴儿潮一代所导致的技术娴熟工人供应的急剧增长。使得发展技能偏态型技术(例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更为有利可图(Acemogln,1998年)。
- 5 Feenstra和Hanson(1999年)还指出,在更多使用高技术设备的情况下,这两个尺度之间的贡献比对于用以测算这种使用的方式具有敏感性。如果将高技术设备计算为所用总资本设备在每个行业中的占比,则贸易和技术能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起到同样好的解释性作用,而如果将高技术设备计算为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设备新投资的一部分,则贸易只具有微不足道的重要性。
- 6 Van Reenen(2011年)表示,英国也有类似的证据。
- 7 Goos、Manning和Salomons(2011年)按照这些国家在1979年的平均工资对职业进行了排列,以考察每类职业的总就业比例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类似证据。
- 8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
- 9 2008年1月1日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要求雇主签发书面合同,这类合同将试用期期限限定为两年,向那些至少工作了10年的企业工人提供永久身份,对解聘工人的做法进行限制,并增加解聘费。新立法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允许工会成为工人的真正代表;改善争端解决制度。在该法律生效后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显示,该法律有效地改善了工作条件(李, 2011年)。
- 10 根据Banister和Cook(2011年)的资料,没有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与劳工报酬的全国性官方统计数据。更准确地说,人类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有关城市正规企业的数据与农业部有关其他制造单位(即:乡镇企业)的数据是合并在一起的。该证据显示,尽管制造业的工人收入要比以前高,但2008年,每小时的平均报酬只有1.36美元。尽管难以进行跨国比较,但在2010年,该水平远远低于中国的东亚近邻,如日本(32美元)、韩国(16.6美元)和中国台湾省(8.36美元)。中国按小时计算的报酬成本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水平大致持平,如,菲律宾为1.90美元,但明显落后于那些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12.7美元)、巴西(10.1美元)和墨西哥(6.2美元)(美国劳

- 工统计局, 2011年)。类似的定性估计数据, 见 Ceglowski和Golub, 2011年。
- 11 尽管大量流入了外国直接投资, 但该投资在中国资本形成毛额中的占比却实际上下降了。
 - 12 尽管可以先验地认为电子器件属于技能密集型制成品, 但众所周知, 将电子器件作为发展中国家技能密集型出口一部分的报告数据大多属于一种统计幻象。其原因是, 除了低技能的劳动力外, 这些出口很少含有出口国家自身的技术和生产要素。证据显示, 有些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 已在过去一个年代左右, 成功地提高了其电器器件出口的中国内附加值, 而“墨西哥和中美的大多数出口商依然处于装配阶段”(Hanson, 2012年: 第47页)。不过, 其他证据显示, 中国出口品占据了美国某些产品类别的空缺低价市场, 当然, 不一定是劣质产品(Schott, 2008年)。
 - 13 由于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会给东道国带来债务责任而且不会有投机性心理, 所以更加强了这种投资作为促发展手段的吸引力。但利润汇款在一段时间的累积实际上可能最终会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
 - 14 一些侧重于较早期间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果。美国有关制造企业的一项研究对1982-2004年进行了考察, 结果发现跨国公司的国内活动水平和国外活动水平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Desai、Foley和Hines, 2009年)。但这一结果可能对合项所在的层级和被考察的期间具有敏感性。的确, 在更低合项层对美国和中国特定部门所进行的一种重点分析显示, 这两个因跨国活动而紧密关联的国家之间具有显著的劳动力替代关系(Ebenstein等人, 2012年)。此外, 正如正文所述, 证据显示, 美国企业最近转向了一种伴随着海外就业增加和本国就业减少的商业模式。
 - 15 有关美国和中国的证据显示, 甚至部门一级也可能存在着这种劳动力替代。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中国就业增长最多的产业部门一直是美国就业下降的部门(Ebenstein等人, 2012年)。但本证据所采用的样本期间止于2005年, 因此, 没有涵盖最近几年, 而在这几年中, 中国的工资有了强劲增长, 而人民币升值则进一步提高了按美元测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因此, 不清楚该研究的观察结果是否依然有效, 退一步说, 甚至不明确是否可以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
 - 16 例如, 经合组织(2011年: 第113页)发现了“(极具)统计显著性的强”效应, 这说明“放松外国直接投资监管(以吸引更多外部投资)与工资不平等水平上升之间具有相关性”。基金组织(2007年a)也发现, 发展中国家的流入外国直接投资和发达国家的流出外国直接投资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并将这一情况归因于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技能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
 - 17 Milberg和Winkler(2010年: 第276页)指出, “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在公司战略演变中具有双重作用。生产全球化所减少的成本为非金融公司部门的金融化提供了支持, 因为它可提高利润, 减少这些利润用于国内再投资的必要性, 然后将收入用以购买金融资产, 以此提高股东回报”。这些作者还对各研究进行了评述, 指出, 在若干发达国家中, 股东价值最大化与创新之间为逆相关。
 - 18 在全球生产分工中, 贸易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可能尤其密切, 因为“如果没有低廉的信息技术, 离岸外包活动将无法想象, 如果不是为了将全球供应链有效的延伸到低薪酬国家, 信息技术也不会这么低廉”(Milberg与Winkler, 2009年: 第3页)。
 - 19 Draca和van Reenen(2011年)集中研究了欧洲国家的企业和来自中国的进口, 结果发现, 那些因进口中国产品(如, 家具、纺织品、服装和玩具)而面临更激烈竞争的欧洲行业与技术变革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证据显示, 在2000-2007年期间, 与中国之间所增加的贸易约占欧洲技术升级效应的15%。其中有一半效应实际上与研发支出增加所引起的更快技术变革有关, 这表现为专利数量的增加, 而另一半效应则与行业规模缩减有关。
 - 20 如果列入2000-2010年期间的数据, 那么除了建筑业就业显示为负增长外, 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类似证据, 见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2011年)。
 - 21 这一概念的基本原理来自代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 如果代理人(即: 公司经理人员)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 那么委托人(即: 股东)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出现紧张。公司接管是约束经理人员的一种方式, 而公司股票的回报率则可作为测算公司业绩的一种指标(Jensen和Meckling, 1976年)。

- 22 Milberg与Winkler(2009年)对各研究进行了评述, 这些研究显示, 离岸外包活动对于劳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具有某种作用。
- 23 至于那种专注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行为对旨在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见2007年Mintzberg的生动描述, 特别是第9-10页的描述。
- 24 将制造活动从中国转回美国, 还有助于平稳舒缓失衡问题。
- 25 Ed Crooks, “把工作岗位转回本国将使通用电气公司承担10亿美元的风险”, 《金融时报》, 2012年4月3日; Sylvain Cypel, “南卡罗来纳州变成汽车生产中心”, 《世界报》, 2012年5月8日。
- 26 尤其是, 旨在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的政策可阻止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27 中国的分配走势大大不同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早期所奉行的“公平增长”模式。正如2003年《贸发报告》(第五章)所述, 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迅速工业化和制成品出口的增长以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为其基础。因此, 这些经济体的制造商可在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同时, 实现工资的迅速增长。1975-2000年, 韩国在其迅速追赶经济期间的工资增长有着广泛的基础, 这反映该期间工资不平等水平(即, 有技能工人相对于无技能工人而言的工资收入)的持续下降(Kwack, 2012年)。
- 28 住户登记制度或户口制度一直是城乡之间不平等性发生演变的一大因素。尽管妨碍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这种法律障碍有助于防止大规模贫民窟的问题, 但也意味着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城市工人。塞尔登与吴(2011年)指出, 在1980年代初以前, 这种户口制度将村民束缚在其所在地。但更近一些时候, 该国已将劳动力引向制造活动和城市地区, 但保持了高度差异化的工资和薪酬结构, 这使企业和国有单位能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
- 29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区域不平等问题的举措, 包括“‘西部开发’活动”。该活动于1999年推出, 将目标锁定在所划分的东、中、西部。2005年正式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 该运动旨在缩小城乡差距。2006年10月, 随着“构建和谐社
- 会”这一理念的宣布, 政府开始全面出击不平等
- 问题。国家制订了各项措施, 鼓励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 增加了面向穷人的教育和医疗经费, 并将需求从投资和出口转向了国内消费和公共服务(Zhu和Wan, 2012年: 第85页)。
- 30 在墨西哥, 外国直接投资在总产出中的占比与行业间工资差异之间也呈正相关(Lopez Noria, 2011年)。
- 31 在俄罗斯联邦, 融入世界经济, 再加上私有化以及部门就业和工资结构由此发生的巨大转变, 也影响了收入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工资的增长低于私人公司(Gimpelson和Lukyanova, 2009年)。此外, 区域性不平等水平的增长源于金融领域收入的增长,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尤其如此, 另外, 还源于地理位置高度集中的建筑和工业生产的大幅收入增长(Galbraith、Krytynskaia和Wang, 2004年)。
- 32 McMillan和Rodrik(2011年: 第75页)为这些结论提供了支持, 他们认为, “不管全球化的贡献如何, 都必须极大地依靠本地情况、本国政策制定者的选择以及本国增长战略。”的确, 拉美贸易自由化对结构转变的多数影响都归因于: 各国不成熟的或者未加监管的金融一体化, 通常具有关联性的货币升值, 扶持性产业政策的削弱或者逐步退出, 以及国家从经济体中的普遍撤退(详见2003年《贸发报告》的讨论)。
- 33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智利从1987年至1992年的经历。在该期间, 智利经济的累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0%, 就业增长率为27%(相当于100万个岗位)。这种扩张主要受出口所驱动。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为30%以上, 如果在计算时, 将各出口导向型部门的投资和新创收入所带来的较高消费列入考虑, 则可发现, “出口联合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70%和就业增长的66%(拉加经委会, 1994年)。但只有少数岗位是在主要出口部门内部创造的: 采矿业和渔业对总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不足2%。大部分新岗位都是在不可贸易品部门(零售、建筑)和制造业创造的, 这类部门几乎完全面向国内市场。当时, 极为有利的实际汇率对于产生出口类收入的强大乘数效应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 国有铜业公司是将出口收入引向较高内需的补充手段。
- 34 至于拉美一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在过去一个年

代所推出的部门政策方案，见Peres(2011年)的评述。

- 35 例如，有关Kuznets假设经验效度的方法学争论，见Anand与Kanbur，1993年。
- 36 金融全球化指跨境金融持有额的增加、国家外部资产(如，以外汇表示的私人金融资产和流出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和负债(如，私人欠外国债权人的债务、非居民的有价证券投资以及流入外国直接投资)总数的增加；另见基金组织，2007年b。
- 37 思路略有不同的类似论点，见Akyüz(2011年)。其他人则认为，只有在能够避免过度借款和债务累积问题且在国内金融市场很发达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从金融全球化中受益(基金组织，2007年b)。但，欠发达金融市场正是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因此，对于发展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这一论点没有多少操作性用途。
- 38 尽管这些波浪的发生取决于全球推动因素，但因国家而异的拉动因素将决定进入该经济体的金融流量。这些拉动因素包括经济表现、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和制度因素，如：汇率，因为预期汇率变化会影响金融投资的预期回报。
- 39 Leijonhufvud(2007年)讨论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做法是如何引起过度冒险和新兴市场“短视”投资战略问题的。
- 40 综览见联合国贸发会(2012年)，尤其见第5.2节。
- 41 在一些亚洲国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与收入比似乎较高(Balakrishnan等人，2012年)。但这些市场的价格很可能被那些也会进入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入所抬高，如，没有全面数据可用的毛里求斯。

图4.4所涵盖的国家:

所含国家组如下:

拉美(10个): 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拉圭和秘鲁。

亚洲发展中国家(7个): 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土耳其。

非洲(5个): 加纳、毛里求斯、摩洛哥、南非、突尼斯。

以下是所涵盖的82个低薪酬经济体

发达国家(1个): 保加利亚

转型经济体(13个):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

拉美(6个): 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亚洲发展中国家(23个): 阿富汗、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基里巴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共和国、蒙古、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瓦卢、瓦努阿图、越南和也门。

非洲(39个): 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利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1998). 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s and wage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4): 1055–1089.
- Acemoglu D and Autor D (2012). What Does Human Capital Do? A Review of Goldin and Katz's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 No. 1782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February.
- Aghion P, Caroli E and Garcia-Penalosa E (1999).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4): 1615–1660.
- Agosin MR and Huaita F (2012). Overreaction in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Booms and sudden stop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1(5): 1140–1155.
- Akyüz Y (2011). Capit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ill the current boom end with a bust? Research Paper 37, South Centre, Geneva, March.
- Anand S and Kanbur SMR (1993).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A critiqu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1(1): 19–43.
- Anderson E (2005). Openness and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recent evidence. *World Development*, 33(7): 1045–1063.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Confronting rising inequality in Asia. In: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2*. Manila: 35–95.
- Autor DH and Dorn D (2012). The growth of low 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vailable at: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1474>.
- Autor DH, Katz LF and Kearney MS (2006).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189–194.
- Autor DH, Katz LF and Kearney MS (2008). Trends in U.S. wage inequality: Revising the revisionis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2): 300–323.
- Balakrishnan R, Nowak S, Panth S and Wu Y (2012). Surging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Asia: Facts, impacts, and responses. Working Paper 12/13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aldwin R (2011).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after globalization's 2nd unbundling: How building and joining a supply chain are different and why it matters. Working Paper No. 1771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 Banister J and Cook G (2011). China's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costs in manufacturing through 2008.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Monthly Labor Review*, March: 39–52.
- Berman E, Bound J and Griliches Z (1994).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 within U.S. manufacturing: Evidence from the annual survey of manufactu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2): 367–398.
- Berman E, Bound J and Machin S (1998). Implications of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4): 1245–1280.
- Bernard AB, Jensen JB and Schott PK (2006).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 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the (uneven) growth of US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219–237.
- Bloom N, Draca M and van Reenen J (2011).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 No. 167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 Broner FA and Rigobon R (2006). Why are capital flows so much more volatile in emerging tha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aballero RJ, Calderon C and Cespedes LS, eds., *External Vulnerability and Preventive Policies*. Santiago, Chile: Central Bank of Chile: 15–39.
- Card D and DiNardo JE (2002).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rising wage inequality: Some problems and puzzl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4): 733–783.
- Card D and Lemieux T (2001). Can falling supply explain the rising return to college for younger men? A cohort-based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2): 705–746.

- Ceglowski J and Golub S (2011). Does China still have a labor cost advantage? CESifo Working Paper 1579,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www.swarthmore.edu/Documents/academics/economics/cesifo1_wp3579.pdf.
- Chen Z, Lu M and Wan G (2010).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urba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Hi-Stat Discussion Paper 130,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gcoe.ier.hit-u.ac.jp/research/discussion/2008/pdf/gd09-130.pdf>.
- Desai MA, Foley FC and Hines JR (2009). Domestic effects of the foreign activities of US multinational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1): 181–203.
- Desjonquieres T, Machin S and Van Reenen J (1999). Another nail in the coffin? Or can the trade based explanation of changing skill structures be resurrected?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4): 533–554.
- Ebenstein A, McMillan M, Zhao Y and Zhang C (2012).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Je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March. Available at: http://pluto.huji.ac.il/~ebenstein/Ebenstein_McMillan_Zhao_Zhang_March_2012.pdf.
- ECLAC (1994).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y su difusión social: El caso de Chile de 1987 a 1992. LC/R.1483. Santiago, Chile, 27 December.
- ECLAC (2011).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Chile. Available at: <http://www.eclac.cl/publicaciones/xml/2/45452/2011-882-BPI-LANZAMIENTO-WEB.pdf>.
- Feenstra RC and Hanson GH (1999).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S., 1972–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907–940.
- Feenstra RC and Hanson GH (2003).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rising inequality: A survey of trade and wages. In: Choi EK and Harrigan J,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lden, MA, Blackwell.
- Galbraith JK (2012).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A Study of the World Economy just before the Great Cri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braith JK, Krytynskaia L and Wang Q (2004). The experience of rising inequality in Russia and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 87–106.
- Ghosh A, Kim J, Qureshi MS and Zalduendo J (2012). Surges. Working Paper 12/2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Gimpelson V and Lukyanova A (2009). Are public sector workers underpaid in Russia? Estimating the public-private wage gap. Discussion Paper 394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IZA), Bonn. Available at: <http://ftp.iza.org/dp3941.pdf>.
- Goldberg PK and Pavcnik N (2007).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65(1): 39–82.
- Goldin C and Katz LF (2008).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os M, Manning A and Salomons A (2011).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The roles of technology, offshoring and institution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1.34, University of Leuve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Leuven.
- Gordon RJ and Dew-Becker I (2007). Selected issues in the rise of income inequal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69–19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Hanson GH (2012). 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s: Emerging economies in glob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2): 41–64.
- Harrison A, McLaren J and McMillan M (2011). Recent perspectives on trade and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3: 261–289.
- IMF (2007a).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 IMF (2007b). Reaping the Benefi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 Jensen MC and Meckling WH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4): 305–360.
- Krugman PR (1995).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327–37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1–28.
- Kwack SY (2012).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capital, differential lab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o economic growth in Korea, 1965–2007. *Seoul Journal of Economics*, 25(1): 1–23.
- Kwon OH, Chang S and Fleisher BM (2011).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wage structure in China since 1980.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hio-state.edu/Fleisher/working_papers/IWS%2012_22_11.pdf.
- Lawrence RZ and Slaughter MJ (1993).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merican wages in the 1980s: Giant sucking sound or small hiccup?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2): 161–226.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Lazonick W (2012). The fragility of the US economy: The financialized corporation and the disappearing middle class. In: Breznitz D and Zysman J, eds., *National Adjustments to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Leijonhufvud C (2007). Financial globalisation and emerging market volatility. *World Economy*, 30(12): 1817–1842.
- Lemieux T (2007).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ag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1(1): 21–48.

- Li X (2011). How does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affect floating work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law.harvard.edu/programs/lwp/papers/How%20Does%20China's%20New%20Labour%20Contract%20Law%20Affect%20Floating%20Workers%20in%20China%20_Xiaoying%20Li_.pdf.
- Lopez Noria G (2011). The effect of trade and FDI on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The case of Mexico. Working Paper 2011-10, Bank of Mexico, DF Mexico. Available at: <http://www.banxico.org.mx/publicaciones-y-discursos/publicaciones/documentos-de-investigacion/banxico/%7B0392ACC7-E257-6DB2-5AE3-BF1DFADD4C77%7D.pdf>.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1). Growth and Renewal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ooling America's Economic Engine. Available at: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MGI/Research/Productivity_Competitiveness_and_Growth/Growth_and_renewal_in_the_US.
- McMillan M and Rodrik D (2011).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Bacchetta M and Jansen M, eds., *Making Globalisation Socially Sustainable*.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49–84.
- Milberg W and Winkler D (2009). Globalization, offshoring and economic insecuri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No. 8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November.
- Milberg W and Winkler D (2010).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offshoring in the US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2): 275–293.
- Mintzberg H (2007). How productivity killed American enterprise.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mintzberg.org/sites/default/files/productivity2008.pdf>.
- OECD (2011).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Paris.
- Peres W (2011). Industrial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Discussion Paper 2011/48,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 Rajan RG (2010). *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inz P and Calcagno A (1992). In search of another form of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48, ECLAC,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Schott PK (2008). 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 *Economic Policy*, 23(issue 53): 5–49.
- Selden M and Wu JM (2011). The Chinese State, incomplete proletarianization and structures of inequality in two epoch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Available at: <http://japanfocus.org/-Mark-Selden/3480>.
- Tinbergen J (1975). *Incom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Policie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Thoenig M and Verdier T (2003). A theory of defensive skill-biased innov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3): 709–728.
- UNCTAD (TDR 1997).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Globaliza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7.II.D.8,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199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Financial instability. Growth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8.II.D.6,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1999).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Fragile recovery and risks: Trade, finance and growth*.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9.II.D.1,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II.D.7,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Global partnership and nat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6.II.D.6,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Commodity prices, capital flows and the financing of invest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D.21,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mployment,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1).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Post-crisis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1.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11).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UNCTAD to UNCTAD XIII. Development-led globaliz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Paths*. Document UNCTAD (XIII)/1.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 UNCTAD (201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81–2011: Three decades of Thinking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2.II.D.5.
-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1).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hourly compensation costs in manufacturing, 2010. News Release USDL-11-1778, 21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ichcc.pdf>.
- Van Reenen J (2011). Wage inequality, technology and trade: 21st century evidence. *Labour Economics*, 18(6): 730–741.
- Wood A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ood A and Mayer J (2011). Has China de-industrialise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7(2): 325–350.
- Zhu C and Wan G (2012).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the move to a balanced economy.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 83–104.

财政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A. 导言

实现一个令政策制定者满意且被整个社会接受的收入分配格局一直是财政政策本身的目标。这是因为即使不同人口群的贡献各不相同，这也有利于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并使整个社会能够参与总的经济增长进程中。但也应将实现一个能够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收入分配格局视为中间目标。基于这两个原因，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其发展战略中认真考虑财政政策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

至于财政政策应该努力实现怎样的收入分配和为什么要实现这种分配，共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基于供应方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一种有利于营利和那些具有更大储蓄倾向的较高收入群体但却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将能促进增长。这是因为这有望带来更多的投资，因为净利润和总储蓄增加了。另一种是基于需求方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有利于那些具有较低储蓄倾向的中等和低等收入群体而且更加平等的分配

将能加强国内消费和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就业，因为企业所预期的需求较高。在两种情况下，实际产能投资都被视为经济进步的驱动力。

在战后时代的头三个年代，后一观点在有关收入分配、投资、增长和经济政策联系的思潮中占了主导地位，在最发达国家中，尤其如此。这些政策减少了不平等，加快了增长和减少了失业。但自1970年代后期起的政策取向转向了前一观点，结果使不平等水平上升、失业上升和增长放慢。

除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外(见本报告第六章的讨论)，财政政策提供了可用来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工具。这些工具包括税收、社会转移和公共服务供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旨在影响收入分配和支持增长进程的努力中，所有这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对19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国家不平等水平上升的原因进

行评估时，必须了解该财政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影响收入分配只是若干财政政策目标之一。但即使有关公共收入获取方式和公共支出分配方式的决定不是专门为了影响收入分配，也必然会使分配朝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发展。因此，必须从更广泛的视角，对宏观经济政策和那些很少有助于降低不平等水平的结构性改革进行重新定位，并以此为背景来看待过去三个年代中的财政政策行为；的确，这些改革通常还使不平等水平上升了。

从197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逐渐转变了其焦点，以消除税收所带来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时，政策决定往往会更加强调财政收支平衡，而对宏观经济或发展需求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如过去。普遍倾向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认为有必要进行预算调整，都要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很多国家中，有利市场的税收改革降低了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边际税率，助长了公共收入体系中那些会对收入分配产生累退效应的元素(即：往往会提高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元素)。这一新取向也铸就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

政策，在这些国家中，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政策改革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条件和建议的强烈影响。这些机构还强调，有必要加强公共部门的财政状况，减少政府的资源分配的干预(2006年《贸发报告》第二章)。

本章将讨论有关收入和支出的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不同社会和收入团体的收入分配，以及如何通过修改这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的。

该章认为程度更高的累进税制可帮助减少收入

和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同时又不会减少人们进行固定资本、创新和技能投资的积极性。就公共支出而言，社会转移和社会服务供应可减少市场势力和不平等初始禀赋给社会所带来的不利分配后果。已采用的或可建议采用的

具体工具组合将因各国现有的具体情况而异，尤其是，将取决于各国的发展阶段、行政能力和社会偏好。

本章布局如下。B节将回顾税收制度设计的一些重大变化，以及过去30年中那些似乎提高了不平等水平的公共支出格局。本节还将介绍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为减少不平等而在更近一些时候采取的财政政策措施。C节以这些经验和进一步的理论考虑因素为基础，为那些将会在加强增长和发展动力的同时减少不平等的财政措施提供一些建议。

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其发展战略中认真考虑财政政策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

B. 财政政策和不平等

1. 财政与收入分配

从1970年代中期起，在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中间，出现了一种日益一致的观点，即：需要对税制进行普遍修改，以实现更大程度的税收“中立”(Tanzi, 1987年)。这是经济范式中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其所依据的观点是，1970年代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滞胀(即：高失业与高通胀)有一部分与国家干预所带来的扭曲效应有关(详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B节)。结果，货币政策开始以旨在抑制失业上升问题的举措为代价，而优先考虑了旨在抗击通胀的举措。当时认为，如提高“聘用和解聘”条件以及工资确定的灵活性，并使收入分配朝着有利营利的方向转变，则可解决失业问题。有关“好税收制度”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原来的观点明确将扭曲问题引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后来的观点则尽量减少了这种扭曲问题(Steinmo, 2003年)。这种转变的基础是市场效率信条的复兴。根据这一观点，应将税负和政府支出保持在最低水平，税负分布和公共支出分配应主要取决于效率标准(McLure, 1984年；Musgrave, 1990年)。只在需要避免极端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才应发挥分配性考虑因素

的作用，而且应该主要通过支出来减少这种平等问题(如，Engel、Galetovic和Raddatz, 1999年)。当时认为，对那些处于收入等级高端的采用较高的公司利润税和较高的边际收入税率会放慢经济活动，而且对于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不起作用(Bird和Zolt, 2005年)。

在增长缓慢和失业上升的情况下，经济思想的转变也会影响广大公众对于“社会可接受”内涵的看法。尽管减少累进税会使不平等水平上升，但在发达国家，很少有民众反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税制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一样，是恢复增长和避免公司将生产迁往国外的唯一方式。同样，在发展中国家，旨在向资本所有者尤其是跨国公司提供广泛税收优惠的政策被视为“社会可接受的”或“理想的”，因为可促进外国资本流入。

2. 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

在发达国家，税制改革通常包括：按比例缩减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尤其是收入等级高端的边际税率；减少所得税等级的数量；削减公司税率；消除缴税漏洞和课税豁免以拓宽所得税税基；提高间接税税率(尤其是增值税)

表 5.1

1981-2010年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指标 (在当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总收入与赠予	41.6	42.5	42.8	42.2	41.5	41.8
其中:						
税收	26.6	27.8	26.9	26.3	25.9	26.0
其中:						
增值税	5.5	6.1	6.3	6.7	7.0	7.1
国境税	0.9	0.8	1.1	1.1	0.8	0.6
所得税	13.3	13.9	12.8	12.3	12.0	12.1
其中:						
公司所得税	2.5	2.7	2.7	3.1	3.2	3.5
其他税收	6.9	7.0	6.7	6.2	6.1	6.1
社会缴款	9.5	9.7	10.9	10.3	10.1	10.0
其他收入 ^a	7.3	3.3	5.1	6.1	5.4	5.3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2.42	2.28	2.03	1.84	1.71	1.70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欧统局的统计数据库; 经合组织的StatExtracts数据库。

注: 数据指广义政府收入平均观察的五年平均数。

a 包括资本收入。

和社会保障缴款(Sandford, 1993年: 第10-20页)。

据称, 税收结构的变化是为了让税制更具“中立性”, 这种变化对某些利益群体所带来了好处超过了其他利益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 消除缴税漏洞和课税豁免都能减少较高收入群体各纳税人的某些特权。同时, 收入和资本税的减少与消费税的增加带来了税负的重新分配, 加重了较低收入群体的税负。这些税收结构变化的总体影响使税收的累退程度增加。的确, 对经合组织国家税收改革进行的评述发现, 没有一个国家的税制出现累进程度增加的情况(Steinmo, 2003年: 第223页)。

税制的再分配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以及个人所得税率表的累进程度。在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发

展中国家, 所得税是公共收入的最大来源(表5.1和5.2)。在2006-2010年期间, 发达国家的所得税, 包括公司所得税, 平均占了总税收的46.5%, 而累退增值税平均为27.3%。自1980年代初以来, 所得税的占比下降了, 而增值税的占比则持续上升。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可作为测算税制累进程度的适当指标, 该比率已从1980年代上半年的2.42%下降到1990年代上半年的2.03%, 以及2006-2010年期间的1.70%。此外, 将所得税的等级列入考虑也很重要。尤其是, 尽管高端收入者只占了人口的一小部分, 但收入等级高端的边际税率却是总累进税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他们通常占了总所得和总所得税收入的大部分。然而,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处于收入等级高端的边际个人所得税率则从1970年代后期的平均71%下降到21世纪00年代后期的57%左右(图5.1)。

表 5.2

1991-2010年若干地区的财政收入指标
(在当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非洲				
总收入与赠予	22.1	21.0	23.8	28.2
其中:				
税收	14.4	14.0	15.0	16.4
其中:				
增值税	4.4	4.4	4.9	5.4
国境税	5.3	5.0	4.2	4.2
所得税	4.0	4.2	5.1	6.2
其中:				
公司所得税	2.5	2.4	2.3	3.4
其他税收	0.7	0.4	0.8	0.6
社会缴款	2.0	1.8	2.3	2.7
其他收入 ^a	5.6	5.3	6.5	9.1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0.91	0.95	1.04	1.15
拉美				
总收入与赠予	21.3	22.7	23.9	27.3
其中:				
税收	12.5	13.8	14.8	16.7
其中:				
增值税	4.7	5.4	6.4	7.3
国境税	1.8	1.6	1.3	1.2
所得税	2.8	3.3	3.6	4.7
其中:				
公司所得税	2.0	2.2	2.2	3.0
其他税收	3.2	3.5	3.5	3.4
社会缴款	2.9	2.8	2.8	3.1
其他收入 ^a	5.9	6.1	6.3	7.5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0.60	0.61	0.56	0.64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总收入与赠予	20.9	19.6	19.2	20.7
其中:				
税收	14.4	13.8	13.7	14.9
其中:				
增值税	4.5	4.5	5.2	5.6
国境税	2.4	1.7	1.5	1.4
所得税	4.8	5.4	5.4	6.2
其中:				
公司所得税	3.0	3.1	3.5	4.3
其他税收	2.7	2.2	1.6	1.7
社会缴款	0.7	1.2	2.2	3.0
其他收入 ^a	5.8	4.6	3.3	2.8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1.07	1.20	1.04	1.11
西亚				
总收入与赠予	28.5	30.3	34.6	35.8
其中:				
税收	5.5	5.9	6.5	6.9
社会缴款	1.0	2.1	1.8	3.8
其他收入 ^a	22.0	22.2	26.3	25.1
转型经济体				
总收入与赠予	..	28.0	29.9	34.2
其中:				
税收	..	18.7	18.3	20.6
其中:				
增值税	..	8.8	10.1	12.2
国境税	..	2.1	1.9	1.9
所得税	..	4.9	5.1	5.9
其中:				
公司所得税	..	2.7	3.3	3.3
其他税收	..	2.9	1.2	0.6
社会缴款	..	8.5	8.6	9.2
其他收入 ^a	..	0.8	3.0	4.4
备忘项:				
所得税与增值税之比	..	0.56	0.50	0.48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与《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 以及各国资料。

注: 数据指广义政府收入平均观察值的五年平均数, 但以下国家除外: 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和乌拉圭, 这些国家的数据指非金融公共部门的数据。有关发展中国家组的构成, 见表5.3。

a 包括资本收入。

图 5.1

1975-1979年与2004-2008年若干经合组织
国家位居前列的边际所得税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 Piketty、Saez和Stantcheva, 2011年。

注: 数据指每个期间的均数, 指中央和地方政府这两级的个人所得税。在没有有关这些期间的数据可用时, 则采用1975年后的头五年期间和最近的五年期间(详见Piketty、Saez和Stantcheva, 2011年, 附件三)。

尽管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些税率都下降了, 但整个税收体系的累进程度这些国家之间有差异。其中一个原因是财富征税模式不同(Piketty, 2010年)。例如, 1970-2005年期间, 法国不动产和财富税的演变与英美的演变截然不同(Piketty和Saez, 2007年)。自1980年代初以来, 对于这些国家中那些处于收入分配最高层且持有大部分资本的群体来说, 平均个人所得税率、工资税、不动产税、赠予与财富税, 以及公司税(仅指美国)一直在下降。相反, 法国整个税收体系中的累进程度几乎没有变化, 因为自1980年代以来, 财富税的推出和

遗产税的提高足以抵消个人所得税率的下降。同时, 在法国的可支配收入分配中, 不平等上升的幅度远远低于英国和美国。

新自由主义税制改革的支持者主张减少累进征税, 理由是, 这会减少要素分配中的扭曲问题, 从而改善经济体的效率, 并对全民的毛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经合组织赞成这一观点: “致力于更大程度的税收中立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 从效率角度看, 比例税制成为理想选择的可能性要大于累进和选择性税制”(经合组织, 1989年: 第184-185页)。但税收“中立”会提高经济效率这一观点所采用的经济模型没有考虑到现实世界中众多的市场失灵问题和初始禀赋不平等情况, 而这正是差别征税所要纠正的问题(例如, 见Aiyagari, 1995年; Koskela和Vilmunen, 1996年; Pissarides, 1998年)。该观点还忽略了收入分配对内需水平的决定性作用。

对高收入群体和利润征税较低的税可从两方面提高投资。首先, 一般认为较高的净利润会增加公司进行再投资的积极性和资金来源。第二, 收入等级高端的净收入增加有望提升总储蓄, 因为这些收入群体的储蓄倾向高于平均水平。而这又类似于让投资自动增加。随着1990年代全球化的推进, 还有理由认为, 有必要减少税负, 尤其是利润税负, 因为较高的公司税会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此外, 较低的公司税有助于防止公司将生产迁往低税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大多为低薪酬国家)。

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消费倾向下降且对需求增长的预期恶化, 那么投资增长的可能性将不太大, 在劳动力和现有产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的确, 旨在增加总储蓄因而降低了大众消费的政策更有可能减少投资和进一步削弱产出增长。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经合组织国家税制改革尽管降低了税收结构的累进程度，但却没有提高总体效率和加快增长(Piketty、Saez和Stantcheva, 2011年；另见图5.2A)。但在这些国家中，最高档税率的下降幅度是预测税前所得集中度提高的良好指标(图5.2B)¹。最高档边际税率的降低也会鼓励那些主要来自最高一档收入群体的股东更多地分配公司利润，而不是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这种收入反过来更有可能以购置现有资产的形式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Bakija、Cole和Heim, 2012年)。

总之，很多发达经济体在上个世纪末的税制改革都以最高收入住户为其主要受益者，但当最高边际税率的下降被那些具有累进税负归宿的其他税的增加所抵消时，则不在此列。但尽管税收系统的累进程度和公司税下降，增长依然很缓慢而失业却较高。

3.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共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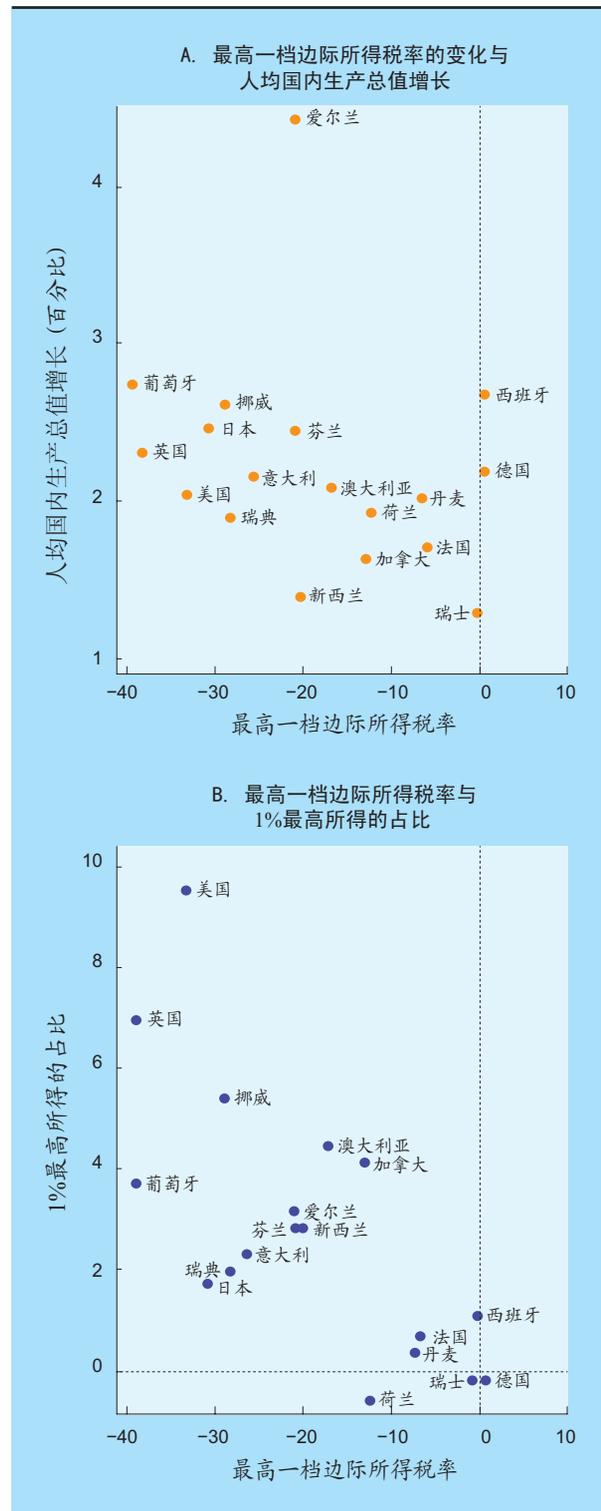
(a) 公共收入结构

政府收入的结构和收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表5.1和表5.2)。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拉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所得税在总公共收入中的占比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累退增值税和其他收入(如，特许权使用费和国家财产税)则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在总税收中，所得税收入的占比较低而增值的占比较高说明，发展和转型经济体的总体税制累退程度高于发达国家。在2006-2010年期间，拉美所得税(包括公司所得税)在总税

图 5.2

1975-1979年至2004-2008年，若干经合组织国家最高档边际所得税率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最高1%所得份额



资料来源：Piketty、Saez和Stantcheva, 2011年。

注：数据指每个期间的均数变化，除非另有说明，数据将指百分点。

收中的占比最低(28%),而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则最高(42%)。非洲增值税的占比最低(33%),而转型经济体则最高(59%)。

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中国家得自特许使用费和国家财产(尤其是开采业)的公共收入份额较高,因而减轻了其税制累进程度较低对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影响。这种较高的份额主要与石油和矿产出口有关,因此,不是向国内纳税人收取的税。但其在总公共收入中的占比会因地区而异。2006-2010年,这些收入占了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9.1%和拉美的7.5%;西亚的这种占比尤其高(25.1%),而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则很低(2.8%)。不过,发展中国家税制对再分配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不仅与其总体结构有关,而且与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普遍较低有关。

由于非正规部门很多而政府能力又有限,所以难以收取直接税和累进税,在早期经济发展阶段,尤其如此²。此外,在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累退征税,非工资收入者逃税的情况很普遍。这更加大了不平等的问题,因为较富裕人口有更多的逃税机会和技巧。根据税收正义网(2011年)的估计数据,逃税或避税使全世界每年的税收减少了3.1万亿美元。同样,转移定价(指跨国公司内各关联企业之间的国际交易定价)使跨国公司能够将利润转到低税或无税的管辖区,因而以不公平方式剥夺了一国的税收(Jomo, 2012年)。

在过去三个年代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税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这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及其贷款条件有部分关系,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尤其如此。在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于1979-1989年期间提供的所有调整贷款中,约有50%附加了与财政改革有关的条件,并有50%以上附加了与贸易改革和政府财政合理化(含税改内容)有关的条件(Webb和Shariff, 1992年:第71页)。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改革主要侧重于三个传统财政政策职能中的两个(Musgrave, 1959年):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源有效分配。第三项职能是影响收入分配,该职能不太受重视。尤其是在开始时,国际金融机构建议的重点是创造更多收入,以使国家能够如期偿债和

减少财政赤字。从1990年代初起,他们不仅比以前更加注重鼓励一种被视为能够更有效地将收入分配给私人生产和投资的分配方式,而且还更加注重公平和税收管理(世界银行,1991年:第9-10

页)。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有利市场的其他改革一样,财政结构变化一般需要在效率(需要尽可能依靠市场势力实现最优化)和公平(需要政府干预)之间进行取舍。

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减少了贸易的各种赋税和关税,从而使公共收入下降,这种下降有一部分由所得税收入的增加所弥补,还有一部分由税基更广的消费税尤其是增值税所弥补。如果将所得税收入与增值税收入之比视为粗略指标,那么1990年代(很可能还有没有全面数据可用的1980年代)的这种税改似乎导致了一种累退程度更高的税制。1980年代,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数据可用的14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该比率下降了(Sáinz和Calcagno, 1992年)。之后,该比率又再次下降,从1990年代上半个年代的0.6(这个水平已经很低)下降到2001-2005年期间的0.56,然后又在2006-2010年期间上升到0.64。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发展和转型经济体
收结构的累退程度高于
发达国家。

该比率首先于1990年代的上半个年代的1.07上升到1990年代后期的1.20, 然后又于2006-2010年期间下降到1.11。与这两个地区不同的是, 在非洲, 过去20年中的所得税收入与增值税收入之比一直在持续上升, 从1990年代上半个年代的0.91上升到2006-2010年的1.15。相反, 转型经济体的这一比率基本上都下降了, 从1990年代下半个年代的0.56(这个水平已经很低)下降到2006-2010年的0.48。尽管这一粗略指标没有考虑所得税等级可能发生的变化或者各收入团体在消费不同数量的不同货物和服务类型时可能存在的增值税率差异, 但却表明税制演变已变得更具累退性了。

(b) 公共收入水平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税制都更具有累退性,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总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平均起来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在累退税收结构下, 税收系统要依赖低等和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但由于该税基较小, 所以这一来源的收入也有限。

2006-2010年期间, 发达国家总公共收入和赠予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30%一直将近60%, 平均水平为41.8%(表5.1)。这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 非洲的占比平均只有28.2%,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为20.7%, 拉美为27.3%, 转型经济体为34.2%, 西亚为35.8%(表5.2)。因此, 平均而言, 发展中国家通过财政措施影响收入分配的余地较小。

税收结构变化对总公共收入的影响在各国之间有差异。一些研究发现, 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很多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共收入都下降了, 这种下降大多与收入和贸易赋税的下降有关(Heady, 2001年; Khattry和Mohan

Rao, 2002年; Gemmell和Morrissey, 2003年)。此外, 通过贸易自由化而预期提高效率没有实现, 其部分原因是没有原本可以用来弥补贸易税收损失的财政计划(Rodrik, 2006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现有数据显示,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 财政收入很少增加。198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的14个国家中, 有7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了(Sáinz和Calcagno, 1992年)。平均而言, 1995年后, 尤其是2005年后, 拉美国家的该比率略有上升, 因为税收和非税收入都上升了。

1990年代下半个年代之前, 非洲总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 之后, 尤其是2005年后, 该占比开始恢复, 当时, 商品出口收入的上升提高了非税收入。1995年至2005年期间,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下降了, 但随后得以恢复, 几乎回到了1990年代上半个年代的水平。平均而言, 西亚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预算因其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而获益。

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在公共收入下降的情况下, 政府可用以促进发展进程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余地减少了, 在缓慢增长妨碍了非洲和拉美国家扩大收入和消费税基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在这些年期间, 这些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款也很困难, 而其大部分公共收入却被其很高的外债和偿债利息所消减。因此, 即使在公共收入上升的情况下, 也没有足够多的资金可用于旨在促进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或用以增加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支出。

国有企业盈余原本可成为另一收入来源, 在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 尤其如此。但从1980年代中期起, 大多数国家的很多国

有企业(包括开采业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私有化,收入大部分都用以偿还外债。为获取必要的外汇,经常通过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措施促进私有化活动,而从自然资源开采中获得的租金(即:自然资源销售值与开采成本之差)通常按照明显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方式分配。这也大大减少了政府收入的增幅(2005年《贸发报告》第三章)。只是在近几年中,一些政府才开始与开采部门的跨国公司重新洽谈其合同(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E节),这部分反映在表5.2“其他收入”项目的数据中。

为按照所短缺的这部分收入对公共预算进行调整,很多国家都减少了公共服务供应,或者不能根据其人口增长需求来扩大预算。其中很多国家都按照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对公共服务(如,教育、保健和公路)收费,以前这些服务是免费的。尽管这些措施对财政收支的正面影响似乎有限,但却从各个方面对可支配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具体影响要视不同用户的收入状况而定。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征收公路使用费主要会影响那些作为这类服务主要消费者的较富裕家庭。相反,学费,尤其是初等教育学费和医疗费则更具有累退性,通常会使得社会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无法使用这类服务³。这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和未来原始收入分配带来负面后果,因为会使最贫困住户成员的技能长期处于低水平。

在较低收入国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ODA),尤其是为财政改革国家提供预算支持的官方发展援助,原本可以用来弥补国内公共

收入下降问题。但在1980年代,人均官方发展援助流量开始停滞,而在1990年代上半个年代,该流量的人均值和绝对值甚至大幅下降了(2008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利市场的税制改革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进行取舍……

从1990年代中期起,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官方发展援助拨款开始回升。但其中很多增长都面向少数几个刚刚摆脱数年冲突问题的国家,或者以债务减免形式提供,因此,对当前预算的影响有限。尽管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但为了采取措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在2000-2015年期间将贫困减半的目标,实际官方发展援助流量与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预估援助量之间还有很大缺口(每年大约为500-600亿美元)。另一方面,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这对受援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类用途在官方发展援助中的占比增加意味着旨在促进增长的经济基础设施和产能投资在官方发展援助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了,因此,这种增加对转变结构和创造新就业和工资机会的影响有限(2008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但拉美和其他地区的近期经验显示,累进税收可改善财政收支、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2000年后,发展和转型经济体公共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普遍上升,其原因各种各样。在有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流量的增加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种上升一般与税收增加有关,在初级部门占了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则与商品价格上升有关。

在所有地区中,2006-2010年期间公共收入的上升都与间接税和所得税的上升有关。但

商品出口国非税收入的增加也同样重要。在从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期间，商品价格的上升帮助这些国家大幅增加了其财政收入，在有些情况下，增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12个百分点(2011年《贸发报告》，表2.1)。⁴

就拉美而言，有证明表明，近几年商品租金比重的上升部分一直被国家取得(Comia、Gómez-Sabaini和Martorano, 2011年)。但一些拉美国家为引进累进程度更高的税收体系而进行的税制改革也驱动了公共收入的上升。例如，乌拉圭引进了新的劳动力所得累进税和单一的资本所得税，同时减少了某些间接税，其目的是改善财政收支、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据估计，这种改革在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抑制作用的情况下，帮助降低了基尼系数，并进而降低了个人所得分配中的不平等水平——降幅为2个百分点(Martorano, 2012年)。

4. 财政空间与公共支出

国家收入体系的设计和公共支出格局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影响各异。累进税制会影响所有收入群体及其相对收入，包括中等阶级和最高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支出方而言，社会转移以及免费或有补贴的公共服务供应通常面向特定群体，如，最贫困人口、多子女家庭、老人和失业者。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支出更适于用来防止或减少贫困和保护那些处境尤其不利或者尤其易受影响的社会群体。但至于旨在减少不平等水平的公共支出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面向特定社会群体，还有待讨论(联合国/经社部，2008年)。

为了在不增加社会总支出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目标，尤其是减贫目标，多边金融机构和双边捐助者通常建议将目标对准最有需要的特殊群体，而不是力求更普及的覆盖面(Besley和Kanbur, 1990年；Gelbach和Pritchett, 1995

年)。这可能意味着，某些群体可能获得更大支持，而那些出于其他原因也可能需要社会支持的其他群体则可能需要做出牺牲，或者有可能要牺牲那些对于促进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性的公共支出。还有理由认为，确定目标需要行政能力和交易成本，而选择目标群体则可能会常常受到政治利益的影响(Mkandawire, 2007年)。确定目标还会带来社会分割和分化问题，而这可能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不利影响(联合国/经社部，2008年)。

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社会支出的原因都有多面性：某些类型的支出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受益，而其他类型的支出则是为了针对那些需要经济支持和社会保护的特定群体。按不同方式组合的两类社会支出都可能有其自身的理由，具体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一般而言，由政府提供医疗和教育对于总体经济发展尤其重要，而面向特定人口群的现金和实物转移则可能是消除极端贫困所需要的。因此，与其说主要挑战是在预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决定社会支出是有针对性的还是普及的，还不如说主要挑战是增加公共收入，并在必要时，从国际捐助者那里取得额外的资金来源。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较贫困国家，通过财政措施(如，对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增加公共收入的空间很可能被低估了。正如第三章所述，对市场收入(毛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配的比较显示，在发达国家中，具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措施尽管被弱化了(经合组织，2011年)，但这类措施对于削减可支配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作用一直比发展中国家更有效(Chu、Davoodi和Gupta, 2000年)。⁵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较小，而且累进程度较低(甚至是累退的)。但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往往能够更成功地通过提高社会转移和改善公共社会服务供应来影响收入分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用于这些目的的公共资金来源都较少。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结构调整方案下的政策改革未能向绝大多数人口提供足够保护和服务。在很多非洲国家中，“人们越来越难以享受到可负担得起”那些需要通过收回成本或预付计划获得资金的健康服务，而且“这类服务还在每况愈下”(Narayan等人，2000年：第87页；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拉美的教育服务质量各不相同，较低收入组的教育服务质量较低(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事务委员会，2010年)。至于拉美的养老金制度，自从改革将国有现收现付制私有化以后，覆盖面开始全面下降(Mesa-Lago，2004年)。用以解决不平等水平上升问题所需的社会转移和公益品供应不足，因为政府收入增长下降或增长不足——在偿债负担上升时期，尤其如此。此外，尽管收入不平等水平加大，但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依然疲弱。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结构调整方案不能为绝大多数人口提供足够的保护和服务。

自199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2002年后，公共收入的增加使一些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政府得以扩大其财政空间，包括采取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措施。除了政府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上升外，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债利息负担的减少也有助于很多国家扩大财政空间。利息负担的减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在那些主要向私人债权人借款的国家中，国际利率较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那些主要从官方债权人借款的国家中，有了债务减免。的确，自19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债务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减免，在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减少了公共财政中用以偿债的分配额。但国际债务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国家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在重债穷国倡议(以及后续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的受益国与非受益国之间，这种差异尤其明显。此外，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债

务减免是其他援助形式的补充(2008年《贸发报告》第六章；联合国贸发会，2008年)。在很多情况下，所提供的债务减免都不足以让那些旨在促进基础设施开发和减少不平等的重要资金改变方向。在有些国家，这意味着，政府不得不产生新债务，包括国内新债。

如果在过去一个年代中有更多的公共收入可用，那么一些国家的政府原本能够增加其经常支出和资本支出，在拉美，尤其如此，而在更近一些时候的非洲以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也是如此，只是后者稍微逊色一些(表5.3)。同时，其中很多国家都成功地减少了其财政赤字，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获得了财政盈余。1990年代初和21世纪头十年后期，拉美总公共支出的平均值上升了，上升幅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3个百分点，而总经常支出的平均值则上升了4.9个百分点。1990年代初和21世纪头十年后期，非洲的这些增幅则分别为3.8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⁶

较高财政收入对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可通过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税赋，提高再分配效应的潜力。从短期来说，扩大财政空间还有助于增加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支出，从而改善公益品供应和扩大现金转移方案。

非洲、拉美和西亚的公共投资增加了，同时公共债务和利息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下降了。公共投资的增加是进行结构转变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不仅因为它可以带来直接需求效应，而且因为它通常是引导私人固定投资效仿或同时进行投资所需要的。

表 5.3

1991-2010年若干地区和国家组的财政支出 (在当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发达国家				
总支出	47.4	44.1	43.1	44.5
其中:				
资本支出	5.0	4.6	4.3	4.7
经常支出	42.5	39.6	38.8	39.7
其中:				
利息支出	5.2	3.9	2.7	2.3
非洲				
总支出	26.6	23.8	26.2	27.6
其中:				
资本支出	5.5	5.5	6.6	7.8
经常支出	21.1	18.3	19.6	19.8
其中:				
利息支出	2.7	2.4	2.5	1.7
拉美				
总支出	24.5	26.6	27.7	29.8
其中:				
资本支出	5.2	5.3	4.6	5.7
经常支出	19.3	21.3	23.1	24.2
其中:				
利息支出	2.8	2.8	3.3	2.3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总支出	22.0	20.7	21.5	22.1
其中:				
资本支出	5.7	5.1	4.8	4.8
经常支出	16.3	15.5	16.7	17.3
其中:				
利息支出	4.4	2.5	2.5	2.1
西亚				
总支出	37.7	33.6	32.0	30.0
其中:				
资本支出	4.9	5.0	5.7	6.5
经常支出	32.8	28.5	26.3	23.6
其中:				
利息支出	2.7	4.7	4.1	2.2
转型经济体				
总支出	..	36.1	30.7	33.1
其中:				
资本支出	..	5.9	4.6	5.1
经常支出	..	30.2	26.1	28.1
其中:				
利息支出	..	1.9	1.1	0.6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欧统局的统计数据库(Eurostat); 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摘选(StatExtracts)数据库; 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与《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 以及各国资料。

注: 数据指平均观察值的五年平均数。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 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印度、印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有关中国的数据指预算收入和支出; 不包括预算外资金或社会保障资金)。拉美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仅指收入指标数据)、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非洲不包括: 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利塔尼亚、马约特岛、圣赫勒拿、塞舌尔、索马里、西撒哈拉与津巴布韦。西亚不包括: 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也门。转型经济体不包括黑山。

5. 通过公共支出影响收入分配

改善财政账目也使政府能够通过改善公益品供应(包括教育)来影响收入分配。例如,2000年至2010年期间,拉美有关教育的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数从4.1%上升到5.2%⁷,而中学入学率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随之上升,前者从72%上升到86%,后者从7.4年上升到8.2年。⁸

扩大的财政空间如果用来增加社会转移,则可对收入分配产生更直接的影响。的确,很多发展和转型经济体在扩大其财政空间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保护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在过去一个年代中的拉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社会保护的扩大规模相当可观。

有关最近经验的回顾显示,社会转移和公共部门对社会服务的供应能成为减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有力工具。有关过去两个年代社会支出的详细国际数据相当少,但有关当前公共支出的数据显示,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公共支出可能上升了。在拉加经委会提供了数据的10个拉美国家中,7个国家有关补贴和其他经常转移的公共支出明显上升了,不过,有些情况下,是从较低的水平上升的。上升幅度介于50%和200%以上。例如,在阿根廷,这些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的三年平均数从1990-1992年的8.2%上升到2007-2009年的14.8%,而在同一期间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则从7%上升到13.9%。

自2002年起,拉美普遍推出了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转移形式的有针对性社会援助,这似乎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可观的影响(Cornia, 2012年)。2001-2005年至2006-2010年期间,转型经济体政府总支出和经常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都上升了2个多百分点。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尽管政府社

会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升幅较小,但从绝对值来说,则有明显上升。相反,在西亚,这类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则下降了,不过依然高于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

以下一些实例是发展和转型经济体最近在其扩大其财政空间后所推出的社会支出方案。

拉美在其有利市场的早期政策改革失败后,开始从根本上对社会政策取向进行了重新思考(Huber, 2009年)。新取向旨在提供广泛的社会保护,以防范重大风险,改善有需求者获取社会转移的渠道,同时按照同一质量标准向所有社会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货物。福利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并以权利的方式授予,有关机构只有最低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但福利也与相应的义务相挂钩(Filgueira等人, 2006年)。该原则带来了一些新举措,如:阿根廷普及儿童津贴、玻利维亚普及老人养老金、巴西提供老年养老金、病残福利金和孕产期福利金(国际劳工组织, 2010年和2012年)。

一些国家平行推出了旨在减少贫困和进行重新分配的关键社会政策工具,包括有条件的现金转移(CCT)⁹。在保护社会最贫困阶层方面,有关一般社会援助的非缴款型支出,特别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似乎一直很有效(Lindert、Skoufias和Shapiro, 2006年; Cornia, 2012年),这使财政系统的总体效应更具有累进性。还有证据表明,民主化和摒弃侍从主义(clientelism)的做法改善了社会支出的影响范围(Lopez-Calva和Lustig, 2010年)。相对于社会保险计划而言,通过税收提供资金的这种方案能对减少不平等产生更大影响,即使单位转移较小时,也是如此(Skoufias、Lindert和Shapiro, 2010年; Goñi、López与Servén, 2011年)。拉美还通过实物转移实现了重大的财政再分配,如免费或以很低的收费提供卫生与教育服务。

到目前为止，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少数国家(主要在东部和南部非洲)扩大了社会保护方案。该地区社会保护的覆盖面、质量和援助水平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地区。在1990年代后期以前，正规社会保护计划的平均覆盖面还不到劳动力队伍的5%(Palacios和Pallarés-Millares, 2000年)。更近一些时候，引进了两类社会援助计划。适用于南部非洲某些国家的一种计划旨在保护老人，另一计划则以极端贫困为目标，大多适用于中非、东非和西非的低收入国家(Niño-Zarazúa等人, 2012年: 第163-164页)。

在南部非洲的很多国家中，以前只面向某些贫困老年群体的非缴款型社会养老金计划在扩大后已接近普及，没有基于种族来源的歧视，其资金来源大多为税收。在这些国家中，曾面向某些贫困老年族群的非缴款型社会养老金计划已扩大为不再基于种族歧视的家庭举措。该计划主要以税收作为其资金来源，面向老人的转移支付大多是普及的。在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和斯威士兰，养老金计划惠及了80-100%的老人，估计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Barrientos、Niño-Zarazúa和Maitrot, 2010年; Devereux, 2007年; Niño-Zarazúa等人, 2012年)。在南部非洲，家庭结构增强了收入转移的有效性，因为老年补助实际上是向那些有老人的贫困住户所提供的收入转移，而受惠家庭往往将这些转移资金用来支付子女上学费用、改善保健水平和在家庭内重新分配生产资源(Barrientos, 2008年; Møller和Sotshangaye, 1996年)。

中非、东非和西非的一些新转移方案主要由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资金。在很多情况下，其设计反映了国际组织的影响和捐助方捐助重点的变化，因为这些捐助方试图将其紧急

和人道主义援助支持转向社会保护¹⁰。这些方案还给受惠国带来了好处，改善了受惠国的财政空间——在若干国家中，导致这种改善的原因除了债务减免外，还包括源自较快增长和自然资源开采的公共收入增加。最近的这些经验表明，即使在贫困国家，实施社会保护方案也具有政治上、财政上和行政上的可行性(Giovannetti和Sanfilippo, 2011年)。但也表明，在财政基础小的国家中，官方发展援助的增加对于机构建设依然很关键。

亚洲社会保护制度改革的差异很大，这与一系列的历史因素和其他因素有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体的结构。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哥伦比亚、巴基斯坦

和更近一些时候的印尼和菲律宾都在过去一个年代中实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方案(亚洲开发银行, 2012年: 第78页)。在韩国，福利体系的扩大加强了财政政策的再分配能力(Sung, 2009年)，其最大资金来源为直接课税和现金转移。¹¹泰国的再分配政

策以贫困农村地区为重点，¹²而社会保护系统的改革包括向贫困老年提供资金转移、普及健康覆盖面和15年的免费教育。过去，马来西亚的社会目标一直是该国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家发展政策(1991-2000年)和国家远景政策(2001-2010年)的一项重要内容(Ragayah, 2011年: 第2页)。¹³此外，该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力求实现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将移徙人口调节到城市地区，同时促进农业发展。在所有这些举措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交通、水电、健康与教育)的投资一直被列为头等大事。但在亚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保护的覆盖面通常有限。此外，保护贫困人口不受负面冲击影响的可能性也因为社会保护的资源分配额不足而受到限制(亚洲开发银行, 2008年)。

最近经验显示，社会转移和公共部门对社会服务的供应能成为减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有力工具。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般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并重新设计了与工作有关的社会保险计划，尤其是城市居民的保险计划。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为解决新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政府已将其重点转向需经过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援助方案，以此作为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一直在扩大，在沿海地区，尤其如此。但在西部和中部省份，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合格人口未能得到覆盖，因为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不足(Tang、Sha和Ren, 2003年)。同时，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社会服务也获得了某种支持，但有人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制度化(Leung, 2006年)。另外，还建议加强社会政策与制度，保护人民不受中国迅速结构转变所引起的众多危害之苦，这将有助于确保迅速增长能够通过分配让更大比例的人口受益(Xiulan和Yuebin, 2010年)。

印度自1951年启动经济计划以来，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一直通过一系列旨在改善社会经济保障的措施实施社会转移，这种传统由来已久¹⁴。但由中央管理的国家大型减贫方案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因此，1980年代下级政府

实施了参与程度和政治监督程度更高的更灵活计划。自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也逐渐启动了旨在加强教育和技能学习的一系列方案¹⁵，但其效果尚未全面显现。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未能防止自199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水平大幅上升的问题，这种问题在城市地区尤其突出。

在一些中亚转型经济体中，最近的社会转移计划一直未能特别有效地解决贫困住户需求问题，因为覆盖面和资金有限(Gassmann, 2011年)。普及国家补贴福利的社会福利政策源自前苏联，该政策通常意味着要将微薄的社会养老金资源稀薄地分配给广大的人口。此外，很多国家所设计的转移方案都不完善。例如，塔吉克斯坦只有43%的贫困住户从政府收到转移，但却有33%的非贫困住户收到了转移(Son, 2012年)。此外，分权化预算使那些最有需求的贫困地区往往只收到最少的资金支持。因此，应更加重视有关社会保护措施支出，并将该支出作为中央政府预算的一个项目列入，以持续提供可预测的资金(Gassmann, 2011年)。在该地区的最贫困国家中，迅速改革的机会似乎更有限，因为国内收入未能增长。因此，在这方面，这些国家需要获得额外的外部支持。

C. 政策建议

1. 经验教训

尽管人们日益意识到收入不平等上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很多国家财政政策设计所依据的信条依然是，只有国家尽量少地干预总体经济，尤其是尽量少地干预一个有利于更公平收入分配的格局，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福利。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基于这一信条所进行的有利市场的税制改革却未能实现其目标。

当税收体系中的再分配因素被弱化并因此加剧了更加不平等倾向时，资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增加并没有像预期那样伴随着固定投资上升。

这说明，如果主要考虑或只考虑税收和其他公共收费的正式影响(即：明显减少纳税更高者的收入)，则通常会对财政措施的总体影响进行错误评价。这种观点未能考虑到收/支类财政措施所带来的更公平收入和财富分配使整个经济所获得的好处。首先，纳税人获得了社会回报，只是这种回报可能与每个收入群体的税负不成比例而已。这种回报由直接惠益和面向全民的间接惠益组成，前者表现形式为政府整体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后者则表现为，在所支出的收入有助于减少不

平等和贫困以及腐败和犯罪可能性的情况下，可使社会更加和平和更具凝聚力。

第二，有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预算支出对总需求和实际收入的影响。政府支出不管其资金来源如何，都会对收入产生直接影响。政府收入以公共支出的形式反馈到经济中，这种支出是私人需求的补充。人们通常会忘记，并行提高平均税率和政府总体支出的举措会产生正的净需求效应，因为一些额外税收是以纳税人的

储蓄为代价的，而税收支出则会使总需求按照税收全额的幅度上升(Haavelmo, 1945年)。

财政政策设计还应考虑到税收结构对需求的间接影响，

因为该结构会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可支配净收入格局。在更公平地分配给定国民收入时，总消费和私企的固定投资积极性会更高一些，因为较低收入群体将收入用于消费的份额大于较高收入团体。在失业水平处于高位或者上升的情况下，这尤其重要。

因此，通过财政措施进行再分配可能对整个社会有利，当不平等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尤为突出时，尤其如此。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战后时代的头三个年代，

通过累进税和政府支出方式减少不平等和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

尽管对利润和最高档收入征收的税要高于普遍实施财政改革后的水平，但投资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通常会上升。有充分理由相信，企业家投资于新产能的意愿并不主要取决于某个时点的净利润，而是取决于他们对其追加产能所生产的货物与服务有着怎样的未来需求预期。在考虑公司税增加的总体影响时，这尤其重要。如果将所增加的税收用来增加政府支出，则会改善公司对需求增长的预期。这种需求效应不取决于追加政府支出形式究竟是政府消费、公共投资，还是社会转移。在通过有利的需求预期保持了固定投资水平时，即使初始税上升了，毛利润会也上升——而净利润也一般会上升。在此过程中，将会给整个经济带来额外收入和就业。

基于这些考虑，可从不同角度看待财政措施被同时作为刺激经济活动和改善收入分配手段的作用。的确，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课税和政府支出方式减少不平等的空间可能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很多。利用累进税对高收入采用较高的税率不会消除较富裕个人的绝对优势，而且不会打击企业家创新和获取更高收入的积极性。甚至可以将财富和所继承财产征税视为一种激励手段，这种手段促使下一代按照能够实现整个社会成果最大化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而不是依赖所继承的财产。

2. 课税、分配和增长

如第三章所述，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最近有更大比重的收入应计入最高百分位。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通过提高最高档边际税率，提高政府提高税收的潜力，或者减轻中等和低收入群体税负。显然，税收具有上限和下

限。下限取决于公共投资与服务最低额的资金需求。上限则难以确定，这不仅因为税收具有内生性(见下小节的讨论)，而且因为无法确定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会对税率变化做出怎样的反应。如果将税率提高到某个阈值以上(但无法准确确定该值)，那么税负比重最大者会做出行为方面的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会使税基和那些决定税基的经济活动都萎缩。

但即使有了这个理由，对最高一档收入或公司利润征收较高边际会税率的空间也可能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目前的最高档所得税率都远远低于那些能使总税收最大化的税率(Piketty、Saez和Stantcheva, 2011年)。根据该研究，能使税收最大化的最高一档边际所得税率介于57%和83%之间。利率下界指对“生产性”工作的最高一档收入课税，而税率上界则指对寻租活动(即：通过从现有生产中获取更大的份额，而不是增加生产，来为自己谋利益)和生产性工作这两者的最高档收入课税。在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下，这些数据都与2004-2008年期间18个经合组织国家最高档边际所得税率的实际平均数(43%)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此期间，其中只有三个国家的最高档平均边际税率略高于该值域的下界(57%)。如果最高百分位的收入来自寻租活动，则提高最高一档收入的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更有利，因为这可打击寻租行为和提高其他人的收入。

还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政策力求实现多重目标。从发展的角度说，向私人固定投资提供直接支持的财政措施很重要。但问题不是将利润课税降低到最低程度；实际上，自1990年代以来，法定公司所得税率的逐渐下降并没有使发达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毛额(GFCF)上升

(图5.3)。相反，所需要的是根据利润来源及其使用情况对利润进行差别化征税。例如，相对于纯金融活动，尤其是那些不能为整个经济带来好处的投机和“未赚取”资本利得而言，得自生产性创业活动的利润可按照低于它们的税率课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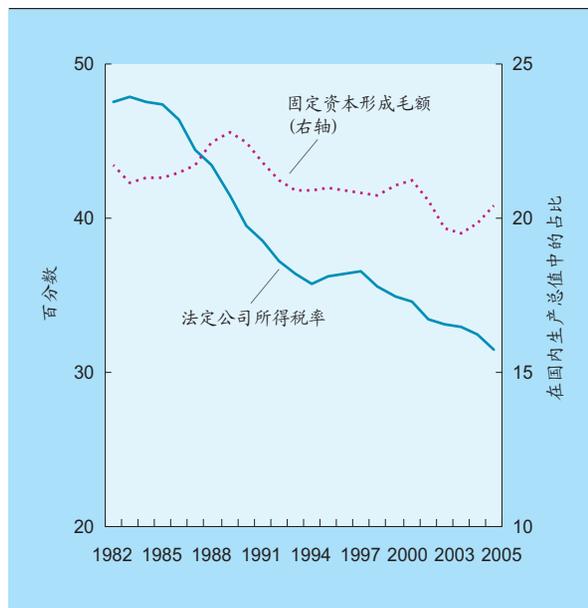
在金融部门迅猛扩大的情况下，这尤其重要。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对股票、债券、货币和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进行征税，都有可能帮助抑制那些要以实际投资资金为代价的破坏性投机活动进一步扩大，同时还可产生累进影响(另见联合国/经社部，2012年)。同样，按照较高税率对金融部门的奖金而非正常工资收入课税，可减少过度冒险的积极性¹⁶。在一个金融化的经济中，对资本利得课税(到目前为止，其课税通常都低于生产活动的收入)及其金融资产和实际资产价值的短期和长期变化之间的差额课税，也值得很多国家加以考虑。同样，其理由是，可减少短期投机性投资的积极性，并可提高税制的累进影响(Dodd, 2007年; Toder和Banemann, 2012年)。

此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可按照低于利润分配税率的水平对重新投资于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征税。此外，可对特定活动领域进一步征收差别税，以便鼓励利润—投资关系方面的支持活动，并为影响结构转变的方向和速度提供帮助(1997年《贸发报告》，第五章和第六章)。在发展中国家，按照高于大众消费的税率对奢侈品消费征税，除了带来累进影响外，也能在这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但是，还应指出，税制累进程度的提高可能并非总是意味着总体财政得到相应比例的增强。例如，在对高收入群体征收较高税的情况下，如果税收以政府债券(通常由较富裕阶层

图 5.3

1982-2005年若干发达国家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率与固定资本形成毛额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Deve-reux、Griffith和Klemm, 2002年的更新数据, 网址: <http://www.ifs.org.uk/corptax/internationaltaxdata.zip>。

注: 数据指以下国家的平均数: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持有其中的大部分)的利息支出形式重新返回到与原来大致相同的收入群体, 则会发生这种情况。同样, 如果税收的支出方式具有累进效应, 例如, 通过社会转移和公共服务的改善, 那么个人累退税可能不一定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因此, 重要的是整个财政体系在课税和公共支出结构方面的累进程度。

3. 发展国家的财政空间

前节考虑的问题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关, 不过这些国家和经济体在财政结构和有效增加某些公共收入的行政能力方面有很大差异。主要差异是, 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会更大地受到各种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如：商品价格和利率的波动，私人资本流入或官方发展援助形式的外部资金供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财政空间要小一些(因为他们的国民收入较少)。

但在这些限度内，财政空间主要取决于内生因素。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通过其对私人部门收入的影响，对宏观经济形势和整个税基产生影响(另见2011年《贸发报告》第二章)。在私人消费和投资疲弱的情况下，适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促进需求预期和投资意愿，并进而扩大税基。这还使政府有更大的空间增加税收，以便为那些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支出提供资金，并对面向不同收入群体的课税结构进行调整。相比之下，目前在很多发达国家中所奉行的以及在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各调整方案下所执行的那种一般性财政紧缩将会带来较低的财政收入，并进而减少这种财政行动的空间，因为这种紧缩会对总需求和税基产生负面影响。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适当设计的直接课税改革可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同时，促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税制的累进程度较低，而各地区和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异又很大，这意味着，其中很多国家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更具累进性的课税有效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当然，这不仅需要改变人们对财政角色的

看法，而且需要有较高水平的正规就业和适当的行政能力。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特定收入的能力有很大差异，具体取决于其发展水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另一方面，有很多潜在收入来源可促进不平等性的改善，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包括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收入。对财富和遗产课税是其中的一个潜在来源，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为此目的挖掘这方面的潜力。这需要的行政能力较少，规避难度较大，而且具有累进效应。

在资源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开采自然资源的收入，以及国际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得是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公共收入来源。政府可通过拨出较大份额的商品租金，确保其整个人口而非少数国内外行为从国家的自然资源财富中受益。在很多国家中，征收较大数额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的空间似乎都很大，特别是向那些活跃于石油、天然气和采矿部门的公司征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过去一个年代中，商品价格的上升和新能源的发现已使自然资源的收入潜力明显上升，非洲的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当商品价格带来暂时的贸易条件改善时，则不能作为政府收入和公共支出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即使是暂时的，也可利用初级部门的较高租金或意外利润帮助其他经济部门加速生产率增长和创造就业。这需要对意外利润征收特别税，并将税收转向其他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或国

拨出较大份额的商品租金可使整个人口而非少数国内/外行为受益。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可帮助避免争夺外国直接投资中的螺旋式税收下降问题，同时减税逃税问题。

家开发银行中这种不稳定收入的积累以及这些资金在一段时间内特定社会用途的扩大可有助于防止收入不平等水平的进一步上升。尤其适于对这种意外利润征收高额税，因为这些利润不是得自企业的成功，而是不受个别商品生产者影响的国际商品价格波动。

发展中国家税收政策的另一问题是如何处理采矿部门、制造和服务部门的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尽管跨国公司活动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具有加强东道国产能的潜力，但当其与国内生产者的联系很弱时，并不总能充分挖掘这种潜力。不过，为了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向投资者提供广泛的(有时甚至是过度的)财政优惠。尽管这些战略通常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但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因为为了将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到制造部门而提供的大幅税收优惠一般需要与那些也提供优惠的其他潜在东道国之间角逐。这会带来问题，因为会使税收呈螺旋式的下降，而这会减少所有相关国家的财政空间。此外，所有初始税收优势都会随时间消失殆尽。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可帮助避免这种税的角逐，使那些争夺生产场所的国家保持政府财政空间，同时保持那些可通过劳动力成本差异而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另见下文第六章)。外国投资者的本国政府可帮助防止这种税的角逐，这需要按照高于本国利润税率的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款课税，同时从收税中扣减那些通常已在东道国按照低得多的税率支付的公司利润税。在考虑本国与东道国之间巨大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的情况下，如能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利润仍然数倍于同一货物在本国的生产利润，那么将能实现这一目的。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也是减少逃税问题所需要的。为此，可将当前的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转为真正的政府间机构。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范本，2011年更新版》¹⁷的新条约将比基于经合组织当前范本的新条约更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供支持，因为前者为发展中国家赋予了更大的课税权。

尽管通过诸如以上的措施提高公共收入不足以增强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却很重要；正如下节所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增加部分是如何支出的。

在一些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可能难以或者无法迅速采取其中任何一种措施来扩大财政空间，因为其行政和征税能力有限。在这些情况下，需要多边金融机构和双边捐赠者提供帮助，也就是为社会支出提供额外资源，并为加强这些能力提供适当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4. 减少不平等的公共支出

为低收入国家的社会支出提供外部金融支持对于减少不平等愈加重要，因为一国的收入水平越低，其通过累进课税进行某种再分配的空间就越有限。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公共预算可能最好通过针对性强的再分配支出和促增长的公共投资来实现其累进影响。

基础设施、卫生与教育以及环保方面的公共投资可为提高生产率、实现生产多元化和其余经济体体面的正规就业创造条件。在旨在实现经济活动多元化的产业政策框架内，提供财政激励措施和改善公共服务，也能起到这一作

用。一般而言，这些措施可能不会直接减少不平等，但可有助于通过财政手段和收入政策增强结构转变的动力(见本报告第六章的讨论)。

通过向富人征税来改善公共教育可减少不平等和加速增长。但为提高总体技能水平，公共服务供应也纳入中产阶级，这也会最终有助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扩大未来税基。

增加政府转移还可帮助减少犯罪活动，从而缓解社会紧张和不稳定问题，并进一步激励投资和促进增长。有证据表明，直接政府转移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公共就业计划，如近几年若干发展中国家推出的计划(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可通过若干渠道对收入分配产生正面影响。首先，可向那些原本失业或没有获得任何失业金计划保护的工人提供收入。第二，可帮助建立有效的工资底线，这类似于强制正规私人部门雇主实施的最低工资。第三，通过这种方式所增加的货物与服务需求可帮助扩大市场，驱动其他经济领域的产出增长和就业，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扩大税基。第四，可与旨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应的项目相结合。最后，这类计划可吸引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向他们提供专业技能，或提升其现有技能，而这将会改善他们将来转向正规部门的就业前景。有证据表明，公共部门就业计划可加速增长，而且即使在行政能力低下的低收入国家中，也能成功实施(Weeks, 2010年)。

累进所得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各种收入转移、受教育机会和技能学习机会的改善可帮助纠正收入不平等问题……

……同时，这些措施可为国内需求提供支持，并可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增长和就业。

国家是否有能力推出社会保障计划，如老年养老基金或失业金，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这类制度的存在以及所覆盖人口的规模可对结构转变进程和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在失业保险计划的情况下，还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积极影响。与其他财政措施类似，他们还可鼓励自营者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进入那些工资

不会更高的正规部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收入群体而言，需要通过总体公共收入为这种社会转移提供资金，以实现理想的分配效应并确保尽可能广泛的覆盖面。对于中等和高等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可将特定个人的缴款为基础，个人福利将取决于这种缴款。即使这类计划含有累进成分，将缴款与福利挂钩也能促进人口为财政基础做贡献(Huber, 2009年)。国际金融机构和双边捐赠者可通过这一目的的官方发展援助分配，来为这类计划提供支持。

政府还可利用较高税收收入为各产业和农村部门的小生产者提供各种形式的优惠贷款和技术支持。除了为这些活动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提供支持外，这类资金供应还可作为吸引小型企业家和工人进入正规部门的一种手段，从而成为一种以各种制度，包括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动力之一。同样，当政府设法获取了租金利得以及国际外币形式的意外商品出口利润时，可将这些收益转向国家公共金融机构，由这些机构向其他部门的投资者提供外汇贷款，以便从海外购置资本货物和技术。

总之，累进所得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各种收入转移以及受教育和技能学习机会的改善可帮助纠正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这些措施可为国内需求提供支持，并可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增长和就业。但提高个人所得分配公平性

的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通过全面的政策途径扭转不平等水平上升问题需要从更广泛的视角对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定位，以考虑到生产投资、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那些会受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动态关系。下章将探讨这些问题。

注 释

- 1 计量经济学估计数据证实了有关这些图的这种解释。就图5.2A而言，利用稳健标准误，将整个期间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对最高档边际所得税率变化进行回归，可得出一个处于10%阈值(p-值 = 0.126)因而不具显著性的系数和一个很低的R-平方值(R-平方值 = 0.07)。就图5.2B而言，利用稳健标准误，将最高1%所得份额变化对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变化进行回归，可得出具有高度显著性的系数(p-值 = 0.001)和高得多的R-平方值(R-平方 = 0.50)。
- 2 对20世纪30年代前的美国政府税收制度进行评述后发现，当时的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关税、有选择的特种消费行为税和最终实施的公司所得税。此外，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税收(按照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进行测算)远远低于目前水平(Hinrichs, 1966年)。
- 3 有关该问题的更多讨论，见Reddy与Vandemoortele, 1996年；Devarajan与Reinikka, 2004年；以及Dupas, 2011年。
- 4 经计算，2002年后，拉美的财政空间增大，这主要与商品价格上升有关。在一些国家，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而得自税收、利润和商品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入在这个增加总额中差不多占了50%。收入增长的另一主要贡献因素是新措施注重累进税制(Cornia、Gómez-Sabaini和Martorano, 2011年)。
- 5 但有大量传闻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多社区的本地居民都为建设和维护那些不在整个税收体系之列的本地公益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们的贡献是没有记录的(如Ostrom, 1991年)。人们以资金和劳动力的方式为社会福利项目做贡献，这通常需要通过复杂的安排确定每个住户应该支付多少和搭便车者应该适用什么惩罚措施(Olken和Singhal, 2011年)。在给定这些安排的性质时，贡献可能很具累进性。有关发展中国家这类非正式安排的更多信息，见Schneide和Enste, 2000年。
- 6 由于1991-1995年与2006-2010年这两个期间的非洲国家构成有很大差异，因此，数据是根据1996-2000年和2006-2010年这两个期间计算的，以避免一些反映了样本构成变化的虚假计算。
- 7 联合国贸发会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 8 有关中学入学和受教育年限的数据分布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和拉加经委会，2011年。
- 9 有条件现金转移由面向贫困家庭的小额现金转移组成，以某些行为作为其条件，如：正常上学，确保某个年龄段的子女进行体检。这类工具广泛用来留住学校的贫困孩子，并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保健服务。源于巴西和墨西哥的这种有条件现金转移已日益成为受人欢迎的除贫手段，如今，有30多个国家提供这类方案(Fiszbein、Schady和Ferreira，2009年；Fried，2012年；劳工组织，2012年)。
- 10 新一轮社会转移方案包括：赞比亚于2003年推出的社会现金转移计划；肯尼亚于2004年推出的孤儿和脆弱儿童方案；埃塞俄比亚于2005年推出的生产安全网方案；加纳于2008年推出的“消除贫困、提高生计能力方案”，以及莫桑比克最近扩大的粮食补贴方案和马拉维面向极端贫困和劳动力紧张家庭的社会现金转移方案(Mchinji)。其他西非、中非和东非国家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试点方案，但这些方案还是更多地处于尝试阶段(海外发展研究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9年)。
- 11 政府通过加强保护系统对亚洲危机做出了反应，作为该系统基础的是：“五个社会保险计划(工伤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养老金计划、就业保险计划和长期护理保险)；一个社会援助计划(最低生活保障)和特殊类别的公共养老金计划”(Kwon、Dong和Moon，2010年：第8页)。此外，最低生活保障计划为贫困人口提供保障金，前提是他们需要参加培训、公共工程项目或社区服务(Kwon，2005年)。
- 12 措施包括：小农债务偿还期限暂缓三年——2001年4月至2004年3月，从中受益的有190万个家庭(Trakarnvanich，2010年)；通过泰国城乡周转资金推出小额信贷计划(Boonperm、Haughton和Khandker，2009年)。2005年推出了类似的村级项目，其目的是帮助各村解决其集体主义问题。为减少转向城市的移徙人口，支持地方创收，政府还于2001年推出了“一村一产品方案”，为人们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咨询和技术援助。最后，政府于2005年实施了“特殊目的实体”方案，以重点设立一个能够通过投入品供应为农业活动提供支持的国有企业。
- 13 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为打造马来中产阶级提供了支持，即：采取措施促进马来族获取资产和高薪工作，为他们的企业提供财务和管理培训，确定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入学份额，并为最贫困住户的活动提供支持。
- 14 有关社会经济保障的概念及其在印度的落实情况，详见Prabhu(2001年)的评述。
- 15 这些包括2008年推出的“有条件现金转移女童计划”(Dhanalakshmi)；2005年为通过接生制度减少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而于2005年推出的印度孕妇健康计划(Janani Suraksha Yojana)；1997年推出的女童赋权计划，该计划旨在为女孩的出生和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健康成人创造一个有利环境；2003年全民教育运动(Sarva Shiksha Abhiyan)推出的女孩初级教育国家计划；2004年推出的印度女子学校计划(Kasturba Gandhi Balika Vidyalay Scheme)，该计划力图阻止中等教育的女孩辍学率，确保18岁以下女孩能够留在学校。有关各邦的众多计划，详见Prabhu(2009年)。
- 16 这可作为金融部门和更普遍非金融公司部门报酬体系相关规定的补充。
- 17 见：http://www.un.org/esa/ffd/documents/UN_Model_2011_Update.pdf。

参考文献

- Aiyagari SR (1995). Optimal capital income taxation with incomplete markets,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constant discoun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6): 1158–1175.
- ADB (2008). *Social Protection Index for Committed Poverty Reduction*. Mandaluyong City, the Philippines.
- ADB (2012).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2: Confronting Rising Inequality in Asia*. Mandaluyong City, the Philippines.
- Bakija J, Cole A and Heim BT (2012). 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 tax return data. Working paper, Williams College, Williamstown, MA. Available at: <http://web.williams.edu/Economics/wp/BakijaColeHeimJobsIncomeGrowthTopEarners.pdf>.
- Barrientos A (2008). Cash transfers for older people reduc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Bebbington AJ, Dani AA, De Haan A, and Walton M, eds. *Institutional Pathways to Equity: Addressing Inequality Trap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69–192.
- Barrientos A, Niño-Zarazúa M and Maitrot M (2010). *Social Assist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atabase (version 5.0)*. Manchester,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 Besley T and Kanbur R (1990). The principles of targetin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8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Bird RM and Zolt EM (2005). Redistribution via taxation: The limited role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Series, 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tlanta, GA.
- Boonperm J, Houghton JH and Khandker SR (2009). Does the Village Fund matter in Thailan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01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Cornia GA (2012). Inequality trend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Latin America over 1990–2011. UNU-WIDER Working Paper No. 2012/09,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 Cornia GA, Gómez-Sabaini JC and Martorano B (2011). A new fiscal pact, tax policy chan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last decade. UNU-WIDER Working Paper No. 2011/70, UNU-WIDER, Helsinki.
- Chu KY, Davoodi H and Gupta S (2000).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ax, and government social spending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U-WIDER Working Papers No. 214, UNU-WIDER, Helsinki.
- Devarajan S and Reinikka R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3(1): 142–166.
- Devereux S (2007). Social pensions in Southern Af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3(3): 539–560.
- Devereux MP, Griffith R and Klemm A (2002). Corporate income tax reforms and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Economic Policy*, 17(35): 451–495.
- Dodd R (2007). Tax breaks for billionaires: Loophole for hedge fund managers costs billions in tax revenue.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pm120/>.
- Dupas P (2011). Global health systems: Pricing and user fees. Stanford 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lsevier Encyclopedia of Health Economics*.
- ECLAC (2010).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10*. Santiago, Chile.
- ECLAC (2011).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11*. Santiago, Chile.
- Engel EMRA, Galetovic A and Raddatz CE (1999). Tax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le: Some unpleasant redistributive arithmeti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9(1): 155–192.
- Filgueira F, Molina CG, Papadópulos J and Tobar F (2006). Universalismo básico: una alternativa posible y necesaria para mejorar las condiciones de vida. In: Molina CG, ed. *Universalismo básico. Una nueva política social para América Latina*.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Fiszbein A, Schady NR and Ferreira FHG (2009).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Redu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over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vailable

- at: <http://www.worldbank.icebox.ingenta.com/content/wb/bk17352>.
- Fried BJ (2012).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The case of Brazil's Bolsa Família. *World Development*, 40(5):1042–1053.
- Gassmann F (2011). Protecting vulnerable families in Central Asia: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nocenti Working Paper No. 2011-05, UNICEF Regional Office for CEE/CIS, Geneva, and 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Florence.
- Gelbach JB and Pritchett LH (1995). Does more for the poor mean less for the poor? The politics of taggin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152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Gemmell N and Morrissey O (2003). Tax structure and the incidence on the po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No. 03/18,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ottingham.
- Gemmell N and Morrissey O (2005).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mpacts of tax structure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little we know.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3(2): 131–144.
- Giovannetti G and Sanfilippo M (2011). Social prote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s. *VoxEU*. Available at: <http://www.voxeu.org/index.php?q=node/6041>.
- Gofñ E, López HJ and Servén L (2011). Fiscal redistribu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 39(9): 1558–1569.
- Gordon RH (2010). Public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China.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1(1): Art. 7. Available at: <http://www.degruyter.com/view/j/jgd.2010.1.1/jgd.2010.1.1.1024/jgd.2010.1.1.1024.xml>.
- Haavelmo T (1945). Multiplier effects of a balanced budget. *Econometrica*, 13: 311–318.
- Heady C (2001). Taxation polic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IDER Discussion Paper WDP 2001/81, UNU-WIDER, Helsinki.
- Hinrichs HH (1966). *A General Theory of Tax Structure: Change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Law School International Tax Program.
- Huber E (2009). Including the middle classes? Latin American Social Policies 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Kremer M, van Lieshout P and Went R eds. *Doing Good or Doing Better: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37–155.
- Hungerford TL (2011).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ong tax filers between 1996 and 2006: The role of labor income, capital income, and tax polic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ILO (2010). Extending social security to all: A guide through challenges and options. Geneva.
- ILO (2012). Social protection floors for social justice and a fair globalization. Report IV (1),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101st Session, 2012. Geneva, ILO Publications.
- Jomo KS (2012). Transfer pricing is a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issu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Available at: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ez/global/08938.pdf>.
- Khattry B and Mohan Rao M (2002). Fiscal faux pas? An analysis of the revenue implication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30(8): 1431–1444.
- Koskela E and Vilmunen J (1996). Tax Progression is good for employment in popular models of trade union behavior. *Labour Economics*, 3(1): 65–80.
- Kwon H (2005).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3): 477–497.
- Kwon H, Dong G and Moon H (2010).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Kore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Policy in Times of Change of the Social Policy Association at University of Lincoln, 5–7 July.
- Leung JCB (2006).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5(3): 188–198.
- Lindert K, Skoufias E and Shapiro J (2006). Redistributing income to the poor and the rich: Public transf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P Discussion Paper No. 060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Lopez-Calva LF and Lustig N (2010). Explaining the decline in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Technological change, educational upgrading and democracy. In: Lopez-Calva LF and Lustig N, eds. *Declin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 Decade of Progre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UNDP.
- Martorano B (2012). The impact of Uruguay's 2007 tax reform on equity and efficiency. Working Paper No. 06/2012, University of Florence, Florence.
- McLure CE (1984). The evolution of tax advice and the taxation of capital income in the USA. *Government and Policy*, 2(3): 251–269.
- Mesa-Lago C (2004). Evaluación de un cuarto de siglo de reformas estructurales de pensiones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de la CEPAL*, 84, December: 59–82.
- Mkandawire T (2007). Targeting and universalism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Ocampo JA, Jomo KS and Sarbuland K, eds. *Policy Matte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to Sustain Equitable Development*. Hyderabad, London and Penang, Orient Longmans, Zed Books and Third World Network: 305–333.
- Møller V and Sotshangaye A (1996). My family eats this money too: Pension sharing and self-respect among Zulu grandmothers. *Southern Africa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5(2): 9–19.

- Musgrave RA (1959).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McGraw Hill.
- Musgrave RA (1990). Comments. In: Slemrod J, ed. *Do Taxes Matter? The Impact of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15–321.
- Musgrave RA and Thin T (1948). Income tax progression: 1929–194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6(6): 498–514.
- Narayan D, Chambers R, Shah MK and Patesch P (2000). *Voices of the Poor: Crying out for Change* (Conference edition). Washington, DC, Poverty Group, World Bank, June.
- Niño-Zarazúa M, Barrientos A, Hickey S and Hulme D (2012). Social prote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Getting the politics right. *World Development*, 40(1): 163–176.
- ODI and UNICEF (2009). Strengthening social protection for childre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Regional Thematic Report 1. Dakar, UNICEF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Regional Office and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www.odi.org.uk/resources/docs/4573.pdf>.
- OECD (1989).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s in OECD Countries*.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 OECD (2011).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 Olken BA and Singhal M (2011). Informal tax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3(4): 1–28.
- Ostrom E (1991).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acios R and Pallarés-Millares M (2000). 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pension provision. World Bank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Piketty T (2010). Commentary on ‘Taxation of Wealth and Wealth Transfers’ by Boadway R, Chamberlain E and Emmerson C. In: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eds. *Dimensions of Tax Design: The Mirrlees Revi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25–831.
- Piketty T and Saez E (2007). How progressive is the U.S. federal tax system? A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1): 3–24.
- Piketty T, Saez E and Stantcheva S (2011). 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 A tale of three elasticit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61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Pissarides CA (1998).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tax cuts on unemployment and wages: The role of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tax structur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2(1): 155–183.
- Prabhu KS (2001). Socio-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pervasiv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India. SES Discussion Paper,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 Prabhu KS (2009).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schemes for alleviating human poverty: Relevance for India. Discussion Paper No. 1, UNDP, New Delhi. Available at: http://www.undp.org.in/content/cct/CCT_DP.pdf.
- Ragayah HMZ (2011). Malaysia’s new economic model: An assessment of its strategies for inclusive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regional workshop on Social Inclusiveness in Asia’s Emerging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in Jakarta, organized by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13 September.
- Reddy S and Vandemoortele J (1996). User financing of basic social services: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UNICEF Staff Working Paper Series, UNICEF, New York.
- Rodrik D (2006). 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 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4(4): 973–987.
- Sáinz P and Calcagno A (1992). En busca de otra modalidad de desarrollo. *Revista de la Cepal*, no. 48.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ecember.
- Sandford C (1993). *Successful Tax Reform: Lessons from an Analysis of Tax Reform in Six Countries*. Bath, Fiscal Publications.
- Schneider F and Enste D (2000). Shadow economies: Siz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1): 77–114.
- Skoufias E, Lindert K and Shapiro J (2010). Glob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public transfers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orld Development*, 38(6): 895–907.
- Son HH (2012). Evaluating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 in Tajikistan.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3(2): 179–188.
- Steinmo S (2003).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ideas: Tax policy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2): 206–236.
- Sung MJ (2009). The effects of taxes and benefit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rates in Korea.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65th Annual Congress of IIPF at Cape Town, 13–16 August.
- Tang J, Sha L and Ren ZX (2003). *Report on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in Urban*. China, Beijing, Huaxia Press.
- Tanzi V (1987). The response of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to the U.S. Tax Reform Act. *National Tax Journal*, 40(3): 339–355.
- Tax Justice Network (2011). The cost of tax abuse – A briefing paper on the cost of tax evasion worldwide.

- Available at: http://www.tackletaxhavens.com/Cost_of_Tax_Abuse_TJN%20Research_23rd_Nov_2011.pdf.
- Toder E and Baneman D (2012).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expenditures: an update. 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
- Trakarnvanich B (2010). Performance based budgeting system: A study of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ailand. PhD thes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angkok.
- UNCTAD (2002).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From Adjustment to Poverty Reduction: What is New?*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2.II.D.18,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08).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Debt Sustainability: Oasis or Mirag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4.II.D.37,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1997).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Globaliza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7.II.D.8,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5).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Features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5.II.D.1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Global Partnership and Nat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6.II.D.6,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Commodity Prices, Capital Flows and the Financing of Invest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D.21,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9).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ponding to the Global Crisi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 09.II.D.16,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mployment,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1).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Post-crisis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1.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DESA (2008).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8 – Overcoming Social Insecurit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C.1, New York.
- UN/DESA (2012).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12 – In Search of New Development Financ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2.II.C.1, New York.
- Webb S and Shariff K (1992).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djustment programs. In: Corbo V, Fischer S and Webb S, eds. *Adjustment Lending Revisited: Policies to Restore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69–92.
- Weeks J (2010). Active macro policy for accelerating achievement of the MDG targets. New York, UNDP, September.
- World Bank (1991). *Lessons of Tax Refor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Xiulan Z and Yuebin X (2010). From social insurance to social assistance: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urba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20(1): 41–51.

重新思考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A. 导言

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中，为确保市场进程取得有效成果，需要拉大资本和劳动力收入之间的差距，以及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本章认为这是一种误导的观点。

本报告第四章阐述了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式。本章认为，在理解这些势力对众多国家所产生的明显影响时，应结合考虑那些致使失业率不断攀升和居高不下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该章建议，无论全球化还是技术改进都不一定要求收入分配进行一种将使富人受益和穷人失去生活条件改善手段的转变。在许多国家，如果能采取更适当的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那么即使不能预防，也能缓解其不断上升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还不会对其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在过去几个年代，还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但却不能反映经济现实的独特思想流派，该学派认为不平等问题加剧是全球化进程以及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资本和更先进技术的“正常”结果。本章对此表示了质疑，认为如果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市场经济随时间演变的方式，并据此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和进行制度建设，则可实现一种更公平和更有效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

在有关增长与发展的问题上，主流经济理论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众多国家目前就经济政策所展开的公开辩论

中。众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趋势已日益引起了民众和众多政策制定者的担心。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为克服当前经济危机而正在提议和实施的各项措施却往往会进一步加大不平等问题。在过去的35年中，收入差距在日益拉大，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一些国家为应对危机而正在提议和实施的各项措施却往往会进一步加大不平等问题。

经济动荡与危机日益频繁，这些问题使人们对许多国家中传统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所依据的理论产生了巨大怀疑。的确，观察也发现，拉大收入差距一直未能减少失业，因此，有必要重新确定基本政策的方向。

经济缓慢增长所带来的失业率攀升问题会对不平等产生双重影响。首先是直接影响，失业者收入要比其就业时的潜在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其次，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往往会削弱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从而对实际工资施加下行压力。

本章将从功能性和个人收入分配两个方面阐述不平等。B节将讨论失业率上升与工资份额下降之间的关系。该节指出，采用简单的新古典供求模式是错误的，因为该模式强调了劳动力市场上关于提高工资灵活性的普遍呼声。在通过工资下调措施应对初始需求冲击时，该模式没有考虑到这种调整对内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模式的各项政策会因工资占比的下降而加大不平等，不仅无法创造额外就业机会，或防止失业率上升，而且还往往会抑制消费者需求，减少固定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按平均生产率增长对平均名义工资进行定期调整可防止工资占比的下降，并能创造额外内需，从而带动产量的增加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本章C节将继续对如下主张进行反驳，即：提高公司或部门工资的灵活性(也就是：拉大公司或部门内类似职业的工资差距)有助于减少所谓的结构性失业。该节认为在一个充满活力和高效的经济中，无论是从总体上说，

还是从整个公司来说，有助于吸收冲击、加快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不是工资灵活性，而是利润灵活性。

前几节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了工资、生产率和就业之间的交互作用，本章D节将根据该分析，为那些旨在取得更好收入分配、增长和就业成果的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建议。这方面核心要素是加强旨在支持集体工资谈判的机构，并将收入政策纳入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包。此举可将实际工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需求增长与生产率趋势联系起来——其中的家庭需求是大多数经济中决定产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还可扩大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各组合的选择范围，有助于货币政策比过去更能鼓励投资和增长。

发展中国家可通过一种能够促进内需的方式，更加平等地分配生产率增长成果，从而大幅减少不平等现象。

这是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特别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发展中国家可能比发达国家更需要大幅度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在这些国家，传统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所传承的权力和商品利好常

常不利于创造一种有时被称之为“机会平等”的东西，而这又是成功进行灵活劳动力分工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专业化和劳动力分工水平的提高为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了巨大潜力。这些国家还可利用其他国家所开发的先进技术，并将这些技术与其相对廉价的国内劳动力相结合，这意味着它们还可通过一种能够促进内需的方式，更加平等地分配生产率增长成果，从而大幅减少不平等现象。

显然，发展中国家若想防止不平等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或者实现其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目标，则需要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特别是有利于最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地区的政策。在生产率

增长和商品租金成果中收取更大的份额也能拓宽政府的“财政空间”，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促平等公共服务”支出，尤其是教育和职业技能形成方面的支出。为进一步加深劳动力分工，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加其正规制造部门的固定投资，将大量贫困自营职业者和非正规行业从业者吸引到正规行业——这些就业有望为他们带来合理、可靠和不断上升的工资收入。

除与国家政策有关的这些问题外，D节还将从国际角度分析就业—工资—增长关系，并将特别关注确立适当货币制度防止实际汇率错位的必要性。本节还呼吁发展中国家在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条件时进一步加强合作。该合作旨在更加公平地分享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实际工资相结合时所带来了巨大生产率成果。

B. 失业与工资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

1. 传统方法：通过抑制工资增长创造就业

在过去几十年中，与增长和发展相伴的是大量失业。从197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一直未能低于6%很多(见图6.1)。人们希望市场机制能带来充分就业，并至少能让劳动者获得一定份额的收入持续增长，但所有地方都几乎未能如愿以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官方失业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整体失业率仍然较高。的确，将迅速增长的劳动力吸纳到生产性就业领域依然是发展的一项主要挑战(2010年《贸发报告》，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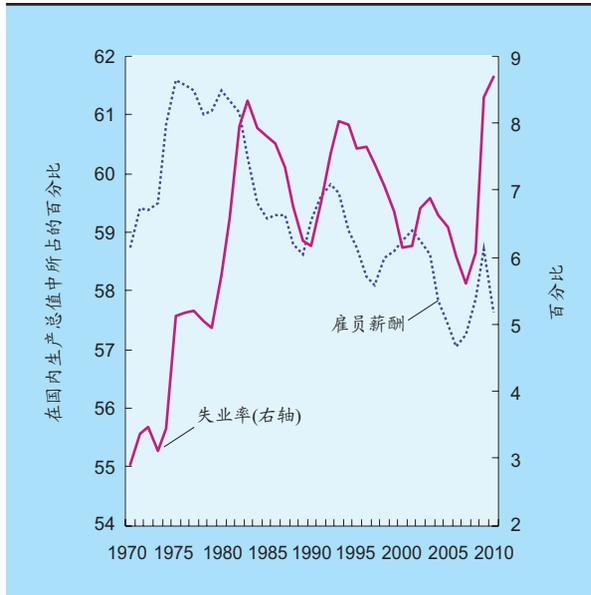
197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政策显然无法应对不断攀升和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这一状况促使各国经济思想回归到1920年代的主流经济模式。当时认为工人不愿接受低工资是失业率毫无起色的主要原因(如，见Hayek, 1960

年)。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差距太小以及工会不愿意接受较低工资是新失业问题的主要元凶(例如，见Nickell, 1997年；Siebert, 1997年；Elmeskov、Martin和Scarpetta, 1998年)。

从1980年代末开始，经合组织一直主张恢复这种基于简单新古典劳动力市场模式的旧方法。的确，许多国家根据其建议制定的政策都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过去三十年中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不平等水平上升现象。1994年，《经合组织就业研究》根据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阐述了应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非凡效果的这种机制，具体如下：

调节过程本身取决于雇主对劳动力需求与就业愿望之间的相互关系，前者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为负相关，而后者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为正相关。从原则上讲，会有一个实际工资水平，

图 6.1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
雇员报酬与失业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经合组织统计摘要数据库；欧委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EC-AMECO)；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数据库。

注：发达国家不包括东欧国家。雇员报酬是以要素成本为基础按照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进行计算的。德国1991年的数据出现中断，这与其该国的统一有关。

或更确切地说，会有一个实际劳动力成本水平能够确保所有愿意按照这一工资水平接受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经合组织，1994年，第一部分：第69页)。

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市场的自我均衡，除要求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成本之间为负相关外，还要求工资水平对市场条件做出反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疲弱会对实际工资造成下行压力，反之亦然”(经合组织，1994年：第二部分，第3页)。

该立场正是大约60年前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所批驳的，具体如下：

因此，古典传统作家忽略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特殊假定，因而必然得出了一种在他们所假设的背景下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显性失业……实际上肯定是由于失业要素拒绝接受与其边际生产率相对应的报酬所致。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会同情那些拒绝削减其货币工资的劳动者，因而承认，努力满足那些暂时的条件可能是不明智的；但诚实的科学态度又迫使他宣称，这种拒绝才是麻烦的根源所在(凯恩斯，1936/1973年：第16页)。

显然，无论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上升，大量工人失业都会对工资产生下行压力，因为工资谈判中的权力天平倾向了雇主。这种情况会削弱或无法加强工会和社会运动。主流经济学家被联合了起来，以废除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工资下行刚性、过紧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其他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因素。过去25年中所普遍采取的各项政策一直是努力保持一个低于总体生产率成果的工资增幅，同时认可资本收益占比的相应增长。

面临持久失业威胁的工人常常会接受较低的工资，以保住他们的工作。表面上看来，这是正常市场进程的结果，在该进程中，货物供应过剩会诱使其价格下降，而价格下降则会使需求增加。但若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整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这种简单的供求机制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容易应用；这的确容易产生误导(2010年《贸发报告》，第三章)。

不断攀升的高失业率是实际工资超过其均衡水平的结果——这种解释在上世纪70年代很难轻易抛弃，当时发达国家的工资占比创了历史新高。但在随后的几个年代中，实际工资增长远低于生产率增长，但失业率却在上升。这说明依靠简单市场机制就能解决失业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就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出现新一轮

暴涨之前，即：从2007年不足6%的水平蹿升到2010-2011年的近9%之前，工资在总体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跌落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即从1980年的61%以上下降到57%)。这应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失业率升幅大于过去三十年任何其他衰退期间的失业率升幅，那么即使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下降，一种主要以解决持续失业问题为由来拉大不平等差距的经济理论也定然会出现某种根本性错误。

就业论中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假设名义工资下降预示着实际工资的持续下降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比价的变化。这将刺激公司未来聘用更多劳动力和减少资本，以改变生产流程。但这必须有极快的行动和所有企业的同时参与：企业只有迅速从一种生产结构转到另一种结构，才能防止整体需求下降。但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劳动力与资本比价变化进行调整的条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若每个人或每小时的工资下降，而工人数目或工作时数的增加不能抵消工资的下降，则工资总额会下降，从而会进一步诱使需求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太可能会因为工资持续走低和需求不变的预期而做出战略性决策和进行旨在多用劳动力和少用资本的流程调整。

这种推理的关键点是事件的先后顺序，而不是正常供求曲线下相关市场的先验逻辑。经济衰退时期削减工资会增加就业和产量——这一普遍思想所依据的假设是，供与求不仅是给定的，而且还各自独立。但基于部分均衡分析的这一观点不适用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贸发报告》，第三章，B节)。

的确，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近期经验显示，宏观经济运行方向与就业及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模型所建议的方向相反。多年来，美国工资一直落后于生产力，但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其失业率升幅一点不亚于以往衰退期间的升幅，甚至比以前更持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像美国自2010年以来的那样，在脆弱的复苏阶段削减工资，则会适得其反。

就雇主而言，削减工资似乎可以减轻衰退对其利润所带来的压力。但，如果私人住户需求的进一步下降使其业务受到了更大的打压，并对价格施加了额外的下行压力，那么这种缓解也只是短期的。在住户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公司将不得不相应削减其生产。与此有关的附带效应是，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降低会导致投资计划的下调和更多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名义工资下降会带来较高利润的这种预期要以总体需求不变作为其假设。但这种假设不能反映现实情况。同样，时间顺序至关重要。如工资下降之后需求立即下降¹，则不会像预期那样在工资下降之后取得较高的利润，因为第一轮总产量的下降会对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这种分析适用于封闭经济体，但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如果出口在总需求中的占比很大，则其适应性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在某些情况下，出口的确可能会对降薪做出积极反应：如果只在一个国家削减工资，该国生产力趋势不受影响，且其汇率不会上升，那么工资下降可能会刺激出口需求(因为提高了价格竞争力)或提高出口部门的利润。如果像大多数经济体那样，内需大于出口，那么对需求的总体影响仍可能为负，但不应低估竞争力增强所带来的潜在影响。甚至一次性改善一国的竞争力也可能对出口需求产生持续影响，因为该国生产商获得市场份额，因而可从全球需求增长中

在脆弱的复苏阶段削减工资，会适得其反。

获得与其不相称的利益。如通过削减工资实现实际汇率的持续下降，而又没有一个外汇机制可通过货币升值加以补偿，则会严重扭曲国际贸易，造成大规模失衡问题，因为其对竞争力的影响将会随时间逐步累积并对该国带来巨大的绝对优势，德国就是这样(见下文D.5节)²。

此外，如为提高竞争力而将部分生产力增长转化为较低的出口价格，则会产生合成谬误：一国以其他国家的成长和就业机会为代价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生产商与国内出口商竞争的国家中，会采取类似的战略，这往往会引发工资的螺旋式下降，但不会对就业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

2. 其他方法：将工资增长作为决定需求增长的关键因素

上述分析对解决不公平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力市场分析不应孤立进行，而应与整体增长相结合。这是因为创造新就业是产量增长积极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工资下降或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下降所致。人们发现，发达国家就业周期和发展周期密切相关。就业增长通常与总需求及产出增长密切相关(图6.2)。这些国家之间随时间推移所出现的宏观经济和就就业绩差异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立场的差异而非其总工资灵活性的差异度所致。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的战后期间，就业增长要比以前快得多，而工资限制程度则远远低于只有极少新就业机会的前两个年代。尽管工资具有灵活性，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很小，但像2008年和2009年经济大萧条那样的经济下行也会减少就业。为减少失业，所有发达国家都需要在提高大众收入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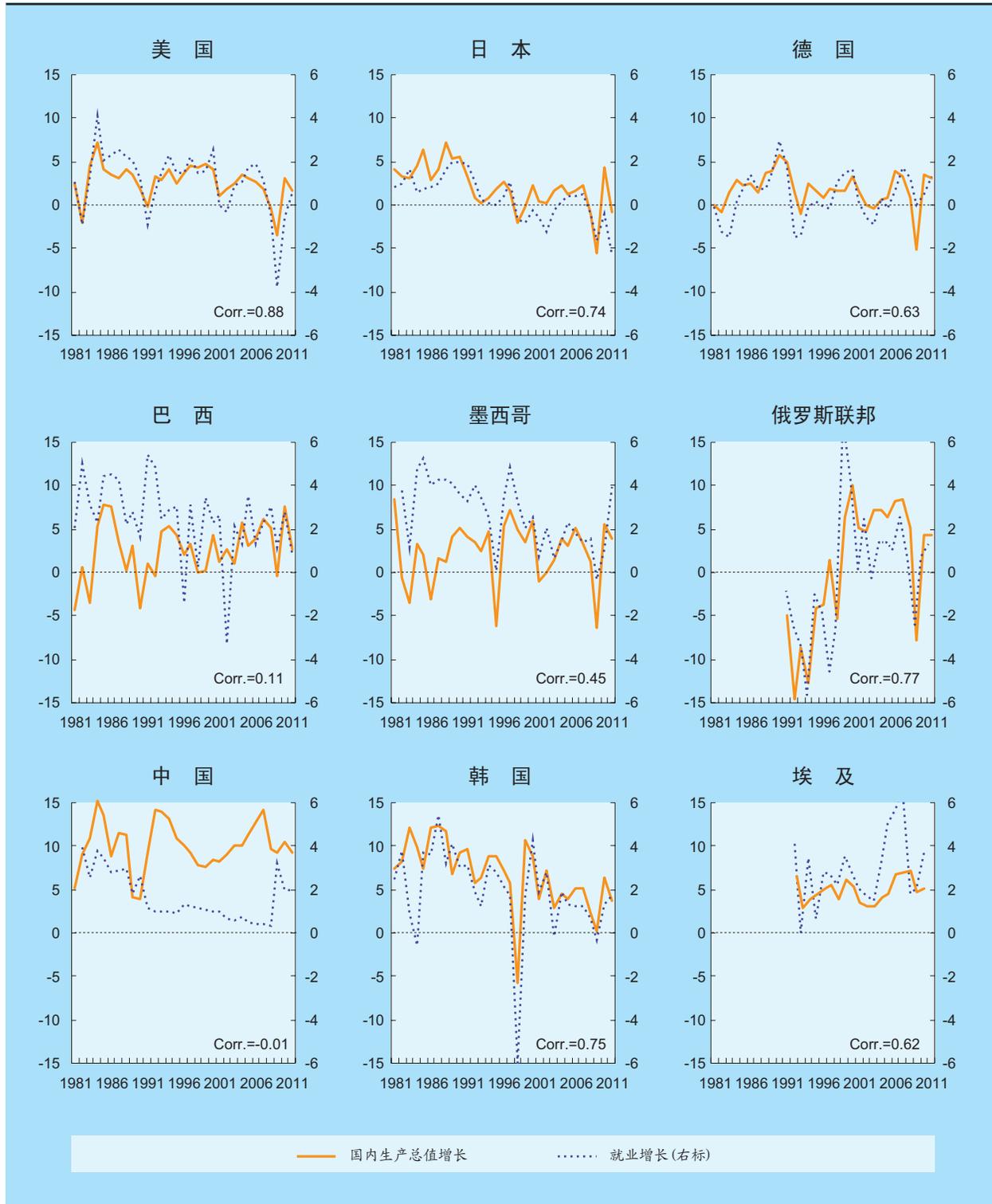
复苏，而这也通过其对进口的影响，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出口和收入机会。

如果认为提高总体工资灵活性和降低平均工资的举措能使总体经济体实现劳动力取代资本之目的，并以此为由认为这种举措促进就业所必须的，则可直接推翻这一主张，因为发达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毛额(GFCF)与就业创造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图6.3)。这种相关性与新古典模型相矛盾：在现实世界中，公司既会有资本和劳动力方面的投资，也会有这方面的撤资，其投资水平取决于整体经济状况，而该状况又决定了这些公司对需求的预期。这意味着，在宏观经济背景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相互替代性非常有限。更确切地说，为实现所计划的产量，需将它们结合起来作为互补性投入品用于生产过程中，这种结合要视某一时间点的现有技术而定，而与其价格比或功能性收入分配关系不大，甚至无关。

因此，实际产能投资和促进这种投资的需求增长是实现收入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尽管相对于增长而言的就业弹性可能会因国家而异和因期间而异，但增长、就业和投资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流行观点相左，这种观点认为，将收入分配从劳动力转向资本，从储蓄倾向低的较低收入群体转向具有较高储蓄倾向的高收入群体，可补救适应问题。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或固定资本形成毛额与正规就业之间的关联性弱于发达国家。其部分原因是非正规就业和自营职业的变化抑制了周期效应，因为在正规就业与一种可被定义和测算为失业的类别之间，这两类就业充当了缓冲机制。的确，由于缺乏社会安全网，在经济困难时期正规部门的下岗工人往往会流入非正规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情况要比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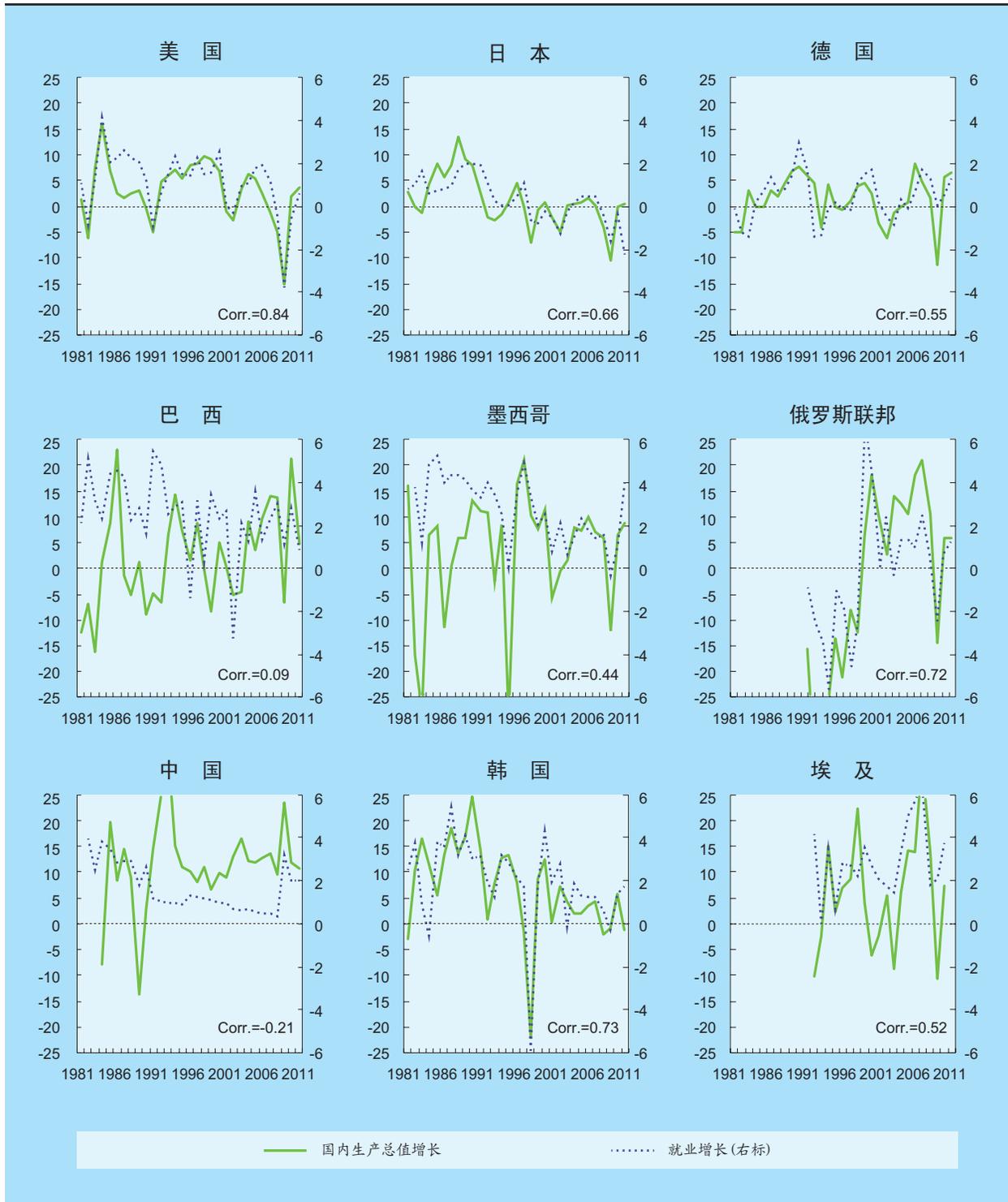
图 6.2

1981-2011年若干国家就业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表1.1的数据；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LABORSTA与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数据库；经合组织“统计摘要”(StatExtracts)数据库，“年度劳动力统计”与“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库；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以及各国资料。

注：Corr. = 关联度。

图 6.3

1981-2011年若干国家的就业增长与固定资本形成毛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采用了:联合国/经社部,“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LABORSTAT与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KILM)数据库;经合组织“统计摘要”(StatExtracts)数据库,“年度劳动力统计”与“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库;拉加经委会统计数据库(CEPALSTAT);以及各国资料。

注: Corr. = 关联度。

国家明显(2010年《贸发报告》,第三章,B.3节)。在那些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联系通常较弱,因为短期增长会对国际上有关其出口商品的定价做出强烈反应。事实上,从2002年至2008年期间,强劲的商品价格上升势头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以及商品或正规部门的就业增加(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10年)。不过,除中国外,在图6.2和6.3分析的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就业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之间依然为正相关。就中国而言,除非正规部门和自营职业的重要缓冲效应外,人口趋势在就业演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当外部对中国出口需求减弱时,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大规模一揽子刺激措施为促进就业提供了帮助。

在一个动态经济中,是否能在不增加不平等现象的情况下使失业率下降,关键要看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是如何分配的。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关键在于名义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从该角度讲,问题关键不在于要素成本,而主要在于作为总体需求主要决定因素的工资所发挥的作用(如,工薪阶层的消费)。较高工资和较低的不平等水平可刺激需求和产量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可鼓励投资者增加产能投资,并对就业和生产率增长产生附带效应。

由于生产率的连续增长会增加经济体的供应能力,所以只有当公司预期总需求同步增长时,才能避免失业率上升问题。由于国内工资收入是国内需求的主要动力,所以按照生产

率的总体增幅对实际工资水平进行定期调整将有助于稳定需求预期,产生足够的有效内需,从而避免失业率的上升。这有助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需求增长、投资、生产率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本章D节将讨论这种推理对政策的影响作用。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还需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不是表现在宏观经济进程中,而是表现在公司对生产和投资的决策上,以及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但农业和服务部门的规模通常很大而且不正规,小规模自营职业很常见。此外,制造部门的正规就业在整个有酬职业中的占比较小,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的作用通常比其在发达国家的作用小得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几乎普遍采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部门主要根据外部需求和全球市场竞争情况来决定其生产和投资。此外,这些国家从更先进经济体进口了其大多数高端技术。这似乎加剧了技术进步、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与创造就业之间相结合的问题。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保证所有生产率增长成果都能转化为所有人口群的收入增长,这一点甚至更重要。

毫无疑问,在那些依然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国家,增长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关联性不如发达国家那么直接。国际上对初级产品的定价走势通常会对其增长表现产生很

较高工资和较低的不平等水平可刺激需求和产量增长……

……而这反过来又可鼓励投资者增加产能投资,并对就业和生产率增长产生附带效应。

大影响。2002年至2008年期间，强劲的商品价格上升势头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却未能带来商品部门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这一更充分的理由说明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从较高商品租金中拨出一大部分注入到其他急需额外投资的部门，以促进多元化和创造正规就业(详见下文D节第3小节的讨论)。

在那些已经具有更加多元化生产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情况有不同。其中一些经济体的技术追赶行动已通过其净出口的扩大带来了可贸易品产业的迅速增长。但即使在制成品出口量大且在增长的国家，有时也会发现这种成功只能对制造业总就业产生不大的影响。这一点可从以下方面得到佐证：其出口导向型产品多为资本高度密集型，国内市场在与进口品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活动领域出现了就业流失问题。因此，这些国家

更迫切需要确保其增长能够带来更多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压低工资以保持或改善外部竞争力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增长还通常以较低价格的形式传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使其生产率获得了较大增长，但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某些制成品出口价格却一直在下降了(2005年《贸发报告》第四章)。可以理解，奉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制成品生产者是为了获取刚才所述的竞争优势。但支持该战略的政策制定者应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剥夺大部分人口在生产率增长成果中的应有份额。此外，还会使收入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从长远来看，这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危机期间或全球增长缓慢期间，尤其如此。

C. 企业工资灵活性和市场经济活力

尽管事经验明，将失业率增长归因于过高工资的观点具有严重缺陷，而通过抑制工资来减少失业和更严重收入不平等问题而努力未获成功，但却极少有人对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提出质疑。更有甚者，基于理论推理，人们更加注重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性”。与其说这是指各部门和企业之间以及一段时间内类似职业的工资结构灵活性，还不如说是指总工

资水平的灵活性。这意味着下放工资制定权，并在各企业间和企业内部根据个人表现实行差异化工资。提高工资的“相对灵活性”加大了不同部门或企业员工之间的不平等。据认为，这可消除所谓的“结构性失业”。同样，率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经合组织，该组织指出：

尤其是，尽管如今的利润份额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在现行工资水平下，

提高工资灵活性，减少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和加强竞争，可使失业人员更容易地找到工作。尽管有了适度的工资水平，但相对工资的灵活性可能一直不足，或者过度职位保护可能不利于人员雇用(经合组织，1994年：第一部分，第73页)。

该组织还指出：

各种建模工作探讨了工资/价格刚性与就业/产出表现之间的某些关键联系。这些联系往往表明，工资和价格刚性差异的确会对失业趋势和周期性变动规模和持续时间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从更长远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较差和工资刚性较强的经济体似乎有可能会经历更持久的失业和通胀问题。因此，旨在减少劳动力市场刚性和改善灵活性的政策可能会减少外生干扰所致负面失业变动的规模和持续期限，并可更容易地缩小产出差距(经合组织，1994年：第一部分，第69页)。

按照这一观点，很多发达国家的最低薪酬职业和最高薪酬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还不足以克服结构性失业问题。正如经合组织所述(1994年：第二部分，第2页)“十分灵活的工资结构可确保能力不会妨碍就业：各种能力的人群都可通过自身定价找到工作”。

尽管有关不平等问题之担忧在日益加剧，但依然有人坚信，在国家和企业一级提高工资灵活性和进一步弱化集体制定工资制度是适应需求变化的唯一途径(Barkbu、Rahman、Valdés等人，2012年)。例如，欧洲央行(ECB)行长在呼吁进行“旨在提高灵活性和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时，实际上是在暗示，很多国家坚持维护其福利状态是妨碍欧洲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主要绊脚石³。同样，在提到欧元区危

机时，基金组织指出，可通过“一个能对企业经济状况做出更敏捷反应的工资制定机制”，改善各经济体适应冲击的能力(基金组织与20国集团，2012年：第1页)。该观点所依据的信条是，甚至失业和通胀的周期性变动都会由相对工资灵活性所驱动。这意味着，甚至在总工资水平下降后，居高不下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会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而持续存在。

本章B节表明，从总体上说，劳动力不能只“通过定价寻找工作”。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对特定部门或个别企业的工资进行调整是否是应对冲击的有效方式。源于外部或内部的冲击是否应该通过灵活的工资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来消减？什么样的调整造就了昔日市场经济的上好增长、投资和发展表现？什么样的调整吻合了劳动力就业变化和资本变化之间高度相关的经验证据？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初步思考。

按照传统的观点，对企业货物或服务的需求下降会促使企业解聘工人，以避免产能利用率下降所带来的利润下降问题。为了通过“自身定价重返工作岗位”的下岗工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以保住工作或尽快找到另一家单位。这样，即使个别公司持续存在生产下降问题，也可恢复全面就业。根据这一推论，即使生产水平不如从前，工资下降也有助于首轮下岗工人重新就业。但在市场经济体中，需求骤降不是个别公司所经历的常见冲击。在任何给定的总需求下，需求对某个公司的冲击通常都由竞争对手的战略举措和消费者的偏好变化所致。⁴

按照竞争逻辑，如果某个企业的货物与服务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那么需求将会转向那些具有更成功企业战略的竞争者。前一

企业所流失的岗位将通过更成功企业竞争者所增加的岗位加以弥补，为满足市场对其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企业需要通过增加工人来增加其产量。在这一进程中，所需要的不是下调工资，而是为下岗工人暂时提供旨在避免工资压力的安全网，同时提供再培训和学习新技能的机会。

如果获胜公司通过采用新生产技术或引进新产品取得成功，那么最终会对就业产生类似影响。一项新技术，如能提高某个工厂的生产率，并为创新公司的可比产品暂时带来某种优势，则往往会促使价格的普遍下降，因为其他企业会模仿创新。另外，还会使实际工资以及整个经济的国内需求普遍上升。这使那些不再被创新公司所需要的工人在那些从需求增加中获益的其他企业中找到工作，而无需接受下降的工资。如果实际工资的上升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同步，那么需要通过实际经济增长来扩大用以吸收大量工人的市场需求。

如果一个公司或部门的业务模式由于消费者偏好发生变化而过时，那么更灵活劳动力和更灵活企业或部门工资可减少失业的这一观点则更缺乏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下行企业工资灵活性意味着保持相当于由工人提供补贴的过时工资结构。如果此时，其他企业从其产品需求上升中获益，那么合理的反应结果不是工资下降，而是过时企业的利润下降和闲置产能关闭。与此同时，从消费者偏好中获益的企业将会增加新产能和吸收暂时失业者。同样，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是否被淘汰出局的主要驱动力是利润而非工资的升降。⁵

一般来说，企业工资调整不会有效，因为通常无法确定企业受冲击影响的具体理由。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补贴，不管是由政府提供还是工人提供，都不适于用来应对特定市场需求下降所带来的挑战。由于工资下降会降低宏观层面的需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切实可行的预测方案表明，一个能对供求冲击做出有效反应的动态市场体系会是工资下降和不平等水平上升。

反对提高工资灵活性的另一重要论据是，企业所聘劳动力的技能和资格千差万别。有关其中每种技能的劳动力细分市场各不相同，这些细分市场的运行方式取决于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性、工会化程度和工资谈判的集中程度。在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工人流动性大或工资谈判集中的情况下，可以预计，其中每个细分市场所支付的工资都类似。这意味着，个别企业必须接受市场为给定资格所确定的工资。因此，如认为企业工资灵活性可通过基于工人边际生产率的工人报酬水平来提高总体效率，则不切合实际。边际生产率理论概念所依据的理念是，可测算和明确识别贡献(如，某类工人的一小时工作)。但在大多数的现代生产背景下，却无法测算每个雇员对其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有多少贡献(框6.1)。

个别企业为价格接受者，因为价格是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确定的。因此，当冲击对某个企业造成影响时，该企业不能削减工资，因为工人会干脆离职到别处谋职。诚然，可能有很多因素会妨碍工人的区域性流动，这可能会将货币工资的均等化限制在某个地区或聚集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将个别企业所受到的正面冲击列入考虑时，反对提高企业工资灵活性的理由则更充分。例如，如果企业家采用了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创新理念，从而可以按照

公司是否被淘汰出局的主要驱动力是利润而非工资的升降。

工资的确定与边际生产率

边际生产率理论概念所依据的理念是，可对贡献(如，特定工人的一小时工作)进行测算和加以明确识别。如果在给定劳动力细分市场中向所有工人支付同样的工资，那么如果某工作流程增加了一小时，而在增加的这一小时中，所生产的产量低于以前的各小时(规模回报递减的生产流程)，那么所有工人都不得不接受降低的薪水。只有当投入到生产流程中的众多不同雇员是高度标准化的，且能明确加以识别和测算时，这一概念才有效。但在大多数现代生产背景下，情况都不是如此。

在绝大多数雇员的工作环境中，都无法测算某个生产小组各成员的边际贡献和相对贡献。例如，某位医院护士的边际生产率是多少？相对于外科主任或行政主管而言，其对总成果的贡献如何？由于这些是未知的，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雇员报酬都大致反映了资格类似者的稀缺性或供应状况而不是其个人的边际生产率。经济体因特定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率而获得的总体生产率增长通常反映在货物的降价中，因为生产货物的效率提高了。较低的价格水平意味着，尽管每个雇员的生产率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但所有雇员的实际工资都相应地提高了。从整个团队所增加的产出中获益的是团队(在这个极端形式下)——即整个经济体这个团队，而不是生产流程中的个别雇员。^a

^a 以一名小学教师为例，40年中，这名教师都在讲授完全一样的内容，教学没有任何创新，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薪水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如果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了整个经济的价格下降，那么这名教师的购买力将会提高。如果经济体确立了明确的通胀目标，则不得不按照该具体目标加上生产力增速后的幅度来提高所有名义工资，但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并不会改变调整程序的实质。

低于以往的价格供货，那么重新商洽其企业工资的做法将会起反作用。首先，如果预期其公司的工人会立即争取其中的部分开拓者租金，则会减少潜在开拓者的积极性，从而减少经济的创新动力。尽管其他工人可能愿意接受一份低于该企业原有雇员的工资，但一种更有效的安排是保持个人工资不变，而将该企业因为高于平均生产率增长水平而暂时获得的较高利润奖励给该企业。这还使他们能够将部分开拓者租金用来减少其产品价格，而这会使整个经济的竞争性产品价格下降，因为效仿者会模仿这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从而使所有工人受益。

如果每个劳动力细分市场的工资都往往会趋同，那么利润可能会有暂时的明显差异。正如凯恩斯所观察的那样(1930/1971年)，这些差异有助于将经济体的资源从不再需要的地方转向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地方。部门或企业一级的工资灵活性不会促成这种结果。相反，灵活的工资往往会保留过时的结构和大大减少经济体适应新环境和挖掘创新潜力的能力。

如以上各段所述，跨期结构转变以开拓性企业为其特征，这些企业能够按照快于其竞争者的速度提高生产率，或者能够通过推出新

产品吸引额外需求。因此，可采用特定企业较高的生产率和整个经济体的给定工资来解释其成功。

该原则也适用于国际结构转变，在涉及发展中国家时，即：当初始转变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进程或者是因为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时，尤其如此。在将更发达国家的技术用于工资和平均生产率水平要低很多的另一国家时，通常会带来国际结构转变。因此，注重国际或跨地区转让的投资行为和已知技术的采用会带来较低价格或较高利润。但这种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冲击类似于跨期转变的冲击。同样，单个企业或其分支机构面临着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这些企业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因而可按照较低的价格提供类似产品。还是一样，努力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来维护市场份额的行为不利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不平等问题。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获取别处开发和已经使用的技术对于经济追赶必不可少。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中那些利用这种技术的生产者进行竞争时，如果其个别企业或部门将工资下调，也能起到类似于保护主义措施的效果。由于用心良苦的政府和工

会错误地认为这能保护就业而未加重视，所以这种做法经常发生。但就像对那些受困于内部冲击的下滑企业提供补贴一样，这种做法将适得其反。更合理的做法是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做法：这些国家会利用其增加的出口收益从发达国家购买更多的进口品，而这不仅能为发达国家的他企业创造新机会，还能创造新就业。

总之，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下调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会加大利润和工资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当一个经济体面临最常见的冲击，即：需求冲击时，这种做法对于失业问题无济于事。企业或部门一级的工资灵活性以及由此拉大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也同样无济于事，因为这会减少各企业之间的潜在竞争动力以及创新投资的积极性。现代市场体系的合适动力是灵活的利润而非灵活的工资。在现实世界中，各种冲击主要通过利润而非工资来消减。基于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如此。利润变化会使企业通过调整适应新形势而不是做其力所不及之事。在任何发展阶段，调整政策都不应以孤立劳动力市场基于灵活工资的新古典静态模型为指导，因为在通过调整应对国际或跨期冲击的情况下，这经常会产生不平等问题。

D. 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建设

1. 参与型社会与动态调整

正如本章B节和C节所述，有关经济增长和追赶以及持续改善所有人群福利方面的战略不能通过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方式来取得成功。的确，很多国家的较慢增长和较高失业都与这种解除管制的做法有关。

由于劳动分工在进步，而每个参与者对其成功的依存度在上升，所以，重要的是要根据生产率所带来的增长情况按照能够增加货物和服务需求的方式来分享利益。若想避免失业率持续上升的风险，或者不想一再通过“以邻为壑”的政策姿态来为其剩余供应创造需求，那么这种分享方式将是一个经济体可以采用的唯一方式。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由绝大部分人口分享这些成果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和凝聚力，而且对于增长也至关重要，因为作为国产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这些人口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大的需求，而这会促进生产。

收入增长和全民就业战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在由私人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不仅融资条件会对这种投资产生强大影响，而且该资本所产货物和服务的预期需求增长也会对这种投资产生强大影响。因此，只有当所有生产活动的收益都通过所有收

入群体的私人住户分配时，才能指望广泛系列的活动获得投资增长并最终实现更大程度的多元化。这需要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监管制度安排对营利者和工薪阶层之间的谈判权进行系统化权衡，因为前者是投资的决定者，而后者则是消费需求的主要驱动者。此外，借助于其他非正统政策工具可增加政策选择和潜在政策工具组合的数量，这些可用来实现理想的产出增长和较高的就业率，同时避免通胀上升和不平等问题。

2. 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

一旦认识到，市场机制不能通过加剧不平等问题做法来恢复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均衡，政府在稳定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对于创造就业和收入分配将至关重要。如果任由高失业率给工资所带来的压力在整个经济体内蔓延，则会额外发生巨大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的政策防止这一问题。

目前，欧元区是工资抑制措施失灵和宏观经济政策不利于增长的最典型例子。在该地区的南部欧洲成员中，尽管大幅削减了工资，但失业依然在飙升。为吸收这种剩余劳动力，需要通过那些以固定资本形成为基础并以实现强劲增长动力为目标的适当货币、金融和财政

政策，来创造额外就业机会(另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和2008年《贸发报告》第四章)。迅速通过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积极解决失业率上升问题的政府也可尽量减少不确定性的持续时间和岗位流失威胁。在衰退时期或增长潜力未能充分发挥时期，强有力的逆周期政策对于那些缺乏或者无充分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尤其重要。之所以有理由认为可用美国更积极的经济政策姿态取代欧洲更先进的社会安全网，其原因正在于此。另一方面，如果欧洲打算在危机期间削减福利方案支出，则需要改变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态度。如在削减安全网的同时，取消宏观经济激励措施，则注定要失败，而且会带来更多的失业和更大程度的不平等。

除了旨在支持就业和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外，适当的收入政策能为实现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收入不平等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如通过某种规则来确定大众收入的演变情况，则能为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方面的工作提供很大方便。一种基于这类规则的良好收入政策可有助于防止增长进程中不平等水平上升的问题，同时还有助于就业增长，因为这能稳步地扩大内需。收入政策应确保平均名义工资上升与平均生产率(外加通胀目标，见下文)保持同步，这是其核心特征。这类政策的实施需要有一个与各国经济结构和特定历史背景相适应的制度框架。这种框架甚至更重要，因为收入政策不仅可作为创造就业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可作为控制通胀的一种手段。

为保持工资份额和确保实际工资增长不会超过经济体供应能力的增长，名义工资调整还应考虑到具体的通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

应牢记，在没有重大进口价格冲击的情况下，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即：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确定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具有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在创造了足够就业且失业率在下降的期间，尤其如此(图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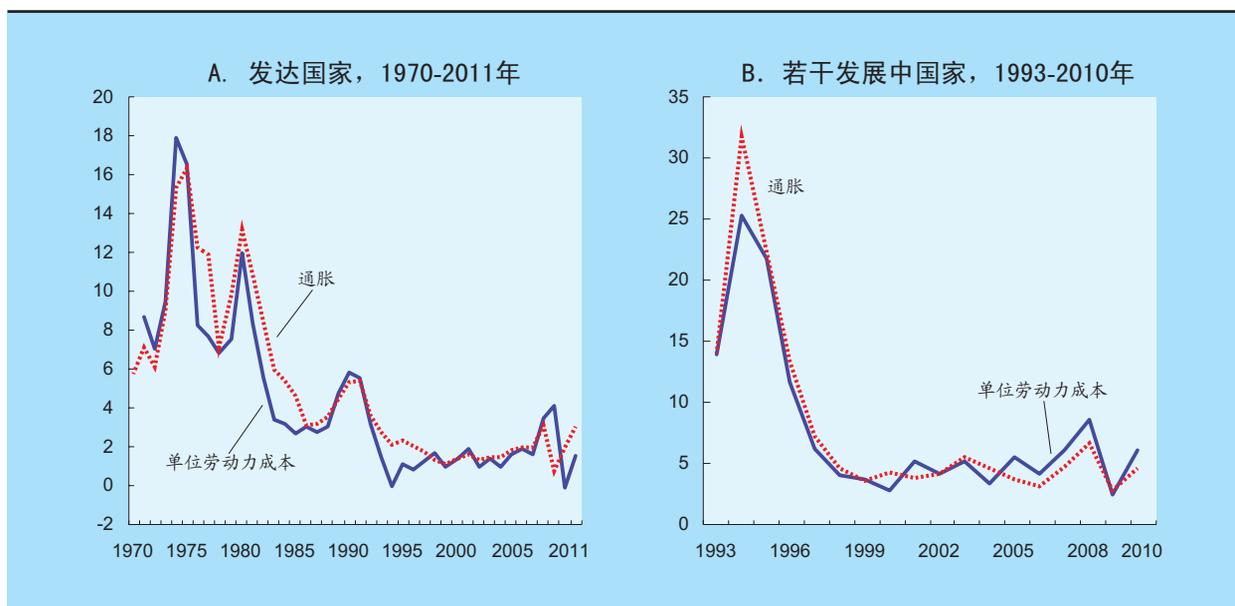
当一个经济体的工资上升时(涨幅通常按照平均生产率增长加上具体的通胀目标来确定)，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将保持不变，而整个经济体将会创造足够数量的需求来充分利用其产能。在应用这种规则时，工资调整应具有前瞻性(前向调整)。这意味着，应根据生产率趋势和政府或央行为未来期间所确定通胀目标，而不是生产力的实际增长率和以往期间的通胀水平来进行调整(即：后顾性/后向调整)。

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包括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和相关治理改革。

中期生产率趋势(例如，五年期间的年均增长)优于实际年生产率增长，因为后者往往会波动，而且会受产能利用的周期性变动影响，因而不能为可持续收入增长奠定基础。此外，工资不应根据以往通胀水平进行指数化调整——但在实践中却经常这么做。这种计划往往会使通胀长期存在，而不会确保理想水平的实际工资。这是因为，当需求上升速度快于产出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的生产者能将这种上升传递到价格中。相反，采用所提议的计划将能确保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决定未来通胀的主要因素)不会超过通胀目标。

1970年代中期以及1980年代初，为应对石油冲击影响而进行的后顾性工资调整便是一个佐证(框6.2)。另一例证是一些曾有过极高通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固然，这些国家的名义工资上涨不是引发通胀的唯一元凶。但通常由

图 6.4

单位劳动力成本与通胀的年增长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的数据, 采用了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数据; 拉加经委会的统计数据库(CEPALSTAT); 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统计: 主要总量和细目表》; 欧委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EC-AMECO); 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

注: 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整个经济。若干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中国、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韩国、南非和突尼斯。

外部冲击引发的一次次不断加速的通胀却漫溢到名义工资增长中。这加速了成本—价格的盘旋, 因为政府试图通过后顾性指数化机制来保护工资收入免受通胀的影响。这种工资政策的代价很大, 因为在顶着成本给价格所施加的持续上行压力的情况下, 央行为了将通胀降到目标水平, 有义务一次次地提高利率。这种为了名义上稳定的做法妨碍了实际投资和就业。

这样, 将工资与生产率增长及央行通胀目标挂钩还有利于央行防止通胀, 并为央行刺激投资和增长提供更大空间。根据所提议的计划, 实际产能投资也能从名义工资调整中受益。这是因为当内需增速与供应潜力增速接近时, 能诱导企业投资, 刺激工业增长和创造就业。

将名义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趋势及通胀目标挂钩能确保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保持不变, 但不会提高该占比。如果在引进该计划之前, 已实施了若干年的工资限制措施, 那么该占比可能会稳定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因此, 政府最好纠正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果, 以解决不公平问题和国民不平等问题。但是, 如果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没有事先达成协议, 那么按照一个大于生产率增长与目标通胀率之和的幅度来提供名义工资将难以实现这一目的。在工薪阶层需求增长的情况下, 雇主如不愿意因为较高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而减少其利润, 则可很容易地将较高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转嫁到价格上。这样, 提高工资占比的任何举措结果都会适得其反: 价格上涨能恢复利润, 但在同时, 通胀上升则往往会减少工人累积储蓄的实际值。此外, 还会促使央行采

框 6.2

为应对进口价格冲击而进行的工资调整

进口价格急剧上升给供应带来的负面冲击有其自身原因。以往引用最多的例子是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初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石油冲击。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较高油价和无弹性石油需求导致了最初的通胀冲击时，名义工资和工资结构相当具有刚性的国家能更成功地防止由此所带来的通胀加速问题。这是因为，工资刚性意味着名义工资的刚性和实际工资的灵活性。只有当通胀火花从货物市场窜到劳动力市场时，对货物市场的一次性价格冲击才会转化为较高的通胀(即：持续价格上涨)。在根据实际价格水平对工资进行指数化调整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具有所谓的后顾性指数化计划的很多国家(如，意大利的自动调整条款)，便是如此。该计划是为了防止实际工资的下降和保护工人免受通胀引起的再分配影响。但当进口价格急剧上升时(如石油)，则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朝着有利于国内利润的方向转变，而是带来有利于第三方的再次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利于外国石油供应商。首先受到较高进口成本冲击的国内生产者将工资上涨部分转嫁到价格上，从而将一次性价格冲击转化为永久性的较高通胀率。这促使央行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从而使就业水平下降。

从工资调整不能反映实际通胀这个意义上说，名义工资刚性最好用来调整进口价格冲击，因为它可带来实际工资的灵活性，而这对于避免首轮通胀所引起的持久性高通胀是必不可少的，在采取不利于增长和就业的限制性货币政策时，这还可防止这类政策所带来的额外需求冲击。

取限制性更强的货币政策，这会对投资、增长和就业产生附带影响。避免这一问题的唯一方式是采取价格控制措施。

如希望避免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干扰问题，那么在任何情况下，试图提高工资占比的政策都需要取得高度的社会共识。但政府可采用有利于谈判权弱势一方的其他工具来纠正市场结果，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可采取的政策包括：累进课税(见第五章讨论)；将更多收益用于各种偏向某些目标群体的社会转移。也可增加旨在改善基本货物和服务供应及其可负担性的公共支出。

本《报告》对不平等问题的各种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需要通过一些制度

安排来实施所建议的名义工资制定规则。最重要的是，政府要为全国性工会的设立和赋权提供支持，这对于收入政策的成功实施可能很重要。整个经济体内类似职业的工资平等对于减少收入不平等以及保持大众需求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的同步将至关重要。通过强大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可大大方便这一目标的实现。可通过政府的工资调整建议或导则影响他们的行为。

可通过这种方式促成一种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增长，同时确保工资增长既不会大大超过也不会大大低于一种能够有助于稳定价格和就业的速度。可能需要更加注重这种制度建设和相关治理改革，对于那些正在扩大其制造部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应如此。

此外，为顺利适应需求冲击，重要的是要让那些面临压力的工人需尽快通过“自身定价重返市场”——如上所述，这没有可能性——即使有了保护，也是如此。另外，最好保护工人免受长期失业之苦，这不仅有其社会原因，而且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这甚至可能更重要。为防止货物或金融市场受冲击后的高失业问题“传递到”工资上，需要有严密的安全网。这有助于暂时失业者在不会大幅降低其生活水平及其货物和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寻找其他经济领域所创造的岗位。

3. 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收入和就业政策

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生产率增长潜力。因此，也完全可以通过更平等地分配生产率增长成果来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这需要有一种能将各种额外因素列入考虑的收入政策，具体政策要视每个经济体的特征而定(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尤其是，这些方面包括农业领域的大量自谋职业者和那些从事非正规活动的人员。另一方面与租金分配有关，这类租金指自然资源开采租金，以及在将进口先进技术与本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时，尤其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在出口导向型行业实现这种结合时，得自巨大生产率增长成果的租金。第三个方面与全国范围的集体谈判和监管机制有关，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方面往往都比较薄弱。下文将对这些方面进行讨论。

(a) 在庞大非正规部门和小规模自谋职业的背景下减少不平等现象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和自谋职业都在总就业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此外，很多国

家的自谋职业一直在上升，因为现代正规部门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因此，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有关正规部门的收入政策外，重要的是还要采取措施提高非正规工人和自谋职业者的收入和购买力。通过各种机制将农业生产者价格(及其相关农民收入)与经济体的总生产率增长挂钩可逐渐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这类机制在发达国家中的使用已有几十年，可使农业活动从业者能够分享其余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成果。同样重要的是，这部分人口往往会购买本地生产的消费品，因此，还可通过农业研究与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公共投资、政府协助的农业支持组织和政府向小规模农场主所提供的优惠贷款，来促进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另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毫无疑问，理想状态是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包括提高农场主报酬，但应牢记，经济发展将伴随着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将自谋职业的众多贫困人口和非正规部门的从业者吸引到正规可靠的就业，这些就业有希望为他们带来合理、可靠和不断上升的工资收入。在持续扩大正规部门的同时，加强社会安全网有助于防止工人在失去正规部门的工作后重返非正规部门。

(b) 商品价格、租金和不平等

依赖商品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另一挑战，即：如何管理自然资源开发和国际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收入。为确保商品租金(即：自然资源售价与开发成本之差)有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这些国家的有关当局应与那些从事其自然资源开采的各个公司(通常为大型外国跨国公司)做出适当的合同安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合同都要求从这些公司收取较

高的特许开采权利金和各种税，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转入国内经济(另见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D节)⁶。

商品出口价格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可按照类似于前述生产率增长的方式分享。但是，因贸易条件改善而提高实际工资总体水平的空间会受到供应的限制，因为需要有供应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因此，除了这种政策外，还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国内投资的融资成本，改善国内众多企业家的贷款渠道，以增加固定投资，生产国内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在预计商品价格只会带来短暂的贸易条件改善时，这将尤其重要。

(c) 将先进技术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租金

如以上B节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生产者通常要采用进口的先进技术，在从事出口生产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东道国通常通过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获得这种技术转让和进口更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类投资有助于大幅提高低薪酬国家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以这种方式将先进技术与较低劳动力成本相结合时，所获得的成果一般由雇主(不管是国内雇主还是跨国公司)以较高的利润形式，或者由外国消费者以较低购买价格的形式所分享。由于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决定各国和各地区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所以雇主通过降价所能实现的市场份额租金或利得可能会极高。

低薪酬国家所面临的政策挑战是，确保国内工薪阶层能从这种资本与劳动力结合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成果中获得适当份额。如任由一个解除了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来决定工资水平，

则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同样，收入政策可在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亚洲一些成功工业化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的追赶战略中，那些获得了大部分这类生产率租金的国内生产者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出口导向型活动中的再投资，从而创造了新就业机会。但这一进程只能持续到那些具有较高生产率和低薪酬的新一代竞争者出现时。因此，显然有必要加快总体工资的增长，以便通过国内大众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来保持有效需求的扩大(1996年《贸发报告》第二部分，第一章)。

因此，一般规则是，名义工资调整应以所有部门的平均生产率上升为基础——这些部门包括那些通过先进技术与国内低工资的结合获得了大幅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这有助于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减少各部门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难以实施这一规则时，有关国家的政府可对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垄断租金进行适当征税，然后利用该收入增加国内对国产货物的需求，这也能收到类似的效果。可直接通过公共部门采购，或者间接通过暂时工资补贴、公共就业方案和/或对地方私人投资者的资金支持，来促进内需。

4. 法定最低工资

在发展中国家，劳工保护程度以及劳动力和雇主的组织程度很低，很少有用以确定工资和就业状况的组织化谈判。因此，如希望按照生产率增长加上通胀目标的幅度来进行名义工资调整，则极难为这样一种收入政策确定一个制度框架。由于这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建立一个能够有效代表工人和雇主的主管机构，因此，一项可用以减少不平等问题且能得到更快落实的措施可能是确定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

《贸发报告》第五章)。在其他国家中，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可能是集体谈判的一种有益补充。

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不过一些具有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发展中国家也许不是总能全面落实这种立法。尤其是，那些缺乏严密社会安全网的国家经常而且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选用最低工资标准来保护低技能工人不受强大雇主的剥削。然而，尽管有很多经验证据表明，法定最低工资对失业没有影响或只有很小的影响，但一些人士批评指出，政府确定工资的行为是对有效市场的干扰。这些批评家认为，旨在保护低技能工人的最低工资立法可能会确定一个超过劳动力均衡价格的工资水平，因此，相对于没有这种立法的情况而言，这会加大工人继续失业或陷入失业的风险。有650多名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可改善低薪酬工人的福利，不会带来批评家所声称的那种负面影响”（经济政策研究所，2006年）。

在作为批评家推理基础的新古典模型中，最低工资取决于特定资格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但在大多数职业中，都既无法测算某个生产小组个别成员的边际贡献，也无法测算这些成员的相对贡献(框6.1)。因此，所有社会都有很大空间可用来确定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而又不会违反任何市场规律或供求原则。例如，如果规定最低工资应始终按照有关经济体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来确定，则难以想象这种安排何以会增加某些群体陷入失业的风险。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货物和服务很可能会变得更贵，而一大群雇员的购买力将会提高，而这将有助于整个经济体创造额外收入和就业(另见20国集团，2012年：第12页)。

大多数最低工资计划都根据通胀进行指数化调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根据以往通胀而非通胀目标来选择指数化机制，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根据生产率增长进行的调整都不在该机制之列。与上述一般工资调整的理由一样，这种指数化也会带来问题，尤其是，这种调整会带来通胀惯性。同样，如根据经济体平均生产率增长加上目标通胀率之后的幅度对法定最低工资进行定期调整，而不是武断地根据各利益集团对政治决定的影响来调整，则可能会对投资—生产率—增长动力产生积极影响。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阶层的收入来减少贫困，而且还可在生产率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中，通过较高需求和较高利润所创造的额外就业减少贫困。此外，法定最低工资及其定期调整可作为私人部门工资谈判的重要基准。

5. 国际框架

前节有关国家政策的讨论间接假设，根据总体经济背景不同变化进行调整的过程既不会受到负面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的影响，也不会受到其他国家所奉行的不同政策的影响。

但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开放经济世界中，一国的宏观经济正在日益受到外部动态和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些可能会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产生强大影响。出于各种原因，一个国家(包括其所有公司)可能会通过其更强大的价格竞争力持续保持高位运行的经常账户和贸易盈余。在单边或多边确定汇率的情况下，这有可能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却没有反映在其货币估值中的结果。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德国是一个典型例子(框6.3)。另一方面，一直作为很多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特征之一的是货币被高估并使其丧失竞争力，这会带来

框 6.3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德国的相对成功与欧元危机

1999年，建立了欧洲单一货币区，与此同时，德国开始通过新举措解决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诸如减少工作时间的计划和其他措施都未能减少失业问题，1999年，政策制定者、雇主和工会领导在其三方协议中同意摒弃传统方案，即：工资增长不再按照生产率增长加上通胀目标的幅度力求工人的平等分享。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选用了一种有利于资本的再分配战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生产率增长转化为就业，从而以此减少失业。

德国新的劳动力市场方案以及欧元区各国货币的废除使各国之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出现了巨大差异——而单位劳动力成本则是决定价格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很少上升，而在南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名义工资增长则略超过各国生产率增长和一致商定的2%欧洲通胀目标。自推出欧元以来，法国是完全依照商定名义工资增长路径的唯一国家：法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与国家生产率表现及欧元区2%的通胀目标一致。

尽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员之间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小幅差异，且价格和工资的增幅很小，但这种情况却持续了多年，因此，随时间累积的这种差异会很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头十年之末，德国和东部欧洲之间的成本和价格差距已上升到25%左右，而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这种差距则上升到15%。换言之，尽管本国货币不再存在，但德国相对于其大多数欧元区伙伴而言的实际汇率却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单位劳动力成本与价格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对贸易流量产生了强大影响。尽管在建立欧元区时以及建立欧元区之前的数年中，贸易流量相当平衡，但在欧元区建立后的头十年，不平衡水平急剧上升。德国出口增速远快于进口，因此，其经常账户盈余加大。同时，南部欧洲和法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则在加大。甚至在金融危机冲击及其对全球贸易产生破坏性影响之后，出口受到影响的德国在2010年和2011年迅速恢复了其盈余，达到了每年约1,500亿欧元的水平，其中与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约占了800亿欧元。

当前的深度衰退以及赤字国家的紧缩方案往往会减少有形贸易赤字。但是，如果竞争力不发生根本转变，这些国家将缺乏刺激增长的必要动力。该经验显示，一国相对于那些具有类似贸易结构的其他国家而言所具有的绝对和累积优势不具有可持续性；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迟早得缩小。否则，那些必须为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的贷款人将会面临不确定性，而这往往会使利率上升。对于那些由于经常账户赤字而累积的债务，为了能够支付其净偿付额，债务国的经常账户必须在某个点附近摆动。因此，必须为债务人实现其经常账户盈余提供可能性。但是，如果盈余国家千方百计地维护其盈余地位，那么债务人违约将不可避免。

欧元区的经验还显示，各国间的竞争状况不同于企业间竞争。个别企业可通过其基于创新的生产率增长实现竞争优势，这使他们能够按照低于其竞争者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进行生产。但该机制则对国家不起作用。在那些主要从事制成品贸易的国家中，其相对平均工资水平会对其竞争力产生强大影响。在一个采用本国货币和由本国对货币政策行使主权的世界中，一个按照远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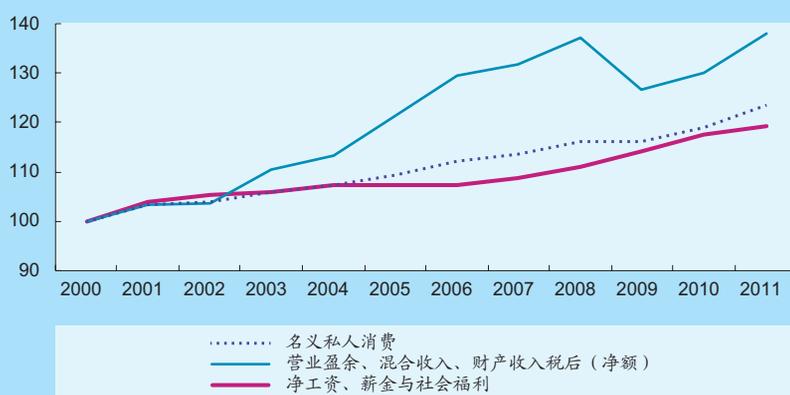
框 6.3(续)

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供应类似制成品的国家会增加其市场份额，并累积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但会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该国调整其以国际货币计算的工资和价格，因而迟早会迫使该国通过其货币升值来调整其以国际货币计算的工资。

但在货币联盟中，成员国明示或暗示地同意不选择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政策(即：将名义工资增长保持在本国生产率加上商定通胀目标这一幅度之下或之上)。在采用(欧洲央行所确定的)的将近2%的通胀目标时，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成员所暗示的协定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不会超过该比率。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将其生产率增长(不管是像德国那样按照1%的幅度，还是像希腊那样按照2%的幅度)用来增加实际工资或/和减少工作小时。如果在任何一个成员国中，单位劳动力成本或通胀偏离了通常所设定的通胀目标，则不管是上偏还是下偏，都会出现对外头寸不可持续的问题。

为提高其竞争地位，德国将其工资增长保持在其生产力增长率加上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通胀目标这一幅度之下，这不仅带来了欧元区内的不平衡问题；而且也未能在其本国取得成功。尽管在货币联盟推出后不久德国出口开始急剧上升，但国内需求与实际工资一样没有发生变化。这破坏了其国内市场的动力，加剧了其贸易伙伴的脆弱性(见图)。

2000-2011年德国的消费与收入
(指数, 2000年 = 100)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2012年1月。

注：2011年第四季度的估算收入。

以劳动力取代资本的希望落空了，按照给定产出增长水平增加就业的希望也落空了。此外，德国的尝试给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其他成员带来了惨重后果，这些国家失去了其市场份额。如果德国不大幅提高其工资水平，其他国家将需要在数年中通过降低其工资来恢复其国际竞争力。但时间证明这是错误的：工资下降使国内需求下降，并使当前衰退加剧，在出口份额较小(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尤其如此。由此带来的萧条是政治上所不能维持的，希腊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贸易赤字。这种高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利差交易，即：根据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利率差异所进行的货币投机——最近，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率非常低，这种投机已大幅上升。在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增长很快的情况下，高估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也可能严重削弱一国实现其生产结构多元化的能力。

货币市场这种错误定价给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对整个经济产生了影响，因此，不能在企业一级加以解决。为适当处理这种冲击，需要对有关货币进行升值或贬值，而不是由赤字国家削减工资。欧元区的近期例子和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早期例子明确显示，努力通过全方位削减国内工资，不能解决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出口在总需求中的占比通常很小，因此，这方面的更强竞争力对增长的预期影响速度还不足以防止工资下降之后国内需求下降所引发的深度衰退。此外，在若干各贸易伙伴国家同时削减工资时，则会出现合成谬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低工资对竞争力所带来的影响大部分都被耗尽。相反，贬值有利于制造商出口，但不会对内需直接产生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可击退进口需求，从而刺激人们对国物的需求。

因此，为确保效率，应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调整进程纳入一个合理的全球或区域货币体系；否则，外部宏观经济冲击将继续威胁上述调整的顺利进行。为减缓宏观经济冲击，名义汇率变化应反映各国之间的基本面变化(即：通胀率差异，或者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差异)。这样，如果按照国家贸易伙伴的货币进行测算，则可在国家一级实现单位劳动力

成本变化的均等化。这可最有效地防止实际汇率失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也可最有效地应对过高估值压低工资从而加大不平等水平这一潜在风险。同时，避免国际贸易中以邻为壑行为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一个系统具有一个能与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保持一致的汇率格局。在那些具有开放资本市场的国家中，与通胀或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保持一致的汇率可扩大国家货币政策的施展空间，这种政策可通过鼓励固定资本投资来促进增长。

为适当处理宏观经济所受到的冲击，需要对有关货币进行升值或贬值，而不是由赤字国家削减工资。

国际框架另一重要内容是国家对固定资本迁址的处理方式。当贫/富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可为外国投资者带来提高利润的机会时，可能会推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这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正如本《报告》所提议的那样，按照本国生产率

增长进行实际工资调整的规则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都缺乏实施有效收入政策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机构，包括工会和雇主协会。

因此，在确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条件时，应通过那些能对适当工资调整予以适当重视的原则发挥重要作用。可列入的条件之一是，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按照总生产率增长加上国家通胀目标的原则来调整工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企业将能为国内企业确定一个标准。为提高效率，所有作为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或者努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都应对这些政策进行协调。这可能是避免过度工资竞争所必要的——这种竞争将最终以较高的利润形式仅使外国企业受益，或者以较低价格的形式使外国消费者受益。

通过那些能够提升绝对生产率的先进技术与东道国低下的绝对工资水平相结合，通常能使外国投资者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但遵守上述工资调整规则决不会使他们丧失这种利润。他们所要确保的工资增长不是与其自身的生产率增长挂钩，而是与整个东道国的平均增长水平相挂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规则类似于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低薪酬国家的外国企业如不愿意按照这种方式调整工资，则说明他们不遵守市场原则。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第三个领域与国家间竞争有关。一种广泛的认知是，加速的全球化正迫使各国按照类似于公司的方式展开竞争。这一观点认为，国家财富取决于各国是否有能力在开放的货物与资本市场带来各种挑战的情况下，有效进行调整。具有优越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国家会面临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那些具有较多劳动力供应和较薄弱劳动力市场机构的贸易伙伴，反之亦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新出现的大量闲置劳动力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并使低工资和高工资在某个居间点附近达到均衡。

如前所述，工资份额下降不是全球化的“天然”副产品，适用于公司竞争的模型不适用于国家，尤其不适用于那些具有独立货币的国家。在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中，各公司通过差异化的生产率和利润展开竞争。他们必须接受劳动力价格，在一个具有不同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上，该价格的确定方式与资本价格相同。因此，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给那些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货物和服务所带来的特定增加值。公司如能通过创新提高其生产率，并能按照低于其竞争对手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生产新产品，则可按照较低价格供应其商品或者按给定价格获得较高利润。

但该机制不适用于国家。不管工资是从整个经济体角度集中谈判的结果，还是一个具有很大大劳动力流动性的灵活市场所带来的结果，类似职业的工资往往都会大致相同。因此，与公司不同的是，必须将国家视为工资制定者，而不是工资接受者。因此，当生产率优势表现为较高的名义和实际工资时，则整个经济体平均生产率的更强劲增长不会提高所有公司相对于世界其余经济体而言的竞争力。

但即使将生产率成果用来降低价格，而不是转变为较高的实际工资，这也不一定会改善该国的竞争力或其所有企业的竞争力。在一个持续通过工资倾销政策改善其竞争力的国家中，按照其贸易伙伴货币表示的价格也不一定低于世界上其余国家的价格。在一个采用本国货币和本国货币政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供货价格如果要低得多，则会赢得市场份额和积累大量的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但会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该国调整其以国际货币计算的工资和价格，因而迟早会迫使该国通过其货币升值来进行这种调整。

所要采用的原则显而易见：在边境对贸易与资本流动日益开放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和金融系统的设计应使全球劳动力分工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公司在世界其余国家的公司面前不会成为永远的输家。如果一国名义工资的增长一直超过生产率的总体增长，而且超过幅度大于其贸易伙伴，那么该国则有可能陷入不可持续境地。这是因为其大部分公司要么不得不抬高其要价，要么永久失去其市场份额，或者为避免市场份额流失而接受较低的利润。但在开放市场中，必须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缩小该国与世界其余经济体之间在价格竞争力方面的差距。

在目前的全球化时代，很多国家都会努力通过低估其汇率来维护其竞争地位。尽管从长远来说，该战略不会成功，但政府操纵汇率、压缩工资、利用补贴和降低公司税的风险则一直存在，需要制止这种能从表面上改善其本国生产者国际竞争力的“新重商主义”。所有国家可同时通过推进其生产率、工资和贸易，来改善其总体经济福利，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同时实现经常账户盈余或较高的市场份

额。连续数轮的竞争性贬值或者竞相降低工资或税收会适得其反，而且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因此，需要有一个能够超越现有贸易政策国际规则框架的国际行为规范，包括世贸组织的“国际收支条款”（世贸组织，2012年）。在一国政策有可能损害其贸易伙伴和破坏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情况下，该规范应责成该国按照通胀或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差异来调整其名义汇率。

E. 结 论

过去几个年代的经验显示，在面临那些会使失业率上升的冲击时，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不会使经济体更有抵御能力。相反，会使经济体更脆弱。低于生产率增长的工资增幅以及工作不确定性的加剧会给内需稳定带来系统化破坏。正如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夕那样，如通过住户债务的增加或者股票市场/住房泡沫所带来的利得来弥补内需增长缺口，则不具有可持续性。

市场经济运行不能完全依靠所假设的灵活市场和所有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价格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比这重要得多的是，需要通过各种安排让创新活动的投资者能够将经济推向更高级的活动和结构转变。尤其是，这类安排将包括各种用以确

保劳动力市场运行正常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第一，将平均工资增长率以及适当情况下的最低工资与经济体按照总生产率增长测算的总体表现相挂钩；第二，根据目标通胀率对该增长进行调整；第三，根据各国国情，尽可能确保整个经济体内类似资格者的工资水平类似，而不是由个别企业自行决定。

一项全面的收入政策，需将工资和生产率增长挂钩，并对法定最低工资以及有关较贫困家庭的紧密社会安全网做出相应规定，这有利于确保投资动力和货币稳定。

金融危机期间失业达到新顶峰之际所重现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这类安排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显然未能回到可持续增长之路，尤其是，发达国家未能恢复其国内需求，这是一个应引以为戒的信号。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相信公司和政府会让他们分享适当份额的集体劳动收入，那

么收入增长本身会受到很大损害。重新吸取以往有关公平性和分享方面的某些教训是最终战胜危机和致力于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的唯一方式。

以本章所述原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全面收入政策，包括法定最低工资和有关较贫困家庭的紧密社会安全网，不会妨碍那些基于投资动力和货币稳定的成功经济战略。相反，将有助

于稳定住户对收入的预期及其消费，从而将大多数经济体中那些能对有效需求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决定性因素与供应潜力的扩大联系起来。此外，还使货币政策更能激励投资和增长。最后，还可以在不带来重大干扰的情况下，为我们处理负面的供应方冲击提供灵活性，因为这种政策有助于我们预防限制性货币政策有可能带来的额外需求下调负担。 ■

注 释

- 1 如果消费者怀有悲观情绪，那么需求甚至会在工资削减之前下降。例如，工会成员在就未来消减工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或者发生了罢工和示威，那么私人住户可能会因为降薪预期而减少其消费。
- 2 有鉴于此，如果认为，“利润导向型增长”可能会带来类似于“工资导向型增长”的结果(实际工资下降或上升)，而这种结果要视有关国家的开放程度而定(Onaran和Galani, 2012年)，则有误导性。
- 3 《金融时报》，Draghi敦促欧元区将重点放在增长上，2012年5月4日。
- 4 供应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有其自身原因。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也最好将工资调整与平均生产率增长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劳动力谈判权以及一般情况下或企业一级的资本相联系(见D.2节)。
- 5 这一点也为凯恩斯所承认，在论及市场经济时，他指出“诱使他们生产这种而非那种商品的是总利润率变化”(凯恩斯，1936年：第141页)。
- 6 2002年的石油、矿产和金属制品价格逐步上升后，人们越来越担心，有关公司的投资回报飙升了，但相关东道国的租金份额却依然没有变化，甚至还下降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与非洲开发银行，2007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09年；2010年《贸发报告》，第五章)。

参考文献

- Barkbu B, Rahman J, Valdés R et al. (2012). Fostering growth in Europe now.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 12/07, June. Washington, DC, IMF.
-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6). Economists' statement. Hundreds of Economists Say: raise the minimum wage. Available at: http://www.epi.org/page/-/pdf/epi_minimum_wage_2006.pdf.
- Elmeskov J, Martin J and Scarpetta S (1998). Key lessons for labor market reforms: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experience.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5(2): 205–252.
- G-20 (2012). Boosting job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G20 countries. A joint report by the ILO, OECD, IMF and World Bank. June.
- Hayek F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MF and G-20 (2012). Euro area imbalances. Annex to *Umbrella Report for G-20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g20/pdf/map2012/annex2.pdf>.
- Keynes JM (1930/1971). A treatise on mone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V. London, Macmillan and 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 Keynes JM (1936/1973).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VII. London, Macmillan and 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 Nickell S (1997). Un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Europe versus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3): 55–74.
- OECD (1994). *The OECD Jobs Study*. Paris.
- Onaran Ö and Galanis G (2012). Is aggregate demand wage-led or profit-led?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31,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 Siebert H (1997).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At the root of unemploy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3): 37–54.
- UNCTAD (TDR 199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6.II.D.6,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5).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Features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5.II.D.1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0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Commodity Prices, Capital Flows and the Financing of Invest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D.21,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TDR 201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mployment,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D.3, New York and Geneva.
- UNECA (2009). *Africa Review Report on Mining*. E/ECA/CFSSD/6/7. Addis Abab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 UNECA (2010).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10, Promoting high-level sustainable growth to reduce unemployment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K.1, Addis Ababa, Ethiopia.
- UNECA-AfDB (2007). The 2007 Big Table. Managing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Summary Report.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1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uneca.org/thebigtable/>.
- WTO (2012). Understanding on the Balance-of-Payments Provisions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09-bops.pdf.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www.unctad.org)

联合国贸发会议若干出版物

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危机后世界的政策挑战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1.II.D.3
ISBN 978-92-1-112822-2

- 第一章 当前世界经济的趋势和问题
- 第二章 金融危机的财政方面及其对公共债务的影响
- 第三章 财政空间、债务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
- 第四章 金融再监管与重组
- 第五章 金融化商品市场：最新动态与政策问题
附件：商品衍生品市场监管改革
- 第六章 全球货币秩序与国际贸易体系

2010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就业、全球化与发展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0.II.D.3
ISBN 978-92-1-112807-9

- 第一章 全球危机之后：脆弱而不平衡的复苏
附件：信用违约掉期
- 第二章 恢复全球平衡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附件：恢复全球平衡对贸易和就业的影响模拟：技术说明
- 第三章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创造就业和失业
- 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革和创造就业
- 第五章 持续增长、创造就业和减贫政策框架的修订

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应对全球危机
缓解气候变化与发展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II.D.16
ISBN 978-92-1-112776-8

- 第一章 全球危机的影响和短期对策
附件：全球衰退加剧了粮食危机
- 第二章 商品市场的金融化
- 第三章 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关于更安全更稳健金融体系的政策
- 第四章 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
- 第五章 缓解气候变化与发展

200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商品价格、资本流动与投资的融资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8.II.D.21
ISBN 978-92-1-112752-2

- 第一章 当前世界经济的趋势和问题
第一章附表
- 第二章 商品价格飞涨和不稳定性
- 第三章 国际资本流动、经常账户差额和发展融资
附件：扩张性和收缩性经常账户逆转相关决定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 第四章 国内融资来源和产能投资
- 第五章 千年发展目标的官方发展援助和经济增长
附件：关于经济计量研究的详细资料
- 第六章 与发展中国家国家外债有关的当前问题

2007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区域合作促进发展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II.D.11
ISBN 978-92-1-112721-8

- 第一章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第一章统计数据附件
- 第二章 全球化、区域化和发展挑战
- 第三章 “新区域主义”与南北贸易协定
- 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和贸易一体化
- 第五章 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
附件1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附件2 海湾合作委员会
- 第六章 贸易物流、能源和产业政策的区域合作

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全球伙伴关系和国家发展政策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II.D.6
ISBN 92-1-112698-3

- 第一章 全球失衡：体系问题
附件1：初级商品价格和贸易条件
附件2：储蓄/投资辩论的理论背景
- 第二章 制订发展战略——超越《蒙特雷共识》
- 第三章 外部发展环境的变迁和趋势
第三章附表
- 第四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 第五章 支持生产动力的国家政策
- 第六章 支持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治理安排

2005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全球相互依存的新特点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5.II.D.13
ISBN 92-1-112673-8

- 第一章 当今世界经济热点问题
- 第二章 收入增长和亚洲贸易结构的转变
- 第三章 贸易条件的演变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附件：石油和采矿租金的分配：以1999-2004年的拉丁美洲为例
- 第四章 迈向新型的全球依存关系

* * * * *

1981-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30年的发展与思考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2.II.D.5
ISBN 978-92-1-112845-1

第一部分 1981-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30年的发展与思考

- 1. 引言
- 2. 相互依存
- 3. 宏观经济学与金融
- 4. 全球经济治理
- 5. 发展战略：评价与建议
- 6. 展望

第二部分 关于“发展与思考：贸易和发展报告30年”的小组讨论
开幕词

Anthony Mothae Maruping

《贸发报告》的起源和思想演变

Richard Kozul-Wright的介绍性发言

Rubens Ricupero的发言

Yulmaz Akyüz的发言

《贸发报告》有关发展战略的提议

Taffere Tesfachew的介绍性发言

Jayati Ghosh的发言

Rolph van der Hoeven的发言

Faizel Ismail的发言

《贸发报告》的宏观经济论据

Charles Gore的介绍性发言

Anthony P. Thirlwall的发言

Carlos Fortin的发言

Heiner Flassbeck的发言

国际经济治理问题的演变

Andrew Cornford的介绍性发言

Jomo Kwame Sundaram的发言

Arturo O'Connell的发言

未来之路

Alfredo Calcagno的闭幕词

辩论总结

* * * * *

2008-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 与发展中国家

Sebastian Dullien、Detlef J. Kotte、
Alejandro Márquez与Jan Priewe(编辑)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1.II.D.11
ISBN 978-92-1-112818-5

导言

危机 —— 传播、影响和特点

Jan Priewe

问题出在哪里？全球金融危机的其他解释

Daniela Magalhães Prates和Marcos Antonio Macedo Cintra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Jörg Mayer

商品市场金融化与商品价格波动

Sebastian Dullien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风险因子：从2008-2009年动荡中吸取的早期教训

危机 —— 国家和区域研究

Laike Yang和Cornelius Huienga

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影响与政策反应

Abhijit Sen Gupta

在全球衰退期间维持增长：印度的案例

André Nassif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巴西和印度：直接影响和经济政策反应

Patrick N. Osakwe

非洲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对策和机遇

瞻望未来 —— 政策议程

Alejandro Márquez

施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摘要和评论

Ricardo French-Davis

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改革：从顺周期办法到逆周期办法

Jürgen Zattler

特别提款权在全球货币体系内外可能发挥的新作用

Detlef J. Kotte

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经济治理

* * * * *

全球经济危机： 系统失灵和多边补救措施

贸发会秘书处系统问题与经济合作工作组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II.D.4
ISBN 978-92-1-112765-2

第一章

危机预言

第二章

金融监管：今天有危机今天解决

第三章

商品期货交易金融化的管理

第四章

汇率制度和货币合作

第五章

共同努力克服系统危机

* * * * *

这些出版物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由National Book Network转交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地址：15200 NBN Way, PO Box 190, Blue Ridge Summit, PA 1721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免费电话：+1-888-254-4286；免费传真：+1-800-338-4550。电子邮箱：unpublications@nbnbooks.com。网址：<https://unp.un.org>。

**区域货币合作与促增长政策：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新挑战**

联合国出版物，UNCTAD/GDS/2010/1

- 第一章 问题出在哪里?拉丁美洲的增长和宏观经济价格分析
- 第二章 区域货币合作与促增长政策
- 第三章 区域支付体系与苏克雷倡议
- 第四章 政策结论

* * * * *

金融化商品市场中的价格形成：信息的作用

联合国出版物，UNCTAD/GDS/2011/1

1. 此项研究的动机
2. 商品市场中的价格形成
3. 价格和基本面的近期演变
4. 商品价格形成的金融化
5. 实地调查
6. 政策因素与建议
7. 结论

* * * * *

这些出版物可在www.unctad.org网站上查阅, 也可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处出版助理室索要副本, 地址: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传真: +41-22-917-0274。

贸发会议讨论论文

No. 206	Dec. 2011	André NASSIF, Carmem FEIJÓ and Eliane ARAÚJO	The long-term “optimal” real exchange rate and the currency overvaluation trend in ope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case of Brazil
No. 205	Dec. 2011	Ulrich HOFFMANN	Some refle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green growth illusions and development space
No. 204	Oct. 2011	Peter BOFINGER	The scope for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s
No. 203	Sep. 2011	Javier LINDENBOIM, Damián KENNEDY and Juan M. GRAÑA	Share of labour compensa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discussions towards a growth strategy
No. 202	June 2011	Pilar FAJARNES	An overview of major sources of data and analyses relating to physical fundamentals in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
No. 201	Feb. 2011	Ulrich HOFFMANN	Assuring food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Key trade and development issues of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No. 200	Sep. 2010	Jörg MAYER	Global rebalancing: Effects on trade flows and employment
No. 199	June 2010	Ugo PANIZZA, Federico STURZENEGGER and Jeromin ZETTELMAYER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debt
No. 198	April 2010	Lee C. BUCHHEIT G. MITU GULATI	Responsible sovereign lending and borrowing
No. 197	March 2010	Christopher L. GILBERT	Speculative influences on commodity futures prices 2006–2008
No. 196	Nov. 2009	Michael HERRMANN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imes of high commodity prices
No. 195	Oct. 2009	Jörg MAYER	The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financial and commodity markets
No. 194	June 2009	Andrew CORNFORD	Statistic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 banking services: Requirements, availability and prospects
No. 193	Jan. 2009	Sebastian DULLIEN	Central 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redit cre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o. 192	Nov. 2008	Enrique COSIO-PASCAL	The emerging of a multilateral forum for debt restructuring: The Paris Club
No. 191	Oct. 2008	Jörg MAYER	Policy space: What, for what, and where?
No. 190	Oct. 2008	Martin KNOLL	Budget support: A reformed approach or old wine in new skins?
No. 189	Sep. 2008	Martina METZGE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No. 188	March 2008	Ugo PANIZZA	Domestic and external public deb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o. 187	Feb. 2008	Michael GEIGER	Instrumen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1994–2006
No. 186	Jan. 2008	Marwan ELKHOURY	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 * * * *

贸发会议讨论论文可在www.unctad.org网站上查阅，也可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处出版助理室索取，地址：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传真：+41-22-917-0274)。

24国集团讨论论文集

24国集团国际货币事务和发展政府间小组的研究论文

No. 59	June 2010	Andrew CORNFORD	Revising Basel 2: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o. 58	May 2010	Kevin P. GALLAGHER	Policy Space to Prevent and Mitigate Financial Crise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No. 57	December 2009	Frank ACKERMAN	Financing the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Meas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o. 56	June 2009	Anuradha MITTAL	The 2008 Food Price Crisis: Rethinking Food Security Policies
No. 55	April 2009	Eric HELLEINER	The Contemporary Reform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and Lessons from the Past
No. 54	February 2009	Gerald EPSTEIN	Post-war Experiences with Developmental Central Bank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Hopeful
No. 53	December 2008	Frank ACKERMAN	Carbon Markets and Beyond: The Limited Role of Prices and Taxes in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No. 52	November 2008	C.P. CHANDRASEKHAR	Global Liquidity and Financi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Trends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No. 51	September 2008	Ugo PANIZZA	The External Debt Contentious Six Years after the Monterrey Consensus
No. 50	July 2008	Stephany GRIFFITH-JONES with David GRIFFITH-JONES and Dagmar HERTOVA	Enhancing the Rol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
No. 49	December 2007	David WOODWARD	IMF Voting Reform: Need, Opportunity and Options
No. 48	November 2007	Sam LAIRD	Aid for Trade: Cool Aid or Kool-Aid
No. 47	October 2007	Jan KREGEL	IMF Contingency Financing f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ith Access to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al to Create a Reserve Augmentation Line
No. 46	September 2007	José María FANELLI	Regional Arrangements to Support Growth and Macro-Policy Coordination in MERCOSUR
No. 45	April 2007	Sheila PAG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Aid for Trade Initiative
No. 44	March 2007	Injoo SOHN	East Asia's Counterweight Strategy: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No. 43	February 2007	Devesh KAPUR and Richard WEBB	Beyond the IMF
No. 42	November 2006	Mushtaq H. KHAN	Governance and Anti-Corruption Refo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ies, Evidence and Ways Forward
No. 41	October 2006	Fernando LORENZO and Nelson NOYA	IMF Policies for Financial Crises Preven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No. 40	May 2006	Lucio SIMPSON	The Role of the IMF in Debt Restructurings: Lending Into Arrears, Moral Hazard and Sustainability Concerns
No. 39	February 2006	Ricardo GOTTSCHALK and Daniela PRATES	East Asia's Growing Demand for Primary Commodities –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 * * * *

24国集团讨论论文集可在www.unctad.org网址上查阅,也可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处出版助理室索要副本,地址: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传真: +41-22-917-0274。



调查表

《201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为改进《贸易和发展报告》的质量和针对性，贸发会议秘书处乐于了解贵方对本出版物的看法。请填写以下问卷，然后将问卷寄往：

Readership Survey
Division o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CTAD
Palais des Nations, Room E.10009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Fax: (+41) (0)22 917 0274
E-mail: tdr@unctad.org

非常感谢贵方给予我们的合作。

- | 1. 贵方对本出版物的评价如何？ | 优 | 良 | 中 | 差 |
|------------------|--------------------------|--------------------------|--------------------------|--------------------------|
| 总体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问题的针对性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分析的质量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政策结论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 编排方式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input type="checkbox"/> |

2. 贵方认为本出版物有哪些强项？

3. 贵方认为本出版物有哪些弱项？

4. 贵方使用本出版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分析和研究	<input type="checkbox"/>	教育和培训	<input type="checkbox"/>
制定政策和管理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请说明)	_____

5. 以下各项中哪一项与贵方的工作领域最为接近？

政府	<input type="checkbox"/>	国有企业	<input type="checkbox"/>
非政府组织	<input type="checkbox"/>	学术或研究	<input type="checkbox"/>
国际组织	<input type="checkbox"/>	媒体	<input type="checkbox"/>
私有企业机构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请说明)	_____

6. 填写人的姓名和地址(可不填)：

7. 贵方是否还有任何其他意见？



